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旧上海的帮会

朱学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87
K250.6
7
:54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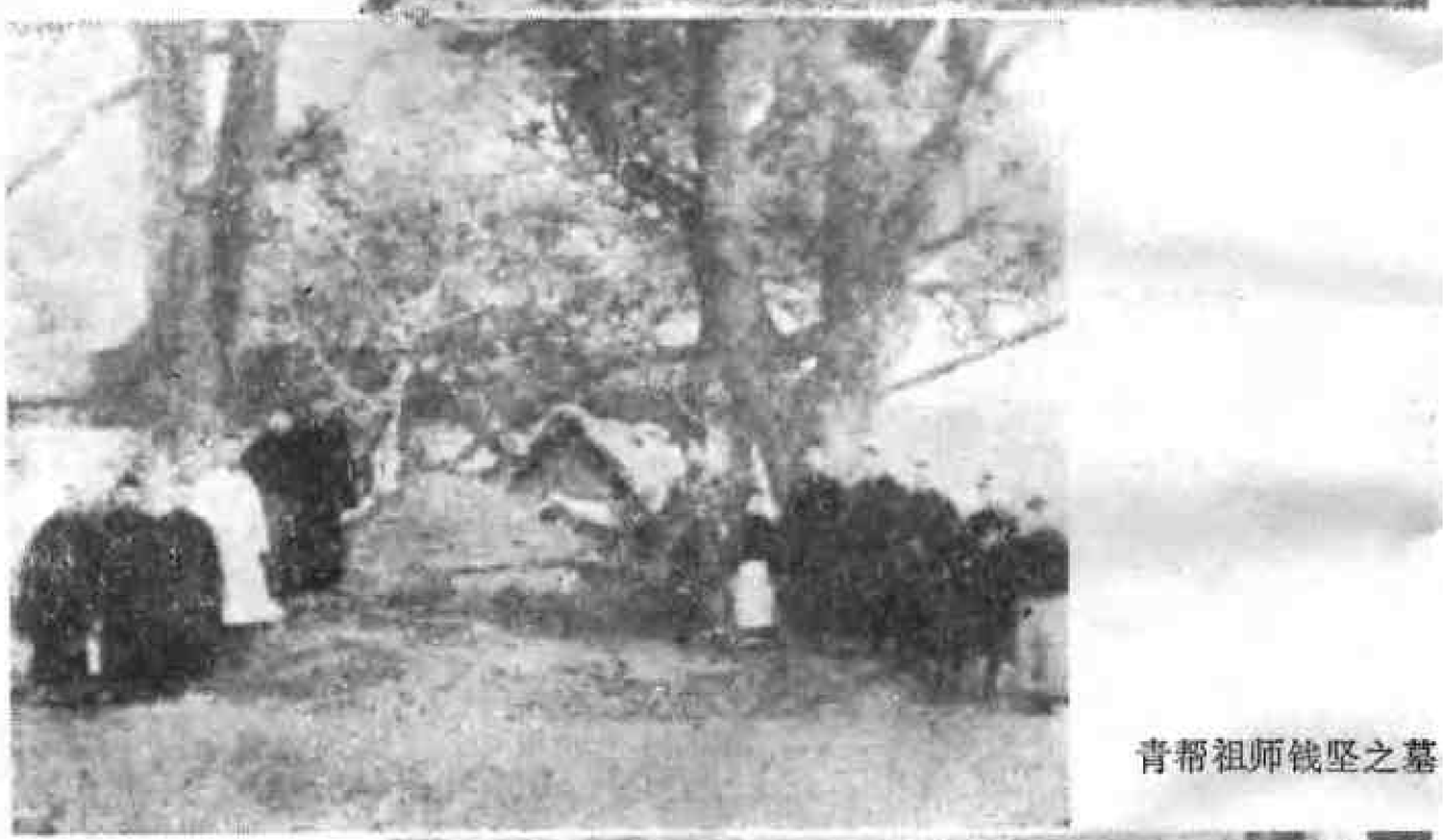
旧上海的帮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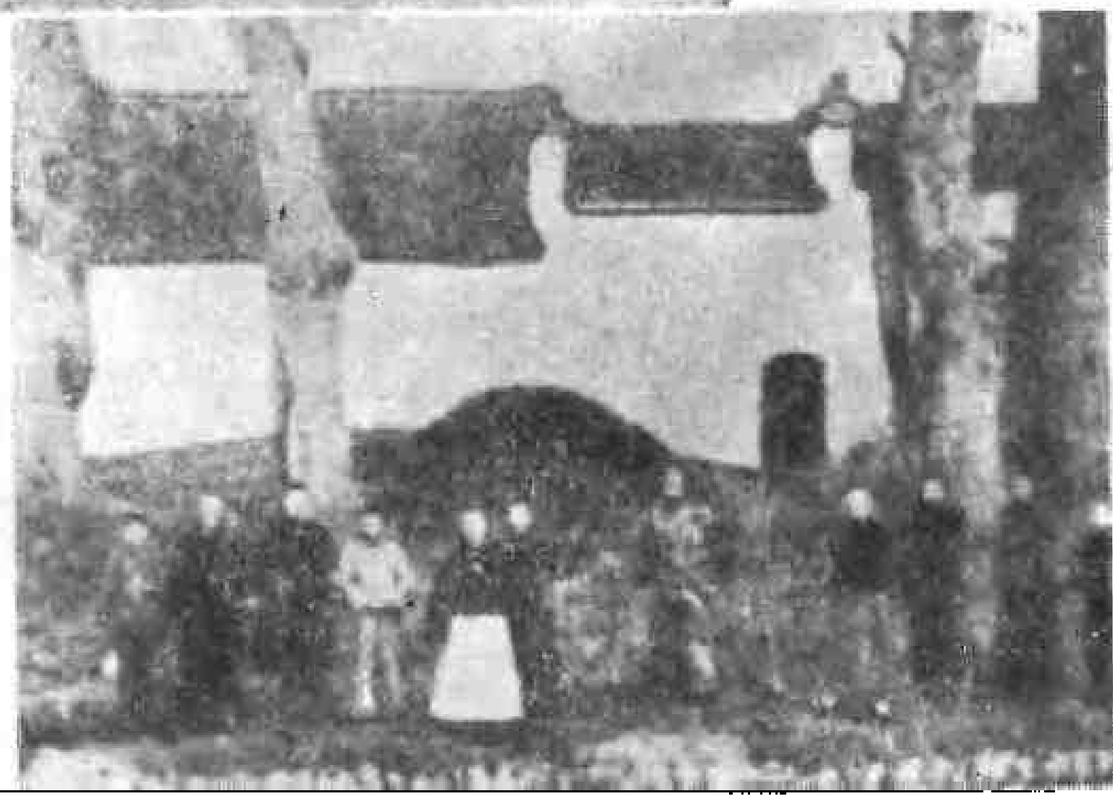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3200307

青帮祖师翁岩之墓



青帮祖师钱坚之墓



青帮祖师潘清之墓

Yt244/27

编辑说明

一、为了贯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提出的向专题化、系统化发展的方向，我们除继续编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外，计划从今年起，根据上海近现代历史特点，陆续编辑出版一些专辑。这本《旧上海的帮会》是初步的探索。

二、本辑稿件来源，一部分是本会历年积存未发表的旧稿；一部分是国内书刊已发表的文章，经征得作者或有关方面同意转载；还有较多篇幅是新近约请熟悉帮会情况和参加过帮会的同志所写的综合性叙述，或亲身经历与见闻，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同志在公务繁忙中，为我们撰写专文，并亲题书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魏建猷同志长期从事会党历史研究，在患病休养中，为我们撰写序言，并审阅了部分稿件。在此统致谢意。

三、关于青帮、洪帮的名称，有多种提法，本辑各篇，基本上采用作者各自的叙述，不强求一律。

四、上海的帮会问题情况复杂，涉及面广，当年亲历其事的人物大都去世，加之我们征集的对象不够广泛深入，因此本辑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有些情节，作者回忆互有出入，一时难以完全核实，只能诸说并存或适当加注，希望知情人补充、订正。对编辑工作中

的缺点错误，也希望读者批评指出，以便改进。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四月

序　言

魏　建　猷

中国近代的帮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产物，上海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的集结点，研究上海帮会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地方史不可缺少的部分。

上海帮会是从鸦片战争后兴盛起来的，经过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发展到它的极盛时期，辛亥以后至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是其逐渐没落和消亡时期。它的兴盛和衰亡，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相联结。它在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官僚资产阶级随之出现的复杂历史条件下兴盛起来，一度扮演过时代的重要角色，又随民主革命的发展而日趋没落，终至消亡。

上海帮会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在积极、消极两方面都起过较大作用。它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曾大显身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但又常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反动势力相勾结，做过不少危害人民的勾当。特别在它的后期，如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租界当局的鹰犬，与蒋、汪伪特务勾结祸国殃民的罪行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帮会虽然消亡了，但是我们在十年浩劫期间，仍可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言论和行动中，隐约窥见帮会的阴影和流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深刻探求这些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上海帮会史的研究，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但迄今仍属薄弱环

节，大量的史料任其散佚，原有档案无人整理，活资料无人采访，旧的禁区无人过问，新的禁区无人突破，研究工作未曾开展，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仅见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及《上海小刀会起义》二书，此外，有质量的论著不多。至于民国时期的上海帮会，几乎无人问津，近年始见到《杜月笙正传》和澳门出版的翻译本《杜月笙传》。须知民国以后，虽为上海帮会没落衰亡时期，但又是它的恶性膨胀时期，许多帮会头子广收门徒，长期利用上海租界，勾结中外反动势力，为虎作伥，大规模贩卖鸦片，开设赌场，横霸街坊，鱼肉人民，实为帮会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对此不加分析研究，实为憾事。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及其编辑室响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号召，打破"左"的观念，解放思想，根据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编辑整理了有关上海帮会的史料专辑。在本书中，既有黄金荣、杜月笙等的亲友门徒对其出身家世、"发迹"过程、重要事迹的真实回忆，又有个中人物对社会黑暗面的亲见亲闻；既揭露了这股邪恶势力的种种肮脏行径，又反映了某些帮会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革命力量引导运用的情况。本书以其生动丰富的内容，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比较翔实可信的资料，又可帮助青年一代了解旧上海的种种丑恶和帮会流氓的重重黑幕，从而增强警惕，激发对新中国、新上海、新生活的热爱。

本书的编辑出版，为帮会史研究开辟了先河，实属难能可贵，空谷足音，闻之跫然而喜。本书所辑，大多属于亲见亲闻，虽或事隔多年，不免挂漏讹误，见仁见智，容有偏颇缺失，但多属第一手资料，足资参考。爰书鄙见，弁诸简端。

一九八六年四月

一九一九年，青帮十七位大字辈人物在沪召开恳亲会时合影(后排左起：步章五、吴省三、高士奎、荣华亭、张蔚斋、李春利、樊瑾成。中排左起：梁绍堂、刘登阶、张树声、赵德成、曹幼珊。前排左起：袁克文、周慕臣、李琴堂、阮慕白、程孝周)

黄家花园大门

杜月笙在中汇银行办公室

宁波同乡会为虞洽卿祝七十寿辰

左起第五人为王晓籁，第六人为虞洽卿，第八人为张啸林，第九人为杜月笙

目　录

编辑说明……（1）
序言……魏建猷（1）

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朱学范（1）
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段资料……吴成芳（21）

青帮早期组织考略……李世瑜（29）
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姜　豪（51）
洪门历史初探……姜　豪（68）
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薛畊莘（87）

张仁奎与仁社……洪维清（108）
我的老师袁寒云……陈惕敏（115）
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徐晓耕（126）

黄金荣事略……乡　波（131）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程锡文口述、杨展成整理（138）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黄振世口述、何国涛整理（167）

关于杜月笙……范绍增口述、沈醉整理（195）

28

杜门话旧……黄国栋口述、罗醴泉整理(248)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郁咏馥(268)
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黄永言(284)
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黄炳权(293)
杜月笙与恒社……郭兰馨(300)
杜月笙与戴笠及军统的关系……郭　旭(321)

张啸林的一生……朱剑良　许维之(342)
我所知道的张啸林……俞云九(347)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石　君(350)

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王德林(357)
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顾叔平(360)

附录
恒社社章……(367)
恒社社员录……(369)

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

朱 学 范

一、帮会是旧上海工人工作中的大问题

李立三同志回忆一九二四年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的经历时，曾经说过，上海工人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第二次李启汉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立三同志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就运用他在安源对付洪帮的办法来对付青帮，结果五卅运动时，保护他的都是青帮的徒弟。他到上海，正是我考进上海邮局当邮务生的那一年。那时上海邮局内还没有青帮帮口，我对青帮还没有认识。以后我加入了青帮，并且自立帮口，利用帮会在工人中开展活动，对帮会与工人运动的关系有了相当认识，对立三同志的话有了实际的体会，而且在与世界各国工会交往中，深感中国工人运动中遇到的帮会问题及其复杂性，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中是罕见的。

民国以后，上海帮会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等操纵利用下，在政治上曾起过反动作用，成为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作过帮凶，许多帮会分子在社会上横行霸道，欺压群众。但是上海工人加入帮会的人数为什么这样多？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历史的原因是什么？对帮会在工人运动中的

作用究竟如何具体分析？这些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现在就我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一些回顾，希望对了解和研究这一系列问题有所裨益。

从解放前全国来看，上海的在业工人最多，失业工人最多，入帮会的工人也最多。一九三二年以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上海的许多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情况严重，广大职工群众为谋生而竭力挣扎。上海邮局有一次招考信差，定额只录取六十八名，但报名投考的却有二千四百多人。一九三六年冬天，招考乙等邮务员，报名报考的有三千人，只录取了五十几人。当时人们称海关的职业为“金饭碗”，银行的职业为“银饭碗”，邮局的职业为“铁饭碗”，因此吸引了不少失学、失业和谋业的大、中、小学毕业的学生。可是，进了邮局要保牢饭碗也不容易，尤其是差工随时有被开革的危险，那些外商企业对信差投递邮件找个岔子，写一封信给邮局的外籍邮务长，往往就把一个信差的“铁饭碗”砸碎。上海邮局所以入帮的职工多，帮会的帮口多，除了各帮口争权夺利、扩张势力的原因以外，职工们为了寻求靠山保障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入帮会，是一个重要原因。外勤差工，如投递信件和往码头运送邮袋的信差、差役等，还有个保障人身安全的问题，更需要有人撑腰。尤其是信差中的劳逸程度相差很大，有些人为了在职务分工上能派到轻松的位置，或者在经济上盼求工资晋级快一些（邮局实行定期晋级工资制，邮务佐、邮务生、邮务员的工资晋级快慢相差半年），需要有人支持说话。还有少数人想捞点外快，因而加入帮会。

英商电车公司的职工入帮会的也较多，主要原因同样是为了保持饭碗，怕失业。电车公司的职业虽然不及海关、邮局，但当一个工人找到英商电车公司的职位时，朋友们也会很高兴地向他道

贺，表示难得。电车公司和海关、邮局一样，也有退职金即养老金制度。邮局规定，凡职工服务满二十五年的，退职时可按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计算，发给二十五个月的养老金；超过二十五年的，每一年加发半个月。电车公司的养老金少些，凡服务满十五年，年龄已到五十五岁，退职时有二十四分之一的养老金，即满一年给半个月；服务满二十年的，满一年给一个月养老金。电车公司的职工和海关、邮局的职工一样，要想拿到这笔养老金，殊非易事，一旦被开革就不予发给。而电车公司的工人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开除。一九三七年从八一三战役到年底，短短五个月中共计被开除的职工就达一百多人。这年冬天，公司当局竟将工会代表和工会热心分子无故开除，并且利用巡捕房势力将其驱逐到外地。公司还随意给职工以各种惩罚，卖票工人差不多每月总有几次甚至十几次被喊到写字间被外国职员训斥或罚款，罚款轻则几角，重则一元两元不等。这种惩罚方式俗名"吃大菜"、"见阎王"。有些卖票工人要求减少这种处罚，就得在出事后托人向高级职员或查票员说情、送礼。还有一种处罚叫做"革班头"，就是勒令停止工作，停发工资。如卖票工人被认为有揩油、漏票、错票行为，或者外国乘客写信表示不满，就不问是非曲直，被革几天班头，不给工资，还得每天到公司去等着，等三四天到十几天，一直到派班头为止。一年内革班头的次数一多，就会被开除。开车工人、机务工人以及查票员等，都有受到种种处罚以至开除的危险。

这种职业无保障，被中外资本家随意压迫、剥削的情况，在各行各业中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被人欺凌蹂躏。于是他们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我国之有帮会，由来已久。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原始形态的民间秘密团体，在家长制统领下，结合成种种名目不同的组织，有的还拥有武装。他们曾经用这种组织求得社会生活中的互相援助，并在一定时期用以发动斗争，反抗压迫他们的官僚和地主。到了近代中国，这些组织的成员，从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扩大到现代产业工人、知识分子，以至中小民族资本家等阶层。这些组织的社会地位也从秘密存在状态逐步转到公开合法。这些组织的组成分子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为它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社会上的一股特殊的力量。

上海职工大众入帮会的人数，据估计，在邮局方面约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全市职工入帮会的比例可能更大些。若将入帮会的职工人数加上各行各业各单位职工自发组织的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等，以及地方帮口如广东帮、宁波帮、山东帮、湖北帮、江北帮等等的人数，那在全市职工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大。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大小组织里，有不少人是与帮会有联系，并以帮会为靠山的。这些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以及各地方帮口，都是广大职工在社会生活和经济斗争中的互助团体。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因素所造成的。职工大众为了求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联合，需要互助。当然，他们是不可能从兄弟会、姐妹会、关帝会和帮会这些组织中得到出路的。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还没有达到靠拢共产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由于帮会本身的落后性和狭隘性，与入帮的职工大众的切身利益也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因此在职工大众团结斗争的进程中，这些组织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有可能成为统一战

线的对象之一。另一方面，帮会中有与职工大众切身利益相对立的因素，按照李立三同志的说法，是反映在帮会内的阶级斗争。这是研究帮会应注意的问题。

二、我是怎样利用杜月笙的关系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的

（一）进入杜门的经过

邮务工会成为上海七大黄色工会（其余六个工会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工会、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工会、报业工会、南洋烟厂工会、英美烟厂工会、华商电气公司工会）之后，陆京士为了巩固对邮务工会的控制和要在上海七大黄色工会中出人头地，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邮政总局和上海邮局内挑选了十一人（包括他自己一共十二人），于一九三一年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职工事务委员会主任、杜月笙的学生陈君毅的介绍，拜杜月笙为先生，第一批是他和我二人，都是邮务生。第二批是邮务生赵树声、张克昌、肖清珊，邮务员傅德卫，交通部的杨克天，邮政总局视察员缪鸿俊，上海邮局邮务佐刘心权、于松乔，信差徐子琴，听差杨德龄。杜月笙对邮局职工投入他的门下，认为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因为邮局是中国政府办的，局长是外国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

我们进入杜门后不久，杜月笙在高桥兴建的杜氏祠堂落成，国民党和政府的显要人物从蒋介石起都送礼祝贺。陆京士和我送不起重金厚礼，想出一个既不花大钱又使杜月笙有面子的办法，就刻了一个庆祝杜氏祠堂落成典礼的纪念邮戳，专在高桥邮政支局使用。这在当时算得别开生面，人们感到新奇，杜月笙认为邮局也对他捧场，颇为得意。我们私刻纪念邮戳，照邮局规章本是不允许的，由于党政要人都纷纷向杜月笙祝贺，在上海轰动一时，邮政当局慑

于声势，只好默许。

我入杜门后不久，参加发起成立恒社。这个社名是章士钊提出的，取意是“如月之恒圆”，用以称颂杜月笙。陆京士提出，参加恒社的都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不是入杜门的学生一律都作为社员。恒社有一个圆形社徽，图案中间是一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新月。钟表示为发声之源，“声”字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为“月笙”。恒社有一个理事会处理社务，陆京士和我都是常务理事。

（二）创办大公通讯社

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上海没有一家专发工人运动消息的通讯社。一九三二年我担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当时正值一二八抗战以后，上海工商业因受战争影响，不景气情况更加恶化，中外资本家企图把所有损失都转嫁给工人，延长工时，减少工资，关厂停业，开除解雇，失业工人达数十万。工人为求生存，纷起斗争。各业各厂工人的罢工此起彼继，但是收效很少，大多数罢工归于失败。原因除资方的顽抗和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以外，罢工大都是自发的、分散的，缺乏相互支援，力量单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我是邮局出身的，深知消息传递的重要性，于是创办大公通讯社，专门采访罢工消息，逐日发布工人运动重要活动的通讯稿。通讯社设在九江路华萼坊，我任社长，邵虚白任编辑，叶翔皋任总务，开始时记者二人是卢慕琴、余耀球，后来有邵飘飘。市总工会在南市小世界对面的酱业公所里，我每天晚上不是从市总工会直接到大公通讯社，便是从别处去通讯社，总之，每晚必到，同邵虚白商量研究发通讯稿的事。我通过在各主要报馆工作的恒社弟兄，如申报馆的余空吾，新闻报馆的唐世昌，时事新报馆的蒋湘青，时报馆的

蒋忠义、蒋忠道兄弟等，采用大公社通讯稿，从此，见报的罢工消息逐渐增多，尤其是申报登的工潮消息最多。有些小厂罢工，工人自己到大公通讯社来报告，或者打电话来。通讯社经济来源有两个，一是各报馆付的稿酬，另一是我同周学湘、叶翔皋、李梦南（五洲固本肥皂厂工会）、邵虚白等开设的合作印刷所的收入。印刷所设在南市方浜桥金家坊，经理是叶翔皋，管印刷工务的是彭文美（即彭向梅），专门承印各工厂、企业的工会和工人的来件，有些印刷所不敢印的罢工传单等，就送到合作印刷所来印。因此，营业情况不错。

大公通讯社受到社会重视，与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全国邮务总工会和邮务职工会联合发起“巩固邮基运动”有很大关系。当时邮工要求：一、裁并储汇局；二、停止航空公司一切津贴；三、维持邮政一切用人制度；四、邮政经济专养邮政。五月十二日上海邮工罢工，到了二十三日，北平、天津、开封、太原、济南、南京、安庆、福州、郑州、杭州、洛阳、青岛、烟台、苏州、常州、无锡、镇江、徐州、宁波、松江等地的邮局工人都罢工，声势很大，全国震动。汪精卫把邮政总局局长钱春祺、交通部邮政司司长龙达夫撤职，并训令上海市长吴铁城劝导立即复工。上海社会各界闻人名流虞洽卿、王晓籁、史量才、林康侯、张公权、杜月笙、潘公展等七人出面调停，全国邮务总工会和邮务职工会的代表陆京士、张克昌、齐嘉谋、傅德卫、史贻堂、劳杰明、林卓午和我等八人接受调解。由上列十五人成立了一个调解委员会，提出解决的办法，于五月二十六日全面复工。所谓巩固邮基运动，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不过借题做文章。从酝酿到罢工，邮工争到的切身利益很少，仅每人每月加了津贴二元，并对年终奖金的核发标准和假期，稍有改善。因为邮工罢工影响全国，大众关心，而消息由大公通讯社独家发布，各报采用，使大

公通讯社的声誉大增，从而改变了各报不重视工运报道的状况。

（三）组织毅社

我进入杜门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对邮务工会的控制，组织毅社是为了巩固在上海市总工会中的地位和扩大在租界上各行各业工会中的势力。

从一九三二年起，我担任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委员。到一九三三年十月二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训令上海市总工会暂准备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则因内部矛盾而拒不承认，租界当局更不理睬。由于上海的主要工厂企业大部分设在租界和越界筑路地区，因此市总工会在工人中的影响微弱。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上海市总工会接到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训令，略云："查修正人民团体组织方案第二节第八项及修正指导民众运动方案第二项，关于工人团体组织，均有县市区域内之工会得联合成立总的组织之规定，兹据前项规定，由本部制定县市总工会组织准则，以为各县市制定总工会组织规章之准绳。"于是上海市总工会开始取得合法地位。

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核心除主席委员外，有五个常务委员，都是帮会中人。我自己是杜门中人，周学湘、邵虚白、叶翔皋、李梦南、龙沛云等五个常务委员投在金廷荪门下。我在一九三四年初在市总工会内部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方如升、万邦和、沈桴等，接着在上海邮局内开始收"学生"，第一批是王震百、肖浦松、李克荪等数人，以后就广泛铺开。在租界上一些主要企业如英商电车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云飞和祥生汽车公司、纱厂、橡胶厂、机器厂和轮船拖驳业里，都收有"学生"。租界以外的以

华商电气公司、闸北水电厂为收“学生”的主要对象。

一九三四年秋，我的“学生”中一部分人认为要有个团体把大家组织起来，设想成立一个叫“学术研究会”的团体，草拟了一份章程，以联络感情、交流友谊为宗旨，并设有具体研究项目。这个会酝酿了几个月，没有正式成立。一九三五年初，在一次聚餐会上又提起这件事，谈起社会上一些帮会组织一般都称作某某社，如杜月笙的恒社，金廷荪的铭社等等。于是借用“恒毅为立身之本”的意思，继恒社之后，取名毅社。并援引恒社是以杜月笙为赞助人的先例，毅社不设社长，请我为赞助人，设理监事会处理会务。社址设在南市福佑路一一七号酱业职业工会里，没有活动场所，实际上是一个通讯处。一九三六年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浦东大厦落成，那是杜月笙主持的浦东同乡会所经营的一座大厦，我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在浦东大厦内租了两间房间，才有了活动场所，正式挂起毅社的牌子。还设计了一个社徽，图案是圆形的红色底板，中心是一本翻开的书，书的周围是环形的链条。它的含义是：红色代表“朱”字，书影射“学”字，环形链条影射“范”字，表示团结互助的意思。用这个图案制成徽章，发给一些社员佩带。毅社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号召，提倡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入毅社的职工，到一九三六年上海全市共有一千几百人，分布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

毅社迅速地、广泛地发展，引起帮会各帮口的注意，也带来了种种矛盾，由于杜月笙的支持，才能够顺利解决。因为杜氏门人在各行各业里都有头面人物，在工会方面主要通过我扩大他的声势。由于陆京士已经当了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对工会事务无暇顾及，杜月笙把工界的问题都交我处

理，对我十分信任。因此，毅社在很多行业的工厂企业里的各帮口中，渐渐取得优势，在这些工厂企业里的毅社核心人员，进入了工会的领导层。他们又以结拜兄弟、姐妹的形式同一批工人义结金兰，扩大势力。我就通过一千几百个“学生”和他们结集的大批工人，与各业工会及其基层组织建立了联系，扩大了市总工会的社会基础，巩固和加强了我在市总工会的地位。但是，使市总工会受到社会的重视，能在租界地区打开局面，则主要依靠杜月笙出面调解工潮。

（四）杜月笙调解工潮

一九三二年以后，我国民族危机日深，同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与日货倾销的影响，上海工商业的景况一年不如一年，工人的处境日益困苦。上海工人为了争取生存，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据国民党官方统计，一九三二年全市罢工八十二次，罢工人数七万一千多人，劳资纠纷二百五十三起，关系到一千四百多家工厂企业。一九三三年，华商纱厂从四月份起减少开工百分之二十三，烟厂每星期开工三天至四天，橡胶厂在夏季普遍停业，十月间全市有三分之二的丝厂因丝价暴跌而关厂，全市罢工八十八次，罢工人数七万四千多人，劳资纠纷三百零一起，关系到七百多家工厂企业。一九三四年，美棉、美麦和面粉大量进口，加上日货走私、倾销，面粉厂大部分停工，纱厂普遍减工，工人大批失业，全市罢工七十三次，罢工人数三万一千多人，劳资纠纷二百三十三起，关系到九百多家工厂企业。一九三五年，全市罢工九十四次，罢工人数七万八千多人，劳资纠纷二百二十一起，关系到四百几十家工厂企业。一九三六年，北平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上海的工

人运动，工人罢工斗争达一百十次。尤其是十一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四万多人的反日同盟大罢工取得胜利，将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这几年里，国民党一面加紧“围剿”苏区，一面镇压工人运动，屡次通令严禁罢工，动辄用武装镇压和军法处理威胁罢工工人。因此，这几年中罢工斗争结果，工人取得完全胜利是少数，一九三二年为罢工总数的百分之十八，一九三三年为百分之二十九，一九三四年为百分之二十八，一九三五年为百分之十八。在这几年里，工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所以能够取得一部分胜利的主要原因，是广大工人群众的英勇战斗精神，还有一个因素是斗争到一定程度，接受调解，适可而止。一些对社会影响较大的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工厂的劳资纠纷和罢工的适当解决，杜月笙曾出面调解，起了一定的作用。下面举出我亲身经历的若干事例。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招商局全体船员约一千人推派代表向局方请愿，要求与招商局机关职工同等待遇，发给年终双薪，为局方所拒绝。八日起全体船员罢工，以后到上海的招商局轮船也相继罢工，共达十七艘。局方以“国难期间不得擅自停船”威胁船员，顽固不理。最后经杜月笙调解，议定三条：一、发给船员年终双薪（一月份发半数，其余半数在三月份发）；二、不得无故开除船员；三、如局方承认局员职工会，则对船员联合会也同样承认。这样，各轮从一月十二日起先后复航。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时事新报资方利用一二八战后失业工人激增的机会，强迫工人兼印大晚报，工人不允，资方借口将八十多名工人开除，招雇失业工人顶替。由于资方仗着国民党政府某要人为后台，这一纠纷拖延了一个多月，不能解决。六月一日，申

报、新闻报和时报一千多工人实行同盟罢工(上海各大报馆都有杜月笙的“学生”)，要求时事新报资方恢复被迫离馆工人的工作，离馆期间工资照发。资方则变本加厉，指使国民党警察局将时事新报的工人二十多名逮捕。在群众斗争的强大声势下，经杜月笙出面调解，将被捕工人全体释放，口头答允对时事新报被开除工人发给解雇费。

一九三三年八月底，英商会德丰公司资方借口生意清淡，开除一百多工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调解无效。全体工人五百多人于九月十九日罢工，一百零二艘货船全部停运，各客商纷纷向该公司责问及要求赔偿损失。经杜月笙调解，达成协议：一、对解雇的工友二十人发给退职金；二、其余八十多名工人全部复职；三、罢工期内，工资照发。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银楼业全体外作器皿工人怠工，反对资方将工资八折发给，要求恢复“三六拆账”(工人得每件工价的百分之三十六)，发清欠薪。资方借口营业清淡，拒绝工人的要求，国民党的党政机关调解无效。三月三日怠工工人十七人齐赴大东门外花园街银楼公所绝食。上海市总工会派人前往慰问，力劝他们喝牛奶，并浼杜月笙出面调解。最后商定工资实行二七拆账(工人得每件工价的百分之二十七)，上年中秋节到年底期间积欠的工资按百分之二十三付清。三月十三日全体工人复工。

美商上海电力公司新老两厂工人一千四百多人，为反对资方大批解雇和开除工人，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罢工。工会提出七项条件，其中主要的是：一、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临时工满半年者以长工论；二、收回开除工人代表命令；三、承认工会并每月津贴费用三百元；四、罢工期内工资照发等。由于

美国老板态度顽固，拒绝工会提出的要求，并勾结巡捕房强迫老工人回厂，雇用三百六十名白俄为临时工，以此来威胁罢工工人。罢工开始时职员不肯采取同一行动。罢工工人中的毅社社员挟持职员中的一个头面人物，用汽车载到华界军工路，将他推下汽车，工人向空中鸣枪两响，这个职员连声答允回去动员职员参加罢工，于是职员也罢工了。罢工僵持了五十四天，最后由杜月笙出面调解，在罢工期间工资由资方借给一个月，以后扣还。这次罢工实际是失败的，杜月笙的调解，仅仅给罢工工人挽回了一点小面子，总算有一个收场。

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四万多人力车工人于月底前登记，每人收费五角，遭到人力车工人反对。八月一日晨，公董局命令巡捕在街头强迫登记，被扣人力车数百辆。当天下午，工人在南码头开会推派代表向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市政府请愿。经党政机关调解无结果。全体工人于六日罢工，推派代表一千五百多人，从大南门出发游行，到市党部、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公董局请愿。队伍走到斜桥附近，被法租界巡捕拦阻，发生冲突，当场有工人十二人被打伤，三人被捕，一人失踪。后经杜月笙出面调解，发还被巡捕房扣留的车辆，人力车登记一律免费，登记日期延长两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全市日本纱厂四万多工人举行反日同盟罢工，提出五项条件：一、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二、吃饭要停车一小时；三、不许开除任何一个工人；四、不许拷打任何工人；五、反对礼拜日多做钟点。罢工是中共地下党员张维桢、韩念龙、周林、陈之一、郭光洲等组织发动的，得到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各社团、学校等的各种形式的支援，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上海工学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日统一行动。日本资本家为了加紧镇压，调动大批陆战队和侦探、巡捕遍布各厂、逮捕工人。由于工人坚持斗争和全市人民的支持，日商纺织业公会会长船津辰一郎不得不浼杜月笙调解。十一月二十五日，杜月笙在中汇大楼邀我和罢工工人代表二十多人，还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社会局、警察局的代表共同商定解决办法七项：一、工资增加百分之五；二、每月赏工制，现改为奖励制，成绩优良者，酌量升级加工资；三、不准无故开除工人；四、不得打骂工人；五、每日工作十二小时，礼拜日工作十四小时，其多做的二小时工作另给工资；六、吃饭时停车三十分钟；七、各厂工人一律于二十六日晨复工。在此以前，我已交涉先把被捕工人从龙华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罢工结束后，我支持丰田纱厂工人组织工人福利会。

在一九三二年以前，杜月笙曾经出面调解工潮，但次数很少，而且主要在法租界。自从我出任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后，杜月笙出面调解工潮的次数逐渐增多，范围遍及全上海。这是因为一二八抗战以后，民族危机和经济衰疲日益加深，劳资纠纷和罢工事件日益增多，市总工会在处理工潮中遇到了很多困难。首先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虽然由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管辖，但是在处理工潮问题上双方往往意见不一致。市党部和社会局总是从所谓维护社会治安、防止共产党人活动出发，站在资方一边，对工潮采取压制态度，急于平息工潮，甚至指使军警逮捕罢工工人。市总工会则认为应当采取和解办法，解决一些工人的实际困难，不同意采取高压手段，更不赞成任意逮捕工人。因此，市党部和社会局往往对市总工会施加压力，使我屈从他们。遇到这种

情况，我就求助于杜月笙。在上海市政府、市党部等机关里都有杜月笙的“学生”，如吴铁城手下管地方政治问题的王绍斋，市党部管工运并在警备司令部当军法处长的陆京士和市党部执行委员陈君毅等等，杜月笙一出面调解，当然大家都要给他面子。因为他平时不管工界的事，而且发生工潮的情况很复杂，所以他在这方面完全信赖我，为我说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杜月笙成为上海“闻人”，与他经常出面调解工潮有密切关系，我通过大公通讯社发布工潮消息总是突出杜月笙的调解作用，在每次工潮结束后，总要有关单位在各大报上登鸣谢杜月笙调解的启事，杜月笙觉得很有面子。所以他调解工潮不图利，而且我去请他出马，总是有求必应。我在处理工潮中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与中外资本家的矛盾。我是主张劳资合作的，但也坚持改良工人生活的主张，而且在各业工人中往往有我的“学生”在工潮中与资方对立。资方不仅与党政机关联合对付工人，甚至逮捕工人，有时还利用帮会中各帮口之间的矛盾，拉一帮来压另一帮（各业里的工头、稽查等中不少人属于各帮口），威胁、殴打罢工工人。遇到这样局面的时候，我就去求助杜月笙来压制资方和别的帮口。我所以能够到巡捕房和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保释工人，就靠杜月笙的关系，他去打招呼，我去办手续。

杜月笙调解工潮与国民党的党政机关的态度不完全一样，他讲究面子，自以为主持公道，要大家买他的账，听他的话。所以我往往要工人先作出一些让步，给杜月笙一点面子，推动他去压资方，强制资方作出更大的让步。有时他干脆越俎代庖代表资方答允工人的要求。他有一句口头禅，说某老板不拿出钱来，我出钱，我说话算数。在一般情况下，这句话是有效的。可是杜月笙也有

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一次他调解法商电车公司的劳资纠纷，工人依了他的条件，但资方不依，他只好拿出几千元来敷衍工人。

（五）组织帮会武装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时，我正在从马赛启程的邮轮返国途中。在轮船上听到了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谈话。八月七日到达上海，就去找杜月笙提出工人武装抗日的意见。他说，上海各界已经在七月二十二日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他和王晓籁、钱新之、潘公展、张寿镛、童行白、黄炎培、陆京士、柯干臣等为主席团，他兼筹募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募支援抗日部队的各项经费，恒社的骆清华为副主任之一。上海工人武装抗日，可由筹募委员会出钱，他出枪支。

八一三抗战爆发，杜月笙通知我，派我为别动队第三支队长，给一千五百人编制。我从勇进队中挑选了四百多人，又从各业工人中动员了一批人，在龙华寺集合，举行建队大会，我在大会上讲了话。第三支队队部设在枫林桥明星影片公司内，副官王震百、文书王宝昌，都是我的“学生”。支队设三个大队，一个大队长是水祥云，一个大队长是原勇进队的教练韩静宪，还有一个大队长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易礼容介绍何寒威教授到支队来讲政治课。我用邮局汽车从杜月笙处运来一箱手枪，发给军官，运来的步枪都是旧的，还不够每个士兵发一支。

别动队的总指挥是刘志陆，原是东北军军官，常去杜月笙公馆走动。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第一支队长是何行健，杜月笙的“学生”。队里青帮、洪门的人都有，洪门的向松坡派了一批人参加。第二支队长是陆京士，第三支队长是我，第四支队长是张业，第五支

队长是陶一珊，他是警备司令部管军事训练的，把受训的店员、学徒、青工编在这个支队里。刘志陆曾在虹桥路某处召开过一次支队长会议，发过一次饷，以后没有再召集过会议。他发过一次公文，委任我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三支队队长，上校军衔。我就去问杜月笙这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属哪里管的，杜月笙说，与戴笠有关系，这样才弄得到枪支。

八一三上海抗战坚持到十一月中旬，第三支队一直待命，没有上过前线。国民党军西撤前三天，刘志陆命令第三支队将全部步枪交给浦东第二支队。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当晚我宿在第三支队队部，翌晨天刚亮，哨岗报告，警察已撤走，两卡车日军正向枫林桥开来。当时我对部队和警察都撤走，而没有预先通知我，好生奇怪，使我毫无准备。由于我们手中只有手枪，无力抵抗，就从后门撤走，但法租界的铁门已关闭，我们就跨过肇家浜进入法租界。第二天我去找杜月笙，要解散费，将第三支队全体官兵解散。杜月笙从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拨给几千元，每个军官发六元，每个士兵发三元。我将手枪交还了杜月笙，留下了二十五支，藏在民立中学教务长吴叔和家中（我担任过民立中学秘书长，故与吴叔和相识）。后来铲除汉奸陆连奎（原公共租界巡捕房督察长）和陆伯鸿（伪维持会会长），使用了这批手枪。

国民党军西撤后，杜月笙的去向为各方面（包括敌伪方面）所关心。杨管北、陆京士和我力促杜月笙离开上海，恒社中徐采丞等则主张杜月笙留下。杜月笙听从了我们几个人的意见，同意立刻去香港。我送他到海关码头，看到他乘汽艇上了轮船才回去。过了几天我到了香港。一个月后，陆京士也来香港，同杜月笙和我会合。

三、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帮会的变化

一九三六年前后，上海的帮会不论是青帮还是洪门(洪帮)，都相当活跃，大开山门，广收徒弟。我组织的毅社，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旺盛起来，吸收大批职工入社的。这与当时的形势有极大关系。因为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职工大众更加关心社会活动，感到抵御外侮，反抗中外资本家压迫，已有的兄弟会、姐妹会等组织的力量太小，迫切要求扩大联合，参加爱国运动和一些进步活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冲击了帮会的旧体制，帮会的部分上层人物受下层群众的推动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也采取同情和支持抗日救亡的态度，参加种种活动。

杜月笙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抗战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参加了全市性抗日救亡活动。洪门的向松坡（向海潜）也以团结抗日为号召，在职工大众中开展活动。他手下的小头领在七七抗战前，召集申新五厂、六厂、七厂，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大讲团结抗战，要求兄弟们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

上海成为孤岛后，帮会内部进一步发生很大变化，一部分首领参加抗日，一部分首领变节，投向敌伪。杜月笙离开上海到香港，以后到重庆，他在上海的代理人之一姚惠泉同中共上海地下党人保持联系，帮助募集教育文化经费，并且答允在巡捕房方面有什么事，他可以想办法疏通。日伪势力侵入租界以后，职工大众为了抵御日伪凌辱，选择仍然合法存在的帮会作为保障，因此帮会的力量有所发展。

这时上海邮局内的帮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邮局原有好

多帮会社团，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杨虎、马祥生、彭柏威都在邮局职工中收门徒，我和邮局内部的傅德卫、史贻堂、张克昌、刘心权、陆克明等也在邮局职工中收门徒，各立门户。邮局职工入毅社的有三百多人，入张克昌的畅社的有二百多人，是人数较多的两个社团。我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离开上海以后，从广州到武汉，进行全国工人团结抗战的活动。张克昌投向敌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派人在上海组织汉奸工会，畅社中大多数人深明大义，不愿附敌，但也有一小部分人犹豫动摇。就在这个时候，领导上海邮局地下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同志推动畅社部分成员，以“畅社热血分子”的名义，发表了《告畅社弟兄书》，原文不长，照录如下：“仁侠好义、守信不移的畅社弟兄们：

吾人自参加本社的第一天，即宣誓为家尽孝，为国尽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弟兄们义气通天，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本社门生，个个应该在家为孝子，在国为良民，投名师，访义友，修桥补路，养老济贫。因为我们光明正大的宗旨，山高水长的义气，所以弟兄们相敬相爱，社务也因之而扩大。乃今竟有不肖分子，利用本社之名，招摇撞骗，假借会宾楼聚餐，引伪中华工人福益会秘书者高丽人林资炯，宣传投降，企图蒙昧众弟兄，危害邮政主权，既有害于国家，又陷弟兄于不义。念吾社一贯清白，今竟沦为汉奸，遗臭万年，应速警醒，表明自己‘忠孝节义，誓不做汉奸’的立场，对于勾结敌寇，认贼作父之沈某、戴某，鸣鼓而攻之，永远不使我光明磊落之社，容有此辈无耻之徒！凡我黄帝子孙，中华民族的儿女，均得擒而诛之，专此告白。”

这封公开信，震动了畅社，通过打入畅社的地下党员对社员大

众做工作，争取了畅社中的大多数站到“为国尽忠、不当汉奸”的立场上来，孤立了极少数变节分子，打击了汉奸的阴谋。

一九四〇年三月，南京成立汪伪政府，张克昌当了伪社会部副部长。当时畅社在邮局内的人数有所发展，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他们努力引导畅社下层群众一面利用合法外壳，维护自己利益，一面突破帮会的狭隘圈子，站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抗日救亡做些有益的工作。

在革命工作中运用帮会关系的片段资料

吴 成 芳

毛泽东同志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时，就指出："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本世纪初，帮会势力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曾利用这股势力为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帮会成员以游民无产者为主体，在进步的政治影响下，也存在同情革命甚至为革命出力的可能。据我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各个革命阶段，曾运用过帮会关系或通过与帮会有联系的人士进行革命工作。现追忆若干片段，供研究中国近现代革命史和社会史的同志参考。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一段时间，我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当时工作的一个方面，是由胡鄂公（又名胡南湖，当过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联系和团结一些早年曾追随孙中山，配合孙中山做过帮会工作的人士，其中有吴景濂（辛亥革命后一度任众议院议长）、张伯烈（曾任众议院副议长）等。他们当时在政治上、社会上都有一定地位，比较了解反动派的内幕，且不易为反动当局注意。这些人自辛亥革命失败后，对时局悲观失望，认为我们青年共产党员，朝气蓬勃，把革命前途寄托在我们身上。因此，当我们进行革命活动时，尽量为我们作些掩护，不时把各方面的活动情况告知我们。

胡鄂公在我党政治主张影响下，与李大钊建立了关系，并与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加拉罕往来频繁，后来加入我党，表现很好。他与杨度的私交很深，在他的影响下，杨度曾与李大钊秘密见面，胡是杨度加入共产党的引路人。一九二七年四月，杨度从奉系军阀方面得知张作霖将不顾国际惯例，搜捕住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的李大钊，他立即通知胡鄂公，胡鄂公马上告知李大钊。可惜李对这个消息未引起重视，以致被捕牺牲。

一九二九年，胡鄂公奉组织之命调到上海，参加由中共党员戴湘云负责的上海互济会工作，以后又参加反帝大同盟，成为其中的积极活动者，同时运用帮会，作了不少工作。这时候，杨度已是中共党员，也在上海，根据党的指示做帮会工作，为杜月笙聘的高级顾问。他曾想利用帮会在太湖地区的力量组织武装斗争，但是没有成功。由于杜月笙在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内有很多

门徒，我们通过杨度了解帮会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同时对杜月笙也起了些影响。杨度在一九三一年底逝世，曾留言儿子杨公庶、杨公兆，要他们继续在我党的领导下做革命工作。后来，胡鄂公根据杨度嘱托，把杨公庶、杨公兆介绍给我们。当时，杨公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把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介绍给我们，为党的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一九二七年，热河察哈尔地区有个帮会头子黄子和（又名黄守中），在当地势力较大，他手下有个重要帮手宋兰坡。中共党员毛俊（当时任北京电话局工程师，解放后曾任北京电话局副局长）、张祝堂派了耿顺清、张纪根两同志去联系宋兰坡、黄子和，想利用他们掌握的帮会力量，组织一、二千人的游击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搞起来，但在热察地区打下了一定的组织基础。到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在我党影响下，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这部分力量都参加了，黄守中任军长。

三十年代，上海有个叫宋启荣的，与浙江嵊县帮会有联系。此人曾为我党上海地下机关工作，公开身份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探，秘密掩护过我党机关，提供过重要情报。一九二九年李立三同志来沪，为其同乡所知，向敌人告密，此事正落在宋的手中，他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使立三同志得以脱险。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后，日军侵占上海，正当他们忙于清理战场，对闸北、南市许多物资还顾不上掠夺之际，我们派宋启荣配合有关方面，抢运了一些物资支援抗日部队。一九四七年，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刘善本驾机起义，飞赴延安后，其在沪家属受到

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生活来源断绝，我们利用宋启荣对刘家接济。

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通过多方面关系和各种渠道了解各方情况。在帮会方面，主要对象是帮会上层人物，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高汉声、王次宾、谭道南、邱子佩、姚文成等人。高汉声是湖北人，早年在日本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活动，袁世凯窃国时期，曾任国会议员，思想上倾向无政府主义。在上海，他曾建立“五圣山”，是洪帮头领。王次宾，安徽人，是杨虎的把兄弟，其父曾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他在上海开有鸦片烟行，社会上一般都认为他既反共又反蒋，实际上他是同情革命的。我们曾利用他表面上的落后色彩，有些政治活动让他出场，作为掩护。谭道南，湖南人，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有交情，曾任汉冶萍铁路局局长。抗战期间，他与日伪周旋，有时周佛海送些生活费，“和平军”的头子也极力拉拢他，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特务万里浪与他有联系，他们都想通过他寻求政治退路。由于有如此众多的社会关系，人们奉承他为“交际博士”。在我们与他联系后，他提供了不少情况，还动员了一些人为我们工作。邱子佩，湖北人，在上海山东路开设新昌报关行，帮会上层人物常在他那里聚会，谭道南就经常住在那里，因此，我们利用邱进行一些政治活动。姚文成，湖北人，旧知识分子，曾在上海组织洪帮山堂，在高汉声影响下，为我们工作。还有徐朗西，是帮会有名人物，也为我们作过些掩护工作。由于这些帮会人物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在日军和汪伪盘踞下，可以起到特殊的作用，使我们的政治活动，可以

根据需要，深入到各个方面。

一九三五年春，上海地下党在王明路线危害下，几乎被摧残殆尽。吴大琨、梅达君等同志通过赵朴初与上海著名人士关炯之以及青帮人物闻兰亭等的联系，出面推动佛教界组织了“和平护国法会”，借此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同年冬，又建立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主任是南京政府赈济委员会负责人许世英，董事有王一亭、闻兰亭、关炯之等。闻、关在赵朴初的影响下，对在这一团体内工作的我党同志比较支持，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赵朴初即着手在慈联会之下筹建“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会所设在云南路三十五号仁济堂内，由屈映光任主任，关炯之、闻兰亭等任副主任，赵朴初任收容股主任。一九三八年，赵朴初又推动成立“慈联会难民教导委员会”，日常事务委托由我方人员组成的教育组负责。一九三八到一九四〇年间，利用闻、关提供的经费和场地，先后共办了四、五十个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五十万人次。后来黄金荣、杜月笙门下的帮会人员一部分离开上海，滞留在沪的，大多转投闻兰亭。我们进一步利用闻的社会影响，成立由赵朴初负责的难民教育核心（即星五聚餐会）和难民军校、难民无线电训练班（新四军中的报务员、通讯员有不少是从这个班毕业的）等，深入开展难民工作，教育、动员难民参加我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和上海工厂、码头的革命斗争。在党的教育下，许多难民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骨干，有的成长为党的重要干部，为新四军和我党干部队伍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三年，日伪方面鉴于闻兰亭在工商界的影响，极力拉其

下水，担任伪“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在统制总会之下，日伪设立了三十来个经济机构，我党派同志渗入做工作。闻在我党政策感召下，提供了这些机构的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使我党比较详细地及时了解了敌伪经济活动。后来，派去的同志被捕，是由闻出面保释。抗战胜利之际，新四军一度准备开进上海，闻曾向有关同志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对帮会下层分子，我们也争取他们为抗日和革命做些有益的工作。当时福州路有个帮会头目杨安青，在我们的影响下，他利用其在码头和海关、轮船上的关系，为我们传递过一些宣传品，做过交通。还有一个姓白的帮会分子，在公共租界开茶馆，兼卖牛肉汤和葱油饼，手下有许多门徒，在他管辖范围内，流氓之间发生纠纷，都到他那儿“吃讲茶”，由他进行调解。当时永安、先施公司店职员中有不少是他的人，每当店职员与资本家斗争，掀起工潮时，他往往出面斡旋，因此两公司都聘他为顾问，定期给他报酬。但在暗中，他是同情革命的，做过一些工作，有时也接济革命者。

四

一九三八年，党派林钧、缪尚清等同志到川沙、江阴一带，开展革命工作，组织人民武装，利用当地的帮会力量，后来在沪西、浦东、崇明、启东、江阴、吴江等地组织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义勇军”（也有叫××抗日会的，简称“武抗”）。一九三九年党又派王啸琴在无锡荡口一带组织了一支三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当地帮会头目邓本殷曾响应党的号召，率领部分门徒参加。同时，缪尚清还利用帮会关系，派梅光迪和朱松寿到江阴、常州一带建立了两支抗

日武装，各有二百余人，分别由梅、朱指挥。后来邓、梅、朱三支队伍合起来约七百余人，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邓本殷任总司令兼一路司令，梅光迪、朱松寿各为一路司令。当时党派杨进同志化名陈达协助邓本殷工作。后来邓的直属队伍中有几个头头犯了纪律，受到党的处理，邓不习惯我们严密的组织纪律，自动离开了“江抗”。一九三九年间，党把江抗三支队伍先后交给在江南的军事部门领导，整编后仍称江南抗日义勇军。

一九三八年底，因工作需要，任天石同志奉党的指示，到常熟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动员部分帮会成员参加，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简称“民抗”。同时，在党的影响下，顾复生在青浦组织抗日游击队，也称为“民抗”，也有当地一些帮会成员参加。

鉴于帮会人员情况复杂，对革命的态度各各不同，因此，我们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争取大多数，使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抗战胜利后，杜月笙一度有不少物资被扣在海关，杜让手下人送礼通关节，不料海关监督张勇年及其属下不买账。杜无奈之际，要求通过我们的关系帮忙。当时我们考虑到，杜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可以答应他的要求，同时希望他在政治上能对我们有所表示，杜也承诺了。经过我们的工作和疏通，这些物资顺利地回到杜的手中，杜对此甚为感激，以后也做了些有利于我们的事。另一方面，对于顽固的帮会分子，我们给予警告或惩戒，对于极少数反动分子，在必要时，则坚决予以打击。

解放前，在各个革命阶段，我们运用帮会关系，进行不同形式的革命斗争，在组织武装、收集情报、运送物资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的获得，除了同志们的努力外，最根本的是党的政

策的正确和政治影响的深远。这个工作在整个革命斗争史上仅仅是一个方面，但认真加以总结，对研究现代史和党史是很有帮助的。

青帮早期组织考略*

李 世 瑜

青帮是清初以来流传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民间秘密结社之一。除了在其早期以及某些特殊情况下它也起过进步作用之外，一般地说，它总是具有很大危害性。尤其是民国时期，国内各派反动统治者以至帝国主义侵略者，无不与之有着彼此依存、狼狈为奸的暧昧关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它更形成蒋介石政权组织的重要社会支柱，所谓“党、政、军、帮，路路皆通”①。当时有许多城市，如果说已经成了“青帮世界”，那是诚不为过的。因此在现代史的研究中，青帮问题就不能不被列为一项重要课题。而研究现代的青帮，又不能不溯及其早期组织的种种，为此试就闻见所及撰成本文，囿于水平，未识有当否。

一、青帮的早期组织

青帮的早期组织因何而起，起于何时何地，组织情况如何，名称来源如何，起于何人，史籍缺乏明确系统的记载。然而在青帮内

---

* 此文是一九八四年八月作者在会党问题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稿，现征得作者同意，在本辑发表。

① 唐人：《金陵春梦》第一集第一六一页，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部流传的一些“通草”① 里面，却颇不乏关于其源流的考证。虽然编纂人大多为帮内粗知文墨附庸风雅分子，考证的目的不外为妄托古人以显见其源远流长，但有些资料经过剔抉印证，还是足资征信或可以取材的。

青帮的早期组织原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一种行会性的秘密结社，先从漕运说起。② 漕运是封建时代转输田赋（粮食）的一种制度，他们称这项田赋为“漕粮”或“皇粮”。清代时，统治者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南等省把粮食搜刮来之后，主要是经由运河运到北京，专供那些统治者和他们的军队以及统治集团的寄生虫们去消耗。因此青帮不论在称为“青帮”以前及以后，其发展一直是以转运漕粮的河道沿岸各大码头为基地的。

漕运的转输量很大，在清代每年运到北京的粮食共有四百多万石，运粮的船只经常有一万二千多艘，水手有十万户，大约二三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所谓“仰食者千百万”。为了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些船只和水手，他们仿照明制，设立了一个“漕运总督”。他有行政权，也有带兵权。带的兵叫“漕标”，也叫“卫军”，是专门用于镇压水手和保卫漕运安全的。他们把各地漕运组织分成许多卫、所③，卫、所下面有联，联下是帮。这套组织又统称为“粮帮”或“粮

① “通草”又称“通漕”、“通钞”、“统抄”，是帮内秘籍。版本甚多，以我所见即有印本、抄本三十余种。内容不外记录青帮历代祖师、粮船制度、帮规、仪注、黑话等。大都是驳杂荒唐，牵合成书的，但也保存了一部分青帮内部的原始资料。

② 以下讲漕运及粮帮组织的一段文字，参阅《清朝通典》及《通志》、《清朝文献通考》及《续通考》、《大清会典》、《清史稿》等书中有关漕运部分，以及《光绪漕运全书》等，因一般不引用原文，故不再一一加注。

③ 据《明史·兵志二》载，卫、所都是明代的军事编制。后来卫、所名称有的即被作为地点名称，清代因之。漕运组织中的卫、所也是沿袭了这种称谓，这也可能与漕运中的“漕标”编制有关。

米帮”。每个卫、所都有名称，如苏松卫、杭州卫、严州所、金衢所等。下面的联，记载中不常见它们的名称。帮则与他们所属的卫、所名称统一，如说江西卫四十帮、江安卫五十二帮等；但也有径称帮名的。如江淮泗总帮、兴武六帮、嘉白总帮等。各帮还因地区的丰歉或所负担任务的多寡而有分别，他们称为“高帮”、“低帮”。每个卫、所有守备，每个帮有千总，此外还有一些武举“随帮效力”，每个船有旗丁，或称帮弁、运弁、千总、旗丁等，都是些下层统治者或其爪牙，他们是比较接近水手的。

这一套统治机构中的分子联合一气，通同作弊，对上隐瞒虚报，对下克扣加派，盗窃、走私无所不为，水手叫苦连天，人民不堪其扰。当时这类问题已经形成一种专案，叫做“漕弊”。关于“漕弊”的情况，清代官方是并不讳言的。如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就有一道上谕说：“近数年以来，内外臣工条奏旗丁不法者不下数百纸。”可见其流弊之甚。下面节录几段他们的这类“条奏”以示一斑。

如一只粮船从装载粮食到运至通州，即须经过不知多少道税卡或非分的勒索，只是这一项剥削就要几百两银子：

> “以臣所闻，弁丁有水次之苦，有过淮之苦，有抵通之苦。何谓水次之苦？其一为买帮陋习。帮有高低，高者丁殷易完，低者丁穷必欠。当检运时，富弁行贿买帮，费至二三百金，……此一苦也。其一为小次陋规。卫丁当承运时，有卫官、帮官常例，……名目数十，难以枚举。……船未离次，已费五六十金，又一苦也。”①

① 王命岳《论漕弊疏》，见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下称《文编》）卷四十六。

"运丁恣行不法者，皆由官弁剥削所致，如开兑之时，粮道发给钱粮，任意扣克，……而运丁之都司，监兑之通判，又多诛求；及至启行，沿途武弁借催趱为名百计需索。"①

剥削的严重，有时竟使他们装载的粮食运不到目的地原领的运费就全部用光。回空时甚至绝粒，只好变卖自己的东西。

"即如赣州帮素称殷实，而其穷彻骨。临至河西务剥米（按即水浅处须换用小驳船分载，雇用驳船的费用须由原来的大船负担）之时，米已上船，而剥价不能开发，千总代为挪移，始免误公。回空则身工饭米全无，无所不卖。……各帮情形，大概皆然。"②

"臣奉旨催漕，留心体访，数年以来，回漕船回空冻阻，……破产不足，益以儿女，苦累难言，深可悯恻。"③东西卖光，就要连自己的儿女都得出卖。

"盖以屯丁领运漕粮，冬出冬归，过湖过江过河，殚劳涉险，备极艰苦。……水手亦赤贫穷汉，一年每名止得身银六两，撑驾挽拽，泥水风雨，使尽筋力。"④经济的剥削之外，在劳动强度上也是备极艰苦的。

充当水手的大都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一类的"赤贫穷汉"，"况粮船水手甚多，皆系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从，亦易齐心生事"⑤。面对上述那些严重的情况，他们是不会缄默的。

---

① 《东华录》雍正朝，雍正四年闰四月谕户部。

② 杨锡绂《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见《文编》卷四十六。

③ 李绂《请截漕运劄子》，见《文编》卷四十七。

④ 林起龙《请宽粮船盘诘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⑤ 觉罗永德《查获罗教人犯先行恭折奏闻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下称《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五号。

因此秘密结社，以保卫自己的利益并和官方进行斗争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们的这种结社就是利用了原来官方在各地的粮帮组织建立起来的，名称也照旧。凡是原来属于各粮帮的成员，都有资格加入这种秘密的结社。

这种结社据说最早是由安庆地方的粮帮开始的，后来才逐渐普遍于其他粮帮①。按安庆府是个重要产米地区，当时共辖六个县，有粮帮十六个，由这个地方的粮帮首先组织起来自然是很可能的，出现这种结社的时间大约不会晚于雍正初年。因为现在能查到的档案资料中，有关查禁水手中的秘密结社的案卷最早的是雍正五年至七年(公元一七二七——一七二九年)②。

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大约到嘉庆年间，安庆府的粮帮水手们又在原来粮帮组织之外，独立地成立了一种秘密结社，名字叫做“安庆道友会”，简称“安庆道友”、“安庆帮”、“庆帮”。这是一个较前此利用地方粮帮组织所建立的秘密结社更为健全的结社。它的组织内部情况今天已经不易确知了，我们只能从某些史籍中的片断记录，参比青帮“通草”中的有关资料，略为窥见其大概。

如他们的首领不再叫守备、千总一类的官称，而叫做当家、师父、老头、前人。他们捏造了一套“道统”，拉来一些不一定相干的人当做祖师，甚至把佛教的历代祖师也排列进去，而且煞有介事地说他们是佛教临济宗的支派，后来青帮有个别称叫做“临济会”就是这样来的。加入安庆道友会的还依进来的先后分成二十四个辈

① “通草”内多有所谓“家谱”及“一百二十八帮半领帮当家”一类记载，详列粮帮秘密结社初创时期所有当家姓名、别号、籍贯、帮头、辈次、师承关系以及粮船名称等，似尚有所依据，可知当时粮帮大都有这种结社。

②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中有雍正五年李卫、张大有，六年张大有，陈明夏，七年费金吾、史贻直等人的奏折。

次，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理大通悟学"①。他们还在水手们聚居或歇宿的地方，如靠近河岸的庵堂里，也有的在船上，摆设成一种"佛堂"式的场所，设上香案，供上祖师牌位（详后），他们称做"香堂"，摆设香堂的这条船就称为"泰子船"、"老堂船"、"将军舟"、"太平舟"。订立了一些条规守则，如"帮规十戒"、"十禁"等经常奉行。编造了一套仪节，加入的人要在香堂里举行一些类似宗教洗礼的形式。还发明了许多隐语、手式、暗号做为帮内人秘密交通的标志，他们叫做"切口"、"令子"等等。这套东西越到后来自然是越复杂的。

安庆道友会的产生是青帮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安庆道友会还不等于整个青帮早期组织，而只能看做青帮早期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安庆道友会成立之后的若干年中，原来地方性的粮帮秘密结社陆续联合到这个新的组织中去，它的声势也就日益壮大起来。大约到光绪年间，各地粮帮秘密结社（据说共有一百二十八帮半）才被它所统一。

适应统一的需要，名称也随之改变。"安庆道友会"改为"安清道友会"或"安清道义会"，它的简称"安庆帮"、"庆帮"也就相应地改为"安清帮"、"清帮"，还有称"清门"的。"庆"改为"清"显然是音变而来，但也含有"清朝"或"大清"的意义。至于象一些"通草"里说的，他们所以称为"清帮"或"清门"是由于帮内的二十四个行辈（"清净道德……"）里"清"字居首之故（《安庆粗成》主此说）；或说是"清门"一词来自乾隆时王伦的"清水教"（《清门考源》主此说），

① 青帮还有所谓后二十四个字辈："万象皈依戒律传 宝化度心回临持康泰普门开放光照乾坤"，但这是晚近的青帮分子所定，未及按此排辈，青帮即行消灭。

这纯属附会。按“安清”一词和“扶清”、“助清”的意义相同，青帮的由“安庆”而“安清”也犹义和团的由“反清”而“扶清”、“助清”的转变过程。这是一般民间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的通例，当他们的组织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想从非法而取得合法。最早使用“清帮”名称的记载始于清末，如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查探徐怀礼报告》：“向来枭贩有清帮、围帮两种，清即安清道友。”①其时正是青帮的盛大发展时期。

“清帮”又何以称为“青帮”，首先还是由于同音代替之故，也可能是与在它以前出现而又长期并存着的“洪门”又称“红帮”的一种相对的称谓，即“青帮—红帮”，简称则是“青红帮”。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从粮帮的秘密结社时期就曾自称为“青皮”，这个词在许多档案资料里都见过，如道光十六年（公元一八三六年）色卜墨额在《严查回空粮船水手拿获自号青皮拦路截船滋事之缘由》中所说：“又淮署督臣林则徐咨开奉上谕御史刘梦兰奏，粮路积惯匪徒，号为青皮：……既有犷悍性成之水手，又有积惯为匪之青皮。”②道光年间“自号青皮”，光、宣年间就自号“青帮”了。按“青皮”一词有闯将、英雄好汉的意思，与民间所谓的“青头楞”或“三青子”为同义词。这个词经过青帮的使用流行很广泛，不只在文献资料里使用，文学作品里也使用，连鲁迅先生也曾谈过青皮问题。“青帮”一词的出现不晚于清末。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朱家宝在《奏请以鄂蜀之例罚办皖省青红帮》中说：“昔青红各帮会匪，靡地蔑有，历为巨患，虽节经查拿惩办不敢稍宽，而蕴孽有本，根株迄今未能尽绝。”③

①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三册。
②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十三号。
③ 《录副奏折》卷二九六七。

"安庆帮"、"安清帮"、"青帮"、"清门"等名称分别于各个历史时期出现之后，并非递次取代，而是同时并用，即使是最早的"安庆帮"一词，到出现"青帮"称谓之后，仍有某些地方的帮头在使用。路滨生在《中国黑幕大观》中说："又有所谓'潘氏兄弟'者，……在北有'江湖东号'，在南有青帮、安庆帮等。"① 这个事实从各帮头所编印的"通草"名称也可看出。如：《安庆粗成》、《安清仪规》、《清门考源》、《青帮通漕汇海》等等。

在"青帮"这面旗帜下的统一，自然不会是真正的统一，而是各地粮帮组织仍旧相对保持其独立性。这除了从上举的"通草"名称可以看出其混乱的情况外，各"通草"的内容出入也是很大的。特别是其派系、师承、切口、令子等，大半都是为了尊大自己，区别于其他而任意捏造的。这也就是青帮分子直到晚近仍是既有帮头又有辈次以代表其身分的原因。举例说，如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的青帮身分就是"兴武六帮头通字辈"。其实青帮与粮米帮组织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这些帮头、辈次的意义，晚近的青帮分子根本是莫名其妙的。

至于青帮早期组织究竟创始自何人？最初，在出现安庆道友会名称之前的青帮早期组织，就是在官方粮帮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各帮水手的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因此很难说是创自何人。但在所有的青帮"通草"中，在提到青帮源流时，都无例外地说它是创自清康熙或雍正或乾隆年间的翁、钱、潘三个人。而且不仅说他们创立了青帮，还说由他们"领帮匡漕"，似乎清初的漕运制度就是由翁、钱、潘三人所创兴。各种"通草"还

① 《中国黑幕大观》初集卷上《党会之黑幕》第三页，一九一八年版。

一律说青帮的“家庙”在杭州武林门外(“家庙”是指翁、钱、潘传教时所建的庵堂)。翁、钱、潘各建过一个庵堂,有一种“通草”的名称就叫《三庵宝鉴》。各种“通草”还一律说翁、钱、潘三人的师父姓陆,陆的师父就是罗祖教的创教祖师罗祖,罗祖的师父姓金。青帮中的香堂里所供牌位各帮头并不统一,大致都是“天地君亲师”、“四海龙王”、“老官师父”、“金罗陆祖”、“翁钱潘祖”……。但必不可少的就是“翁钱潘祖之灵位”。翁、钱、潘三人以潘为主,青帮内向来有一种规矩,就是彼此称为“潘氏弟兄”。有一种帮头里还规定帮内人彼此问姓什么时,不能直接说出自己的本姓,而要答以:“在家(即帮内)姓潘,出外姓×(本姓)。”另一种帮头规定要答以:“头顶潘,本姓×”。看来翁、钱、潘三人创立青帮早期组织之说,还可能是有所依据的。

按翁、钱、潘三人实有其人,许多有关查禁水手中信奉罗教的档案资料中都曾提到,比较详细的是乾隆三十三年(公元一七六八年)闽浙总督崔应阶的《拿获罗教各庵人朱光辉等审拟事》:

“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此水手皈教之由来也。……其各庵借寓之水手亦不尽归罗教之人,而每年平安回次,则各出银五分,置购香烛素供,在庵酬神。向来守庵之人是日念经数卷,其水手中归教念经者亦即随之如守庵之人,不会念经则惟与水手人等焚香礼拜,别无夜聚晓散及煽惑民人之事。此现在朱光辉等二

十二庵信从罗教容留水手之情形也。”①

这通奏折所记，把青帮早期组织与罗教的关系说得十分明白。水手与罗教的遇合是偶然的，而且最初只是在杭州一地，也没有什么翁、钱、潘“领帮匡漕”的事。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青帮是罗教的一个支派，从这通奏折也可予以澄清②。

这里就是要根据这通奏折所记，参比青帮内部的一些传说，试图对于青帮的创始人问题，得到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第一，翁、钱、潘三人在杭州布道建庵是事实，他们传的是罗祖教，教徒内有水手。第二，罗祖教在联系和团结水手方面起过良好作用，翁、钱、潘也有可能曾把教徒组织起来，成为一种宗教性的团体。官方为了控制水手们的活动，曾借查禁罗祖教的名义对水手们施加过压力。第三，奏折里并没提到翁、钱、潘曾建立过青帮早期组织（自然是指出现安庆道友会之前的），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譬如从以罗祖教为联系纽带的宗教性团体转化为水手们的秘密结社。第四，如果翁、钱、潘确曾建立过青帮早期组织，则传说中的在康熙或雍正年间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不可能晚至乾隆年间。总之，从官方的记载来印证，青帮内部的关于翁、钱、潘创立青帮的传说，除个别地方不够确切尚需存疑外，基本上是可信的。

二、青帮早期组织的互助活动和反抗斗争

粮帮的水手们自己秘密地组织起来，其最初的目的就是保卫自己的利益，针对官方的盘剥、欺凌进行抗争。他们彼此很团结，

---

①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七号。

② 拙作《青帮·天地会·白莲教》，见《文史哲》一九六三年第三期，系辨析青帮非罗教支派的专文，因此这里只引奏折一通略为说明，不复赘述。

小则是在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帮助，大则聚众闹事。不论是官私文献还是青帮的“通草”，所记都体现了他们的这种精神。

如在杭州为了解决水手们回空时的食宿问题就自己成立了一些庵堂，它们有的是利用原来的庙宇，有的是新建，庵外还有耕地，收获即归守庵人用度；还有义冢，水手死后就葬在那里；年老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还可以进庵养老。

“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亡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现在住庵之人，皆供系年老有病，不能为水手，遂住庵管守。”①

“伊等闲空歇业，因各堂不取房租，只收饭钱，皆贪图省便，到堂住宿。”②

“……该庵遂为水手已业。更因不敷居住，醵资分建至数十庵之多。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③

水手们的团结互助还表现在他们运输漕粮时，是采用的“包运”制度，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水手们的职业得到保证（但包运制度是一种严酷的剥削制度，危害性也很大，详后）。如有时水手犯了错误被革或被通缉，他们就彼此收容或庇护。

“[水手]经千总请革、请缉，而守备听其革于此船仍入彼船，革于此帮仍入别帮。如此舵役包运之弊，奚由禁戢？”④

关于他们的这种患难与共的作风，直到出现了“安庆道友会”

---

①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五号。

② 《彰宝折》，见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第十五期。

③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五号。

④ 杨锡绂《论漕弊与各省粮道书》，见《文编》卷四十六。

这个名字以后，文献上仍然能见到寓褒于贬性质的记载。如下面这段文字就是记录咸丰年间安庆道友会的情况的。

“以先入者为长辈，次入者为幼辈。已及五七辈。辈不知若干人，均以口号字第为凭，随地联络。所至不携分文，可得居处饮食。遇事群起应之，口号所通，趋救立至，不必素相识也。”①

由于官方对水手们的浮收过重，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求增加运费：

“伊等知州县浮收有加五、六[成]之多，遂得借口多索。运弁、奸丁连成一气。州县惟恐误兑，不能不受其刁勒，是以帮费竟有递增至五六百两、七八百两者（按原只一二百两），而苏松为尤甚。”②

闹得更激烈些的话，就是进行请愿（官方称为“告漕”）或暴动（官方称为“哄仓”或“鼓噪”），因为规模很大，有时将那些统治者们弄得焦头烂额，叹嗟不置。

“丁船借此需索兑费，为数甚巨。……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③

“……稍有不随意，甚至纠众凌官。如漕臣周卜世所题‘吴江鼓噪’一案，岂惟民膏吮尽，抑且国体大伤。漕事至此，尚可言哉！”④

---

① 陈锦《勤余文牍》卷一。

② 蒋攸铦：《拟更定漕政章程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③ 胡林翼《革除漕务积弊并减定漕章密疏》，见葛士濬《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下称《续编》）卷三十。

④ 王命岳《论漕弊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道光年间，青帮早期组织出现两种形式，一种在船上，一种在岸上。他们都常与地方上的游民无产者（官方称为“游帮匪徒”）以及地方下层小吏联合一起与官方作对。

“帮内之巢穴即老官师傅盘踞之船，名为老望船，藏有经卷神像，传徒敛钱，挟制旗丁，与游帮匪徒表里为奸，实为帮中之害。……其沿途之巢穴，皆由沿河集镇捕役河快素与水手声气相通，其间亦有老安（庵）、潘安（庵）等教之人混迹充当，与水手游匪互相勾结，从中取利，而水手青皮亦恃为护符。地方官查拿匪徒，不能不责成河快捕役，是欲其查拿而反被纵扬，更为帮中之隐患，尤宜严禁。”①

青帮早期组织有时还联合“绿林英雄”（官方称为“无赖亡命徒党”）进行起义。如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山东临清王伦起义时，就曾借重过漕运水手的力量：

“［王伦］往来山东，号召无赖亡命徒党日众，……［八月二十六日］连陷堂邑，陷阳谷，皆劫掠弃城遁，分趋临清、东昌，图阻运道，众数千。”②

“［九月］十一日探知回空粮船自九月初六日挽进闸河者，俱日夜遄行。……其于临清经过之船，并有迫胁短纤随行者，是以贼匪聚集日众。”③

“［九月十三日］回空粮船已过临清者六十八帮，计船三千四百余艘，其余多在临清以北。”④

---

①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十六号。

② 魏源《圣武记》卷八。

③ 《录副奏折》卷一八九一。

④ 《录副奏折》卷一八九四。

"[九月十四日]回空粮船阻桥闸，[官兵]不得进，贼反胁纤夫以攻城，又束粮船为浮桥，图北渡。"①

由于王伦和粮帮水手有过这样一段过程，所以后来在青帮中就传说王伦也是他们的老辈"前人"之一。如在著名的青帮"通草"《清门考源》的作者初版《自序》中就提到"清水教（白莲教支派）王伦在山东与诸秘密会党共同树旗反清失败之后"，"各埠粮米帮统行归并，清门弟子由此日增"，而且还证明青帮(清门)的名称来源与清水教是有关系的②。

又如嘉庆初年安徽巢县以水手为业的白莲教首方荣升在长江下游各省传教，并酝酿起义，嘉庆二十年(公元一八一五年)事泄被捕牺牲。有关这件史实的记载③并未发现它与青帮早期组织有关，但在《清门考源》中也把方荣升列在"家谱"之中，说他是"兴武四帮头来字辈"的"前人"④。

与此同时，著名太平军后期领袖之一，西捻首领张宗禹，由于他曾在河北、山东交界的运河地段与清军有过激烈战斗，最后牺牲在这里，因此也可能与漕运水手有过配合。尽管有关记载⑤语焉不详，但《清门考源》也把他列入"家谱"，说他是"镇前帮头性字辈"的"前人"⑥。

---

① 《圣武记》卷八。

② 陈国屏《清门考源》，上海道德善堂一九三九年版，《自序》(初版)。

③ 嘉庆二十年十月二十九日上谕，见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四册，第四三四页。又吴之英《圆教始末及其经卷》，见《人文月刊》第八卷第五期，引杨缙《祉庵日记》及百龄《除邪纪略》。

④ 《清门考源》第二〇二页。

⑤ 参阅《国朝事略·皖豫寇靖》；《清史稿·李鸿章传》；《山东军兴事略》卷九。

⑥ 《清门考源》第二〇二页。

甚至还有一些从历史记载上看与漕运和水手不可能有关的农民起义领袖，如嘉庆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的四川农民军领袖冷天禄、冉文元，河南滑县清茶门（白莲教支派）起义领袖王正纪等，也被说成是粮帮出身的英雄人物而列入青帮“家谱①”。但也有从历史记载上看与青帮早期组织极可能有关的起义，而其领袖人物却未被列入青帮“家谱”的。如咸丰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捻军进入山东后，以水手刘双印、孙化祥为首的“幅军”，分别在峄县云谷山、岐山建寨起义，配合了捻军的行动，并曾攻克邹县②。水手们参加起义的原因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漕运被迫改由海道，原来的水手为了生计问题，不得不铤而走险。

“江苏徐、海、邳、宿，山东郯、兰、滕、峄之民，随漕逐末，及游手好闲挽舟佣食者累计数万。恒以匹布分幅帕头，私相雄长，阴有曲部。……[咸丰]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③

“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逆滋扰，淮、颍、徐、宿之人居多。往年贼党繁滋，未始非漕运羁阻，激而为此也。”④

另一则材料更明确地指出参加太平军和捻军队伍的是“安清道

---

① 《清门考源》第二〇一页。

② 参阅佚名《山东军兴事略》卷十七；又，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第二〇七页，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③ 《山东军兴事略》卷十七。

④ 丁显：《请复河运刍言》，见《续编》卷四十一。

友”，并指出这种组织的分子加入义军的只有一部分，还有的是零星地流于社会的。

“[道光年间]……而犷悍游食之徒萌蘖其间，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者，引类呼群，恃众把持，成固结不可解之势。迨发，捻事起，此辈潜入其中。南北荡平，消磨殆尽。虽阛阓市镇尚有此等名目，然无大渊薮以容之，偶或什伍成群，良有司足以治之矣。”①

上引这些有关漕运水手参加起义活动的记载，情况是很复杂的。它们有的注明是安庆道友会所为；有的泛指为“贼党”、“贼匪”、“奸丁”所为；有的可能与漕运水手有关，有的不可能有关；有的载入青帮“通草”中的“家谱”，有的没有。因此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些记载中，除确知其与漕运水手根本无关的之外，不论其载入“家谱”与否，都可视做以安庆道友会为代表的青帮早期组织所为。理由是：这些记载既然都是漕运水手或与之有关的起义活动，这些起义就都不可能是没有组织的，因为他们动辄以千万人计。而当时漕运水手中的秘密结社之风甚炽，所谓“各立教门，多收门徒，结为死党”，“结党成群”，“贼党繁滋”，安庆道友会则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从安庆道友会这类组织的性质来看，如果说它们在这些起义活动中没有起过作用，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事。

三、青帮早期组织的破坏活动

青帮早期组织的活动，除了上述的团结、互助、斗争以至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一方面之外，它还具有另一重性格，即破坏以至罪

① 沈葆桢《漕项无从划拨海运难以议分疏》，见《续编》卷四十。

恶、反动的方面。

第一，不论青帮早期组织的目的是怎样地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种利益终归是狭隘的利益，而他们的天职却还是为那些统治者去运输"皇粮"，这就在客观上起了"资敌"的作用，自然这与较它稍早出现的天地会一类的反清革命组织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如一九二一年谭人凤以革命会党的立场向北京政府所上呈文中所说："清帮起于漕运，船桅高张'天庾正供'旗号，乃残吾民以资寇粮者，呜呼视为同道！"① 因此，青帮一类的组织我们只能把它视为一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而不能称他们为革命团体。在晚近时期中，青帮在各种反动派的支持和纵容下，转变成为非作歹的社会流氓集团，最后发展为特务、汉奸组织，实际就是滥觞于此的。

第二，青帮早期组织没有严格的纪律，组织很涣散；更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行动很盲目。有时固然可以做出好事来，但有时就尽做坏事。这些坏事即使有的也能算是一种自发的斗争，也应属于消极手段。如《大清会典》中在记述漕运水手的情况时就说他们：

> "盗卖漕米，渗水和沙，或私带客货，冒渡关津，或扰害民船，强横生事，或行船越次，以避稽查，或中途并载，脱船私归。……"②

更其是关于群殴斗狠，行劫为非，扰害居民，以及他们在生活上的任意花销、吸毒、聚赌等的记载更多，称为安庆道友会时期，表现较前尤为突出：

---

① 见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大清会典》卷十三《漕运》。

“数年前浙江、湖广粮船因怀挟私忿，彼此争斗，持戈放箭，杀伤者多。逞其凶顽，肆行无忌。又闻前岁之冬，粮船守冻在山东地方，竟行抢夺，扰害居民。去岁回空，又闻强取百姓衣物，此等皆大干法纪。”①

“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窃或盗，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②

“安庆道友多脚夫、船户、肩贩、手艺及游民、游勇者流，借烟馆、赌场、茶坊、小押为巢穴，行劫为非，声气甚广。”③

这样就把他们自己闹得很被动，官吏们“每言及运丁，无不切齿”！④对待水手中的案犯总是“严加究审”、“从重处治”、“尽法从严究办”、“以昭炯戒”。如道光十六年（公元一八三六年）直隶总督琦善奏报：“自五月底至八月下旬，共计获犯五百余名。”大约同一时间，漕运总督恩特亨额奏报：“本年在直隶、山东、江苏境内先后弋获不下四、五百人。”大约同一时间，两江总督陶澍也奏报：“饬获凶恶水手王七，当在清江浦恭请王命正法。……尚有阎大汉等数十名、……郭蕴得等三名，……张茂富等四十余人，现饬讯质严办，期无枉纵。”⑤一方面如此严厉地镇压，一方面一再加强雇用水手时

---

① 《畿辅通志》卷二《诏谕二》。

② 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一八七六年六月十五日）《申报》，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九四四页，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

③ 陈锦《与琴岩论善后余事书》。

④ 姚文田《论漕弊疏》，见《文编》卷四十六。

⑤ 《录副奏折》卷四五一第十四、十六、十七号。

的查选点验，甚至规定每船“水手十人，由运军雇募；令十船互保，有滋事不法者，连坐”① 的办法。所有这些，都使得水手们的许多正确行动，也就因此受到很大局限。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这些消极行为，就使得本来是纯朴的劳动人民，做了官家的水手，入了帮之后，就渐染了许多恶劣习惯。这些恶劣习惯，他们一直带在身上，直到晚近时期青帮成了反动的社会流氓集团，他们依然使用这套伎俩去危害社会，危害革命。

第三，青帮前身组织中那些“当家”、“老头”一类人物，大都是坏得透顶的。他们利用在帮里的地位，往往形成一种“把头”，与官方一气地剥削压榨水手。如前引杨锡绂的奏折里就提到“舵役包运之弊”。他们向官家包下任务之后，再用低价去雇用水手，从中渔利。雍正七年《刑部咨文》② 里也记录着江淮卫七帮的把头孟有德雇用水手时只给工银三两，而他却从官方按六两具领，其他向水手的需索尚不在内。除了经济的盘剥之外，还有人身的凌虐，他们的“香堂”同时还是私立的公堂，里面有“家法”，即私刑，那些老头们可以随意动用。在那篇《咨文》里还记录着嘉庆帮的刘把式指使他的徒侄赵玉，借口一件小事对孟有德船上的水手严会生动用私刑，把他的左耳割掉。《咨文》里评论道：各帮水手结党后，“一切任其‘教主’（老头）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毫无忌惮，为害殊甚。刘把式倡教惑众，赵玉藐法纵虐，孟有德附党作恶，均属恶徒，风不可长。”可见这种把头的凶恶嘴脸。这种风气同样一直保留下来，即在后来青帮的“通草”里也还是十分强调这种“家法”制度。请看下面的三首诗：

---

① 《大清会典》卷十三《漕运》。

② 《史贻直折》附《抄录刑部咨文》，见《史料旬刊》第二期。

“家法森严鬼神惊，乾隆钦赐棍一根。汝既犯法当责打，下次再犯火烧身。

“法师堂上把令行，手执家法不容情。谁人如把帮规犯，不论老少照样行。

“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当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①

真是好不厉害！这就无怪乎晚近的青帮老头一类人物仍是动辄非刑拷打其徒众了。例如抗战胜利后在天津充双议成脚行把头号称“四霸天”的青帮头子王家保兄弟四人，即曾因工人抗议其剥削工资达百分之九十且常拖欠的事，而“将工人刘保玉、杨老、姚明寿、崔小冬、赵天斌、大群等六名，手足捆绑，倒悬马棚，鞭棍交加，神魂数绝。经工人亲属再三跪求，何二说项，立誓悔改，始释绑饶命。”② 显然这仍是雍正年间刘把式一类人物“捆缚烧炙，截耳割筋”的遗风所被。

但这里必须指出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把头并不一定都是纯粹的劳动人民，他们有的本身就是那些漕运系统中或地方上的下层统治者或其爪牙，有的则是被官方收买过去的水手。在光绪初年安庆道友会超越漕运范围向一般社会发展时，这种情况更甚：

“〔安庆道友〕初犹无业游民刑伤匪类当之，今则居然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愍不畏法，自以为雄，乐居下流，毫不为怪。”③

---

① 《清门考源》第一七九页。

② 天津市运输公司《脚行典型调查·双议成脚行》，见李世瑜辑《天津市脚行资料》第二十八页，一九五八年抄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③ 光绪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申报》。

我们从“通草”里的“前人题名录”、“同道题名录”、“近代家里知闻录”等之中所列举的数千个老头一类人物的名单，也可看出这个事实，因为其中有百分之十左右为粮帮时代的守备、千总、武举、文牍等等。民国以后，也就是他们正式以青帮名义开始盛大发展的时候，则更由上层招揽。同样是从那些“录”中，我们还可看到著名的军阀官僚吴佩孚、李景林、张宗昌、褚玉璞、江朝宗、袁克文、姜桂题、杨宇霆、陈调元、王占元、张之江等等，就都同时也是青帮的著名老头子。① 即使是原为一般青帮分子的，做了老头之后，也莫不竞向上层趋附。一个青帮老头如果没有军阀、反动派、帝国主义者或者地方的军政首脑当做后台的事是不可能的。现代史上为大家所熟知的例子就是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起，他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与戴笠结拜为兄弟，最后在蒋介石的提掖和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竟至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党国要人”②。当然这些都应是青帮后期历史范围内的事了，这里提出来，不过是想更有力地说明：我们研究青帮问题时，那些老头们的行径，是要与一般帮内分子严格界别的。

小　结

综上所述，可知青帮早期组织乃是清代漕运水手的一种行会性的秘密结社。这种结社的产生不晚于雍正初年。初创于安庆府

① “通草”内“前人题名录”之类的名单，列得最多的当推《清门考源》，《青帮通漕汇海》（北京正礼堂一九四四年印），《三庵宝鉴》（天津一九三二年印），《学道须知》（一九三二年印）。仅此四书即有约三千七百余人，吴佩孚等人名字均见于其中。

② 参阅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大流氓杜月笙》第三章，群众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

的粮帮。青帮中传说，其创始人是翁、钱、潘三人，基本上是可信的。当时并没有自己的名称，嘉、道之后一度称为安庆道友会，“青帮”这个名称大约是光绪年间定下来的。其组织形式初以官方的粮帮组织为基础，渐后乃渐趋复杂；赖有“通草”的留传，这套组织形式得以保存至于晚近的青帮之中。

青帮前身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卫水手们的利益。他们很讲团结、义气，除了在生活上、工作上彼此互助之外，有时还联合起来对压迫他们的官府进行斗争，以至举行起义。但他们并未因此得到什么便宜，招来的反而是更为残酷的压迫。更由于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本身就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他们的组织很不健全，斗争目标很不明确，水手们的某些消极行动构成了他们的许多罪恶，再加上一些原为下层官吏或由劳动人民蜕变而成的把头人物的操纵把持，因此青帮在它的早期组织时代就是一种在主观上依附封建统治者、在客观上维护了封建统治者利益的流氓无产者的结社。当他们的发展超越了漕运范围之后，更迅速地堕落为无恶不作的更为反动的社会集团，以至成了为各种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所利用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重要工具。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青帮的源流及其演变

姜　豪

解放前，我在上海从事社会活动多年，与帮会中人素有交往，一九三六年，投拜“大”字辈汪禹丞门下，正式参加青帮组织。八一三日军侵沪时，汪避居香港，不久逝世。另一“大”字辈张仁奎，抗战期间在沪病故，其在重庆的门徒为之做忌辰时，代收门徒十人，名为“灵前孝祖”，我也是其中之一，因我已拜过师，称之为“过房”。对于青帮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就搜集所得资料及亲历所知，草成此篇，供史家参考，并请指正。

一、青帮的“前三祖”及其与佛教的关系

青帮组织，实际上是在清朝雍正初年为了承运漕粮而形成的，但帮中人却把其历史渊源，推前到明朝，以明永乐朝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为其第一代祖师。

金幼孜号碧峰，祖籍应天府（南京）麒麟门外三十里金家堡，生于元顺帝至正六年（公元一三四六年），明洪武时中进士。先在北京燕王朱棣前任职，后随军南下，负责都督粮台。燕王在南京正位后，任工部左侍郎，永乐间迁都北京，改任文渊阁大学士。及成祖亲征辽东，金奉命都督粮运，不久辽东平定，随成祖凯旋回朝。当时他看到仕途险恶，厌弃红尘，衷心仰慕达摩，因此上表辞官，隐

居栖霞山紫云洞修炼。后又转至五台山求戒，拜佛门禅宗临济派三十六传鹅头禅师为师，取名清源，从此在紫霞洞隐修，数年后去世。这就是青帮以达摩为始祖，把金幼孜尊为第一代祖师的来历。

第二代祖师是罗清，号净清，甘肃兰州府渭清县东乡罗家庄人。十七岁时考中明嘉靖恩科举人，后赐进士出身，擢任监察御史及户部侍郎。吐鲁番犯边时，嘉靖帝任为阃外都督，领兵直抵番边。传说血战后不幸被困于两狼山下，粮尽三天，杀马充饥，忽来一和尚相告，寺后石崖下有本朝清源禅师北征时所储藏的粮食，往取果如其言。全军饱餐后次日出击番营，斩了番将，一直追到番都，番主出降，表示以后永不叛明，罗接受降书，大获全胜而回。归途中经过五台山，访求清源禅师遗迹，由北寺方丈恨修禅师指引，从佛龛中取出金幼孜的经典遗物，并悉嘉靖曾封金为护国禅师。罗深受感动，即由恨修领至金的塔下，拜金为师，后人在师父生后拜师，称为“灵前孝祖”，就是起源于此。后来罗被严嵩父子暗害，入狱十二年，万历年间由于边事需要，把他释放，但他立了功不愿受禄，乃至栖霞山紫云洞金幼孜修炼处修道，在那里终了一生。

第三代祖师陆逵，号道元，江苏镇江府丹徒人，自幼学武，精于技击，当过江右总兵。明亡后隐居茅山。后慕罗清征番定回之功及其能通满、蒙、回、藏语言文字之能，又为佛教禅宗嫡系，因此到五台山求道。清初云游到新疆、甘肃一带，看到回民与汉人由于宗教不同而争执械斗，就向清廷条陈用宗教感化之策，为康熙嘉纳，授以西北宣化法师名号，赴西北宣化，订立“回汉约法”，规定回汉人民互相尊重风俗习惯，各守其制，两不相犯。回京复命后，康熙大喜，议授以官，他却乞归学道，就封他为靖国尊人，并加封其师罗

清为一清佛祖。晚年陆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刘氏庵内讲经说法，听者甚众，殁于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

以上金、罗、陆三人，帮中人奉为“前三祖”，都与佛教禅宗有渊源，所以后来的青帮组织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二、青帮的“后三祖”及其与漕运的关系

青帮的真正祖师，起自陆逵的徒弟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即所谓“后三祖”。

翁岩字福亭，号德慧，江苏常熟人，祖居山东东昌府聊城县，其后迁居河南南阳府。出身秀才，后弃文向河南嵩山少林寺僧习武，喜与绿林好汉交往，并入天地会，为会务奔走四方，到处为家，性情刚毅，不善词令。

钱坚字福斋，号德正，江苏武进人，迁居安徽徽州府。为人精明勇敢，幼从父经商，移居开封。十六岁父母双亡，无心继承父业，改习拳术，入天地会，与翁岩同隶张岳部下，张是天地会中的首领。

潘清字清宇，号德林，浙江杭州人，先移住安庆，后又迁居河南开封。承父母余荫，富有财产，幼年读书，颇以诗词歌赋自豪，武艺亦佳。为人勇义，好交游，地方上以“小孟尝”称之。翁岩、钱坚二人奉张岳之命，到安徽访潘，三人都是天地会道友，一见如故，结拜为异姓兄弟。

三人结拜后，一起出门访求志同道合的人，乃至杭州陆逵处听讲，对陆非常敬服，要求投拜门下，陆见三人学道心诚，同意收为弟子。雍正三年，清政府悬榜招贤，加强漕运，他们意图以粮帮为基础，组织一个大团体，乃至河南抚署揭榜承运。其时抚台田文镜是

杭州人，三人向他条陈了整顿漕运办法，田与漕督同上奏本，经雍正批准，指定归漕运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的钦差大臣何国宗指挥，准许开帮收徒，以之统一粮务。他们接受任务后，先在开封潘清家中招集各地天地会头目就商，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赞助，并联络旧有粮帮，统一了粮帮组织，推翁、钱、潘三人为首领，组成了一个“道友会”，供奉达摩为始祖，金幼孜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

他们开办粮运，首先设厂造船，统一尺寸，绘成图样，亲自监工督造，传说共造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所谓“无半不成帮”，半只是脚划子）。第二步是协助清廷开办浚河工程，动员山东民夫十六万五千人，用银一百一十万两，开浚河道，打通了南北水运。布置完成，乃大开香堂，广收门徒，翁岩按八仙之数收八名，钱坚按二十八宿之数收二十八名，潘清按三十六天罡之数收三十六名，三人按七十二地煞之数共收七十二人。此后徒弟又收徒弟，从而青帮组织扩大起来。

青帮建立承运漕粮后，翁等三人向陆逵请示，陆以祖传二十四字的字派相授，作为传统的帮内“家谱”。此二十四字就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无（又作悟）学（又作觉）”。其中，“清净道”三字是在粮帮未成立前使用的，从“德”字起立帮，所以实际上前三字是教派，从第四字起才是帮派。立帮后徒子徒孙越来越多，原来的二十四字怕不够用，乃由王德降（即王降祖，帮中称为小祖师）续订二十四个字，就是“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解放以前，上海以“大通无学”四字辈居多，而以大字辈为最高。传说后二十四字也已开始用到，但究竟用到哪一个字无从查考。

青帮建立后，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建立“家庙”及十二座“家庵”（翁、钱、潘三人高徒十二人家庵），承运漕粮事务所就设在家庙内，并公议订立了十大帮规、香堂仪式、孝祖规则、十禁十戒、家法礼节等等规则。此后翁、钱二人至青海、蒙古去朝佛，再无音讯，帮务由潘清一人主持。至雍正十三年潘在黄河大风事故中身亡，帮务由王德降继任。

清乾隆年间，白莲教中人王伦，见粮帮势力雄厚，乃与帮中人交结，并自立“清门教”，于乾隆三十九年在山东起义反清，一度发展至数万人，但结果失败被斩，至此清廷严厉查拿一切秘密会党，不过事实上秘密组织依然存在。嘉庆五年，八卦教刘子协、宋之清继起举义，游击清军于川、湘、鄂、豫、陕、甘各地，不久也以失败被杀。其后，山东金丹八卦教主林清和河南八卦教主李文成联合反清，林清并贿太监高广福、刘金二人为内应，事败，预伏于城外黄村的林清被捕杀。李文成原在滑县城外的关帝庙邀集主教三十六人议事，被捕囚禁于滑县城内。附近教徒闻变，顿时集合近万人，其中也有青帮人员，攻占了县城，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但最后义军失败，李文成纵火自焚而死。乾隆年间，粮帮本来是公开组织的，但自清门教、八卦教等相继起义反清，其中人员牵涉到粮帮，因之粮帮也在严禁之列，稍涉嫌疑，就难免杀身之祸，由是销声匿迹，转入秘密活动。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粮运复盛，北方粮船大多为清廷服务，南方粮船大多被太平军改为水师，杭州的家庙祠堂被乱军所毁，至此青帮势力消灭几尽。太平天国失败后，漕运废除，粮帮裁撤，不过青帮组织仍旧流传于社会。

三、粮帮的组织

粮帮的具体组织，以粮船为主体，有一定制度，凡是粮船所到之处，就有统一的组织。传说其组织及粮船数目如下：江苏省二十一帮，派船一千六百三十八只；浙江省二十一帮，派船一千五百三十八只；江西、两广十九帮，派船一千四百九十二只；湖南省十八帮，派船一千三百八十六只；安徽省十六帮，派船一千二百五十八只；江苏省松江府九帮，派船六百八十六只；河南省九帮，派船七百零二只；直隶一帮，派船一百八十七只；桐船麻包四帮，派船三百十只；山东十帮半，派船八百零半只。以上合共一百二十八帮半，粮船九千九百九十九只半。此外传说还有乾隆御赐小祖师半帮，不在正帮之内。

关于运粮船只的分类，类似船队，各指定装粮地点、交粮地点、收粮户名以及船上所用旗号、标帜等等，都有详细规定。其类别名称有江淮四（在江苏二十一帮内）、兴武四（在松江九帮内）、嘉兴卫（在浙江二十一帮内）、武昌卫（在湖南十八帮内）、南昌卫（在江西两广十九帮内）等三十四项。

四、拜师手续和帮规

青帮成员间是师徒关系。入帮手续，第一步是“记名”，由记名人请求介绍人（不问字派，都可作介绍人）代投“小帖”，俟本师同意，乃择期开“记名小香堂”，投正式拜帖，上过小香，就是记名弟子。再上大香，才算正式弟子，从此有了“开法领众”（首次收徒）的资格。

拜师须投拜师帖，上开三代履历及本人年龄、籍贯、职业，亲向本师呈递，这就是拜师凭证，不得抵赖。

香堂分大小二种，具体的讲，可分五种：

（一）临时小香，这是最简便的，不论香堂大小、记名人数多寡，可以随时随地举行，只要用香烛一份，上供三家祖师牌位一座，行礼如仪就行。

（二）正式小香，组织略具规模，须有引进、传道两师在场，依照规定仪式举行。

（三）正式大香堂，组织规模宏大，布置庄严，执事人员也多，乃为帮中大典。

（四）特别大香堂，其组织与正式大香堂略同，所异者多设几炉香，多供几位祖师，多下几次参礼，多用几位执事，多唱几次歌词。

（五）特别满堂香，组织更扩大，极尽铺张之能事。

香堂执事计有十二个名称：一、当家师（收徒者自任）；二、讲经师（传道师兼任）；三、陪堂师（引进师兼任）；四、执法师；五、护法师；六、巡堂师；七、执堂师；八、散香师；九、抱香师；十、福德师；十一、知客师；十二、站堂师。

香堂上拜祖，名曰“参祖”。小香堂有四海龙王的灵位、天地君亲的灵位以及翁、钱、潘三位祖师爷的灵位。大香堂的牌位有达摩始祖、历代佛祖、慧可祖师、弘忍祖师、僧璨祖师、道信祖师、慧能祖师、金祖、罗祖、陈祖、林祖、陆祖、翁祖、钱祖、潘祖以及三家历代过方前人。香堂横幅用“义气千秋”四字，对联一副，上联为“安清不分远合近”，下联为“三祖传留到如今”。

青帮组织严密，规则完备，主要有：

（一）十大帮规：不准欺师灭祖；不准藐视前人；不准爬灰倒笼；不准奸盗邪淫；不准江湖乱道；不准引法代跳；不准扰乱帮规；不准以卑为尊；不准开闸放水；不准欺软凌弱。

（二）十禁：不准拜二师；父子不准同一师；师死不准再拜师；关山门不准重开；徒不收不准师收；兄弟字派有高低；本帮与本帮引进；师过方代师收徒；在道不准诽谤道；香头低不准爬高。

（三）十戒：万恶淫乱；截路行凶；偷盗财物；邪言咒语；讼棍害人；毒药害生；假正欺人；聚众欺寡；倚大欺小；烟酒骂人。

（四）十要：孝顺父母；热心做事；尊敬长上；兄宽弟忍；夫妇和顺；和睦乡里；交友有信；正心修身；时行方便；济老怜贫。

（五）传道十条：遵法律；孝双亲；敬神明；习正道；保身体；善改过；立品行；慎言语；务正业；戒嗜好。

（六）家法十条：在翁、钱、潘三人领导时期，由于帮内组织严密，虽有家法刑杖，很少使用。其后潘清得意门徒石士贤肇事潜逃，乃订家法十条，并以香板为刑杖。清乾隆帝南巡时，在金山寺皈依佛门后，化装到杭州，看了青帮家庙及粮帮公所，认为王德降管理有方，传谕嘉奖，并钦赐龙棍一条，上写“违犯帮律，打死无罪”字样，以为帮中镇山法宝，以后凡遇重大事故，即以此棍责罚。家法十条如下：

（1）初次犯帮规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犯规”二字，并加斥革。如犯叛逆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2）初次忤逆双亲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胸前烧“不孝”二字，并加斥革。如犯逆伦罪，捆在铁锚上烧死。

（3）初次不遵师训，妄言妄行者，轻者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顽民”二字，斥革。

（4）初次不敬长上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不敬”二字，斥革。

(5) 初次以长上资格侵占帮中老少所有财产物件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夺”二字，斥革。

(6) 初次殴打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强暴”二字，斥革。

(7) 初次违国法所禁不道德之事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重大罪时，用定香在臂上烧“莠民”二字，斥革。

(8) 初次诽谤仙、佛、菩萨以及一切宗教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妄为”二字，斥革。

(9) 初次不务正业，专事敲诈、逞凶斗殴，不受规劝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义”二字，斥革。

(10) 初次犯奸盗邪淫，而伪造虚构、诬栽，殃及帮中老少者，轻则申斥，重则请家法处治。再犯时用定香在臂上烧“无耻”二字，斥革。

五、上海青帮人物

青门字派，分为二十四个班辈，从金幼孜算起，是清字辈(号清源)，第二代罗清是净字辈(号净清)，第三代陆逵是道字辈(号道元)，以上三人实为教派祖师。从第四代起，成立粮帮承运漕粮，开创者翁岩(号德慧)、钱坚(号德正)、潘清(号德林)三人，是德字辈。此后一直流传下来，到抗战前后，上海方面还有几个大字辈，其下通字辈较多。现就笔者所知，列举如下：

大字辈：

高士奎，山东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做过直隶水警厅长，后来住在上海，收徒甚众，其中马祥生、杨仁铨等较有社会地位。

汪禹丞，安徽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

时，任总统府卫队长，又在淞沪警察厅及申报馆任职多年，在洪门是五行山山主，抗战期间在香港病故。

袁克文，号寒云，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次子，在上海老牌小报《晶报》上写稿，因此他所收门徒以文艺戏剧界较多，如俞逸芬、金碧艳等。

樊瑾成，安徽人，历史情况不清楚，是张啸林的老头子，在上海由张供养。据说张得发后不愿樊再收徒弟，所以他所收之徒不多。

张树声，江苏人，绰号“天王老子”，又是理教头子，所收徒弟以京剧演员为多，二十年代去世。抗战期间在重庆另有个大字辈张树声，是北方人，西北军中人物，收徒甚众，以交通运输界为多。

王德邻，安徽人，原是军人，后在上海经商，所收门徒甚众，如金廷荪、高鑫宝、顾嘉棠等。

步章五，别号林屋山人，河南项城人，据说当过袁世凯幕僚，到上海先在中国济生会干过扶乩活动，后来挂牌做中医，并办过小报《大报》，写些鸳鸯蝴蝶派的小品文，又喜写评剧稿，吹捧女演员，所以他除收无聊文人为徒外，又收女演员为义女。

张仁奎，号锦湖，山东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通海镇守使（驻南通），后居上海，收徒数百人，其组织名仁社，成员中颇多旧军政人员及工商企业负责人，抗战期间在上海病故。

仁社形式上是个俱乐部，地点在现延安路重庆路附近的一所二开间三层楼的西式建筑内，经常有人在内吃喝玩乐。其中人员有陈世昌、黄金荣、张竹平、孙以乡、姜怀素、汪英宾、徐逸民、杨虎、周思忠、吕苍岩、杨德钊、庄铸九、夏奇峰、时寿彰、陈铭枢、韩复榘、范绍增、孙连仲、黄绍竑、韦作民、董显光、蒋鼎文、孙桐萱、杨庆山、金

月波、徐亮、葛福田、曹志功、姜豪等。

徐朗西，号峪云，陕西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参加同盟会，从事过辛亥革命活动，担任过军事方面的职务，北伐后因对蒋介石不满，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职务，在上海创办新华艺专，自任校长。所收门徒，以知识分子居多，解放后在沪病故。他在洪门是峪云山山主。

刘登阶，江苏人，具体情况不清楚，是顾竹轩的老头子，因顾而出名，生活由顾供养。

通字辈：

金九龄，江苏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探长，兼开人力车行，解放前去台湾，在台开浴室，大概在一九八〇年前病死。

马祥生，江苏人，贩卖烟土的八股党之一，开设金门大戏院（现儿童艺术剧场），解放后被镇压。

陈世昌，江苏人，张仁奎徒弟，是杜月笙的老头子，杜得发后由杜供养。

金廷荪，浙江人，抗战前因杜月笙关系承办航空奖券。

高鑫宝，王德邻徒弟，解放前是丽都花园（现市政协所在地）的经理，八股党之一。

戴步祥，南京人，公共租界巡捕房探员（包打听），开设大中华饭店。上海沦陷期间其子与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有关系。

季云卿，曹幼珊门徒，在长江帮中有一定势力，抗战时期汪伪沪西七十六号特务组织成立时，由他支持，特务头子李士群、吴世宝都是他的徒弟，后被暗杀。

顾嘉棠，上海人，贩烟土起家，八股党之一，原来是花匠，黄金荣得力助手，四--二反革命活动中搞共进会。

顾竹轩，江苏人，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刘登阶徒弟，与虞洽卿的关系较深，后为天蟾舞台经理，解放前是上海市参议员。

郑子良，广东人，在广东帮内收徒弟甚多，抗战期间因军统关系参加忠义救国军，解放后被镇压。

王彬彦，江苏人，闸北区商界重要人物，区保卫团负责人。

吕苍岩，江苏人，大业公司经理。

周思忠，江苏人，中国旅行社副总经理。

徐逸民，广东人，著名西医，广收门徒，其组织名逸社，在洪门是五行山山主。

汪英宾，安徽人，汪禹丞之子，留美学新闻，曾任申报馆经理、时事新报馆总经理。

姜怀素，江苏人，曾任国民党上海市执委兼书记长、上海义务警察副总队长，也收徒弟，解放后被镇压。

孙以乡，安徽人，阜丰面粉厂高级职员，在沪西收徒甚众，其组织名怡社。

张竹平，江苏人，抗战前大陆报、时事新报、申时电讯社、大晚报设有四社总管理处，他是负责人，抗战期间在香港开设大华饭店，后至重庆办百龄餐厅，抗战胜利后回香港办大华饭店，后在港病故。

曹立功，安徽人，曾任上海市商会秘书、上海市卫生局药政处长、西药业同业公会主任秘书，解放前病故。

徐学禹，浙江人，招商局总经理，解放前去台湾，近况不明。

唐季珊，广东人，大茶商，与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有过同居关系，后阮自杀。解放前唐在上海，以后情况不明。

孙百群，安徽人，阜丰面粉厂经理。

庄叔遐，江苏人，曾任国民党军委会西南运输处秘书长、国货银行总经理，解放后病故。

杨虎，又名啸天，安徽人，曾任淞沪警备司令及中华海员工会主任委员等职，解放后在北京病故，所收门徒甚多，其组织名兴中学会，所收徒弟以海员为多，但也收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员。

程俊观，江苏人，江海银行总经理，解放初在沪，以后情况不明。

黄金荣，江苏人，法租界巡捕房探长，贩烟土起家，所收门徒甚众，原来以巡捕房人员及流氓居多，后来发展到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及其他方面，其门徒组织名荣社。

解放前荣社主要负责人为黄振世、陈培德等。黄在十六铺称霸于渔业，是渔业银行的负责人，又是市参议员。陈培德原在浦东英美烟草公司搞工会，后在黄色总工会内有一定地位，抗战胜利后自办大德印刷所，也是市参议员。

董显光，浙江人，上海英文大陆报负责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郑希涛，浙江人，曾任时事新报馆经理。

肖宗俊，广东人，曾任新新公司总经理。

葛福田，江苏人，抗战前曾从事马路商界联合会活动，抗战期间在重庆办百龄餐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金谷饭店总经理、江海银行经理等职，解放前病故。

卢友兰，哈同妻罗迦陵的义子。

韦作民，浙江人，在交通技术界资历很深，抗战期间任交通部技监，抗战胜利后病故。他是张仁奎的门徒，与另一仁社中人张彬

人(浙江人)合办文社,所收门徒以交通运输业人员为多。

文社设在上海,主要负责人为陶一珊、王微君、王庆年等。陶一珊是军统人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上海解放前数月改任民政局长,解放前夕去台湾。王微君原是三青团人员,抗战胜利后任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干事,陶一珊调任民政局长时当该局主任秘书,陶离沪时王负责局务,解放后负责办理移交工作,由市人民政府民政局留用为专员,其后离沪赴香港。

张啸林,樊瑾丞徒弟,生于浙江慈溪县,二十岁时移居杭州,先进机房学织绸,不久进武备学校,结识了张载扬,后拜杭州衙门探目李休堂为师,从事流氓活动。旋到上海拜樊瑾丞为师,从此大收门徒。北伐前张载扬当浙江省长,张啸林通过他的关系勾结浙江督军卢永祥,又因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又搭上了何丰林的关系,依仗这些关系,贩运烟土,与黄金荣、杜月笙结拜为兄弟,成为上海流氓中"三大亨"之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们共同搞"中华共进会"反共,此后踏上政治舞台,并担任工商界职务。一九三二年经杜月笙推荐,充任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张在日本特务指使下,搞"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收购军需物资。一九三九年与日特暗谋成立浙江省伪政府,张自任省长,国民党特务暗杀未成,但因此不敢出任省长伪职。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被其保镖林怀部所杀。

姜豪,上海市宝山县人,抗战前后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上海市参议员等职。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老闸区区长,现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无(悟)字辈:

杜月笙,上海市浦东高桥人,陈世昌的徒弟,年轻时在十六铺做

水果小贩，后来结识了黄金荣，替黄跑腿贩运烟土，从此青云直上，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而且他的势力还超过黄金荣、张啸林二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为国民党反共有功，从此登上政治舞台，进而插足工商企业，成为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各方面爱国人士合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以上海地方协会会长身份参加该会，并为该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与黄炎培、王晓籁、钱新之、潘公展、张寿镛、柯干臣等共同主持会务。上海沦陷后，他先至香港，后转重庆。在香港和重庆期间，直接参与指挥国民党方面在上海的秘密组织统一委员会等工作，并与军统头子戴笠合作，搞“对敌物资交换”，与沦陷区做生意。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通过门徒，控制了上海市商会和黄色工会等组织，并与CC合作，控制了上海市参议会，左右上海地方行政。

杜月笙善于使用软硬兼施和广事交结的多面手法。他和蒋介石表面上关系密切，但在历次反蒋运动中他同时拉拢反蒋派系。一九三〇年四五月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我是改组派上海工人运动的负责人，也去过北平，陈公博布置我回上海配合杜月笙进行反蒋军事活动，说杜已准备好三师人响应石友三在浦口的反蒋兵变。临行时陈公博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叫我回上海面交，可是我回上海时石兵变失败，就没有去见杜月笙，由此可见杜的两面派手法。

杜月笙广收门徒，其组织名为恒社，成员遍及各行各业，其中有些原来就有相当社会地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负责工商团体工作的骆清华、王先青，负责工会工作的陆京士、水祥云都是恒社人员。在工商业方面，杜月笙充当了许多工商企业单位的董事、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而且安排几个儿子和得力门徒充当

各该企业的经理、副经理，掌握实权。在新闻界方面，杜月笙本人是申、新两报的董事，加之报人唐世昌、赵君豪、金雄白等也是恒社中人，因之可以左右上海舆论。当时恒社在上海各方面的影响是很广泛的。

无（悟）字辈青帮人员为数众多，社会影响很大。按理讲，通字辈人员所收的门徒都是无（悟）字辈，但严格地讲，不一定都是有辈份的。因为收徒分“徒弟”和“学生”二种，收“徒弟”是青帮关系，拜师父只能拜一人。收“学生”、拜“先生”的性质不同，拜“先生”同时可以拜几个人。当时与帮会有关的各团体成员中，有的是“拜老头子”（即师父），有的拜“先生”，所以有的有青帮辈份，有的没有青帮辈份。

还有几个人的字辈不清楚，但在社会上有一定势力，如：

谢葆生，苏州人，驴夫出身，后到上海，开设卡德浴室、卡德旅馆和仙乐斯舞厅，他和汉奸陈群关系密切，曾任伪江苏省警察厅长。

陆连奎，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督察长，与汉奸常玉清关系密切，抗战初被暗杀。

卢文英，女，绰号卢老七，上海市宝山县人，专搞花会赌博，被称为花会大王，收徒甚众。

徐铁珊，浙江绍兴人，在上海同文书院读过书，以后在山西警务学校当过翻译教师，敌伪时大收日本浪人为徒。

六、青帮对上海社会的影响

青帮对社会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评价。由于创立粮帮的翁岩、钱坚、潘清三人原来都是天地会中人，天地会是洪门中的一个

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翁岩等为清政府运粮，在政治上起了安定清朝统治的作用，违背了洪门宗旨，所以洪门中人认为青帮是洪门的叛徒。但青帮中人却说，他们开帮收徒积蓄力量，也是为了反清复明。不过在翁、钱、潘三人开帮运粮时期，并没有反对清政府的活动，直到后来才有青帮中人参加各地的反清起义。到了辛亥革命前后，青、洪二门中有不少人响应孙中山号召，加入革命行列，作出了贡献。

青帮对于上海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利用帮会、流氓势力，作为殖民统治的爪牙，例如帝国主义运来大量鸦片，就是利用流氓主要是青帮中人推销的。此外，帮会与流氓合流，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开设赌场、妓院，划地称霸，为非作歹，欺压良民，成为社会上的一股恶势力。

上海的帮会人物，原来只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下层活动，而且拜师传徒大都秘密进行。但自蒋介石利用上海帮会、流氓势力，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少帮会中人、流氓头子登上政治舞台，纷纷公开组织团体，各立门户，扩充势力，在某些场合形成政帮合一，气焰不可一世，在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事业中，都有深刻的影响，直到解放后才肃清。

洪门历史初探

姜　豪

一、洪门的起源和发展

洪门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组织，由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演化而成。据传说，始祖洪英，又名洪盛英(有称为殷洪盛的)，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明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考中进士，崇祯七年受聘于直隶大同镇守姜瓖幕中，参赞军机，为人精明练达，慷慨好义，因之当时许多豪侠之士，从各地慕名而来，投拜在他门下，中有陕西同州府蒲城县人蔡德忠，直隶宣化府怀来县人方大洪，直隶顺天府涿州人马超兴和山西绛州人胡德帝、李式开等。

崇祯十四年，洪英偕门人南下改投明阁部史可法。其时史正督师扬州，抵抗清军，命洪至燕京(现北京)侦察虚实。他一路联络抗清志士顾炎武、王夫之、傅青主、黄梨洲等人，共同创建“汉留”组织，从事抗清活动。后史可法在扬州殉难，洪英至安徽芜湖，投奔明将黄得功。黄战败自刎，部众溃散，洪英招抚黄部二万多人，继续武装抗清。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屡战屡北，于崇祯十八年(公元一六四五年)五月十三日，卒于距芜湖六十余里的三汊河。

此后，洪英的儿子洪旭与洪英门人蔡德忠等至杭州投奔明潞王，不料潞王降清，他们就投奔郑成功。崇祯十七年清兵占领燕

京，此后南方各地虽然继续有抗清力量，但逐步被清军破灭。

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蔡德忠等随郑成功据守台湾，郑成功为了加强将士团结，开立“金台山”、“明论堂”（意义是取法梁山，既有山名，又有堂名，以后国内有用山名的，国外则单用堂名而不用山名），这是洪门最早的“山”、“堂”组织。为了发展大陆上的反清秘密组织，郑成功派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等化装至福建兴化府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投方丈智通为僧，此五人在洪门尊称“前五祖”，所以世传洪门的祖师是和尚。

少林寺僧精于武艺，名闻全国，各地慕名而来习武者甚众，形成一个武艺传习所。康熙时，郑成功的侄子郑君达偕妻、妹投居少林寺，曾率领僧众一百二十八人组成僧军，应清廷招募，出征西鲁，凯旋而归，僧众并不居功，仍请回寺修道，清帝大加赏赐，除留用郑君达为总兵外，其余听任回寺。后清帝听信谗言，派兵围攻少林寺，由于叛徒出卖，少林寺被焚，僧众逃出十八人，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五人得脱。

蔡德忠等逃出少林寺后，中途遇清兵追索，在沙湾口幸有勇士吴天成、方惠成、张敬之（或作张敬照）、杨杖佑（或作杨杖佐）、林大江五人掩护得脱，此五人洪门中称为“中五祖”。此后吴天成等随同蔡德忠等至广东，途遇清兵追迫，又被惠州宝珠寺和尚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五人救护脱险，此五僧洪门中称为“后五祖”。

蔡等自广东经江西到达湖北，其时万云山万云寺的方丈万云龙和陈近南结义，共图反清复明。万云龙原是明潞王部将，在山东起义失败至此。陈近南是翰林院学士，湖北人，因反对清帝焚烧少林寺，力谏无效辞官云游。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三一年），曾在四川

雅州组织“汉留”，开立“精忠山”，以后回至湖北故乡，就在白鹤洞研究道教，自号“白鹤道人”。他同情少林寺僧众的遭遇，为图替僧众报仇，改装江湖卖卜，结交天下豪士，途遇蔡德忠等，就迎至家中，把他们安顿于附近的下普庵红花亭。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由陈近南主香，在红花亭同盟结义，以先来者为兄，后来者为弟。当时从各方来会者，有福建的吴天成、方惠成、张敬之等，广东的吴天佑、吴廷贵、洪太岁等，江西的黄昌成、钟玉英以及明朝的遗臣志士。其中有个朱洪竹，据说是明崇祯帝的孙子，大家以为他是明代正统，拥戴他为盟主，并以“洪”字为结盟之姓，把“洪”字拆为“三八二十一”，作为会中暗号。以“红花亭”为兄弟出身之地，“结盟日”为兄弟诞生之日。这次集会称为“洪家大会”，洪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汉留”组织也由此演化为洪门团体。

洪门团体形成后，进一步组织军队，由陈近南统率，派苏洪光为先锋，宝珠寺僧吴天佑等五人为中军，勇士吴天成等五人为后备，由湖北的襄阳进军，连战皆捷。但到了武昌，被清军于成龙所败，万云龙阵亡，朱洪竹失踪。陈近南不得已，退守襄阳，三月余不得进展，由是改变战略，分散部众，到各地自行开山立堂，以图日后发展，再行会合。临别时并以一诗作为日后相会时的证词，其诗句是“五人分开一首诗，身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与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

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四九年），洪门在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其时陈近南已逝世，由吴天佑等五人主持。其后吴等相继去世，乃由苏洪光主持。他改名为天佑洪，定其组织名为“三合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月为姊妹，取义是把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而为一。天佑洪率领三合军攻打清军，攻占了不少名城，声震

东南七省。后有明总兵周遇吉之侄周豪(又名玉英)率部韩龙、韩虎、李昌国等先后来归,遂以史可法之侄史鉴明为军师，女侠关玉英为女军统领,尊朱洪竹为“先皇”,声势浩大,自襄阳起兵入蜀。其时清廷蜀督王春美看到三合军势大,难于正面抵御,就设计派其心腹符四、田七向三合军诈降,天佑洪误信为真，安置符四为三合会的四排,田七为七排,充任三合军的副军师。行至重庆与清军作战时,符四、田七在三合军内为清军作内应,因之三合军内外受敌,遭致大败。天佑洪作战时为流矢所伤,全军溃退白虎山,符四和田七均被拿获处死。此后洪门中禁用四、七两排,就是这个起因。

后来为了整肃内部,修改会章，订立“三十六条”、“十禁”、“十刑”等规律,建立严格的赏罚制度。不久天佑洪伤重去世，由苏洪宇、林烈统领三合军继续抗清,连占数县,后被清军包围,关玉英往援战死,又以失败告终。适逢蜀督王春美调粤,苏洪宇晚间潜入督府把王刺死,本人在混战中被害。至此,林烈势孤力薄,难以维持,乃将所部遣散,改向全国各地发展,开山立堂，采取游击方式继续抗清,并把洪门组织推广到海外华侨社会。

嘉庆十一年(公元一八〇六年),贵州开立“筑青山”,主其事者为林怀明。次年,林在河南卫辉的滑县起事,从狱中劫出会首李文成，当时曾有山东泰安的几个州县响应。其后又有林清在北京起事，他本来与河南的会众约期共同行动,但因约期有误,林清先期约集了二百人从宣武门入城，分头进攻东华门、西华门，并有太监作内应,但被宫内护卫发觉，林看形势不利，立即退走。事败。其后河南会众起事，亦告失利。会众不得已分散四方，河南各地的起义军始平息。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福建泰宁县的郭永泰从渔人

手中获得郑成功开山时订立的“规律”。这是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被清军围困紧急时，把“规律”和重要文书装在铁箱里沉于海底的。此后洪门中就把它称做“海底”，通用于各地的洪门团体。但因历时已久，原本遗失，流传的本子与原本的内容不尽相同。

洪秀全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公元一八五一年）金田村起义至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攻破南京为止，原有三合会参加在内，同时各地三合会会众看到洪秀全起义胜利，也纷纷发动。如道光三十年间，两广三合会在各地起义，至咸丰四年占领了肇庆、佛山、东莞等地，广东省城几被包围。福建方面，会众占领过厦门。上海方面，在咸丰三年九月，广东人刘丽川、福建人李咸池等起义，攻占上海县城，他们的组织名为“小刀会”，属于“天地会”的一个支派，以后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到了咸丰五年，刘丽川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县城始为清军所陷。

光绪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三合会三千人，在广东惠州府宁山起义，有石工四百人应援，不幸被清军击败。光绪二十四年，三合会首领李立亭、洪振年在广西起义，除梧州、桂林外，席卷全省，活动十多个月，被清军镇压。

哥老会成立于清乾隆年间，原是三合会的又一名称，盛行于湖南及浙江，长江沿岸各省次之，会员极众。

洪门在海外华侨中发展颇广，在南洋群岛及美洲都有组织。一八九三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结识三合会首领郑士良，由郑介绍参加了洪门组织，此后改组“致公堂”，创建“兴中会”，开立“大陆山”，并派会员郑弼臣、陆皓东、陈少白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方面首领集议于香港，合组“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首领，至此洪门与孙中山的革命组织结合起来。

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人物黄兴，一九〇四年二月间联络陈天华、宋教仁、谭人凤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被推为会长。同时成立“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他亲自去会见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并决定于同年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初十)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的“万寿节”举事。可是风声泄漏，起义尚未发动，即告失败，黄兴被通缉，逃亡日本。一九〇五年孙中山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设总会于日本，于国内设三大部，以武昌为中部，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会所设于汉口，公推宋教仁主持会务，并派人分赴南洋各地设立支会，洪门中人参加者甚众。

孙中山领导革命，从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一九一一年四月黄花岗之役等等，他所策划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先后共有十次，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武装斗争中，洪门力量起着重要作用。所以洪门虽然由于历史悠久，分子复杂，兼之在清政府统治下，一贯采取对立、破坏策略，有些洪门中人数典忘祖，作出了一些不利于人民的事情，但总的来讲，洪门在反清复明斗争中，保持了民族气节，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洪门的组织

洪门在国内虽有“汉留”、“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等等不同名称，在国外则有“致公堂”、

“洪顺堂”、“义兴堂”等等名称，但其内部体制，却大体相同。

洪门的每一个团体，各有其山名、堂名、水名、香名、内外口号，还有一首诗。由于在清代洪门是抗清秘密组织，所以采用许多暗号，以防破坏分子混入。兹举刘传福的锦华山为例，它的山名是锦华山，堂名是仁义堂，水名是四海水，香名是万福香，内口号是义重桃园，外口号是英雄克立，诗句是“锦华山上一把香，五祖名儿到处扬；天下英雄齐结义，三山五岳定家邦。”在碰到陌生人盘问时，双方就用这些暗语作为问答的词句。

洪门成员间是横的关系，效法三国时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之意，称做哥弟。哥弟间分十排，以之区别地位的高下。一排称大哥或大爷，其中有山主、副山主、香长（开香堂时的主香人）、盟证（开香堂时的盟誓人）、坐堂（或称左相大爷，总管山寨事务）、陪堂（或称右相大爷）、刑堂（执掌刑法）、执堂（负责组训工作）、礼堂（负责教导礼节）、管堂（负责升降赏罚）、护箭（或称护剑大爷，保管令箭）、护印（保管印信）、新服（又称心腹，一般是新进人员而为山主所器重或有才能的人）。以上山主、副山主是首领，称为龙头大哥、副龙头大哥；香长和盟证是开香堂时的临时任务，称为有位无职；自坐堂至护印，凡是有职有位的，称为内八堂执事，有似明朝八部大臣的组织。再下面是外八堂，新服在内八堂是末位，在外八堂是首位。二排称圣贤二爷，或称京外军师，负责谋划；三排称当家三爷，或称京外粮饷总管，负责财物收支；五排称管事五爷，或称红旗，负责总务事宜；六排称花冠六爷，或称巡风、巡哨，负责巡查；八排称贤牌八爷，或称纲纪，负责功过登记；九排称江口九爷，负责新进兄弟和提升职务、公布名单；十排称辕门，又称大老么或称大满，负责各项杂务，其余都称小满，就是小喽罗。四、七两排

由于以前出过奸细，纳入阴性，所以只收女子，不收男子。上述从新服至十排人员，除四、七两排以外，就是外八堂。

上述兄弟步位，不是固定的，可以因功提升，一次可以连升三级。初加入的人，看他的社会地位和学识声望而定位，但以外八堂为限。也可以一步登天，一加入就是新服大爷。

三、入门仪式

新成员入门仪式，叫做“开香堂”，一定要上过香，才算正式入门。香堂分二种，一称“大香堂”，一称“小香堂”。开“大香堂”适用于新加入的人数较多时，其礼节繁杂，费时很久。“小香堂”较为简单，宜于少数人举行。在清朝时洪门因为是反清秘密组织，所以开香堂大多在郊外的庙宇内秘密举行。辛亥革命后帮会可以公开，但开香堂也不是当众举行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表面上禁止帮会活动，乃采用一般性社团组织形式，开香堂也以半公开形式举行。

大香堂布置，有称为“红花亭”的，正中设关帝位，上悬“忠义堂”匾额，中间设置供桌三层，上层设羊角哀、左伯桃二人位，中层设梁山宋江位，下层设始祖、五宗、前五祖、中五祖、后五祖、五义、男女军师和先圣贤哲等位，各用红纸或黄纸书写。

香堂上的用物，有香炉（上有“反洪复汨”四字，即“反清复明”的隐语），另有烛台、七星剑（“满覆明兴”之意）、算盘（计算灭清后明帝再行登位时间）、尺（衡量会员的行为及计算天地合一的方寸）、斛与秤（表示正义公道）、镜（照破一切善良邪恶之意）、剪刀（剪开乌云之意）、桃枝（象征刘、关、张桃园结义之意）、珠串与木鱼（为合抱一剑，以成穹窿之形）。又张挂红灯，外层三盏，中层八

盏，内层二十一盏，意把洪字拆开为“三八二十一”。下面设置一桥，意为五祖逃难遇险之处。小香堂的布置和礼节简单一些，不赘述。

关于上述香堂下层供奉的祖先牌位，始祖是洪英、傅青主、顾炎武、黄梨洲、王夫之；五宗是文宗史可法、武宗郑成功、宣宗陈近南、达宗万云龙、威宗苏洪光；前五祖是蔡德忠、方大洪、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中五祖是杨仗佑、方惠成、吴天成、林大江、张敬之；后五祖是李式地、洪太岁、吴天佑、林永超、姚必达；五义是郑君达、谢邦恒、黄昌成、吴廷贵、周洪英；五杰是郑道德、郑道芳、韩龙、韩虎、李昌国；三英是郭秀英、郑玉兰、钟文君；军师中男军师是史鉴明，女军师是关玉英。

四、规则和家法

洪门组织严密，约束周至，其规则有二十一则、十禁、十刑、十八律书、十条、十款和议戒十条等等。兹举十条为例，可见其纪律的大概。十条的内容是：一、尽忠报国；二、孝顺父母；三、长幼有序；四、和睦乡邻；五、为人正道；六、讲仁讲义；七、叔嫂相敬；八、兄仁弟义；九、遵守香规；十、互信互助。

按照上述各种规则，凡是违反者，处罚甚严。因为都是在内部执行的，所以称为“家法”。其处罚办法有：极刑，凌迟或刀杀；重刑，挖坑活埋，或沉水溺毙；轻刑，三刀六眼，或四十红棍；降刑，降级或挂铁牌；黜刑，抓去光棍，或降入生堂，永不复用。

上述家法中所用的刀，称为“小宝”，所用的棍，称为“红棍”（长三尺六寸）。“三刀六眼”的刑法用于上四排；“四十红棍”的刑法用于下四排及么满十排。大体上按照犯规轻重，依照“五刑”处罚。

五、秘密文书和隐语、暗号

洪门中相传的秘密文书和隐语、暗号等甚多，大都是口头相传，文字记载甚少，有的辗转传抄，难免以讹传讹。其中“海底”的内容较为具体，惟因秘密流传，也有脱漏谬误之处，其主要内容有拜码头交结的隐语，梁山根本问答，始祖洪英出身问答，赞酒（敬酒）用语，送宝（讲义气）用语，出山访友交结，四十八句总诗交结，送行交结，三把半香（头把香，羊角哀、左伯桃结生死交；二把香，刘、关、张桃园结义；三把香，梁山宋江有仁义；半把香，雄忠至死忠刘王），出门交结，盘问客店主，洗面（一称开光）交结，陪堂传令，贺五排高升，山岗令，赞刀斩牲，祭旗，传令开山，红旗安位，镇山令，接客安位，封赠各级弟兄用语，禀见盟证大爷等等，还有其他各种隐语、暗号。

六、开立的山堂和会社

洪门宗旨在于反清复明，所以洪门组织，绝大多数是在清朝创立的。当时为了便于从事游击活动，所以各个组织都是独立的，必要时互相呼应。就我搜集的资料，在清代及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洪门团体，有以下一些。

清代成立的洪门团体，表列如下：

山名	成立年份	创立人	地点
金台山	顺治 十八 年	郑成功	台湾
精忠山	雍正 九 年	陈近南	四川
筑青山	嘉庆 十一 年	林怀明	贵州
人义山	嘉庆 十五 年	范松如	福建

续表

山名	成立年份	创立人	地点
蓬莱山	嘉庆二十三年	方安澜	四川
华严山	嘉庆二十四年	郭雨钦	不详
广金山	道光五年	胡林章	云南
苌忠山	道光二十八年	郭永泰	福建
金凤山	咸丰七年	胡佐臣	湖南
天兴山	同治五年	胡九云	云南
青城山	光绪二年	李云九	四川
回龙山	光绪十二年	童立三	不详
飞龙山	光绪十二年	江彭焕	上海
万云山	光绪十五年	王金宝	浙江
九成山	光绪十五年	胡文翰	不详
飞虎山	光绪十九年	刘家福	浙江
金龙山	光绪二十一年	杨鸿钧	湖南
虎威山	光绪二十一年	不详	甘肃
西凉山	光绪二十一年	贺桂林	甘肃
宝华山	光绪二十三年	肖松山	山海关
泰华山	光绪二十三年	不详	湖南
终南山	光绪二十三年	何步鸿	浙江
魏峰山	光绪二十四年	李煜清	四川
峨眉山	光绪二十四年	颜鼎章	四川
东梁山	光绪二十四年	李云龙	江苏
金华山	光绪二十九年	胡郎秋	不详
太安山	光绪二十九年	袁庆凯	湖北
永安山	光绪二十九年	孙近州	湖北
福圣山	光绪二十九年	戴海廷	湖北
万宝山	光绪三十年	李明良	不详
复明山	光绪三十一年	林式开	山西
九峰山	光绪三十二年	何金梁	不详
嘉峪山	光绪三十二年	马海秋	不详

续表

山　名	成　立　年　份	创　立　人	地　点
蓬瀛山	光绪三十三年	冯紫雷	山　东
西明山	光绪三十三年	冯紫雷	山　东
宝林山	光绪三十三年	冯紫雷	山　东
锦华山	不　　详	刘传福	湖　南
楚荆山（又作楚金山）	不　　详	陈　尧	湖　南
天台山	不　　详	胡　云	湖　南
天宝山	不　　详	肖朝举	广　东
太白山	不　　详	叶　某	陕　西
清峰山	不　　详	王　某	不　详
宝成山	不　　详	胡　某	不　详
光复公会	不　　详	黄泽霖	贵　州

辛亥革命期间及其后成立的洪门团体有：大陆山（孙中山开立）、大洪山、通洞山、西陆山、春宝山、栖霞山、太极山、民国山、九华山、谷云山、大同山、同登山、龙会山、桐柏山、九龙山、天寿山、天目山、飞龙山、十龙山、景阳山、武当山、鑫华山、五圣山、中华山、群英山、大龙山、复华山、天龙山、五行山、复办复明山（停顿后又恢复的组织）、复办泰华山等。此外，以会、社等为名的洪门团体有：义兴公、同兴公、复兴公、民兴社、正诚社、侠谊社、正谊社、信谊社、安信怀公社、洪兴协会、致公堂（在国内的组织）等。

七、洪门在上海的活动

（一）上海的洪门团体

洪门团体遍布全国各地，尤以长江流域各地以及福建、两广为多。上海五方杂处，各地洪门人员都有迁居上海的，也把洪门团体

带到上海来，有的把他们的团体整个带来，有的以原来的团体名称在上海另组新机构，或另组新山头。由于上述情况，因之上海出现了许多洪门团体，开始时地方帮派色彩浓重，如某某团体为湖北帮，某某团体为广东帮等。但到后来新吸收的弟兄不限一省一地，而包罗全国各地，因之地方帮派色彩逐渐冲淡。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表面上取缔帮会，因之原以山堂为名者，对外采用会、社名称，作为一般性社团，向国民党政府机关立案，取得合法地位，可以公开活动。在抗战以前，上海洪门团体有四十个左右，在八年抗战中，一部分团体停止活动，一部分继续存在，并由湖北帮的白玉山带头搞过一个洪门联合会。抗战胜利后洪门联合会无形解体，原有洪门团体各自恢复活动。现把我记得起来的列表于下：

山名	负责人	山名	负责人
五圣山	向松坡、张子廉等	聚胜和体育会	不详
侠谊社	郑子良	五祖祠	致公堂在沪组织
终南山	白玉山	福寿山	王铁民
十龙山	石振江、龙清泉	鑫华山	兰少亭
江湖联合会	石振江、龙清泉	大龙山	周镇坤
天寿山	姚庚白	太华山	不详
长白山	张树声	民兴社	汪禹丞
楚荆山	李文辉、李栖云	兴中山	杨虎、程壮
正诚社	王知本	民国山	不详
五行山	汪禹丞、徐逸民	复兴公	不详
峪云山	徐朗西	琅琊山	不详
大洪山	王铁民	复明山	不详
新胜和体育会	不详	洪顺互助会	杨文道

致公堂本来是海外华侨中的洪门团体，在上海旧海格路自建

五祖祠一所，原是祭祀洪门五祖的，实际上就是致公堂在沪的一个组织。

五圣山有仁、义、礼、智、信五个堂口，每一堂口都有堂主，仁文堂为朱卓文，义衡堂为梅光培，礼德堂为明德，智松堂为向松坡，信廉堂为张子廉。此五人中朱卓文、梅光培原是广东帮，明德是和尚，向松坡是湖北帮，张子廉是杭州人，在上海经营三星棉铁厂，在南京路设有门市部。

五行山的前身是四川帮的民兴社，抗战前由山主汪禹丞扩大为五行山，但对外仍用民兴社名义。汪禹丞是安徽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活动，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任警卫队长，其后在上海警察厅任职，又在申报馆负责总务工作多年，抗战期间避居香港，在港病故。抗战胜利后，五行山由原来的副山主徐逸民升任山主。徐是留美西医，在沪业务颇佳，他吸收了一批留美同学参加五行山，如韦敬周（副山主，抗战前曾在上海任中央造币厂厂长，抗战时期在重庆当财政部关务署长，和宋子文关系密切）、范文照（副山主，著名建筑师）、韦颂冠（解放前曾任怡和洋行总会计）、孙伯群（解放前阜丰面粉厂厂长）、周思忠（解放前中国旅行社副社长）等。因此，五行山内有很多知识分子。

（二）上海洪门在辛亥革命中的活动

参加辛亥革命的洪门人士颇多，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号英士），与青洪两门中人都有联系。如他发动肇和兵舰起义，接受他领导的杨虎原是洪门中人。上面讲过的汪禹丞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此外，洪门中著名人士徐朗西在辛亥革命中贡献颇多。他原是陕西人，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一九一〇年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发动会党，他也参加了帮会组织，尤以洪门为重点，南京临

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徐为北伐联军前敌总指挥，不久南北议和，徐卸职来沪创办《生活日报》，同时从事帮会活动，而以洪门为主，收了不少弟兄，以后民国三年的倒袁运动，民国七年的讨伐段祺瑞，他都担任过重要任务。

（三）洪门在北伐战争中的活动

在辛亥革命中，洪门有不少人出过力，由于这一历史渊源，在北伐战争中，洪门人士参加者更多，尤其在工农群众中，有的参加群众活动，有的参加武装斗争。例如徐朗西，曾在上海组织过武装力量，在蒋介石收缴武装纠察队枪械时，徐一度隐匿，蒋虽在事后向他表示歉意，徐因此对蒋不满，此后徐不作南京政府官吏，在沪创办新华艺术专门学校，自任校长，而对洪门活动并没有放弃，主持谷云山会务。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参加群众运动的洪门中人有的成为被害者，有的充当刽子手和帮凶。例如当时国民党的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既是青帮的通字辈，又是洪门的一个头子，在四一二屠杀过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反共“共进会”中，很多人是参加青洪二帮的，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上海洪门中人既有革命人士，也有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和帮凶。

（四）上海广帮的洪门组织

上海广帮的洪门组织，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带，人数比较多，情况也较复杂。一部分是从三合会、小刀会遗留下来的，不过以后参加的人，良莠不齐，有些坏分子参加在内，从事不正当活动，甚至拐骗小孩，开赌设娼，贩卖毒品。由于利害冲突，互相之间有时械斗。

广帮洪门组织，有以体育会为名者，如新胜和体育会、聚胜和

体育会，有以社为名者，如侠谊社，有以会为名者，如洪顺互助会，其中以郑子良为首的侠谊社人数最多，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该社假座逸园跑狗场开过一次复员大会，到会者四五千人，其势力范围不仅在虹口地区，而且发展到旧法租界。原来法租界的烟赌是由黄金荣、杜月笙包办的，郑子良也在法租界活动，要求分赃。抗战期间，他和军统及忠义救国军有联系，解放后被镇压。

广东帮洪门中，从事正当职业的工商界人员占多数，洪顺互助会的杨文道抗战前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抗战胜利后才出狱，继续负责洪顺互助会，并在虹口区中州支路该会会所内开办了洪顺小学。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洪门活动

八一三上海抗战期间，洪门中很多人支援抗敌，如开办伤兵医院，慰劳前线将士，救济难民等工作。也有搞游击队的，如五行山的汪禹丞和我搞过东南国民抗日自卫军。当时五行山有些弟兄在上海县、嘉定县和江阴县等处联络地方保卫团遗留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准备搞游击队，汪禹丞和我计划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曾用东南国民抗日自卫军名义，派杨鸣孝下乡联系，我并把情况通过秘密电台向国民党中央汇报。其后重庆军事委员会派人来沪同我联系，我就把几个地方的关系介绍给他们，其中江阴部队有三百多人，枪百余枝，主要是原来地方保卫团人员。后来听说这些部队都参加了新四军。

（六）上海的洪门联合组织

洪门团体本来各自独立，并没有联合组织，我于一九三五年间在上海参加湖南帮的楚荆山，次年又转到四川帮的民兴社。山主汪禹丞，安徽人，在帮会内有一定声望。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对于

洪门逐渐丧失民族革命精神，堕落成为流氓恶势力，深有感慨，主张整顿洪门组织。对此我有同感，因此，我们策动组织一个洪门联合团体，取得五圣山向松坡等赞同，一起发动筹建，于同年成立“洪兴协会”，其意义为“同心协力，复兴洪门”，参加者有上海的三十多个洪门团体，每一团体推派代表五人作为会员，在老西门关帝庙举行成立大会，选举理事、候补理事三十多人，监事、候补监事二十多人，主要的有汪禹丞、向松坡、程壮、姜豪、张子廉、王知本、郑子良、毛云、陈培德、白玉山、石振江、王铁民、龙清泉等，并推汪禹丞、向松坡为理事长。按照一般组织，理事长只有一人，但在洪门内按声望来讲，以汪禹丞为高，按声势来讲，五圣山为盛，所以推出汪、向二人同任理事长，而向国民党党政机关上报时，理事长只有汪禹丞一人。

洪兴协会成立时，并没有经费来源，会址借设在浦东大楼五行山的会所内，靠收取会员会费作为日常开支。洪兴协会成立后，加强了各洪门团体之间的联系，每月举行理监事会议一次，各团体的头头都来参加，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此后帮派之间打架斗殴的事，再没有发生。

洪兴协会成立的次年，即一九三七年，爆发了八一三抗战。上海沦陷后，协会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复会，其时汪禹丞已病故，乃推向松坡为理事长，原来的理监事大部分在上海，仍旧当选，会所借设在威海卫路的正诚社内。

抗战期间，军统也搞过帮会活动，在重庆设立“人民动员委员会”，聘请杨虎（上海帮）、范绍增（四川帮）、田得胜（四川帮）、杨庆山（汉口帮）、韦作民（其时任交通部技监）等为委员，戴笠也自任委员。抗战胜利后，由徐亮（又名徐为彬，无锡人）在上海成立“中国

新社会建设协进会”，名义上是全国性组织，各地设分会，上海也有分会，聘请上海帮会头子为委员、专员等，洪门各团体的头头都聘请在内，实际上只有郑子良同军统关系较深，抗战期间搞过忠义救国军活动。这个协进会花费了大量经费，其气势象是军事机关，实际上只是一副空架子。

（七）全球洪门恳亲会在上海召开经过

洪门在海外有致公堂、洪顺堂、义兴堂等不同名称的组织，其中致公堂在美洲华侨社会中更为普遍，影响较大。在海外华侨中，本有名为“恳亲会”的临时性集会，集合各地洪门代表举行联欢活动。一九四六年春，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赵昱先后来沪，发起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目标是集合国内外各地洪门代表共同聚会。经国内外各地代表商决，推选司徒美堂、赵昱、杨天孚、朱今后、程壮、张书城、王知本、王铁民、郑子良、陈漫生等二十多人为筹备委员，并推司徒美堂主持，我为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当时由于国内外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决定先开一次预备会议，等到适当时期再开大会。同年七月十四日，筹备会假座青年会西餐厅招待本市新闻界，由我介绍洪门历史以及举行恳亲会意义。同月十七日，假座贵州路湖社大礼堂举行联欢大会，到国内外各地代表及本市各洪门团体骨干共约一千人，来宾有当时市政府工务局长赵祖康，地政局长祝平，以及戏剧家、复旦大学教授洪深等多人。大会主席团为司徒美堂、赵昱、程壮等，会上由程壮报告洪门历史及举行恳亲大会的意义，次由来宾致祝词，会上通过了筹备会提出的建立洪门先烈祠，创办洪门中学，设立通讯处于华山路四七六号，编印全球洪门通讯录等提案，最后举行文娱表演。本来预备在适当时候举行扩大的恳亲大会，可是由于形势变化，没有再举行，上述决议案也

没有实现。

作者参加洪门时间不长，所见有限，文内错误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历史学家和知情者补充指正。

我接触过的上海帮会人物

薛　畊　莘

解放前，我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二十多年，跟不少帮会人士以及大小流氓打过交道，现回忆一些情况，择要介绍。

一、几个有名的帮首

近代青帮的最高辈份是“大”字辈。上海地区仅有数人，大都社会地位不高，默默无闻，只有张仁奎，字锦湖，北洋军阀时，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三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凡拜张做“老头子”的，均有“通”字辈资格。张晚年住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宛园。黄金荣、陈世昌（杜月笙的老头子）、夏奇峰（曾任外交部长）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张锦湖在南通时与清末状元张謇（张季直）关系密切。当年张状元请郁启生老伯委托笔者先父薛仲江向英国购买纱厂机器后，在南通设宴庆功，被邀参加者，有先父及郁启生和张锦湖。后来张锦湖得悉我是薛仲江之子，曾邀我及公共租界捕房高级警官刘绍奎、张元清及三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的经理等，至宛园聚餐饭后，他个别对我说：“你是我老友之子，看到你高升（当时我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我很高兴。但在抗战乱世时期，我有一句话劝告你，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切记切记。”我一直认为这句忠告，

是值得深思，作为座右铭的。

近代上海地区洪帮声望较高的是陕西徐朗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同乡、知友），当时住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文台路一座法式小洋房内。

洪帮势力范围本在长江中游，特别是宜昌、汉口、大别山一带。他们兄弟间见面第一句暗号是“同饮长江水”。后来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特别是川土、云土），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即雇洪帮头目沿途保护，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青帮黄金荣、杜月笙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绝大多数是洪帮成员，由于利害关系，相互依赖，无形中青洪两帮混成一体。

通过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特高处副处长姚筠伯（即饶恕，也是帮会大哥）介绍，我与徐朗西认识，并且经常往来。徐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有过贡献，所以解放后受到宽待，可见中共是不忘老友的。

二、郑家木桥小瘪三的来历

当年上海开辟外侨居留民地时，法国人选择的范围是沿上海城脚，从小东门外滩向西的地区，认为地近上海县城，市面较热闹，向北则有护城河，与英租界分界。这个护城河，又名“洋泾浜”，后以垃圾填平为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当时老北门外的护城河上有一座桥，称为“郑家木桥”。桥南属法租界老北门大街，桥北属英租界福建路，又称石路。因为当时福建人开设的桂圆及檀香店多集中此地，故取名福建路。

浦东南汇、奉贤等县农民摇小木船，装载豆萁、稻柴等到桥

边出售，一些小瘪三（无赖小流氓的俗称）云集在桥堍，遇有老实农民船户，即挑衅敲诈勒索。若被害人高声呼唤，英租界巡捕过来干涉，则逃至桥南，法租界巡捕过来干涉，则逃至桥北。因为桥南北分属英法两租界，形同二国，在英租界犯了罪，到法租界就不管，反之亦然。这样就被坏分子钻了空子，由此，上海旧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当心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上海人民群众当心吃亏的口头禅。

有的小商贩，每天都要摇船经过此地，为了免遭麻烦，就主动向其中的强有力者行贿，请其出面保护，随后进一步发展拜小瘪三中强者为老头子，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地方恶势力，有的依靠两租界捕房便衣探员，变成了流氓集团的头子。

三、黄金荣与法捕房

黄金荣，苏州书画店裱画出身，高小文化程度，约在一九〇〇年前后来沪。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最先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丁谙拳术；程绰号"黑皮子卿"，镇江人，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从小捐米，握力很强，后入法捕房当巡捕，最后升为政治部督察长，先后有三十七年之久。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青帮弟兄，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

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用黄金荣为刑事科便衣探员（俗称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加以掌握，作为向法捕房立功的资本。通过黄的关系，程、丁两人也先后进了法捕房当巡捕。黄利用这些条件，确实破获了一些盗窃案件，逐渐擢升为探长，在那时洋人统治的上海租

界，这个探长的地位是了不起的。

黄在法租界依靠刑事科长夏才立（Chazel）的势力，开始在上海社会上有了声望。北洋军阀时期，他结交了浙江督军卢永祥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卢的亲信），合作贩运鸦片。黄通过留法回沪的张一枢，与法捕房总巡费沃利上尉（Capitaine Fiori）勾结，初是半公开地在东新桥宝裕里销售鸦片，其货源由何丰林管辖下的高昌庙海军兵舰由汉口运来。后黄又通过其同产弟兄陈世昌，与马祥生、金廷荪、高鑫宝等挂钩，由汉口直接运到上海太古码头，公开在法租界兴办烟赌事业。在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嵩山路宝康里设烟馆，在福煦路一八一号（今延安中路卢湾区妇科医院）、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褚家桥申吉里和东新桥宝裕里第一弄内开赌场。由于黄的飞黄腾达，上海青帮的势力随之而起，使他成为上海第一号“闻人”。据程子卿告知我，杨虎、梅兰芳均列其门墙，共收南北徒弟数万人。他六十岁做寿时，徒弟们集巨资在漕河泾建造了一座黄家花园，以资纪念，解放后改为桂林公园。

黄金荣与魏廷荣为了争夺舞台美女吕美玉，发生矛盾，结果吕嫁与魏。当时魏是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其岳父朱葆三是买办巨商兼上海商会会长，为英法二租界当局所倚重。有此种种关系，魏当然不肯买黄的账，不独夺得了美人，而且向法国外交部控告黄的种种劣迹，使黄被迫辞去法捕房探长职务。当时祸不单行，黄又与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为名演员露兰春事，发生冲突，受到打击，加上其他因素，从此黄在上海的地位逐渐削弱，杜月笙后来居上。

魏、黄之争，后来牵涉到法租界上的绅董派与大流氓之间的明争暗斗。论实力，黄派在法租界势力超过魏廷荣，不过恶势力树敌

太多，引起公愤，尤其是上海天主教上层人物，都支持魏。同时，留法人物徐文才及朱孔嘉（法公董局华董，南市水电公司重要董事）之弟朱孔祥通过法侨谭斯脱（Destes）出面，办了一张法文日报，取名《真理报》（La Verité），集中火力，抨击法租界内公开经营的烟赌业，矛头指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流氓闻人，特别指出黄是依靠法租界关系起家的。此报一出，轰动一时，引起法国外交部的重视。适在这时，魏又多次向法政府控告黄"广收徒弟，招摇撞骗，开设烟赌，危害居民"等，特别指出在平济利路（今济南路）法藏寺外面空地上，为法捕房刑事科长夏才拉庆祝六十寿辰，大摆酒宴，向万余商民收寿礼，招摇生事。在此多方控诉下，巴黎当局召回上海总领事葛格霖（Koeclin），询问租界上流氓与烟赌等情况。

所控事实，经法政府查实，乃将捕房总监费沃利上尉撤职，调回法国，改由法伯尔中校（L.Fabrer）继任，并任职业外交官饶伯泽（Jobez）为副总监，严禁烟赌，大杀流氓气焰。从此，黄便收敛锋芒。听说，解放前夕，因梅兰芳的忠告，他掩护了一些革命民主人士，得以立功赎罪，故在镇反时，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终身管制在家善终。

四、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关系

一九三九年，我被擢升为外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后，通过程子卿的关系，每周至少一次被邀到法租界东新桥民国路（今人民路）口的逍遥池浴室洗澡。黄叫茶房头阿五，特备亨牌雪茄烟、茄立克香烟及特制的中西名点招待。在逍遥池特别间内，黄曾多次对我谈他同杜月笙的关系。他说："我因受苏州同乡陈世昌的推荐，在法

租界开办的烟赌事业中，起用了杜月笙，这是大家所晓得的。开始时，他叫我黄老伯。北阀军胜利到上海，四一二清党前不久，蒋介石来上海，在龙华机场上，我亲自把杜月笙介绍给蒋介石（蒋在上海交易所时，由虞洽卿介绍与我认识），当时在场的，有警备司令杨虎、该司令部秘书长陈群、法捕房的程子卿。蒋介石对我和杜说：'将来有些重要工作，还希望借重你们！'清党后，我的徒弟陈培德，杜的徒弟陆京士、周学湘等，成为上海工会的头子。但陈的办事能力远不及陆等，杜又在推销国民政府公债方面发挥了作用，他的声望远胜于我。从此以后，杜在电话里，不叫我黄老伯，而改口为金荣哥了，我感到真不是味道！"

但黄平时常托程子卿带口信给我，要求我对杜的先生陈世昌（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金神父路）特别关照，我认为他很重江湖义气。总之，由于黄的关系，杜才能从一个水果贩变成烟赌老板，后又与国民党挂上了钩，青云直上，对黄不如过去尊重，这也是事实。正如上海流氓中一句成语说的："弟兄之间，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

五、我和杜月笙的交往

一九三〇年，上海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一千余名工人，要求适当增加工资，资方不同意。在徐阿梅领导下，工人发动罢工，长达一个多月，资方企图收买徐阿梅，遭拒绝。当时法捕房总巡找杜月笙说：如果不能帮助解决工潮，我将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重新开禁问题。杜即找罢工领袖徐阿梅，表示愿收他为徒，并每月津贴他三百元。徐不从，杜乃重金收买法捕房政治处法国探目马慕雅（Marmorat）、翻译陆殷栋（后改名为陆昭化）及华

探目范广珍(军统潜伏人员)、赵子柏(于右任学生)等，共同策划，事先由范仿制印有煽动性内容的共产党传单数百张（由范向公馆马路即现金陵东路高生大纸号代印)，在某天晚上由马慕雅率领程子卿、朱良弼、范广珍等三十余人，到徐阿梅家搜查，硬把传单塞入徐的卧室内，即将徐押解法租界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按国民政府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提起公诉。

法租界当局一向只承认南京政府的《中华民国刑法》，不承认特种刑事条例，而这次竟破例引用，该法院按煽动罢工事件，判徐徒刑十年。事后，张福宝、石全福等人拜杜为师，领导法商工会，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

以后，法捕房总监法伯尔，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事业，杜月笙企图通过留法工程师张一枢拉法伯尔下水，并派人送去一副“金台面”(宴会餐具全套，两千两金子造的)。法伯尔除严拒外，还要杜在上海申、新二大报上刊登启事，说明送礼的错误，并保证不再做类似的事，否则要把杜逐出法租界。

这件霹雳大事，影响大流氓的前途，杜即利用他的徒弟赵志英(法商水电公司抄表间组长)及沈静彝，鼓动车务部二千人罢工，声势浩大，时间长达二个多月，所有上海法租界内电车均告停驶，严重影响了法租界的交通和治安。

捕房开警务会议时，我与曹炳生二人也参加。我当时提出：“法伯尔中校莅任后，取消了烟赌二大害，受到全上海中国居民的赞赏，有口皆碑，但上海自中英鸦片战争开辟商埠以来，华洋杂居，良莠不齐，尤其是租界情况十分复杂，流氓恶霸十分猖獗，如果对他们采取的手法太严，可能引起反感，甚至于派徒弟到处扔手榴弹，做坏事，妨害治安，巴黎方面看到这种情况，有损捕房的威信，

为此，我建议先限杜月笙二十四小时内写书面向您道歉认错，不再做类似情事，如果杜照办，总监的威信更高，事情也可圆满解决。”法伯尔接受我的建议。我告知了杜，他欣然接受，即通知赵志英停止罢工斗争，并自那时起，每月给我银洋三百元，后增加到五百元。

事后，赵、沈二人被法国资方开除，由杜收养在家中。一九四〇年我到香港去访杜时，杜指派赵代为接待。

一九三四年，宋子良同上海维也纳舞厅张姓舞女发生关系，怀了孕，女方向宋要求一笔十万元津贴，宋不允，双方纠缠不休。宋请杜处理，杜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厦召见该舞女，她一到即被四保镖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外，连同胎儿一并葬身大海，俗称“种荷花”。

一九三六年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重新处理顾竹轩杀死大世界经理唐嘉鹏案时，风闻这件舞女被害事，曾亲自调查，得知一切经过内情。他将调查情形告知我，要我严守秘密，切勿外泄，因事关国民党政府重要人物宋家的事，法当局应请示巴黎政府，才可决定怎样进行法办。适值那时中日战兴，且不久法国在欧惨败，饶伯泽等均赴非洲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军，此事便不了了之。

六、张啸林的下场

张啸林，杭州人，浙江青帮通字辈，来上海后，与黄金荣、杜月笙拉上关系，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二一六号同杜共建有住宅。因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属浙江督军卢永祥管辖，张是浙江人，在这个黄、杜、张“三大亨”合作的集团里，专门负责联络卢永祥与何丰林，

勾结他们贩运烟土，黄、杜则专与法租界当局来往。

抗战初期，国民党方面曾动员张离开上海，张托词拒绝，后被击毙在华格臬路住宅的窗口。他被杀的主要原因，据悉是由于接受日伪委任，准备出任浙江省长。死前三天，他在愚园路岐山村五十四号岑德广家中，接受委任状，旋即被杀。杀他的凶手是他的保镖，又是其长子法尧（留法学生）奶妈的儿子，名林怀部（绰号王和尚）。整个计划是军统周伟龙派其上海行动组长陈默领导执行的。凶手枪法很好，当日因保镖与车夫在院内吵架，张从楼上窗口向下探望，子弹从口中进入，穿枕骨而出。吵架是一种故意的安排，引张伸首窗外看望时枪杀。次要的原因，是张企图借日伪势力，趁杜月笙不在上海，取代杜在上海的地位，故杜与戴笠商议，利用张将投敌的理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奸”。

事发后，赵志游向法当局联系，认为凶手平时怀恨张啸林气量小，脾气大，为泄愤报复而杀他的。通过这种关系，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洋对该凶杀案断定为普通刑事案件，不牵涉政治问题，因此日伪无法插手干涉。赵志游的法国太太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的内幕。后来凶手被释，送往内地。

七、与法租界有关的其他帮会头目

除上述黄、杜、张之外，还有两位“江北大亨”金九龄与顾竹轩。顾又名顾四，与金均拜黄金荣为师，在公共租界福州路开设天蟾舞台，与虞洽卿为莫逆交。这是一位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据其亲信徒弟王兴高说，顾至少谋杀过七位有名望的人物，其中两个是律师。由于他有恶势力，竟能逍遥法外，并收徒弟一万余人，包括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顾、金二人都是苏北旅沪同乡会

的首要人物。

顾竹轩与唐嘉鹏都是黄金荣的徒弟，为了争夺黄开设的大世界游艺场的经理职位，顾唆使其徒王兴高杀死了唐。事后，王被捕，判刑十年。起初讲定由顾负责王的家属一切开支，谁知过了三年，顾不按时付给，大有毁约之意。王趁饶伯泽参观马思南路监狱时，向饶伯泽密告此案内情（饶精通华语），揭发顾是唆使的主犯。经调查属实，恐顾神通广大，饶伯泽特亲自与公共租界总巡商量，不使两租界捕房便衣探员知道（因他们极大多数是黄、顾的徒弟），直接将顾拘捕，移解上海市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法办。顾的家属虽然用了许多金条，但在法捕房监视下，不得不判刑十年，关押在马思南路监狱。直至抗战开始，经顾祝同出面保释，始恢复自由。

抗战期间，顾对通过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运送到苏北新四军地区的药品等物，做了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解放后得到政府宽大，终身管制。

八、各类犯罪组织和违法活动

在帮会头目的指使、包庇和控制下，旧上海社会上有许多犯罪组织，从事违法活动。如（一）扒窃组织。这个组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秘密集团，非局内首脑不知其详。一九三四年春，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搜出一张名单，与扒窃者有牵连而每日接受津贴的捕房刑事科人员，公共租界有六十五人，法租界有二十七人，此九十二人均被两捕房开革。

实际上，英、法两租界的陆连奎、刘绍奎、金九龄、吕竹林、翁老四等都与该组织有关，是租界上华籍探目、探长放的“笼”。该组织有五百余成员，分粗窃、细窃二种。细窃为特等扒手，七岁起就开

始受训，分男女两组，其中的超级能手称“小少爷”。凡能升到小少爷地位的，要经常“出差”，调往南京、北京、太原、苏州、杭州、广州、汉口、香港等地，领导秘密行业的工作。

扒手们在上海活动地点，主要是车站、戏院、交通车辆、大百货公司、珠宝店、绸布店等场所，而且成员各有专长，扒窃到的财物，须存放三天之后才能处理。每天接头地点是法租界八仙桥菜场西首朝北的黄全茂酒店，时间为晚上八时至十时。有路子的人，可以依靠捕房人员前往该酒店领回被窃的东西。

据说该扒窃行业供奉《水浒传》上的时迁为祖师。内部组织极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各地各道有单线联络，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抗战前，还有全国性总头目。此组织不同于青、洪两帮，其历史渊源更为久长，与“拐带”、“扎飞”等均属未入流的特殊行业。

（二）人口贩子。贩卖人口的流氓，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专贩男孩者，暗语叫“搬石头”，专贩女孩者，暗语叫“摘桑叶”。

专贩男孩的后台是前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洪两帮，有徒弟二千余人，与虹口吴淞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予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卖到广东去。尚武在我做黄浦分局长时，当过半年刑事探长，解放后被处极刑，这就是丧尽天良者的下场。

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前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洪两帮，有徒弟五千余人。他们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极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由于包庇贩卖人口发了财，尤阿根贿通外国人升任总探长。此人在一九三九年帮助日本宪兵队捕捉了十名

苗族抗战分子。这十位苗族志士，英勇不屈，被刑致残，以身殉国，日军部尊称他们为“支那十勇士”，在江湾立碑，并派一队士兵向他们墓前致敬。尤阿根因此被军统陈默杀死在汉口路扬子饭店门口。

法租界上贩卖人口的总头目是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杜月笙的徒弟。任的后台是范浪打（Volenti），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出身，绰号叫“药罐头”，其意是任何事情，有钱都可解决，他的妻子是中国广东人。由于租界上有这些人作保镖，妓院里的女孩卖出买进，是无人敢干涉的。

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当时旧中国天灾人祸，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民不聊生。浙江省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尼斯等地去表演“扭跳小脚舞”。马赛、尼斯两地是法国南部著名的风景区，别墅林立，为欧美资本家避暑游览胜地。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是黄色皮肤，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即叫“贩黄鱼”。

当时有一名陈鹤鸣者，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二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的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严重影响国体。他们的方式，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四百五十至五百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包办，实际上，他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二十

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设法乘火车到葡京里斯本，由中国使馆人员接待，休息一时期，再签署“赴法游历证明”，可以在法国定居三个月。抵法国后，男的由当地流氓宣传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五至二十五法郎不等。三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五千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三个月约可余八千至一万法郎。三个月期满回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一千五百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五六年后，有的混上个法国老婆带回国来。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也赖此交易来维持生活。

这些农民，为要交付旅费，常出卖家乡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训练，并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旅费为陈吞没，因而上船后就藏在煤堆中，如遇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发生窒息闷死情况，尸体即葬身鱼腹。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杂志以侮辱中国。

《申报》史量才先生曾为此事，在社论中揭发批评，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奉令彻查，并有南市上海警察局长文鸿恩亲自协助，在南市王家码头将陈鹤鸣逮捕，移解法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讯办，判刑五年。陈在沪的有关组织均破获，意、法二国邮船公司买办受到严重警告，青田县政府及上海市警察局护照股有关人员被撤职查办，到一九三六年，此案才告一段落。当时法租界承办此案的席能（法国人）和我受到嘉奖。为此，法总领事并曾写公函致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感谢文局长亲自协助破案。

另据当时加拿大皇后轮船公司买办夏君透露，陈鹤鸣被捕后供认，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一九三〇至一九三六年

间，贩运五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即付一百美元。我代表法捕房将此材料咨照文鸿恩局长转南京国民政府，事后未闻下落。

（三）走私贩子。长江“潜水鬼”均属洪帮，组织庞大，十分复杂。当时近法租界外滩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和平女神像（第一次欧战纪念碑）斜对面，有一爿“关记汽车运输公司”，白天甚少活动，清晨四时前，有小木船十余艘，从外国轮船上把进口漏税货物卸在和平神码头，由该公司卡车运至洋行仓库存放，每日有五、六卡车之多，既有租界靠山，又有外国洋行保护，真是“双重保险”。该公司经理吴志龙，浦东人，拜黄金荣为师，同时加入洪帮，与长江帮潜水鬼有密切关系，靠水鬼把外轮扔入水底的货物，运上小木船。抗日战争时，部分外国侨民被日本军部强迫集中，吴经常邮寄物品给与他走私有关的外国人。胜利后，吴被这些外商推荐，当了杨树浦英商蛋行买办。从此走私的事由他的儿子吴小龙继任。吴志龙在十年动乱中身故。其子吴小龙，在镇反时判刑二十年。

此外，抗战前，通过浙江沿海进入的走私物品，除就地销售外，也有经由装运水果、山货及水产等的船只进入上海的，主要商品是西药、高级化妆品、奢侈的生活用品等。其实在旧中国，最大的走私集团是四大家族勾结军统控制的缉私机构垄断了这个生意。抗战时，这样走私的舶来品，在上海法租界也可以买到。虽然走私的销售对象是全国性的，但上海法租界仍为主要集散地之一。国民党有些军政要员，利用职权，或通过空运及军舰，或以军用物资名义，进行大量的走私活动。有的则用搭股方式，或委托他人做生意，即使海关检察人员，遇到这类走私货物，也都不予过问。

（四）烟毒。旧上海流行的毒品，有鸦片、白粉、红丸三种，以前两种为主。鸦片分四等："度土"一名"大土"，即由印度运来者，质最佳，价最昂，非一般人所能问津。"云土"，产于云南，为国产鸦片的上等品，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通过走私，流毒全国；"川土"，主要产于四川、西康一带，是四川军阀的经济来源。"蒙疆土"，产于内蒙一带。蒙土又分二种，一为热河土，质较佳，汤玉麟督热时以此为其主要经济来源，一为绥远土，质较劣，但宜于制造白粉。

白粉用来制造海洛因及红丸，大都由日本浪人经军舰运入上海，由朝鲜人中的败类为中间商转销。这些人有日本领事裁判权保护，可以安然无恙。日本军阀利用白粉、红丸，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则充作头山满领导的亡华机构黑龙会经费。

杜月笙依靠黄金荣与张啸林在上海法租界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即金廷荪与徐采丞。金因此大发其财，在今新乐路襄阳南路口建造巨宅（现为运输公司办事处），并兼任黄金大戏院经理。抗战前，一度由南京方面委为上海航空奖券大运公司经理，设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大楼内。徐采丞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抗战期间，上海沦为孤岛，徐被任命为重庆政府上海直属通讯员，利用他与日本大使馆兴亚院坂田的关系，大唱"双簧"，在其高恩路寓所设置秘密电台，与重庆军政机关通讯联络。

金的徒弟楼银川和高鑫宝的徒弟吴世宝，在一九三〇年前，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江轮由汉口、宜昌带到上海新开河的鸦片，再用汽车运到东新桥宝裕里及霞飞路宝康里潮州大埔帮人开设的"土行"，然后分销各地。

抗战时，清官僚盛宣怀的后裔盛幼盦，住法租界金神父路西爱

咸斯路口（今瑞金二路永嘉路口）的大花园洋房内，以“宏济善堂”名义运销蒙疆土。实际上，他是受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控制，用日机将内蒙古的鸦片大批运到南京，再交“宏济善堂”运销江南各地。盛在法租界的住宅，由日方要求租界当局派警保护。他把江南地区推销鸦片的买卖，交给蓝芭荪办理。蓝是广东大埔人，一贯做烟土生意，是杜月笙徒弟任文桢（法捕房外勤科督察长）的徒弟，专销南京、苏州、杭州、嘉兴一带。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他在岳阳路二一七号的大住宅，胜利初期由姜公美宪兵队长占据。除上述地区外，蓝芭荪还在南市九亩地一带开设“燕子窠”和“土行”，经营零售和批销。一九四二年（时法国已在欧洲战败），他与日本沪南宪兵队长杉原中佐勾结，每日上午十一时到下午三时把烟土运进法租界销售。此外，还有严春堂，上海人，黄金荣徒弟，严潮生（绰号白马潮生），浦东人，陈世昌徒弟，都曾参加这些活动。

敌伪时期，上海最大的白粉贩子，有王永康、李筱宝、徐阿毛等人。王永康，拜褚民谊为义父，又有丁默村为其后台，故得承包当时上海的粪便，兼营白粉贩卖。李筱宝是伪警察局长卢英的徒弟。徐阿毛绰号“咸菜阿毛”，拜杜月笙为师，其毒品出售机关伪装得十分巧妙，设在大公寓的浴室水龙头内，共有两根管子，日本制造，一根出水，供洗浴用，另一根则装有白粉，揿动暗钮即有白粉喷出，外人不容易识破。他与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刘绍奎及法租界的金九龄、吕竹林等均甚密切。

（五）赌窟。上海租界当局借口“补助和发展华人教育事业”，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先后在公共租界上，每年春秋二季举行赛马，还设立“明园跑狗场”；在法租界，成立“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都是变相的赌博，很多中产阶层人家被害得家破人亡。逸园

跑狗场今改作文化广场，回力球场则改为卢湾区体育馆，化害人魔窟为有用场所，说明今昔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别。

二十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也用同样借口，勾结租界中外头目，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部”，实际上是变相的赌场。串线人是留法学生张一枢（李石曾的学生，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当时最著名的赌场是福煦路一八一号、西藏南路褚家桥申吉里及浙江路东新桥宝裕里。三地的总经理是高鑫宝，每月给法捕房及会审公堂的职员以特殊津贴四十至五百元不等，按级别为标准。当时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头子郑子良，属洪帮，会员都谙拳术，曾与黄、杜接洽，要求每月津贴五千元，遭拒绝，因此常派人到以上地点投掷自制的香烟罐头手榴弹，造成伤亡。有时被赌场保镖捉住，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口外海中灭迹。这样惨死的，每年有十多名，谁也不敢过问。法捕房也视若无睹，上海大小报噤若寒蝉，似乎都被收买了。

此外，尚有杜月笙的出窝弟兄马祥生，住法租界陶尔斐斯路十号，勾结南市西门一带的流氓“红脚阿胖”等，在两租界各处设“花会听筒”，以十二生肖为砝码，中者一元可得三十六元。很多劳动人民因受骗而弄得生活更苦，或酿成家庭纠纷，甚至自杀，为害匪浅。

抗战时上海沦陷后，静安寺以西是越界筑路地段，原来路面归租界捕房派警维持交通，两旁居民归中国当局管辖。上海沦陷后，中国当局随军撤出，无人管辖，外国报纸称之为“歹地”或“歹土”(Bad Land)。大批汉奸歹徒云集该地，先后开设“六国饭店”、“绿宝俱乐部”等大赌场，由沪西大流氓潘三省、朱顺林、李筱宝、王永康等负责保护。后来又迁到南市九亩地。这些赌台老板都是广东潮

州帮，聚赌抽头达四年之久。

（六）码头恶霸。上海开辟租界以后，沿黄浦江建立了很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码头上雇用的劳动力主要作搬运工作，俗称“码头小工”。

这些码头大多由外商经营，他们为便于管理，指派一些人做包工头。包工头本身都是流氓，多以洪帮为主。这些码头包工头，就是所谓码头霸首（主）。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二百斤，重的超过六百斤，每件运费从法币一角至二角五分不等。他们不劳而获地抽取百分之六十，真正卖力气的搬运工只得百分之四十。这些小工都是临时雇用的，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不论风雨寒暑，从事劳动，极易得病，或造成工伤、坠江等事故，他们的生命健康，毫无保障。

一个码头，忙时雇一、二百人，把头的收入相当可观。为了便于管理，他们又雇用小工头，层层剥削、压迫。这些把头大都参加帮会，又有洋人和他们手下的“二鬼子”撑腰，小工们则是一盘散沙，无法与之对抗。

码头工人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四十的劳动报酬，实际上还要支付种种不合理的开销，逢年过节，或把头、小包工及其亲属婚丧喜庆，都要工人摊份送礼。这些码头霸主同属帮会，互通声气，只要一个帮会霸主不用，则其他码头也难立足。

这些把头，除残酷剥削工人外，还在码头上横行不法，欺诈老实旅客。例如码头是用木板铺成，他们将其中一、二块暗中改成活动板。这种活动板分弹性和抽板两种，旅客下船后，把行李放在码头上，稍一不慎，转瞬间行李即不翼而飞。原来有小偷潜伏在码头地板下，趁机把行李窃走。这些小偷都是码头霸主的徒弟，他们事

后坐地分赃。我当过黄浦分局局长，洞悉其内幕。记得新开河码头有两个霸主，一姓陈，一姓刘，曾被我通过黄金荣将其收押，起出了许多赃物，最后具结悔改。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经我证实他们确有悔改表现，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据笔者所知，解放前，码头霸首中最大的有三个，均收徒弟几千人。一是沈关生，绰号“大刀关圣”，系杜月笙的同门弟兄，又参加洪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青洪两帮混杂，可以身在两帮），在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丁家衖有大批房地产，与中统码头组长刘槐是结拜弟兄。二是李茂龄，拜顾竹轩为师，以码头恶霸起家，日伪盘踞时，是浦东日商三井洋行煤栈的汉奸把头，大发其财，在法租界今建国西路有“茂龄别墅”，岳阳路有“茂龄新邨”，天平路有“茂龄村”等房地产。当李茂龄在岳阳路建造“茂龄新邨”三十幢三层楼洋房时，因地处甲级住宅区，依照规定，建筑材料也应用甲级的，他通过我的帮助，借口抗战时期缺乏物资，准予改用三等材料，李为酬谢我，把岳阳路七十九弄该新邨二十一号的房子，以三万元伪币廉价卖给我居住二十七年，但时过境迁，我只享受了七年，还有二十年的权利，因无证据，似乎难以解决了。三是张春宝，绰号“码头春宝”，是苏州河内河码头的霸主，早已病故。

（七）粪大王。旧上海，多数居民用便桶，每天清晨四时至八时，有人拉粪车到各街道里弄中叫喊“倒马桶”。每只马桶每月收倒桶费二角。清粪工人用的粪车为粪把头所有，在粪码头，粪把头将每车粪加一车水，一变为二，卖给粪船农夫作肥料，每车收一元。

公共租界粪码头在曹家渡苏州河边，法租界粪码头在徐家汇路打浦桥（今瑞金二路口）。两租界均有承包的粪把头；公共租界是王永康，法租界是黄金荣的姘妇阿贵姐的儿子马鸿根。以法租

界为例，每年承包费八千元，共有粪车四百辆，这是把头的唯一资本。他每月付给清粪工人每人八元，另给法捕房及卫生处有关人员六千元，每月净赚一万至一万二千元左右。除每日清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而坐享其成。

马鸿根绰号“马老三”，是杨虎的门生，与我私交颇笃。他的帐房叫张泉生，独揽大权，在法租界平济利路置有大批房地产，并开设日新池浴室。

九、黄道会与青帮汉奸常玉清

三十年代初，日本军国主义者派川岛芳子来上海、南京进行特务活动，一面收集国民党内部的情报，一面唆使日本和尚在虬江路放火烧毁抵制日货有效的三友实业社，掀起了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这时闸北青帮通字辈苏北人常玉清，秉承川岛芳子的命令，派人到苏北盐城等地招收十岁左右男小孩五十名，经过上海虹口送往日本受黑龙会的培训。一九三七年初，这些孩子全部以日侨身份调回虹口，到江浙沿海调查中国军队驻防情况及海防布置。八一三中日开火后，这些孩子伪装卖棒冰，到南市、浦东、闸北中国军队驻防的地点收集各种有关情况。南市地区的集中地设在原法租界东新桥大街爱多亚路口面朝东的一爿冷饮店内，店主姓吴，小名阿毛，前浦东陆家嘴日华纱厂工人。每天晚上十时，孩子们将收集的情况汇总后，由吴乘云飞出租汽车送往住在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一七号的一个日本人。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法租界东新桥民国路铁门口，搜查出入居民时，发现三个卖棒冰的十三岁小孩身上有很多日本银

元，麦兰分局把这三个孩子送至政治部调查，经我审讯，孩子们即说出以上情况。

事后，法租界当局把吴老板及小孩全部送到民国路铁门交界处，交给我预先约好的南市公安局政治科长刘槐及探长薛士林。后据刘告知我，国民党军队撤退前二周，把吴阿毛枪毙在西门陈英士纪念塔前，小孩全部遣回苏北。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日军占领闸北，常玉清担任闸北地区维持会会长，又在日军特务机关长楠本大佐领导下，组织黄道会，自任会长。该会的设立是企图假借发扬黄种人的道德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常玉清的黄道会直属于黑龙会上海分会会长楠本大佐，自一九三九年起，势力逐渐深入上海公共租界。被常收买的有公共租界捕房政治部对外联络高级警官、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督察长谭绍良，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和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曾任南市区维持会会长）。以上三人，后均被军统驻沪组长陈默打死。

我本人也多次受常派来的人纠缠，但未为所动。当时两租界捕房部分便衣探员被常收买，但因他们无实际权力，收效不大，尤其是在极大多数爱国者监视下，他们也无能为力。胜利后，常玉清被处决。

张仁奎与仁社

洪　维　清

张仁奎号锦湖，山东滕县人，是青帮大字辈。青帮到民国年间，其辈份已传到大、通、悟、学四字。大字辈残存的很少，数不出几个人，帮会中人，把张看成凤毛麟角。他晚年在上海组织仁社，与黄金荣的荣社、杜月笙的恒社，鼎足而三，是上海帮会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仁社的社员，大都是旧社会所谓“上流人士”，与荣社、恒社的鱼龙混杂，有所不同。

张仁奎贩私盐出身，跟随盐枭徐宝山浪荡江湖多年，与瓜洲的水警区区长（相等于水上警察厅长）赵鸿禧，同为徐宝山手下的得力干将。

辛亥革命中，徐宝山挂上革命的招牌，在江北招兵买马，鹰瞵虎视，大有割据称雄之意，因而遭到袁世凯的嫉忌。袁侦知徐有爱古董嗜好，密使人以送礼为名，在装潢精致的木匣内，安装烈性炸弹，徐展匣启视，为炸弹炸毙。徐死后，由张接管徐的旧部，头戴二十四颗当（帮内术语，表示辈份的意思），为部下所拥戴。

癸丑二次革命，冯国璋统率北洋旧部攻打南京，逐走了南京留守黄兴，接任江苏督军兼长江巡阅使，收编了张仁奎。经过李纯、齐燮元的提拔，任苏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长兼通海镇守使，驻防南通。

张到南通后，拜张謇为老师，每日必到张謇的“濠南别业”请安问好，曲尽弟子之礼，张謇也以上宾之礼待之。

我与张仁奎认识，在一九二四年。那时，我只有二十三岁，担任南通大生第八纺织公司（永丰公司）经理。在酬酢场中，与他相识。他喜打五角钱的扑克，同赌的有通泰五属盐场总场长韩奉持，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经理蒋嘏堂，上海银行南通分行经理赵汉生，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还有张謇的私人秘书许泽初等。我们均以输赢太小，提不起兴趣，但因不好过拂张仁奎的豪兴，勉强与之周旋。有一次，张忽发牢骚说：“张三先生（指张詧，字退菴，是张謇的哥哥）同我过不去，我在江湖上混到现在，什么都看淡了。三先生是我老世伯，何必同我闹别扭，他要做什么，我还不依他吗？”言下，颇有唏嘘之感。

第一次江浙战争，齐燮元电调张仁奎部队开往前线增援。他封了很多帆船，把军队运到浏河登岸，布防嘉定、南翔一线。据他说，指挥那一线的宫邦铎，初战得利，当面之敌是卢永祥的何丰林部，有不支之势。后来杨化昭部队开到，反攻很力，锐不可当。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张率领的部队赶到，赵营长（指赵子超，赵丹的父亲）装了刺刀，冲上前去，展开了白刃战，他的部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拚命把杨化昭的攻势压下去，才稳住了阵线。

张仁奎在南通多年，积蓄了一些资财，在山东原籍，置了不少地产，为终老之计。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到江浙，南通易帜。曹万顺部在南通哗变，鸣枪抢劫商店，张仁奎亲出弹压。张有一个远房侄子，希图混水摸鱼，杂在变兵中行劫，为张所知，立即正法示众，悬首南通西城门。此后张告老辞职，迁居上海。

一九二九年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绑受伤，不治身死，哄动了上海银行界。先是朱与静安寺和尚订约，租借到静安寺电车站终点，自大发南货号至元元帽庄的一段地皮，准备建造市房出租，已向地政局备案，办定了一切法定手续。同时，张啸林也要租这块地皮，托人与静安寺和尚接洽，和尚不肯，情愿以便宜的租价租与朱成章，不愿租与张啸林。张向朱商量，愿以较高的租价，向朱转租，朱亦不允。一天早晨，朱成章从愚园路寓所坐汽车外出，同车有朱的女护士邓小姐和朱的女儿。汽车刚出弄口，忽然有绑票匪向朱开枪，勒令停车。邓左手掌中了一枪，朱小腹上中了一枪，当场把朱绑去。中国国货银行得知后，四处派人接洽，探听线索。当日傍晚，由该行庶务周子斌带领赎回，把朱送往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救治，终以伤重不治身死。事后，我问周子斌，周只知捕房叫他去，到杨树浦路底把朱赎回，朱躺卧在田塍内，已气息奄奄。与何人接洽，出掉多少钱，他都不知道。赎票的钞票是用麻袋装的，外加火漆印，数目多少，他没有点过。银行界因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筹商应付的办法。结果，由交通银行钱新之请出了张仁奎，把张供养在海格路範园，称为“张老太爷”。

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陈光甫与女护士发生关系，欲娶为妾。陈妻是著名的雌老虎，闻而大怒，与陈拚命，陈无可奈何，只好与女护士决绝。不料女护士是上海大流氓高鑫宝的徒弟，哭诉于老头子，高答允与陈交涉，派人带信给陈光甫，提出条件：一、与原配离婚，与女护士正式结婚；二、给女护士慰藉费十万元。否则将以对付朱成章的方法对付陈光甫。陈大为恐慌，求救于溥益纱厂总经理徐静仁。徐在淮北办盐务时，曾充张謇的总务科长，甚得张的信任，因此与徐宝山熟悉，与张仁奎亦有关系，就

介绍陈光甫拜张仁奎为老头子，请张与高鑫宝“讲斤头”。陈备了重礼，送张仁奎一副门生帖子。张说：我们年岁相当，而且同是张四先生（即张謇）的门下，兄弟相称即可，门生帖子万万不能收，当场璧还了门生帖子，另换了一份兰谱，张自称盟弟，马上为陈了结了这桩风流公案。事情一传开，银行界知道张仁奎有苗头，辗转托人拜在张氏门下的更多了。同时进门的有上海银行兼办的大业公司的总经理李桐村，上海银行分行经理徐尔康，上海电话公司总工程师华某，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等。

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葛光庭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在北洋军阀中资格很老，与冯玉祥部下宋哲元、韩复榘都有交情。葛卸职后，自置房产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二八五弄上方花园十九号，与我望门对寓。葛也拜张仁奎为师，时常请张仁奎吃饭，有时邀我作陪。我与张有二十多年不见了，相见时，他还认识我，与我谈了南通张家成败兴衰，孝若的惨遭横死（张孝若是张謇之子，在家被保镖刺杀），很有故旧之情。

韩复榘也由葛光庭介绍，拜张仁奎为师。我问葛，韩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一个无权无势的张仁奎？葛说：“你不懂，过去左宗棠出兵新疆，当行军到平凉的时候，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向左要求暂停一日。左问他们什么原因，答是要迎接大龙头。你看，以左帅之威，军令之严，官兵甘冒军法，宁愿得罪左帅，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老头子的威力，祖师爷的规矩，入人之深了。左后来也拜了老头子，于军法之外，用帮规部勒部队，因此，加深了和将士的关系，取得了用兵的胜利。向方（韩字）是西北军，冯玉祥也玩这一套，张之江等都是帮里人，向方拜了张老太爷，他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

拜老头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送帖子，称为门生；一种是开香

堂，由引见人先介绍，经过老头子的同意，开具本人年庚八字，然后定期开香堂，经过三跪九叩首、吃血酒、发誓、请客等重大礼节，才录为徒弟。大和轮船公司买办朱筱竹是经过开香堂、拉台子（请客）的礼节，拜张仁奎为老头子的。朱筱竹常到我家约我闲谈，谈起“张老太爷”又收了两个有势力的徒弟，一是蒋鼎文，二是朱绍良。他劝我也拜张为老头子，可以得到“老头子的游扬和同门的帮助”。他说：“象我这样吃水上饭的人，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没有张老太爷的牌头，就玩不成了。”

孔祥熙、宋子文的部下，拜张为老师的很多，如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江苏印花烟酒税局局长盛昇颐等等。

张的学生，组织了仁社，为聚会之所，借以互通声气，联络感情。杭州也有仁社分社的组织，会址在“双峰插云”的附近，左边是袁良的住宅，右边是周象贤的住宅，买了地，插了木牌，没有把会所建造起来。

帮内把第一个入门的叫作开山门徒弟，最后一个叫关山门徒弟。开山、关山多是老头子得意的徒弟，张的开山门徒弟，据说是第七十六混成旅副官长王凤楼，关山门徒弟是苏北海门警察局局长陈楚均。

陈楚均在海门，也开香堂收徒弟。张驻防海门的部下，多有拜陈楚均为老头子的。陈的徒弟，不少是警察局的警官和巡长，失业后，有的贩私盐，有的贩烟土，对陈都有孝敬。我在海门祖传有一爿茶叶店，烘茶叶的多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喜欢叫叫打打，也有人拜陈为老头子，时常去参加打群架，被打的时候，口里衔了一条毛巾，不吭一声哎呀。如果吭了一声，就是没有“种”，以后帮内就不认他为好汉了。我问陈楚均，为什么张仁奎、黄金荣、杜月笙所收

的徒弟，都是文文雅雅，你收的徒弟，动不动要三刀六洞，大打出手？陈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们所收的学生，分档很严，上等的有上等的一档，下等的有下等的一档，文的有文的一档，武的有武的一档。你所见到的，多是上等的文的一档，下等的武的，你见不到。如果只有文治，没有武功，还玩什么青帮，玩什么老头子？"

青帮有一条规矩，许充不许赖，红帮是许赖不许充。如果你不是帮里人，而懂得青帮规矩的，叫空子，帮里一样招待你，代你付酒饭账和旅馆钱。红帮就不同了。我在湖北担任印花烟酒税局局长的时候，花捐、印花是由红帮弟兄、湖北饭店经理王静哉包办的。王告诉我，有一次，一个乡下佬到汉口，在法租界燕子窠吸鸦片，他放烟枪的位置，插烟签的位置，放茶壶的地方，拿茶杯的手法，吸香烟的姿势，斟茶的派头，俨然是大哥身份，小么（小弟兄）看见了，报告了大哥，说是什么山头的大哥到这里来了。我们就去招待他，同他辩道（盘问底细），但此人所答非所问，问他为什么胆敢冒充我们大哥，他说没有，问他为什么胆敢扯我们大哥的旗号，他极口叫冤。一切一切，都是碰巧的偶合，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帮里的规矩、手法、姿势、位置等等。经过大家研究，认为他有意冒充，犯了帮规。乡下人叩头求饶，结果，死罪虽免，还是割了一只耳朵。

张仁奎在上海所收的学生，都经过他自己严格审查，没有下级流氓混迹，他也不以帮规来管束他的门生。门生孝敬他，以"自愿"为主，有财力的多送些，没有财力的少送些，他从不争长论短，不象黄金荣、杜月笙等那样以做寿等为名，发帖子，打秋风。

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也拜张为师。有一天，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请杜月笙吃饭，有我作陪。杜向我说："听说你和张老头子相识，张老头子何必要收学生，他每月要多少开销，我送他就是

了。”散后，吴启鼎对我说：“杜月笙不高兴张仁奎多收学生，一则怕抢他的生意，二则怕张多收学生，他的师叔会越来越多，因为杜是陈世昌的徒弟，陈是通字辈，别人拜了张老头子的门，也是通字辈，就是杜月笙的爷叔了。”

为仁社奔走最力的，是时事新报馆总经理张竹平、浴德池浴室经理葛福田。大凡基金的筹募，月费的征收，都由他两人负责。仁社的经费是独立的，与张仁奎私人经济不相混杂。

蒋介石背叛革命，利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恶势力，捣毁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内的上海总工会，并诱捕总工会理事长汪寿华，造成了人天共愤的反革命惨案。蒋认为帮会对他有功，因此对帮会头子竭力拉拢收买。蒋对张仁奎也很尊重，曾经利用过张到山东疏通韩复榘。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劝张随同西迁，张没有去。敌伪对张，也作过工作，张托病未出。抗战末期，张病死上海寓所，蒋介石还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扬。

据我看来，仁社的社员入社目的有五种。一如陈光甫、李桐村，喜欢玩弄女性，有了张仁奎的后盾，就不怕流氓敲竹杠；二如朱筱竹、陈香涛，吃的是江湖饭，有了张仁奎的靠山，跑码头可以吃得开；三如蒋鼎文、朱绍良、韩复榘，继承了张仁奎的衣钵，可以借帮会为号召，加强他们的势力；四如钱新之、韦敬周，扯了张仁奎的旗号，可以得到安全保障；五如张竹平、葛福田，有了张仁奎的关系，可以多轧几个有钱有势的朋友，在业务上得到便利。

张仁奎生得魁梧高伟，两目炯炯有神，言笑不苟，颇有“北方之强”的气概。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习于下流，在南通病死。第二、第三个儿子都从事正当职业。第三个儿子经钱新之介绍，在中兴公司工作。

我的老师袁寒云

陈 惕 敏

先师袁寒云，名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生平别号和笔名很多，难记其详，惟乳名“抱存”，是他父母从小就叫的，所以他在文墨上凡是遇到与他父母有关的事，就叙名“抱存”或“豹岑”。

寒云师是青帮“大”字辈。我是民国十四年夏历四月在北京拜他为老头子的。按照前清拜老师的规矩，用三个红封套分装贽敬、席敬、门敬（门敬是给号房的），另外一个红封套里装拜老头子的十行大全帖，叙明三代简历。将以上四个封套和介绍信，一起交给号房，这号房请我坐，我就坐下。这是从前清流传下来的规矩，门生的身份无论多么大，到了老师那里，一定要亲自走进号房，号房照例请你坐，你只好坐，假使不坐就是表示看不起号房，号房可以当面说你“不懂规矩”。

我在号房坐了好久，号房从楼上下来请我上楼。其时寒云师住的是一宅小洋房，号房领我到寒云师吸烟室门口，我一眼望进去，寒云师穿了长衫（平时他在吸烟室只穿短衣）坐在烟铺上等我。我走到他的面前行了“家规”（按帮内规定的动作叩头），寒云师叫我坐在他的烟铺的另一面，问我的学历和履历，我都据实回答，同时问他帮里的人称自己的老头子为“先生”或“老头子”，我认为先生二字太普通，老头子三字又太俗，可否称“老师”？他说可以的，所

以我称寒云师为老师。

寒云师的性情很和平，不肯得罪人，对朋友或门弟子都没有架子，很随便，不拘礼节。凡是有人去看他，先由号房进去通报，号房只要见主子在鸦片烟铺上点头，就请这人进去，这人进去向他招呼，他就在烟铺上一面抽烟一面点头，从不起身。起身迎接而又亲自送客上车的，我只见过两个人。在他的生母生日的那天，我奉命替他招待普通的宾朋，所以整天在抽烟室，这日下午，号房飞奔进来报说“四爷到”，四爷是他的胞弟，他立即起身下楼迎接，并亲自陪同到楼上拜寿(寒云师的生母也住在楼上)。他兄弟二人回到抽烟室时，寒云师为我介绍说，这是你的四师叔，我就按照帮规向这位四师叔行家规，他向我回叩，因此我知道他不在帮。过了一会，号房又飞奔进来报说“六爷到”，寒云师又起身迎接，回到吸烟室后，也为我介绍说，这是你的六师叔，我向六师叔行家规，六师叔也向我回叩。这两位师叔去时，寒云师都亲自送上汽车。到了傍晚，号房进来报说某某几位老爷到了，现在客厅里，寒云师就叫我出去代为招待。入席时，寒云师亲自出来敬酒毕，就将酒壶交给我，要我代为招待来宾。席散后，我向他报告，并说刚才两位师叔太客气了，我小孩子对他们行家规，他俩都回叩。他说，“你今天迟来了一步，假使你来的时候你的大师伯(指袁克定)还没有走，他会毫不客气地坐着受你的头，你起身时，他还要和你说‘赏你一个座儿’。前几天畹华(梅兰芳的号)到天津，因为和你大师伯向来很有感情，所以每到天津，总去看你的大师伯后，再来看我，这是他的老例，那他见了我就说，‘大爷的太子梦还没醒呢’。”接着寒云师又说：“你大师伯为了说‘赏你一个座儿’，闯下了大祸，还不醒，真可叹。”我问怎样闯大祸？他说：“其时我已被你的大师伯和三师叔逼离了北京，这是

另外有人说给我听的，就是段祺瑞到小站发通电讨袁的当天早晨，段向你大师伯叩头，你大师伯坐着动也不动，等段叩完头起来，对段说‘赏你一个座儿’，段当时忍受，回家后就部署一切，到小站发兵。原来段和你爷爷的交情是很厚的，你大师伯这样得罪他，他受得了吗？但是你大师伯始终执迷不悟，凡是不向他叩头的人一概不见，怪不得畹华说他的太子梦还没有醒。”我问，“刚才老师说，老师被大师伯和三师叔逼离北京是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在北京一家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发表一篇反对你爷爷做皇帝的文章。那时你的大师伯太子心热，希望你爷爷称帝。你的三师叔说残废人不能做太子，因为你大师伯是跛脚，又指了我说，‘二哥不赞成父亲做皇帝，当然也不要做太子，所以轮到我是名正言顺。’这些话都是当了你爷爷说的。他二人看了我反对你爷爷做皇帝的文章都想谋害我。因此你爷爷立时密嘱幕府中善于金石的人刻就一方‘上第二子’四个字的长方图章，派人密嘱我立刻使用，冀免危险。我不忍辜负他老人家的好意，只好叫人将这方图章盖在我的藏书上，因此我的一部分藏书上都有这方图章。但是他二人还不肯原谅，你爷爷知道后，就趁他二人不在跟前的时候，叫我的小名说，‘你何不出京去玩玩？’我会意了，回去先将这方图章收起，略为部署，就在这天下午到你爷爷处说‘遵父命办’。你爷爷点点头，我就只身离开总统府径到东车站乘火车到天津，换车到上海。那时我们兄弟都有一位总统府秘书陪伴读书、消遣。这日我刚离开总统府，你爷爷派人找我，知道我已出发，就马上请陪我的秘书步章五（号林屋山人）跟随我。我和步二人在上海见面后，就决定对你张爷爷‘孝祖’，开香堂拜老头子，使你大师伯和三师叔奈何不得。

接着又说：“我孝了祖，请过香堂酒后，凡是与我同一字辈的

人要求和我换帖，结为异姓兄弟，我从不拒绝，所以凡是上海的大字辈，不问他的职业高低，都和我换过帖。”说到这里，他郑重地对我说：“你既进了家门，切不可轻视下流社会，因为下流社会的知识虽然简单些，但只要不轻视他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这是我在上海孝祖后的经验。我自对你张爷爷孝祖之日起，随时随地都有人做我的临时保镖，这些义务保镖都是上一流的人派来保护我的。因为我对他们不分贵贱一视同仁，他们都服从我的指挥。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南市城隍庙去玩，刚说出这句话，其中一个义务保镖说，‘我去布置一下，可以使大家安心’。他出去了一会回来对我说，‘布置好了，等您吸足了烟，我们就随您去玩。’我抽好烟，带着他们到新北门下车，就见到有人和去布置的人耳语，我一路走，一路看着玩，也一路留神注意我的前后左右都有人在暗中保护我。”

有一天我到寒云师家，有一位大胡子客人先我而在，寒云师为我介绍说，这是徐朗西先生，又写一副对联送与朗西，上联是“更能消几番风雨”，下联是“收拾起大地山河”。这日我和朗西先生一同出来步行到电车站头始各分道。第二天我又到袁家，盛赞昨天老师送与朗西先生的联语，寒云师说，我也同样送你一副，同时嘱咐他的佣人预备纸墨，真写了同样的联语，只是上款不同，送徐的一副是“朗西谱兄”，送我的是“惕弟”二字。寒云师说：“辛亥年上海起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寒云师又说：“提起辛亥革命，我闯过一次几遭清室满门抄斩的大祸。那时，你爷爷正做直隶总督，我受了黄兴的委任，将委任令用好几层油纸包好，装在铁匣内，埋在总督衙门内我的卧室天井的花坛内。这样收藏已经够荒唐了，我还亲自将革命传单贴在北京正阳门外，由于我没有经验，做事不密，被人发觉是我做的事，消息马上就传

到你爷爷耳中，你爷爷命我星夜回转洹上村家乡读书，不许到北京或天津。这一消息既然传到你爷爷耳中，也能传到隆裕太后的耳中，幸亏其时北洋军队都是你爷爷的亲信，隆裕太后想必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仅将你爷爷原品休致，这是我年轻时的轻举妄动。”

寒云师的家庭中是遵守旧礼教的，例如我第一次见到梅真大师母，寒云师给我介绍后，我向她行家规，梅真师母回叩，叫我“陈老爷”。以后我每次到寒云师处，假使梅真师母先在寒云师的抽烟室，袁家佣人打开门帘，一定见到梅真师母已经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见了我就叫“陈老爷”，并且一定问“陈太太好”。我的太师母生日那天，我要到寿堂拜寿，寒云师嘱咐梅真师母带我上楼，眉云小师母也随着到寿堂，我对寿星行了礼，照例向梅真师母道喜，梅真师母立即回叩，我又向眉云小师母道喜，眉云小师母也照梅真师母的样回叩。

我和寒云师见面时，除了有特殊情形，略谈青帮的人和事之外，都是谈风花雪月，或是有关学术的话。他时常拿各国金元辞典或各国邮票辞典指定一段叫我译给他听。由于我对法文荒废已久，不能畅译，他说，只要你将懂的字译给我听就够了。我就断断续续地译，凡有我不懂的地方，向他说明在某字之下，某字之上，有一个字或几个字我译不出来，他只要思索片刻，就可将我译不出的字补充成文。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古而缺乏恒心的人，他曾经博览群书，也曾玩过“古书”、“古钱”、“汉玉”以及各国金银币、各国邮票等。

有一天，我将所藏汉玉全部带去，请他鉴别。他看了以后，随手指出哪是假的，哪是真而不精的。我问，这几件何以见得是假，那几件何以见得不精，他听了我的话，就指挥替他装鸦片烟的人到他的卧房去拿来两只小箱子，他用钥匙开了锁，抽去盖子，出现许多

大小不等的抽屉，他指给我看，在哪个哪个抽屉里有相同的精品，让我自己拿出来比，增长鉴别力。他说，大的一箱里都是汉朝的中件和小件，小的一箱里都是三代的中件和小件，三代的玉器中有记载可查的只缺少一件商朝名家刻的七刀头鱼勒。

有一天我和寒云师说起想和华侨议员黄伯耀合办华侨联合通讯社，因为京师警察所规定必须备妥两家四等捐以上的铺保附在呈文内一起送去，方可受理，否则不批准，我找铺保困难。寒云师埋怨我说，何不早说，北京的“公寓”和“马车行”都上四等捐，我家几个佣人连装烟的在内都在北京开着“公寓”或“马车行”。说着，他就对装烟的人说，你到外面弄两张保单来，让陈老爷带到北京去应用，因此我就毫不费事地得到两张保单。

另有一天，我到寒云师处，才说几句话，号房进来报说“褚督办（即褚玉璞，当时任督办直隶全省军务兼省长）副官处的王大人来了”。寒云师对我说，“此人也是‘廿二’（就是第廿二辈、“通”字辈，和我同辈），我今天不便请他进来，你代我出去和他说，如果有什么话由你转告。前几天他来过，说褚玉璞要组织清一色的青帮政府，凡是不在家门（不在青帮）的，一个不用。他有一批朋友急急乎要介绍给我，对我孝祖，好到褚玉璞那里谋事，他今天来，或许就为这件事，假使他要和我面谈，就约他明天来好啦。”我出去和王一说，果然是为这件事，并且希望早日举行开香堂典礼，我就约他明天来面谈。第二天，这姓王的来了，寒云师和他说定，准于某日开香堂，还指定了当“传教师”、“引进师”、“领香”的人选，凡是需要奔走接洽的事，都由姓王的代劳。王又提到请香堂酒的问题，寒云师认为我们这批人都不是希望在天津撑市面的，除了必要的人之外，其他一概不请，因为这笔费用要由这日上“大钱粮”（正式孝祖进帮）的

人平均分担，寒云师体谅我们，减少开支。到了开香堂那天，寒云师叫我点人数，连我在内共是二十人。

段祺瑞将要下台的时候，华侨联合通讯社成立，黄伯耀任社长，我任经理，第一天发稿时，我附带发表了“三不”主义的宣言，所谓“三不”就是不造谣，不拿任何机关津贴，不乱骂人，纯粹是实事求是的超然派。不久就做出信用，京津各报都争相采用华侨联合社稿。张宗昌到北京、天津的时候，正是京津各报争用华侨联合社稿件的时候，我和张宗昌谈话时，他很赞成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和我提起寒云师。我说上海有一家小报，叫《晶报》，就是寒云师和几个朋友凑合起来，他本人不担任任何名义，仅在暗中相助。张宗昌说，我希望他替我办一张报，并且请他到济南重游旧地。我向寒云师报告了这一情况。

这年秋天，我随寒云师到济南，张宗昌请寒云师做高等顾问，派我做上校参议，驻沪办事。张宗昌请寒云师做高等顾问是表面上的事，实际是要寒云师到上海替他办报，所以批给寒云师两万元，作为开办费。张的秘书长吴桐渊还代我挂几处名，月薪都是三百元，但因欠薪关系，不能按时拿到。吴早知寒云师藏着好多名贵的古玉，想染指而没有机会，因此趁张宗昌批给寒云师两万元的机会，竟上下其手，化整为零，等寒云师急等钱用的时候，要挟寒云师送他古玉，一定要古玉到手，才每次汇两千元给寒云师，结果，寒云师所有的古玉，都被吴桐渊弄去。

我随寒云师到了浦口，袁门弟兄之一李金标特地到浦口来迎接，寒云师问他怎样知道今天到浦口？他说这几天上海《晶报》上每日报道先生的行踪，所以知道的。我们到了上海，住西藏路远东饭店，辟室三间，一间是寒云师和眉云师母住的，一间是我的卧室，另

一间是寒云师随从的卧室。寒云师每天会客和抽大烟都在我的卧室，由于《晶报》披露了寒云师来沪的日期以及预定住远东饭店的消息，所以当天晚上就来了好多宾客，寒云师介绍我和每个来宾认识，从此我的卧室中每日高朋满座。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晚上，李金标在福州路大西洋西菜馆为寒云师接风，共请了二百客左右。首座当然是寒云师，和寒云师并肩而坐的是梅兰芳。李金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梅兰芳为他唱一台义务戏，要寒云师和梅说，梅迫于寒云师的情面，当然遂了李金标的愿。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尽了一台班底的义务，当然也是寒云师的情面。这就是当初所谓“白相人”作风。由于寒云师为我向每个来宾介绍，大多数人请寒云师吃饭都随带请我。

寒云师每日到我的卧室，照例一面抽烟，一面看报。他每看到这日报上的绑票案、撕票案，以及其他各种人命案和较大的抢劫案，一定问李金标这件案子是哪些人做的？李金标素知寒云师的脾气，所以当天报上的案子都已摸清楚，凡是寒云师所问，他都能对答如流。

我们住在远东饭店的时候，许世英特地来拜会寒云师，要求在他的三女儿出嫁某华侨的吉日，请寒云师去客串一出压轴戏，寒云师当时应许演出《审头刺汤》中的汤老爷，所需靴帽袍套等一应道具，都是寒云师写了字条，派人向戏剧界老朋友夏月润等处凑合起来的。到了那天，我白天先去向许老世伯道喜，晚上随寒云师去瞻仰我向所未见的老师的杰作。想不到终日躺在烟铺上抽鸦片烟的寒云师，饰演《刺汤》中的汤老爷，他的台步的活泼伶俐和口齿清楚，内行也都佩服。这日他们本备有堂戏，因为请寒云师唱压轴戏，所有戏班中和寒云师熟识的人都来招呼寒云师，看完了寒云师

所演的《刺汤》才走。

寒云师每日写他的《寒云日记》和信件，并在任何一位送来的扇面等小件上题字。他照例躺在烟铺上仰面朝天，两腿弯曲，右手执笔，左手持待写之件。《晶报》的余大雄时常请寒云师在抽烟之余，写几个字去做锌版印出。钱芥尘也时常请寒云师在烟铺上写字，还有一个会画佛像的钱化佛也时常拿他的作品请寒云师题字。

这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寒云师带了眉云师母到天津过年。一九二七年农历正月，只身到上海，住东亚旅馆。我受介绍我入帮的浦应仙之托，代拟了一个申请制造戒鸦片烟药的呈文稿，请寒云师笔削，寒云师指点了不妥当的地方，嘱我自改。其时同门中有人说我请先生改戒鸦片烟药的稿子，等于见了和尚骂秃驴，是欺师灭祖的行为。第二天我到寒云师处，照例是同门满座，或许是这日我的态度有异，寒云师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听说有人说我欺师灭祖，我现在是领罪来的。寒云师当了大众说，“不要听他们的话。”接着问我浦应仙的药灵不灵？我说灵的。他要我给他配些来。我听了这话，很着急地问道：“老师要戒烟吗？”他说，“我是预备在火车上抵瘾的。”过了些日子，寒云师派人叫我去，说从昨天起开始戒烟了，先吃德国制的戒烟药，不见效，后来吃了浦应仙配的药，果然灵验，要我带几块钱给他，继续配药。我将寒云师的话传达给应仙，应仙说，我免费给先生配药，但求先生每日在《晶报》上披露先生戒烟的成绩，并请先生代写市招。我对寒云师说了，寒云师立即写“浦子灵速戒烟院”七个字的市招，并每日在《晶报》发表戒烟后的逐日经过，浦子灵速戒烟院立刻门庭若市。

这年，寒云师纳嘉兴俞佩文为妾。有一天我到寒云师处，适寒云师在前房，我在亭子间，寒云师问，“谁来啦？”俞佩文说：“陈惕

敏。”我听俞佩文对我这样称呼，大不高兴，因此就少到寒云师那里去啦。

民国十六年或十七年，张宗昌派寒云师做“挺进军总司令”，听说这委任令是李金标去拿回来的，可想而知寒云师做总司令是李金标怂恿的。有一个同门弟兄来对我说：“先生就要做挺进军总司令，你应当到天津去捧场，在先生的部下效力。”我说：“捧自己老头子的场是应当的，但是先要研究这个场的本身价值怎样？经我们捧了之后，先生是否能够得到我们捧场的效果？因为这事关系先生一生的名誉，我们做弟子的人应当共同研究，假使认为有不妥之处，不但不应当捧，应当劝阻先生不干这种事。”他说：“事情已经决定，先生的部下预定三个军，我们的师兄李金标和在褚玉璞部下做过师长的同门某人都是军长。我心想李金标是上海大流氓之一，他手下的徒子徒孙确有数千或竟上万也未可知，但都是乌合之众，不能作为正规军看待，这人的做官心热，想靠寒云师的牌头过做军长的官瘾，而置寒云师的名誉等等于不顾。我考虑再三，决定劝寒云师不就这挺进军总司令的职。因此我到寒云师处，虽是同门满座，我还是和寒云师耳语，将我认为不妥当的地方分析给他听，力劝寒云师不可就挺进军总司令的职，但是忠言逆耳，他终于到天津成立了挺进军总司令部。随去的秘书处长劝我同去，我托词谢绝。

事后知道这挺进军总司令部设在天津寒云师原来的住宅内，还成立了八大处，承启处由寒云师家的老号房改组而成，原来寒云师家的总管任承启处处长。李金标到天津后，将寒云师所有总管、号房、当差，以及装烟的人一起收在自己的门下，都算李金标的徒弟。这样一来，所有寒云师家的男佣人都变成了寒云师的徒孙，都改称寒云师为“爷爷”。因此寒云师对李金标这一举动大不满意，但生

米已成熟饭，无法改正。这总司令部在表面上虽已成立，但是始终只有门岗和几个卫队。这样混了一个月左右，国民军到了，挺进军总司令部就消灭，寒云师因自己的住宅为做过挺进军总司令部而被没收，暂避日本租界，不久因病与世长辞。听说袁克定接到梅真师母的电报后专诚赶到天津为寒云师办后事。

寒云师原有家嘏、家璋、家骝三个儿子，寒云师说老三最聪敏。民国十六年寒云师娶了一个嘉兴女子为妾后，又生了第四个儿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先父徐朗西生平事略

徐 晓 耕

先父徐朗西，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生于陕西三原东里堡，家资殷富，在四川拥有几处盐井和茶叶庄。早年留学日本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是东京同盟会首批会员之一。

中山先生历来重视帮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曾亲自参加过洪门。在日本东京组织兴中会，三合会首领郑弼臣即率部来归，辛亥前的历次反清活动均有洪门弟兄参加，后来在《三民主义》一书中说“清洪理白都是革命团体”。同盟会成立之初，先父即奉中山先生命联系国内帮会。当时，日人头山满与宫崎寅藏与中国各地帮会有联系，通过他们，先父得以参加进去。因洪门有“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的帮规，具体经过先父不曾说过，只知他在洪门是“峪云山”山主，在青帮也是个大字辈人物，有理字辈授予的证书。他本系一介书生，为革命需要，遂周旋于帮会之中，与袁寒云、步林屋、曹幼珊、阮慕白、段燮臣等人广为交游。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中山先生以同盟会原纲领已经过时，而洪门帮规却仍然延用明朝以来的封建旧制，曾召集洪门的九位大龙头开“全国九龙会议”，建议废除旧制，改用军队编制，以迎合现代潮流。当时“九龙”一致同意，但因积习已成，更改不易，且时局动乱，未能积极实行，只先父主掌的“峪云山”不再举行传统仪式及封赠

封建性质的职位而已。至于改变建制，也未能依中山先生的主张实施。

未久，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改任袁政府的全国铁路督办，曾有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打算，并以先父为秘书，代为计划，后因发动二次革命而作罢。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威胁大总统黎元洪离任，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异己。当时陕、甘、宁、青、川、滇、黔七省民党结盟，组织联军讨伐段祺瑞，公推唐继尧为总司令。经共同商讨，并取得中山先生同意，都认为进攻策略以先取陕西为有利。因为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湘、鄂等省均为北洋军阀势力范围，虽分直、皖两系，但尚未公开分裂，他们的兵力雄厚，不易夺取。陕西方面，督军陈树藩虽系段氏爪牙，但兵力较弱，且三原有于右任领导的靖国军可以呼应。于是中山先生委任先父为七省靖国联军援陕前锋总指挥。

先父在上海接受任命时，中山先生书赠“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的条幅。先父不解其意，问曰：“我率军援陕，此四字有何用处？”中山先生说：“此次作战，靠你的军事特长，且本是陕人，此番打回老家，先得人和，定能取得胜利，倘若中途发生变化，可将此字传给后辈，作为参加革命事业的纪念。”于是先父敬而受之，并以此作为一生行事的座右铭。

先父取道粤桂至滇，谒唐继尧请拨军入川，得唐首肯，派姚以价为援陕军总司令，徐永昌为参谋长，阎志远为副官长。先父身先士卒，亲率两旅兵力，血战半载，师抵陕南紫阳，大有一鼓而定关中之势。忽接唐继尧来电略云：段方拟以和平解决国事，希驻军待命，以免影响和谈。先父接电后非常愤慨，认为唐置前方将士浴血奋

战于不顾，竟与段方妥协，实属背信弃义，不顾大局，遂解甲归沪，七省联军援陕讨段的军事行动随之结束。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期间，先父不避艰险，积极设法营救革命同志。抗战初期，中共党员张国威同志致函先父云："先生公义为怀，站在劳苦大众方面，过去对于我们工作屡加帮助，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欢迎先生和我们站在抗日的一条战线上，共救民族的危亡。"为此，先父在上海沦陷后，从有利于共同对敌出发，除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外，并把国民党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盛木、彭寿三人介绍给周佛海，使他们得以打入汪伪内部。此时正值周佛海急于向重庆方面拉拢，即利用程克祥等与戴笠接上关系，提供了一些情报。这些情报，先父大都及时向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汇报，兹不絮赘。

抗战期间及解放战争中，先父通过胡振家（即胡英）等同志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党做了些工作。为营救被逮捕的革命人士，我也奉先父之命，奔走于那些特务机关之门，有的被保释出来，有的由于特务们掌握了确凿证据，难于保出，只有在生活上予以照顾。

先父平生鄙视鸦片贩子，看不起盛幼庵、李筱宝、王永康之流，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贩毒行为，也深恶痛绝。先母病殁时，先父拟在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办一图书馆作为纪念，艺专教务长汪亚尘闻信，透风给杜月笙，杜嘱魏廷荣转送五百银元作为协助购书之用，先父婉词谢绝。后来杜对他说："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他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这笔钱买书供大家看，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的鸦片烟味，叫我怎样做人！"因此，终于没有

接受这笔馈赠。由此可见他与帮会中人，虽有较密切的关系，对他们的肮脏行径，决不同流合污。

上海解放前夕，先父受胡振家同志指示，联络上海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公会等组织，准备迎接解放。此时，国民党特务已觉察到先父和中共地下组织有联系，但未掌握具体证据，不敢下手。一九四九年春，南京曾派员到上海劝先父举家迁台湾，于右仁和戴传贤并亲自出马“劝驾”。先父和于老既是小同乡，又从小青年时代即一同闹革命，可以不拘形迹地讲话。当于老劝他举家迁台湾，并负责今后生活时，先父说：“胡子！我去台湾干什么？我宁肯在上海当‘顺民’，也不愿意动！”于老是奉蒋介石的命来劝驾的，先父和陈英士及蒋早年都是换帖弟兄，后来对蒋不满，逐渐疏远，暗中参加反蒋活动，便反唇相讥于老说：“你从前是反蒋的，蒋给了你院长，你就‘委员长万岁’了！”言罢，哈哈大笑，终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动员先父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先到香港，再转北京。先父虽然衷心向往北京，但是安土重迁的思想浓厚，一时很难确定行止。恰巧有一天我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几个高级官员在一起吃饭，酒酣耳热时，有人向座中的参谋长询问：“如果徐朗西拒不赴台，且与中共继续联系的话，我们将怎么办？”这位参谋长当时断然说：“必要时，我们对他也不得不客气了！”其意暗示我转告先父，否则决不会当着我的面泄露这个秘密。我回来把此事告知先父，先父即与胡英同志商量，经他们调查，认为到那时候，警备司令部和其他特务机关确实是会下毒手的，于是促使先父下定决心秘密飞港转赴北京。

上海解放前的十五天，我自驾汽车把化装了的先父送至龙华飞机场，乘最末一班飞机飞抵香港，再由港乘轮至天津转赴北京，

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回沪，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于一九六一年十月病逝。

（杨　实整理）

黄金荣事略

乡　波

黄金荣是旧上海黄浦滩上显赫一时的“三大亨”之首，字锦镛，一八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初一）生于苏州。

黄家祖籍是浙江余姚，黄父炳泉原是余姚县衙门里一名有点名气的捕快。清同治年间被请到苏州破案，就此在苏州府任捕快头，并娶当地邹氏女为妻。

黄金荣乳名和尚，因脸上有几粒大麻子，“和尚”和“麻皮金荣”的绰号即由此而来。

一八八〇年，黄金荣十二岁时，黄炳泉举家迁居上海南市，在三牌楼开设一爿小茶楼。

黄金荣自幼不喜欢念书，稍长混迹于地痞流氓、盗匪赌棍之间，常窃取家中衣物，拿出去典当，手中稍有点钱就聚众赌博，或狎妓胡闹。后来竟结伙抢劫他在那儿学艺的城隍庙萃华堂裱画店，因此被店主开除。

一八九二年，黄金荣二十四岁上，通过他父亲老底子的关系，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他的主要活动地点是郑家桥附近他徒弟开设的“聚宝茶楼”。每天上午，他坐在固定的座位上，泡上一壶茶，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的就纷至沓来。他指挥码头上的“三十六股党”、租界里的“八股党”和他手下的“一百零八将”，侦察、追索案

犯，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这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

黄金荣的干练深为租界当局所赏识，称赞他是“租界治安的长城”。其实黄金荣对洋大人身家安全的保护远远超过上海法租界。有一次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樊尔谛带着他的妻子樊菊丽到太湖游玩，被横行太湖的土匪绑走。法租界当局要黄设法营救，黄与杜月笙等计议后，派与太湖匪首有联系的高鑫宝前去拜山。结果匪首“太保阿书”和“猪猡阿美”，分文不取，交出一对法国肉票。

黄金荣进捕房后，由包探、探目、督察员升到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深得法租界当局的倚重。一九二五年退休后，继续被聘为警务处顾问。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为表彰他的功绩，三次授予他头等和二等金质、银质宝星。

二十年代的上海，是采购军械、筹措军费、收集情报、采办舶来品、运销鸦片的主要水陆码头，因此，北洋政府、内地军阀、革命党人、响马盗匪或多或少都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大亨”有交往，黄金荣等也始终为各地军阀、失意政客等在上海的起居安全提供方便。福建督军周荫人的参谋长杨知候的六箱字画、瓷器等古董运抵上海码头时全部被窃，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请黄金荣协助追索，结果仅用三小时就将原物如数追还。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被迫辞退总统职务后，南下活动，经上海时，作为黄金荣的客人驻留三个月，黄派杜月笙及其小八股党保驾，使这位前总统十分感激，特制十个纯金奖牌分发有关人员以示感谢。一九二四年九月齐卢战争后，统治上海的军阀更迭频繁，但不管谁家当权，黄金荣等都是军阀们竞相结交的对象，或聘为咨议，或委为顾问。北洋政

府曾授予黄金荣嘉禾勋章和上校军衔。

黄金荣凭借他的地位和权势，在租界当局的默许下，指挥他的徒众给上海烟土商押运鸦片，从中获得巨利。后来和杜月笙、张啸林等合股办起“三鑫公司”，在法租界捕房的武装警卫下，包办了法租界的烟土经销，连何丰林和军警头目俞叶封也相继入股。在军阀、租界当局和军警一体保护下，三鑫公司的营业日趋兴旺，为黄金荣聚集了大量财富。

他聚财的另一途径是开赌局。早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他就和门下人开设了新吉利赌台，后来发展到合股开设五、六个大赌台，除每月从各赌台分得盈利外，每个赌台每天还要孝敬他一百元。另外，黄家数以百计的仆佣不用黄金荣支薪，一律到赌台去拿俸禄。与此同时，他又先后开设日新浴室、大观园浴室、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共舞台等。一九二四年间黄为扩充共舞台场地，仅以二担米钱的搬场费，强要金陵中路五金杂货店的店主叶庆祥在半月内迁出。叶婉言谢绝，黄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叶不识抬举，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不出三天叶被法捕房抓走。叶妻到处奔走营救，没有人敢出头帮忙，最后只得到黄公馆哭求请罪，答允迁出店堂让予共舞台，叶庆祥才恢复了自由。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拥有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唯亭乡下有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事实上黄并未正式加入过青帮或洪帮，但他却用帮会名义纳名帖，收学生。按说这是破坏帮规，本要受到严厉的惩戒，曾有人致函责

问他何敢冒充青帮“大”字辈张镜湖的门人，博致虚名，但他凭借在上海流氓群中的声威，并没有招致太大的麻烦。黄金荣迟至退休之时，才托杜月笙硬要张镜湖接受他的名帖和两万银元的赞敬，黄金荣这个空子终于弄假成真，成了青帮“通”字辈的人。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先后派杨虎、陈群、王柏龄带着秘密使命化装潜入黄公馆和黄、杜、张会晤，密商反共清党事宜。这时黄金荣虽已退休在家，仍把为蒋介石效力看成大好机会，一再表示“全力协助，义无反顾”，“一定尽心尽力”，“配合国民党中央的全面清共”。他们按既定步骤组织“中华共进会”网罗党羽，制定作战计划，同时委托洋行买办购置长短枪支和轻重机枪。黄金荣还凭借他和法租界捕房的老关系，把他的公馆作为匿藏军火的仓库。四月十一日晚，他们以有要事相商为借口，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中加以杀害。当夜黄、杜、张和杨虎、陈群、王柏龄在“刘、关、张桃园结义”图前祭天告地，喝酒结义。四月十二日晨，共进会攻打上海工人纠察队各据点时，黄金荣等还亲临阵地督战，为他们的徒子徒孙鼓气。黄金荣等指挥下的上海青洪帮和白崇禧直接指挥的国民革命军，一个挥刀举枪冲杀工人纠察队在前，一个假借调解骗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在后，抢夺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果实，葬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黄金荣和他的徒众们的反共殊勋，蒋介石委任黄金荣和杜月笙、张啸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成了党国新贵、地方政要。

对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从而飞黄腾达的黄金荣，法租界当局倍加器重，并同意他在租界内继续开设赌场。就在四一二以后不久，黄金荣、张啸林等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八一号开设上海最

大最豪华的赌场，场中轮盘赌台、牌九麻将、梭哈摇缸、烟榻酒肴一应俱全，并有姿色少女侍奉巾栉，挑土装烟。这个销金窟开张以后，车水马龙，赌客云集，为黄金荣等提供了又一个聚财的来源。一九三一年黄金荣在上海南郊漕河泾，费资三百五十万银元建造了占地六十余亩，楼台亭阁布局有致的黄家花园，蒋介石还特意送了手书的“文行忠信”的题匾。黄金荣从此深居简出，声言归隐退休，不过问外务。事实上他暗地指挥，坐地分赃的老行当从未放弃。其中最著名的为一九三三年黄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一案，此事由黄金荣出面“讲斤头”，贝家花了二万银元才将小孩赎回，另外还送了黄金荣一辆汽车。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黄竟不肯把大世界游乐场作为难民收容所，并赶走了设立在大世界的上海救济协会，继续开门营业。还散布什么中国和日本打仗是“小鸡去和黄鼠狼斗，哪会不失败！”

一九三八年夏天上海已成为孤岛，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府特派海军少将佐藤到黄家，邀请他筹备组织上海的汉奸政府，黄托病不见，佐藤第二次来访时，两人达成两条协议：一、黄尽力支持汉奸政府，派遣徒众党羽参加汉奸组织；二、黄为日本侵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于是大批黄门徒众开始参加汉奸组织。

一九四〇年汪精卫成立南京傀儡政府，黄金荣派龚天健赶赴南京，代表他祝贺“开国盛典”，密书致意，表示全力支持。

一九四二年黄的结拜兄弟陈群担任汪伪政府江苏省长时，黄亲自出马，率领大批徒众，乘坐专车赶往苏州捧场。在黄金荣和陈群的安排下，整个江苏省的各级汉奸机构安插了大批黄门弟子，如吴县县长沈靖华，江阴县长韦长镇，松江县长杨士杰，无锡县保安

队长周阿福等，都是黄的徒子徒孙，每月都向黄孝敬厚礼。

除此以外，黄金荣在汪伪的和平军中也有很大影响。黄的拜把兄弟太湖惯匪徐林诚任和平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军长，徒弟郝鹏举任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任淞沪铁道护路团司令。驻扎在苏北一带专门对付新四军的一些和平军头子，如集团军司令李长江、军长颜秀吾、三十六师师长田铁夫、二十八师师长丁聚堂等，都是黄的门下。黄金荣的得力徒弟鲁锦臣任第三十六师驻沪办事处处长，负责采办军用物资装备伪军，破坏人民的抗日事业。

黄金荣与日伪显要过从密切，汪伪政府的社会部长丁默村、工商部长梅思平都是黄家的常客。一些汉奸说：麻皮金荣在南京政府里虽没有公开头衔，但他的权力不下于周佛海。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黄金荣摇身一变，以当地绅耆的身份受到蒋介石亲自接见。蒋介石要他组织帮会势力维持地方安宁，巩固国民党的基层统治。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黄金荣组织起“荣社”，由其大徒弟邱子善、儿子黄源焘（中统特务）等分别担任理事、监事，并企图在杭州、苏州、南京、无锡等地设立分社，但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其阴谋未能得逞。

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将家中动产和企业中的资金暗中变换成黄金、美钞，叫他大儿媳李志清连同地产证、企业执照，一并带到香港，并在港、澳等地购屋置产。① 上海解放后，在军管会的教育启发下，黄金荣曾公开登报检讨自己的罪恶，人民政府给以宽大处理。

---

① 据回忆，系李志清背黄卷逃，说见本辑程文。——编者注

一九五三年黄金荣死于自己的寓所。

（原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
本辑转载时，经作者同意稍作修改。）

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

程锡文口述　杨展成整理

一、我和黄金荣的关系

我和黄金荣的关系，要从城隍庙说起。民国初年，我父亲在上海城隍庙附近开设裱画店，我从小就在店里帮忙。当时城隍庙内有五个有势力的“白相人”，① 因名字里都有个“生”字，被叫作“五生党”。其中有个当过律师、后开象牙店的薛连生，有次拿来一张任伯年的学生画的松鹤图，要我偷梁换柱把任伯年学生的名章改为任伯年的图章，我起初不肯干，经不住薛连生再三要求，终于给他裱好。薛连生拿了这张画去送人，经常夸奖我的手艺好，并且介绍我认识了史锦绣，叫我拿些字画到史锦绣家中兜生意。

史锦绣是白相人范开泰的老婆。那时范开泰在上海开设乌木行，人称“乌木开泰”，其弟范回春也是白相人，兄弟俩在上海都很有名气，但史锦绣更比范开泰出名，在白相人中被称为“强盗锦绣”。她是常州人，善于交际，性格豪爽，手段泼辣，在上海女白相人中可算是个头面人物，当时连黄金荣也惧怕她三分，因黄的元配夫人林桂生同史是结拜姊妹，史锦绣是大阿姐。

---

① “白相人”是上海解放前社会上对帮会、流氓分子的俗称。“五生党”除薛连生外，还有牙医陈润生，开玩具店的王廷生，开石灰店的沈菊生，以及后来管城隍庙香火钱的朱友生。

范开泰是城隍庙的董事，我认识史锦绣后，他夫妇就叫我带管些城隍庙的事务。那时我年纪轻，做事巴结，每逢初一月半，城隍庙进香人多，史锦绣来烧香之前，总是先派人通知我，替她准备香烛，做些杂务，她很满意。起初我和她见面总称她老太太，她叫我小弟弟，后来接触较多，她要我叫她"寄娘"，认我为"干儿子"。她为了让我多赚些钱，叫我挑些好的书画由她陪我到黄金荣家中去，卖给黄金荣和黄的亲戚朋友。因此我就经常在黄家进进出出，对于黄家大小佣人也花些小钱交结，关系日趋密切。

约在一九二二年农历七月半那天，城隍庙烧香和看庙会的人特别多，黄金荣是城隍庙执香会的会长，很迷信城隍爷，也带领亲信弟子前来祭供叩拜，还恭送城隍出庙赴会，街上的群众挤在两旁争看，秩序紊乱，烧香的人把香火乱丢在庙门之外，以致引起火灾，把城隍庙的大殿烧毁。靠庙里香火糊口的康道士等请求会长黄金荣和董事范开泰重建城隍殿。黄金荣一口答应，叫范开泰、范回春兄弟两人负责筹建大殿。范开泰做乌木生意，有的是木材，范回春是嘉定银行经理，钱财进出方便，黄金荣那时早已操纵三鑫公司（全上海贩卖鸦片的大本营），于是范回春想出一个办法，把筹建城隍庙需要的大笔钱，在三鑫公司贩卖的鸦片烟中，每两增加些价钱，总共拿出两万多元，由黄金荣、杜月笙、范回春、陆金林（城隍庙救火会负责人）等组成筹建城隍庙董事会，推黄金荣为董事长，实际工作由范开泰负责，叫我经管材料进出。经过一年多时间，城隍大殿重建完成，焕然一新，由于我管理材料有功，得到范开泰和黄金荣的信任。

一九三一年我二十五岁时，父亲去世，裱画店由我接下。但在豫园翻修过程中，把我裱画店的地皮收走，生计无着，范开泰劝我

投靠黄金荣。正巧黄金荣的领子黄源燕结婚，范开泰就叫我到黄金荣家中帮忙。这次办喜事的场面很大，我代为张罗，黄源燕深为满意，要我投帖拜他父亲做老头子，彼此结为师兄弟关系。于是我向黄金荣三跪九叩首，拜他为老头子，同时与我投门生帖子的还有汪伪时期在苏北当伪师长的田铁夫。

我在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以前，经常出入他家，对他家里上上下下、老少男女早已熟悉，拜师以后，和他日益接近。他抽鸦片时，由我在烟榻旁替他装烟，他常到逍遥池洗澡，也由我伴同。在烟榻旁、浴室卧榻上，他和我几乎无所不谈。他所住二楼的事务，楼下厨房间的伙食，以及招待来宾等等工作，都叫我办理，逐渐成为他的总管家。特别是我替他家掌握财政大权的“大少奶奶”李志清办了一件使她和黄金荣十分满意的事，因此更加得到他们的信任，巩固了我的管家地位。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黄金荣的元配妻子林桂生，原在南市一枝春街开设“烟花间”（比较低级的妓院），从苏州选了一个侍女叫李志清，长相秀丽，为人聪敏，林桂生不忍让她当妓女，就领在自己身边当贴身女儿看待。林桂生和黄金荣结婚后，把李志清作为童养媳，配给黄金荣的领子福宝为妻，福宝在十七岁时死去，于是李志清就成为黄家的“大少奶奶”。这位大少奶奶得到黄金荣的特别宠爱，主持黄家一切内务，公媳之间有着特殊关系，黄家的人心中都有数。那时黄金荣有个徒弟叫张方庚，在大陆商场开设大成皮件行，抗战胜利后倒闭，亏空伪币三十四亿多元，各方催偿债务，无法应付，央求黄金荣帮助，黄命我全权料理，我与各债主谈判，由于这些人都怕黄金荣，事情比较顺利地解决。正在这时，黄家大少奶奶风闻做交易所经纪人是发财的买卖，叫我借房子，领执照，我就劝说张方庚把大陆商场里大成皮件行的店面房子

让给大少奶奶使用，又去找杜月笙，请他帮忙领取证券交易所执照，李志清还亲自打电话给杜月笙，结果领到执照，取名“志诚”证券号，由李志清的领子黄起予当经理。这个证券号办得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我也因此得到黄家大少奶奶的青睐。

接着，黄家大少奶奶和我共同集资三亿六千多万元，开办了八十四间门面的小世界福佑商场，黄金荣叫我当经理。这样，黄金荣的门生丁永昌负责大世界，我负责小世界，都成为他的得力心腹人。

二、黄金荣的家世与家庭成员

黄金荣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父亲黄炳泉，原籍苏州，出生在上海漕河泾，原是种园地的，有些地产，后被其姑母侵占，就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那时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武官及捕快差役的人，同黄炳泉是邻居关系，因此后来黄炳泉一度做过捕快差使。黄金荣的母亲邹氏，苏州人，生两男两女。长女阿宝，嫁给邹家①，黄金荣排行第二，三女名招弟，嫁给徐步洲②，小儿子木金，不知下落。此外，黄炳泉还有个姘妇，在高桥旧校场开糕团店，名叫“麻子阿金”，也生过一个女儿，不明其下落。黄炳泉在黄金荣十余岁时死去，几年后邹氏相继而亡。

黄金荣三十多岁时与林桂生结婚，那时他虽在法租界巡捕房

---

① 阿宝的儿子叫邹金寿。金寿有三个儿子，长子邹政之，二子邹定福，三子邹之文。

② 招弟的儿子徐春霖，又名徐至诚，有一子五女。儿子徐寿康业中医，住上海淮海路；长女徐珍宝，有精神病；二女徐美英，任教师，现退休；三女徐月英，任勘察队工程师；四女徐幗英下落不详；五女徐禄英，现在青浦税务局工作。

当便衣包探，还未十分得意，招赘到林家，住在八仙桥钧培里。因林桂生没有生养子女，就领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子名福宝，又名钧培，女名宝宝，嫁给一个姓许的（下落不详）。福宝妻李志清，前面已经说过是童养媳，掌管黄家财政大权，后与黄闹翻，把黄家黄金美钞、珍宝饰物一扫而空，迁居香港，后到台湾死去。她在黄家没有生养子女，领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黄起予，现在美国经商；二儿黄起明，现在上海；女儿黄悦明，现在香港。

黄金荣五十四岁时，当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名利双收，已经得发，因为林桂生没有生儿女，他看中了在他开设的共舞台演《宏碧缘》的京剧名伶露兰春。露曾拜黄金荣为先生，她所唱的《骂毛延寿》，灌有唱片，在共舞台演出改良时装京剧，名噪一时，时常客满。黄金荣眼看露兰春色艺双绝，不管师生关系，搞得火热，并向林桂生提出要娶露兰春为二房，林桂生不答应，两人闹翻，林桂生即与黄金荣离婚，并把黄金荣的财物，如钻石戒指、名贵貂皮大衣等席卷而去，直到一九八一年死在上海。

露兰春嫁给黄金荣时，只有二十四岁，比黄金荣小三十岁，结婚后没生子女，她的母亲给她领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黄源焘，小名连弟，另一个小名根弟。据说黄源焘原是大舞台一个唱武生的演员的儿子，这个演员姓李，山东人，名不详。根弟原姓麦，名政学，又名元勋，是广东人，因其父母贩卖鸦片被捕，死在狱中，由法租界会审公堂公断给黄金荣作养子，在结婚时恢复原来姓名，离开黄家。露兰春与黄金荣婚居三年后，下堂求去，据说先嫁给唱老生的同行安舒元，后来嫁给德孚洋行买办、做颜料生意的薛某，住在丽都花园。

黄源焘十八岁结婚，娶沈阿三的长女沈静华为妻，生两女一

男，大女黄蓓莉，嫁给黄金荣的门生、上海雷允上药店老板雷宪芝的儿子，现都在上海；二女黄蓓兰，嫁给邮电局的一个职工（姓名不详），现也在上海。黄源焘的儿子现在东北航空大队工作。黄源焘在一九七五年获得政府特赦宽释，曾往北京参观学习，回沪后于一九七六年分配在浦东高桥五新木工厂工作，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因心肌梗塞死去。

三、黄金荣的童年

一八七三年黄金荣六岁时，随父母从苏州搬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黄金荣就在附近的庙宇孟将堂内的私塾读书。他从小顽皮，不认真读书，头脑却很灵活，善于随机应付。前面说过，张家弄内住有当过清朝武官和捕快差役的人，黄金荣的父亲经邻居介绍，也当过捕快。黄金荣从小耳闻目睹这些捕快的言行，头脑中印下不少江湖诀窍，对他后来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便衣包探，以及营救法国人姚主教而起家发迹，都有一定的影响。

黄金荣小名“小和尚”，并非是他做过和尚，这里有段来由。一八八一年黄金荣十四岁时，父亲黄炳泉因病去世，留下母亲邹氏和姊弟四人，只能依靠母亲代人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于是邹氏把黄金荣送到孟将堂内做些零碎生活，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人就叫他“小和尚”。由于他脸上有麻皮，后来又有“麻皮金荣”的绰号。

黄金荣在孟将堂做小和尚杂活后，不能解决温饱，他母亲又托人把他送到城隍庙一家裱画店当学徒。这家裱画店开设在豫园路环龙桥下堍，名叫“萃华堂裱画店”，是爿老店（有说是在城隍庙九曲桥得意楼旁边的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这是误传）。萃华堂

裱画店的老板叫黄全浦，黄金荣拜他为师，做了三年学徒，每月只拿月规钱四百文(四十个铜板)。满师后站了两年柜台，收入也不多，生活仍然清苦，谈不上养母亲和弟妹，母亲仍靠洗衣服维持生活。黄金荣在萃华堂度过了五个年头，除学了些正规的裱画手艺以外，还懂得了一些以假充真、偷梁换柱的手法。

四、黄金荣是怎样进法捕房和发迹的

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主要是靠邻居陶婆婆的介绍。陶家也住在张家弄孟将堂附近，同黄金荣家是隔壁邻居，黄金荣的母亲常替陶家洗衣服，日久天长，陶婆婆看到邹氏母子五人生活困苦，深表同情，邹氏就托陶婆婆替黄金荣在巡捕房中找个差使。一九〇〇年，法租界扩充管辖地区，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黄金荣报名投考，恰巧陶婆婆的儿子刚从上海中法学堂毕业，进入法租界捕房充当翻译，陶婆婆就叫她儿子在捕房内打了招呼，因此黄金荣被录取为三等华捕。那时捕房招考录取了二十名华捕，后来改组成侦缉队(即便衣警探)，陶翻译推荐黄金荣做领班，当时人称“二十股党”。

那时法捕房的实权操纵在法国警探手里，黄金荣被派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由于他在萃华堂学艺期间，常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一些地痞流氓和青洪帮分子。当了法捕房“包打听”(便衣警探)后，为了管理十六铺码头的治安和破获盗窃案件，他进一步有意识地和这些人厮混，在社会黑暗面中的关系逐渐多了起来。他用小恩小惠收买了一批惯窃惯盗作为线索，制造内讧，利用一批盗窃分子去破获另一批盗窃分子，甚至玩弄“贼喊作贼”、“假戏真做”的手法，一面布置一批小喽罗，约好某

月某日在什么地点作案抢劫，一面叫另一些喽罗到法租界巡捕房向他“报密”，他再向法国警探报密，这样使他能掌握带人破案的主动权。到了约定的日期和地点，原来约好的一批喽罗果然在进行抢劫时，便被黄金荣亲自带领、化装埋伏的侦缉队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些盗匪被关进捕房后，黄金荣又在捕房内打点，一一陆续释放出来。法捕房当局看到黄金荣连连破获盗窃案件，对他重视，使他逐渐有了威信。

黄金荣对上海的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进行敲榨勒索的办法也很巧妙隐蔽。他常常唆使一些青洪帮分子和地痞流氓，在商店门前或闹市地区寻衅取闹，甚至假装打架和骂街，影响商店营业，使顾客远而避之，不敢进去买东西，而黄金荣带着巡捕和便衣包探，上街巡逻，每到之处，这些闹事的小流氓无不逃之夭夭，有时黄金荣还故意抓起几个小流氓来惩办。于是一些商店老板和富翁财主，感到他确有办法，每逢过年过节甚至按月给他送钱送礼，把他当作护身神，有的还投帖子拜他做老头子，有的拜他为寄爹，有的拜他为先生。对于那些有名的富翁，黄还采用绑架勒索的办法，大肆敲诈。如唆使他的心腹徒弟丁永昌绑架荣德生，一下子就敲诈了几十万美钞。至于指使爪牙向富翁财主写恐吓信敲诈，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受害人被敲去大笔竹杠，还得请黄金荣出面解决，以免后祸。最使黄金荣得意的，还不是他破的假案，而是破了一件法国姚主教被绑架的真案，从而使他成为上海第一流大流氓、大把头。

姚主教原是法国天主教神甫，与法国驻沪领事、法捕房总巡等关系密切，在上海法租界有幕后操纵的实力。他为了开辟传教基地，亲自由上海乘火车，还带着几箱银洋，准备到天津去开办教堂。

当火车行驶到山东临城时，遭到军阀张宗昌部队拦车抢劫，把他绑架到临城乡下看管起来，准备勒索一笔巨款，赎回“肉票”。

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法国驻沪领事限令法捕房火速破案，将姚主教营救出来。捕房动员所有的侦缉人员，四处打听、搜索，都没得到任何消息，只得采取高价悬赏的办法，凡知道姚主教下落通风报信的，赏银洋三千元，如能找到姚主教的，赏洋一万元。黄金荣对此事极感兴趣，认为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于是千方百计寻找线索，甚至亲自到城隍庙烧香求签，祷祝城隍保佑，使他能获得线索，破案立功，将来青云直上，一定整修城隍大殿，装塑城隍金身，但还是石沉大海，音信全无（这是黄金荣躺在烟榻上对我讲的）。

说来凑巧，这起绑架巨案，却从一个到上海来的山东人被扒去一百元钱而获得侦破线索。原来在山东临城地方有个人名叫韩荣浦，是吴佩孚部下的副官，从临城乘火车到上海来买东西，火车到了上海，他从拥挤的人丛中走到车站附近的旅馆登记住宿时，发现装在肚兜里的一百块钱不翼而飞。韩荣浦沮丧万分，想起有个姓隋的同乡在法租界捕房当巡捕，于是抱着一线希望到法捕房去寻找姓隋的巡捕，姓隋的巡捕替他报了失窃案，并介绍他和黄金荣见面。黄金荣一听是从天津附近来的，便不放过机会，向韩荣浦打听上海火车开往天津前被拦车抢劫和法国神甫被绑架的事件。由于韩荣浦是吴佩孚手下的副官，熟悉行伍中的事，而且吴佩孚的部队和张宗昌的部队都驻在天津附近，双方所干的坏事，互有所闻，所以韩荣浦就将听到的消息告诉黄金荣。黄金荣一听有了线索，大为高兴，立即付给韩荣浦一百五十块钱，要他回到临城去详细打听肉票藏在什么地方，一有下落赶快到上海来报信，再给五百元赏金，如果破

案，更有重赏。由于黄金荣慷慨解囊，打动了韩荣浦的心，果然韩荣浦在回到临城之后，几天时间就同绑架姚主教的张宗昌部队取得联系，打听到姚主教被关押的地方。他第二次来上海同黄金荣接头，商量赎票问题，黄金荣的点子多，叫韩荣浦不必去找部队头头开价赎票，而是叫韩荣浦设法买通看押姚主教的人员。同时黄金荣与陶翻译商量，先向捕房支领二千元，给韩荣浦五百元，另交一千元叫韩荣浦立即去买通看守人员，并答应等黄金荣到达关押姚主教地点时，再付二千元，要这些看守人员逃往外地。还叫陶翻译用法文写了一张纸条告诉姚主教，请他放心，黄金荣会亲自到临城来救他出险。韩荣浦再度回到临城之后，黄金荣按照预定日期，亲自带领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由上海乘火车到达临城，在晚上赶到乡下把姚主教营救出来，安然返回上海。

黄金荣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不去直接同张宗昌部队谈判，而只花了几千元买通少数看守人员，竟把姚主教营救出险，法捕房对黄金荣破格重用。原来法捕房中重要职务都由法国人担任，这时破天荒地提升黄金荣为督察长，还专派八个安南巡捕保护他的安全。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他也从此更忠实地为法帝国主义服务。

黄金荣担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六十岁做寿以后，才辞去职务，名义上退休闲居，实际上幕后操纵。继黄金荣之后担任华探督察长的先后有沈德福、任水扬两人，因不奉承黄金荣的意旨，被黄金荣安置在捕房里的余党所排挤，最后还是由黄金荣的亲信担任这个职务。

五、黄金荣与帮会的关系

黄金荣虽然同帮会分子经常往来，却没有真正拜过老头子，既不是什么“大”字辈，也不是什么“通”字辈。按照帮会规定，凡是没有入过帮会的，称为“空子”，不能开堂收徒。黄金荣却不管这一套，他同青帮的“大”字辈张镜湖、曹幼珊等称兄道弟，对人自称是“天”字辈，比“大”字辈还多一划。他收徒弟不举行开香堂仪式，只是要徒弟写张帖子，上写黄金荣老师，下写某某某门生敬拜。黄金荣是见钱眼开讲实利的，只要送钱送礼拜他为老师，他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因此他所收的徒弟不下二、三千人。在当了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后，一次就收了二百多个徒弟，其中重要的和关系密切的有金九龄、程子卿、丁永昌、陆少章、鲁锦臣、曾九如、卢英、尚武、冯志明、韦钟秀、乔松生、汤坚、马德荣、张荣、董明德、周相成、管宝全等。这批徒弟大多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当小头目或骨干分子。另有天蟾舞台的老板顾竹轩、法租界的粪大王马鸿奎、六国饭店赌台的朱顺林、沧州饭店老板姚松如、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和水果荣生，还有工商界人士如新光内衣厂老板傅良骏、正泰橡胶厂老板郑仁业、渔业公司经理黄振世、新华影片公司经理张善琨等，其他还有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医药界人士。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麒麟童(周信芳先生)，当时被天蟾舞台老板压迫和威胁，也曾投拜黄金荣为师。

除黄金荣所收的徒弟以外，他的领子黄源焘收过二、三百门徒，外孙邹政之也收了五、六百人，再加上顾竹轩、唐嘉鹏、卢英、黄振世、丁永昌等也都收有不少门徒，所以黄金荣的徒子徒孙，不但遍于全上海，甚至江浙一带，也都有他的势力。

六、上海的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和三十六股党

黄金荣曾和杜月笙、张啸林、杨啸天、王柏龄、孙祥夫、陈群、陈希曾结拜为兄弟，收罗帮会分子、流氓地痞，称为上海的“大八股党”。按当时结拜的顺序，老大黄金荣，老二王柏龄，老三杨啸天，老四张啸林，老五杜月笙，老六孙祥夫，老七陈希曾，老八陈群。

王柏龄是扬州人，出身财主家庭，北伐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军长，在上海与黄金荣结识后，利用其军队贩卖军火，贩卖烟毒，以后死在扬州。杨啸天名杨虎，曾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北伐战争时期是何丰林的部下，当过海军司令，在上海办过兴中学会、海员俱乐部，参加洪门，收过不少弟兄。张啸林原是杭州的白相人，在杭州开设锡箔店，因逃税而到上海避风头，结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积极参与。敌伪时期，投靠日寇，参加伪组织承包锡箔税，后汪伪拟任为浙江省长，被戴笠所知，即与杜月笙密谋，将张刺死。孙祥夫曾任北伐军军长，与王柏龄搭档，托黄金荣在法租界代买军火。黄金荣有一次在烟榻上谈起孙祥夫、王柏龄两人，说：“这两个都是色鬼，在租界内看到长相好的女人，就请我替他们动脑筋，搞不到手，甚至拦路抢劫，色胆包天。”陈希曾是陈立夫的侄子，曾任蒋介石的警卫队队长，当过南市警察局局长。抗战前夕，黄金荣等组织“反日会”，我当过干事，有一次，上海宝大祥绸布店的老板丁某，因卖日本花布，被陈希曾拘捕，经丁某托人向黄金荣求情后保释。我接待过陈希曾，是陈果夫、陈立夫会见黄金荣时带来，介绍给黄金荣的。二陈要获得法租界的情报，黄金荣就转告陈希曾，互通声气。陈群在“大八股党”中是最小的一个，但在八人中他的文化知识最高，足

智多谋。北伐战争时期，曾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当时他指使部下散布反共谣言，为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作舆论准备。抗战时期，投靠日寇，充当伪江苏省省长，抗战胜利前夕，畏罪自杀。

除了“大八股党”外，还有“小八股党”，都是黄金荣、杜月笙的得力心腹徒弟，计有高鑫宝、马祥生、金廷荪、叶焯山、顾嘉棠、杨仁千、范果百、范恒德等八人。这些人也收有不少徒弟，横行上海。

此外，在上海码头上还有一批流氓，号称“三十六股党”。头头叫陈福生，又名陈世昌，曾拜张锦湖为老头子。张锦湖做过南通镇守使，是青帮“大”字辈，收有不少门徒。陈福生自拜张锦湖后，在青帮中渐有地位，杜月笙在十六铺码头卖水果时，拜过陈福生为老头子，得发以后，就把陈福生供养起来，还送给陈福生一座宽敞的住宅（在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淡井庙斜对过），报答恩师。陈福生绰号“套签子福生”，因他早先在码头上用套签子的赌博方式，骗取行人旅客钱财①。

七、三鑫公司的由来

旧上海贩卖鸦片的生意，原以广东帮为主，靠贩卖鸦片（当时称“黑货”）起家的大商号有郑洽记、郭源茂、同昌等。那时码头上的流氓众多，其中有一批叫“水老虫”，为首的叫范高头。这批流氓专靠在水中偷盗为生，每当英国轮船装运成千成万箱鸦片驶进上海港口时，因为黄浦江水浅，轮船无法靠近码头，必须用小划子从

① 套签子的赌博方法，是用三根一头涂着红、黄、蓝三种彩色的签子，向行人旅客显示，然后用手握住有颜色的一头，让顾客选择一种颜色套住另一头，套中的一元赔一元，五元赔五元。因为一共只有三种颜色，看起来容易套中，不少人受骗输钱。

轮船上将货物驳运，当轮船上一箱一箱的鸦片装进小划子向码头行驶时，常常会发生翻船事件，使一箱箱鸦片沉到黄浦江里去，这就是“水老虫”在作怪。他们把小划子弄翻，然后又把沉在水中的鸦片箱捞起，安放到另外的小划子上，将鸦片偷走。有时运到码头上的鸦片也会被窃。盗窃勾当使郑洽记等黑货商号大伤脑筋，租界捕房虽然指派巡捕在白天黑夜巡逻看守，但无济于事，甚至连巡捕也常告失踪，第二天发现尸体浮在黄浦江面。

在陆上码头也有一批流氓干这种不花本钱的生意，著名的有十六铺的张椿宝、单阿云、李德荣、荣啸云（绰号跷脚阿云），虹口的浦宰元，江湾的粢饭和尚（绰号），天后宫桥的闹天宫徐福生，以及铁臂膀陈长福等。其中有个范高头的徒弟，绰号“橡皮老虎”，曾把外国巡捕摔到黄浦江里去，后来破案，被南市警察局局长徐国梁枪毙在九亩地。

既有偷盗鸦片的流氓组织，也就有窝赃、销赃的贼窝，头头是三十六股党的另一个头子，叫马德宽。他手下养着不少徒弟，专门干收赃、窝赃和销赃的勾当，聚集地点在浦东对岸东昌路码头附近的“金丝娘庙”内。范高头等水老虫从水上和从码头上偷来的鸦片，都在这里开箱收赃，每箱烟土价值数千元。

后来，法租界捕房的头头法国人沙利，指定黄金荣想办法破案，实际这些事都是“大八股党”的徒子徒孙所干，黄金荣只能开只眼闭只眼拖延敷衍。但终非久计，于是和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商量，范回春提议组织一个公司，象保险公司那样收保险费。鸦片向公司保险后，由公司发给盖有印戳的保险凭证，如被盗窃即由公司赔偿。所定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百分之十，每箱鸦片价值数千元就得付数百元的保险费。这些保险费每月收入几十万至百

万元以上，由公司发给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的徒子徒孙和水陆码头的有关流氓，作为“月规钿”。这就是“三鑫公司”的由来。

当时黄金荣打着三鑫公司的旗号，安排捕房派几百名安南巡捕，开出警备车，声势浩大地到处巡逻，公开到码头上保护和押运鸦片进入库房。这几百名安南巡捕的费用，就由黄金荣从保险费中开支。开始时，法租界捕房在名义上派出五百名安南巡捕去保护码头，每月开支数万元，实际上由于法捕房头头沙利等都吃空额，并不足五百名人数。后来鸦片运进越多，法捕房的头头也水涨船高，吃空额由五百到一千、二千，每月开支从数万元增加到一、二十万元，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三鑫公司收取鸦片保险费是出在贩卖鸦片的商人郑洽记等身上，而鸦片商人付出的保险费就出在吸鸦片的人身上。在保险费收入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范回春等坐地分赃，每月各得数万元不等。其中最实惠的是杜月笙，因为黄金荣当时在法捕房当督察长，算是官方人员，不便公开露面，便让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经理，张啸林、范回春任副经理，实权掌握在杜月笙手里。杜月笙当了三鑫公司经理后，掌握了水陆码头大大小小的流氓组织，张啸林负责对付外地的流氓组织，范回春负责经济收支。此外，在三鑫公司安插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徒子徒孙几百名，挂名为检查员，每月可拿数十元至数百元。

三鑫公司之所以得到鸦片商人的信赖，固然是由于通过该公司，平息了鸦片经常失窃的事件，收到了“保险”的效果，但主要的却是鸦片买卖由秘密转向公开。当时，三鑫公司收取保险费不但由公司盖上条戳，而且有法捕房开出的收条，并加盖戳记。这个公司除了收取鸦片保险费外，还巧立名目，收取烟枪捐，于是上海的鸦片烟馆遍地林立，在法租界地区的每条里弄，差不多都有售吸所

（俗称“燕子窠”）。三鑫公司代捕房收取烟枪执照费，每支烟枪收执照费每月几角钱，后来涨至几块钱。那时一个烟馆至少有十几支烟枪，大的烟馆有几十支，仅法租界内就有烟馆一、二万家，每月收入就有几十万元。各处烟馆大都少报烟枪数，而三鑫公司所用的几百名检查员，专门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除了鸦片这种黑色毒品外，到了敌伪时期，又盛行红白两种毒品，红的叫“红子子”，白的叫“白粉”，又名海洛因，即吗啡。“红子子”由一个日本浪人叫滕曲三郎的，首先在上海制造，地点在虹口昆山花园（现武昌路附近），后来顾嘉棠、浦宰元、杨庆邦等在法华庙大量制造。这种毒品比鸦片价格便宜，而且吸法方便，放在香烟上就可吸，因此毒害更甚。旧上海的烟毒如此蔓延，与三鑫公司的经营、包庇是分不开的。

八、黄金荣和杜月笙合办高级俱乐部

黄金荣和杜月笙合办上海高级俱乐部的前夕，我在黄家的烟铺上和逍遥池浴室房间里，听黄谈起他和杜月笙合伙诈骗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钱财的事。那时袁克文初到上海，人地生疏，他的侍从人员中有个名叫韩荣浦的，正是在营救法国主教事件中给黄金荣通风报信的人，因此介绍袁公子去访问黄金荣。袁克文一见黄金荣，就送了十枚金币作为见面礼。这些金币是袁世凯当上总统后，由英国给他铸造的，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颇为珍贵。杜月笙看到连声称好，黄金荣就送给他三枚。于是黄、杜两人大摆宴席，隆重招待袁公子，吃的顿顿是丰盛酒菜、中西美点，穿的是高贵的中西服装，住的是精致华丽的高级公寓，出入有多名安南巡捕保护。袁克文

受到上海这两个"大亨"的殷勤招待，非常满意。黄、杜两人先伴袁公子踏遍上海的名胜古迹，接着又引他到书寓(高级妓院)和会乐里长三堂子，并亲自选上几名红妓女送到袁克文所住的公寓，与袁朝夕相伴，说唱玩乐，使袁克文跌入黄、杜安排的迷魂阵，在上海流氓流行的吃、着、嫖、赌四个字中，一下子就沾了三门，接踵而来就是赌博。开始时，袁克文和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等四人一起叉麻将，总是袁赢钱，黄、杜等输钱，因此袁克文的赌瘾越来越大，一场赌注由成千元到上万元。不到十天功夫，把他带来的几万银钞输得精光，只得拍拍屁股回北京。临行前，黄金荣、杜月笙还亲自相送，并且拿出五千元给袁作途中用费。

黄金荣、杜月笙对赌博门槛不精，但是他们的门徒中不乏赌棍，如王茂亭、朱如山等，对赌博都有精明的手法。这次黄、杜两人陪袁克文玩牌，对赌博发生兴趣，又听黄的门徒王茂亭介绍外国流氓开设赌台赚钱多和轮盘赌的黑幕，黄的门徒马雨亭还会做赌具，如在骰子内灌铅等等。于是黄、杜两人在三鑫公司内召集马祥生、顾嘉棠、王茂亭、马雨亭、金廷荪、范回春等人商议，一致认为开赌场是桩好买卖，顾嘉棠建议开个俱乐部，黄金荣、杜月笙表示赞成，选定地点适中、环境幽静的福煦路一八一号(现延安中路)为场址。

上海最早的大赌窟叫"人和栈"，地址在小东门陆家宅桥口，即现在的一枝春街口。那时该处开设不少鱼行，鱼市集中，开办"人和栈"的是称霸十六铺码头的陈世昌，还有沈嘉福、范恒德等。由于鱼行一早开市，那些卖鱼的贩子卖掉鲜鱼，手中有钱，陈世昌就利用这个机会开设赌场骗取鱼贩的钱财，但比起福煦路一八一号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福煦路一八一号是幢较大的花园洋房，开办之初，只是当作三

鑫公司成员的俱乐部，后来扩展到与三鑫公司有关的员工家属及上海一些闻人财主，最后只要有钱或认识该俱乐部的任何有关人员都可进去赌博。里面中西赌具一应俱全，免费供应上等中西大菜、高级烟酒和上等鸦片烟，还可免费乘坐小轿车回家。但是，进了俱乐部，要想赢钱可不大容易。赌台里惯用灌铅的骰子，轮盘赌的赌具下面放着吸铁石等，做手脚欺骗赌客。即使赢了钱，走出大门，还会被人跟踪，用“抄靶子”、“剥猪猡”等办法，把钱抢走。有时还搞“突然袭击”捉赌。一天晚上，笔者亲眼目睹，正当俱乐部里赌客们兴高彩烈，呼么喝六之际，突然一批安南巡捕和华人包探蜂拥而入，把赌客们一串串押上警车，关进了法租界巡捕房，最后是每人被罚款几百元交保释放，其实都是赌场老板和巡捕房勾结做好的圈套。

九、黄金荣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

孙中山先生是由于黄的徒弟徐福生介绍认识黄金荣的。徐福生绰号“闹天宫福生”，原是天后宫桥的一个流氓，手下有不少徒弟，在天后宫桥及苏州河码头上仗势欺人，因霸占了天后宫的庙产，所以有“闹天宫”的绰号，此人随黄金荣做鸦片生意，认识了一些广东人，由广东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一度跟随孙先生。二十年代初，孙先生来上海，想利用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势力，进行革命工作，曾给徐福生写过一把扇面，那时正值五、六月间，徐福生拿了这把纸扇去见黄金荣，说孙先生是个有名望的革命家，到上海也想看看黄先生。黄金荣十分高兴，约定日期要徐福生伴随孙先生到黄家。六月间的一天，孙先生由徐福生伴同到了黄金荣家。黄金荣亲自邀请孙先生到楼上会客室。孙先生说，知道黄先生在上

海很有办法，在法租界有很多关系，今后我的同志和朋友到上海，请黄先生多加帮助和保护。黄金荣一口答应。

后来，孙先生又写信给黄金荣，大意是讲当时的形势，指出帝国主义支持军阀制造内战是造成民生凋敝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消除封建军阀之间的混战，解救陷于水深火热之民众，而革命需要有人才之参加及经济上之援助，请黄先生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在人才和经济方面多加援助。黄金荣平素在经济方面出手不大，收到来信之后，居然一次拿出一千元交给徐福生转送孙先生，还通知虞洽卿也援助了一笔钱。孙先生接到之后，又给黄金荣写了封回信致谢。由于徐福生奔走出力，孙先生又替徐福生写了两把扇面，其中一把扇面，徐福生特地裱好后装上镜框，悬挂在他家中的客厅正中。

据黄金荣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前后写给他几封信，因时隔几十年，不知下落。另据在黄金荣家当秘书的龚天健告诉我，这几封信在杭石君处见过(杭是大世界最后一任经理，已去世)。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上海时，黄金荣曾要他秘书和账房整理藏在铁箱内的一些文件和信件，陆震中告诉我，曾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来信，不过信封已霉旧，信笺上沾有水迹，字迹模糊，但“孙文”的签字还能看得清楚。此外，孙中山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时，黄金荣曾叫杭石君写了封祝贺信，由杭石君亲自送往南京面奉孙中山先生。北伐战争胜利后，黄金荣有时对徒弟们说：“我一生之中讲义气，重朋友，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只要有困难，我不会不帮忙。”这些话，在一九四一年黄金荣做寿时，我也听到他对前来拜寿的李济琛说过。

十、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划线”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一九二一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负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帖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聊表心意。”黄金荣接过表，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焘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拾万元的“慰劳费”，蒋把十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五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有一百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六十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批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警卫班长也被扣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法捕房头头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领事感到事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枝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车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钧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急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十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黄金荣的八十寿辰，按照往例，每年黄金荣生日，他的徒子徒孙不下三千余人，都要孝敬送礼，最少的百把元，多的上千元。在做六十寿辰时，他把漕河泾的黄家祠堂扩建为黄家花园，就是靠徒子徒孙孝敬以及工商界的送礼，自己

没花一文，还捞进几万元。现在八十做寿，应该又是一个良机，但是黄金荣考虑到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吃败仗，对我和鲁锦臣等说："今年不要太铺张，因时局不利，还是节省点好，就在玉佛寺摆素菜席算了。"当时我和鲁锦臣、杭石君、龚天健等商量后，请杨虎、杜月笙主持，黄振世为总务，鲁锦臣和我接待宾客。那天前来拜寿的有蒋纬国、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等各局局长，由杨虎、杜月笙接待，后来孔祥熙也到了，由杜月笙接待。将近十一时，李济琛来了，吃了一碗素斋面后，由我陪同去向黄金荣拜寿，李称黄为老大哥，黄金荣听不大懂李济琛的话，后来杨虎把李济琛的话详细讲给黄金荣听，大意是说：蒋介石忘恩负义，打下了天下，就背叛孙中山，如今又派人捉我，太没有义气，对这样的人，我就是不买账。现在蒋介石对啸天（杨虎）也当眼中钉了。老大哥，今天我来给你拜寿，也是向你告别，我要到香港去。以后李和杨虎同黄金荣密谈，我不在场，情况不明。据我了解，过去杨虎、李济琛同黄金荣私下做军火生意，曾托黄金荣向法捕房总巡买过军火，是由黄金荣的门徒程子卿接洽的。李济琛离开玉佛寺之前，黄金荣邀他一起拍照留念，黄、李两人拍了一张，黄金荣、王晓籁、李济琛和我四个人也拍了一张。

在黄金荣做寿后三天，即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四那天下午，陈布雷从南京打电报给黄金荣，说蒋介石翌日来沪，到黄家花园拜寿。黄金荣得知后喜出望外，吩咐我和鲁锦臣赶快到黄家花园去布置四教厅，黄金荣的徒弟陶雪生听到这个消息，自告奋勇，调动漕河泾的地方自卫团担任花园外面的警卫，花园里面派心腹人员站岗，黄金荣听了很高兴，点头称好，并嘱咐在外面的人可以多些，花园里站岗的要仔细挑选可靠的，不可大意。

第二天一清早，陶雪生派自卫团五、六百人，在漕河泾前前后后，沿路站岗。在占地近六十亩的黄家花园里，打扫得十分整洁，四教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厅内正中供着福禄寿三星，左右摆着十二把红木大椅（这些红木家具是黄金荣托人从北京特地运来的原根红木精制的）。下午蒋介石来到黄家花园，身穿蓝袍黑褂，头戴铜盆帽，黄金荣率领杨虎、杭石君、龚天健、鲁锦臣和我在花园前面迎接，到四教厅时，蒋介石对黄金荣说："未来拜寿，因玉佛寺人多不便，又因公事很忙，请原谅。"随即亲自动手去搬一只红木大椅，陈希曾马上把椅子接住，蒋介石叫他搬到八仙桌前正中放下，又亲手从其他红木椅上取下一只软垫，把黄金荣扶到当中的红木椅上，黄金荣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行个鞠躬礼吧！"可是蒋介石却已跪下向黄金荣磕了一个头。磕头时，黄金荣急得站了起来去搀扶蒋介石，蒋说："这次特来拜寿，表表我的心意，因为前线情况紧急，我马上要走，请保重身体，多福多寿。"说罢就向黄金荣告别，匆匆离去，黄金荣准备好的宴席，一口没吃，连茶也没有喝。后来，黄金荣不住夸赞说："蒋总统真是个礼重义厚的大人物，我能受到他这样的尊重，真是一生荣幸。"

十一、黄金荣与汪精卫的关系

汪精卫和黄金荣的往来，始于抗日战争之前。一九三五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汪精卫在照相时被人打了两枪，到上海治疗，黄金荣替他请医生，从此两人有了交情。汪精卫投敌筹组伪政府前，曾到黄金荣家，请黄召集工商界及社会名流开会，起初黄金荣想以大世界为开会地址，汪精卫认为大世界厅堂小，不集中，后来黄金荣给他选择大光明电影院为开会地址，并要袁履登和其学

生程子良布置会场，让袁履登、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发表了“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谬论，要求各界人士支持“和平救国”。随后，汪精卫在日本人开设的乐山花园大酒店宴请黄金荣，那天由我和龚天健伴随前往。酒宴上日本军官佐藤对龚天健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工作，黄先生在上海名气大，说句话就能算数的。”龚天健回答说：“黄老板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黄金荣接着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老了，不中用了。”边说边身体摇摇晃晃，我马上扶着他离开了乐山花园大酒店，龚天健向佐藤和汪精卫打招呼后告别。

汪精卫又叫周佛海到黄金荣家，我和龚天健接到楼上会见黄金荣。周佛海请黄金荣当上海市市长，黄金荣躺在藤椅子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我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点也不行。”我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龚天健接着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他就伴同周佛海送出门外。

此外，又有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和其他日本人曾到黄金荣家中拜访，请黄金荣当维持会会长，黄金荣同样地装病，婉言推辞。还有个徐铁珊，据说曾教过日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徐铁珊的洪门关系，组织黄道会，徐铁珊也到黄金荣家中请黄金荣帮忙，主持黄道会，黄金荣同样以病推辞。

日伪多次请黄出山没有达到目的，最后派来了一个名叫藤曲的特务，名义上是保护黄金荣的安全，实际上是暗地监视。这个藤曲长驻黄家，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才离开。

据黄金荣对我和龚天健、杭石君、鲁锦臣等几个心腹徒弟闲

谈，他装病推辞担任伪职，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怕死。傅筱庵被刺杀后，黄金荣对我和龚天健等说："给日本人做事名声臭，性命不安全。"二是蒋介石在重庆也说抗战，黄金荣的门徒胡宇之在申报馆工作，常到黄家告诉政局和重庆的情况，黄对蒋仍有留恋，曾说："事情不要做绝，光棍不打九九，留个余地为好。"三是黄金荣爱听评弹，在钧培里黄家，常有他的门徒请来评弹老演员为他说唱，听《岳传》感到岳飞精忠报国，受人尊敬，而秦桧夫妇奴颜卖国，遗臭万年，对他的思想上有触动。有一次黄金荣在听评书《岳传》后对我和龚天健、鲁锦臣等几个心腹徒弟说："土地是中国的，日本人虽然打进来，占据了上海，但它不能把上海搬到日本去。我能得势窜上去，同蒋介石有关系，他好我也好。现在他在重庆，我只能帮他，不能同日本人打交道，遗臭万年，应当为子孙后代着想。"四是黄金荣老于江湖，惯用"两面光"伎俩，凭他的经验，自己不出头露面，利用门徒和别人办事，可以坐享其成。于是介绍门徒卢英当了伪警察局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担任伪职，从而加以遥控，左右逢源。

汪精卫做寿时，黄金荣特请日本三菱洋行买办王一亭精绘《长眉罗汉寿佛图》一幅，派秘书龚天健到南京送给汪精卫，表示祝贺。

黄金荣曾托周佛海帮过一次忙，原因是他的门徒史雨春那时是上海糖业的领袖，伙同糖商从台湾运来食糖，多次逃税，被伪税务局查获，将四马路善生糖行的老板席德霖扣押，并抄走了两百包蔗糖，价值六、七亿元储备券，还要罚款五亿元，查处史雨春。史雨春非常着急，找黄金荣想法；史雨春的妻子同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是结拜十姊妹之一，也向李志清求救。黄金荣和李志清派我陪史雨春的妻子一起到周佛海的小老婆家中（在马斯南路），送给

周佛海小老婆叁万元现钞、五根金条。第二天，周佛海打电话给黄金荣，黄金荣叫我晚上再到周家，我到周家，周佛海说："我派人同你一起到仓库去，你要多带些人手，在今夜把二百包糖搬走，不要耽误时间，税务局方面我已通知，只要补税，就不罚款了。"我听后就按照周佛海讲的办理，这事便顺利解决。

黄金荣还派我采购过粮食。在日伪时期对粮食统制极严，当时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已落水参加统制金融、粮食、纱布的伪组织，黄金荣要我找袁履登联系，袁让我到苏州买了一批大米运回上海，在老西门关帝庙、武定路财神庙等处施粥。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间，黄金荣秘密同重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联系过，顾祝同曾派其妻舅许某到钧培里与黄见面，黄金荣派他的门徒秦兴炎到南京及浙江等地第三战区所设的办事处联系，我听秦兴炎讲起，他去找顾祝同是请顾发一张委令，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前，顾祝同委派何尚时为驻沪联络专员办事处专员，秦兴炎为支队长，黄金荣的儿子黄源焘为大队长。何尚时与黄元涛、秦兴炎结拜为兄弟。听说何尚时现在台湾为国大代表，秦兴炎到台湾后任候补国大代表。

黄金荣同当时在太湖的游击队双枪王八妹也有联系。约在一九四一年间，美国的一架战斗机协助重庆对日作战，被日方击落在太湖地区，该机驾驶员美国人白劳特（译音）乘降落伞降在太湖地区，被游击队王八妹的部下救护下来，王八妹派人向黄金荣报信，秦兴炎、何尚时、陶雪生等设法将白劳特护送到后方。

十二、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关系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两人中，黄的年龄较大，发迹较早，杜月笙

是黄金荣一手提携起来的，两人又长期共同从事烟赌生意，关系本甚密切。后来杜月笙与孔祥熙、宋子文、戴笠等发生关系，门徒陆京士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门徒王兆槐担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门徒陆京士操纵上海工会，杜月笙的权势和活动能力超过黄金荣，两人之间产生矛盾。最使黄金荣恼怒的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当英美烟厂工会主席的陈培德想竞选上海总工会主席之职，竟被陆京士指控有共党嫌疑，被警备司令部扣押，使黄金荣十分难堪，气得黄金荣咬牙切齿地说："哼！没有我提拔，他那能窜得上？今朝倒好，吃饭忘记种田人。他忘记我，我就没有他。"当时黄金荣直接向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要求保释陈培德。在蒋介石来上海到黄家花园时，黄金荣又将他的门徒被杜月笙打击的情况向蒋介石诉说，蒋指示杨虎从中调停，因杨与黄、杜关系都好。经过杨虎劝说，陆京士和陈培德各当了一段时间的总工会主席，似乎平分秋色，但是黄杜两人暗地里都在勾心斗角。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溃败，各地物价飞涨。蒋介石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督导专员，蒋经国为经济督导副专员，统率所谓"戡乱建国大队"和"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打算大干一番，稳定颓局。

蒋经国一到上海，黄金荣、杜月笙都相继邀请，准备盛宴招待。但蒋对杜月笙的几次邀请都置之不理，使杜心感不妙。黄金荣派心腹黄振世备好请帖面邀蒋经国，因黄振世当时被聘为评价委员，可以和蒋接近。蒋经国开始推托不去，黄振世说："如果到黄家或黄金荣的荣社去不便，那就请到我的'振社'去，我是专员部下的评价委员，到振社去可说召开工作会议，名正言顺。"蒋经国口头答应第二天赴宴，黄振世得意非凡。第二天他把酒席摆好，不料来的却是蒋

的代表吴绍澍和蒋恒祥，大失所望。其实黄振世邀请蒋经国到振社，我风闻后已向黄金荣报告，黄听了改变主意说："让大少奶奶去请他适当，大少奶奶交际手腕好，小蒋先生会听她的。"说罢，微微一笑。我听后告诉李志清，由她亲自打电话邀请蒋经国到黄家赴宴。第二天，蒋经国如约到了黄家，由李志清接待，蒋在席间表示"打虎"决心，并向李志清询问上海交易所内投机倒把的情况。李志清的儿子黄起予是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她本人是后台老板，对交易所的情况一清二楚，但她想借此代黄金荣打击杜月笙，就回答道："交易所是杜家爷叔（指杜月笙）负责的，由他的三公子维屏少爷管理，我的儿子想申请执照当经纪人，要花十根大条，向杜家爷叔再三求情，还是花了五根金条。"李志清这样告了杜月笙父子两人一状，黄金荣大为赞赏。后来蒋经国把杜维屏逮捕关押，震动上海，市民称快。这虽然和李志清告状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李志清的挑逗，充分反映黄杜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此外，两家门徒的明争暗斗，事例很多，当时上海人大都了解，不再赘述。

十三、黄金荣不去香港及解放后的情况

上海解放以前，杜月笙首先离沪赴港，接着黄金荣的媳妇李志清席卷了黄金荣的金银财宝离开上海往香港，后又到了台湾。当时有些人劝黄金荣到香港去，黄金荣没有同意。当时他曾对我和丁永昌、龚天健等说："杨虎讲，共产党的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交给杨虎转交给我，我可以在解放后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据龚天健说，这张字条他和黄起明（黄金荣的孙子）看到过。这可能也是黄金荣不去香港的原因。

一九五〇年，黄金荣对我说："现在我买了五万元公债，没有

钱，你到香港去找杜月笙，请他给我讨还一笔十万元借款，这是刘裕章早几年向我借的。”我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去香港找杜月笙，碰了个软钉子，他要我去找大少奶奶（即李志清）想办法，我只得回上海，把情况告诉黄金荣。黄金荣叫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杜月笙，大意是：现在派程锡文来港，关于追还刘裕章十万元欠款，务必请你协助解决。我问黄金荣，这笔十万元款子刘裕章是怎么欠下的？黄金荣说，这是他和杨虎、程子卿等同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法国人乔辨士私下做的军火买卖，卖给了刘裕章，刘是军火商人，没有付过款。黄金荣私下多年和杨虎等做军火生意，但他守口如瓶，连我也不知道。我带了黄金荣的信，第二次去香港找杜月笙，黄金荣还几次打了加急电报给杜月笙，请杜设法将欠款追还。杜月笙最后叫其门徒万墨林汇给黄金荣五万元，我才返回上海，陪伴黄金荣，直到他一九五三年病故。

我所知道的黄金荣

黄振世口述　何国涛整理

（一）家　　庭

上海最大的青帮头子黄金荣（锦镛），生于清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十一月初一。自幼生长在上海漕河泾，黄发迹之后，就将父母墓地周围的土地买下来，起造黄家花园，里面还有一个黄氏家祠，因此有人说他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原籍并不是上海。据汇中银行经理黄雨斋说，黄金荣是余姚人，老大房食品店主人陈汉勤却说他是崇明人，但黄本人每次对我谈起，总说他的祖籍是苏州。他只有两个胞妹①，长妹住漕河泾，除了婚丧大事，平时很少来往。次妹嫁给邹姓，丈夫早死，一直寄居在黄宅。

黄金荣自双亲去世后，就被叶姓招为上门女婿。元配叶桂生②，后来也是一个出名的女流氓。曾生一子，领有童养媳李志清。此子扶养到十七岁就去世了，李志清一直守寡未嫁。叶桂生自与黄结婚后，因黄在外面与盛家七姨太有染，又与京剧名伶露兰春私通，夫妻间感情渐有裂痕。一九三〇年，黄在父母坟墓周围起造黄家花园，依照叶桂生的意思，认为黄是叶姓的上门女婿，要定名为叶家花园，黄坚决不肯，两人从此闹翻分居。黄宅当家大权就付之

① 此说不确，见程锡文文。——编者

② 一说为林桂生。

其媳李志清。外间纷传黄与李志清有暧昧之事，黄宅佣人背后对我也作如此说。但黄在门生面前，对李志清强作大方，若无其事。

黄金荣开设共舞台，长期聘露兰春挂正牌。当时正是时装剧盛行之时，露擅长演时装戏，共舞台营业因而大盛。黄见露色艺双绝，即以暴力占露为妾。但两人相处不久，露也继叶桂生下堂求去，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

此后，黄就与盛家七姨太同居于吕宋路十号，成为公开的秘密。抗战胜利后，黄授意邱子嘉，拟由门生发起，将盛家七姨太扶正。酝酿多时，卒以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扶正一事拖延未决，后来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黄有领子名源焘，小名叫做连弟，原是大舞台一个武行的儿子。源焘长大后，充当大世界里面高峰舞厅的经理，依仗黄金荣的势力，也收了一、二百个门生。抗战胜利后，又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戚再玉等相勾结，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义务稽查大队长，收罗了一批投机商人和帮会分子充作爪牙，帮助稽查处当眼线。黄金荣的外孙邹政之就是在源焘负责的一个义务稽查大队里当稽查员的。

李志清自丈夫去世后，先后领养了两个儿子，大的叫成法，小的叫成德。解放后成法与养母住在香港，成德留在大陆，是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的女婿。另外还领了一个养女，也带往香港。李志清因为多年主持家政，搜括了不少私蓄，去港时把所有现款首饰全部席卷而去。

（二）学徒、捕快到探目

一八八〇年，黄十二岁，由熟人介绍到上海邑庙九曲桥得意楼旁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当学徒。据黄自己跟我说，这种小店里

的学徒，除照顾店务外，附带充作淘米、煮饭的伙夫，根本没有工资，老板每月只给他五十文月规钱，剃头、洗澡而外，就所剩无几了，他认为干这一行没有出息，要想找门路改换职业。八十多年以前的上海，游艺场还没有兴起，要算城隍庙一带最热闹，得意楼茶馆里每天有人吃讲茶，摆龙门阵，成为流氓出入聚会的处所。一八八三年，黄金荣学徒满师，有了九千六百文一年的工资，他就不时上得意楼吃茶，挤入流氓队伍里鬼混，渐渐结识了上海县衙门里一班六房书吏、捕快差役等人。大约在一八八六年，经过多次请客送礼，终于被他谋到一个上海县值堂的差役，不久又充作捕快。

那时，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他每天要送公文到松江府去，往来一百五十多华里，经常穿了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要到深夜八、九点钟才能回到衙门。日子久了，他感到这种差使虽能仗势欺人，找些外快，但毕竟要起早落夜，风来雨去，太辛苦了，于是又想另找出路。

一九〇〇年（光绪二十六年），法帝国主义者第二次扩充上海法租界，设总巡捕房于公馆马路大自鸣钟（今为金陵东路老北门）。由于辖区扩大，法捕房公开招考华捕，黄金荣也去报名应考，但没有考取。后经浼人向主考者送礼行贿，才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

（三）处世手腕和对帮会的影响

青洪帮流氓集团发展到清末民初，势力越来越大，成为旧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产生了象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所谓“大亨”，其中固然包含着许多根源，而租界的存在却是一个主因。

黄金荣知道当一个洋奴，要向上爬，必须博取法国主子对他的信任。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等，他收买了一班惯窃惯

盗充作眼线，利用他们去破获另一批窃盗集团所犯下的案件，有时还和眼线讲通，保证被捕后可以保释。由眼线纠集了一批人到界内去进行抢劫，黄则密报法国主子，法国主子派出探捕，化装埋伏，果然将盗匪一网打尽。如此连续破了几次盗案，法国主子认为他干练有能，对之另眼相待。

为了造就自己的势力，他又唆使一班小流氓，向当地商店、居民和殷实富户去寻衅取闹，自己则紧跟在后面大做好人。法捕房向有便衣巡捕配合包探巡逻街头维持治安，黄金荣每次出巡，碰到流氓向商店拆梢这一类情事，他一定要对着拆梢的流氓"大摆华容道"，故示惩罚，而那个被打骂的流氓对黄金荣犹如老鼠见了猫，使得旁人看了，认为黄金荣真有一套，其实都是预先布置的假戏文。有时又运用另一种手腕，提高自己的"威信"。如在法捕房对街的兴记咸货店，黄暗地里叫人去捣蛋，一面又指使门生对店主说："这事只要托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店主浼人请黄出场，果然不再有人到他店堂里去捣乱了。总之，黄金荣暗中制造了纷乱的不法情事，闹得租界内鸡犬不宁，而他自己又来亲自消灭这种纷乱的现象，这是他早期博得声誉的手法。

到了后来，他在法捕房的地位巩固了，就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培植封建帮会势力。举例来说：杭州阿法（一说阿发），就由黄金荣一手扶植，成为民初出名的大流氓。太古、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鸦片提货装运，均归阿法为首的八股党独享全权，黄为其撑腰，坐地分赃。如果别人去提货，法捕房就要派出探捕，严加缉捕，归案法办。杭州阿法又承包了法租界花捐，凡在法租界辖区内开设的三等妓院，都得依靠阿法牌头才能开业。这样，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仗恃黄金荣的恶势力，为非作歹，欺压商民，横行到了极点。阿法

的徒子徒孙，经常在聚宝楼等处吃讲茶、打架，率众以利斧伤人。

法捕房的流氓班头目徐阿东对待流氓一向采取高压手段，流氓畏之如虎。黄金荣要提高“白相人”的地位，压制徐阿东，颇费苦心。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法帝加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徐阿东当然也想往上爬，于是便向黄金荣请求提名，黄叫他到新北门聚宝楼去找杜月笙，说这次提名升级的探捕，都归杜月笙拟定名册。徐阿东如约到聚宝楼去见杜月笙时，杜早已得黄金荣暗示，约好两租界以及闸北、南市地区的白相人，等候阿东到来。徐阿东对杜说明来意后，杜月笙立即拍胸担保，但说，今后在公事方面，要请徐先生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另眼看待。徐只好一口应允。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称：“徐先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不走大家的样（就是殴打和逮捕，使流氓难堪的行动）。”徐阿东经过这一次事实教训，不敢再以硬派作风对待流氓。这事以后，英、法两租界捕房里的包探，不但不敢再开罪白相人，反而向大流氓门下投帖，认作门生（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等拜在蔡洪生门下），流氓势力更加飞扬跋扈。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之前，白相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杜月笙的师父陈世昌，绰号套签子福生，在天后宫一带用三根红木签子供游人用竹圈投掷，骗取学龄儿童的糖果钱。此外又强包附近居民婚丧喜事的仪仗队，称为吃“红白饭”等等。而陈世昌在早期白相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头面角色。黄金荣利用帮会分子打天下，慢慢爬到法捕房华探督察长时，流氓势力就大为抬头，黄是他们可靠的后台老板。由黄金荣幕后操纵，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于是造就了象杜月笙、金廷荪、马祥生那样的大流氓。杜金两

人又从开赌台和包销鸦片烟得来的钱，经营工商事业。黄金荣自己经营了大世界、共舞台等游艺场。这样，白相人的生财之道，就从妓院、浴室、旅馆、饭店等类扩大而为工厂、银行、公司的老板，挤入名流闻人之列。

（四）网罗羽翼和勾结军阀政客

黄金荣投靠了法帝国主义，并在白相人中有了地位以后，进一步拉拢各种恶势力为自己服务，勾结官僚政客作为靠山。这样就使黄金荣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政客的混血儿，在社会上起到极大的影响。

黄金荣是怎样勾结官僚政客和拉拢各种恶势力的？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看中了共舞台坤角露兰春，接连几天到共舞台看戏捧露兰春的场。前已言之，露兰春早被黄金荣霸占为妾，黄看到卢小嘉所作所为，醋海生波，派他的门徒到共舞台将卢小嘉打了两下耳光。卢遭辱后，向乃父卢永祥哭诉。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卢的部下）设法将黄拘捕，押解至龙华，要置他于死地。何丰林的母亲信佛教，听到黄金荣常和丛林的当家和尚打交道，况且黄金荣又是法捕房督察长，有帝国主义当靠山，何母认为此人开罪不得，要何丰林释放他。何迫于母命，只得释放。这一场风波却使怨家结成亲家。黄感何母缓颊之恩，拜认她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结为义兄弟。从此黄金荣不但有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也有中国军阀为靠山。黄何结义之后，进一步勾结当时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贩卖鸦片，从中牟利，造孽钱越来越多，恶势力越来越大，凡在上海租界地区干不正当行业的人，都得向他送礼行贿。后来，上海市面上一批闹事生非的

白相人，均惟黄的“马首是瞻”。如瞎子黄清(施黄清)、红木阿胖(沈文元)、闹天宫福生(徐福生)、卖鱼小顺(杨小顺)、松江老大(傅丰来)、歪头李德荣、三上吊长生、瞎子锦芳(朱锦芳)、阿四徒(浦金荣)、季云卿、烂脚炳根(黄炳根)、蔡和尚(蔡洪生)以及出道较晚的谢葆生、水果长赓(沈长赓)、水果荣生、唐嘉鹏(阿裕)、阔嘴巴亦生(张亦生)、杜月笙、金廷荪(阿三)、张啸林、马祥生、许宝福、顾竹轩等，莫不罗致于卵翼之下，集流氓势力之大成。

黄金荣勾结新旧军阀，另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势利眼光。如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曾派金廷荪等组织一批流氓去保驾。徐国梁当淞沪警察厅长时，黄就与徐国梁勾结起来，该厅侦缉队长赫仕林成为黄门的常客。后期担任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的乔松生、卢英等，黄收罗他们充作门生。民初，袁世凯当政，袁党联络法捕房总巡在租界内逮捕国民党分子，有一次要到望志路去捉汪精卫与陈公博，黄金荣采用两面手法，他带领一批探捕出发之前，暗派门徒程子卿去通风报信，以留后步。在他一生中勾结官僚最得意的，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初在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乃与戴季陶、陈果夫从事物品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因投机失败，处境十分狼狈。蒋乃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靠孙中山先生。因迫于债务，又缺乏路费，由虞洽卿介绍他去投拜黄金荣为师。黄见此笔交易好做，不但不收蒋介石一笔压帖贽敬，而且送给蒋介石大洋二百元作为路费，助其成行。一九二七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这自然使黄感到无上荣耀。黄为讨蒋欢心，把蒋介石投递门生帖子悄悄送还，不以“师父”自居，给面子与蒋介石，使蒋黄之间始终维持密切关系，彼此利用。

黄金荣为着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又挖空心思用种种手法拉拢各方面的恶势力，对下层阶级还施以小恩小惠来毒化麻痹。如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也肯接济一点。到了晚年退职闲居，每天上浙江南路逍遥池浴室洗澡，必带二三十元银币，分赠地头上游乞，每人二角至一元，无日间断。乞丐队中视为惯例，等他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就派代表去领受赏赐。黄金荣对在内地犯案潜逃来沪的巨盗惯匪，也能网开一面，以留后步而拉关系。特别对于到上海来的外埠帮会分子，更加沆瀣一气，只要引见有人，备了一份贿赂厚礼，就来者不拒，广事交结。这不仅因为他们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黄金荣想扩大他的影响面，将自己的恶势力发展到各地去。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黄金荣与外地帮会头子也渐渐交上朋友，如武汉的洪帮头子杨青山、向松坡，九江地界有名的鸦片贩子九江阿生，苏州的刘晋康，天津的潘子欣，扬州的曹幼珊，华北的高士奎以及宁波的俞康树等，凡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上海活动时，黄对若辈均予便利行事，多方照顾。因此之故，黄的门徒到外地去干些走私贩毒之类的不法情事，当地帮会头子莫不爱屋及乌，大力帮助。

（五）组织中华共进会，投入反革命政变

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夕，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租界当局借口保护租界安全，命令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纠察队，协助维持界内治安。法捕房仅有的十六辆坦克终日在公馆马路、霞飞路等热闹马路上往来巡逻，以防止法租界工人起来响应北伐军，实际上充当了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

黄金荣的早期门生，大都是两租界捕房的探目和军警人员，如

法捕房的陈三林、金九龄、程子卿，英租界捕房的陆连奎、尚武、冯志铭等，以及南市公安局侦缉队的乔松生、卢英、张荣、董明德等。工商界的门生并不多。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当时是他手下得力的门生，唐徒王文奎、樊良伯各有一二千名徒弟。马祥生虽为陈世昌徒弟，但他早年在钧培里黄宅曾充厨司，是黄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流氓，他如杜月笙、金廷荪以烟赌起家，亦由黄所扶植。他以法捕房督察长身份组织起来的流氓武装队伍，人数达二三千以上。

蒋介石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一面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一面策动青洪帮集团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利用中华共进会名义，在申、新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据亲身参加这次反革命政变的董明德（董为镇海人，杭州阿法女婿，和我拜把兄弟）告诉我：他那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分队长，每天押解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从法租界到龙华司令部。马祥生和金廷荪在这次反革命血腥大屠杀中，都卖足了力气。金廷荪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常常以此自夸，说他一生中有几件自命不凡的事：一是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命他去保护；一是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押送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

中华共进会设办事处于爱多亚路安乐宫旅社内。黄金荣、杜月笙坐镇指挥。事先与第二师刘峙部阴谋劫取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由黄等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上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

负责人不知是计，竟去赴约。他们将带去的枪械放下架好，准备观看第二师演出节目时，就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一次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奖励，并给以顾问、参议一类的名义。黄金荣晚年退隐家居，每逢黄宅有什么结婚、做寿一类的喜事，他必定将这些勋章挂在胸前，以此自耀。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勋章中，还有法租界当局和北京军阀政府颁发的。

（六）黄杜矛盾与忠信社

自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杜月笙跃居为流氓政客，他的实力和地位超过了以“老太爷”自居的黄金荣。究其原因，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三个流氓头子是依靠黄金荣势力承包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起家。黄金荣身为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只能在幕后操纵掌握，不能公开出面去经营烟馆和赌场，实权就落入杜月笙和金廷荪手中，黄只是坐地分赃，分尝一脔。杜金两人从烟赌中获得厚利，在有钱就有势的旧社会中，连法捕房里法籍捕头都见了眼红，甘愿投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如当时法捕房嵩山捕房捕头“鹅牌”、小东门捕房的捕头“马松”这两个人都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每月可向杜月笙赌场拿五百元俸禄。一班与杜地位相等的白相人，如顾嘉棠、芮庆荣、孙嘉福、荣炳根、袁珊宝等，甘为杜所利用，充实杜党势力。

第二，杜月笙与国民党反动派打成一片后，交结孔祥熙和宋子文，与特务头子戴笠结成生死之交。他又千方百计收罗国民党党政人员投拜门下，并以重金聘请“名士”幕僚，组成智囊团，助其定策

设谋，扩大声势。这就促使杜月笙在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地位大为提高。黄金荣收录门生，只视作个人进益的一条途径，他的门生中只有唐嘉鹏、丁永昌辈替他奔走效劳，实力渐不如杜。

第三，杜月笙热衷于工商事业，开设银行、商店、工厂等等，影响越来越大，黄金荣故步自封，从来不肯出资与他人合营企业，所以除了早期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经营的共舞台、大舞台、大世界等等以外，只有一些房地产。他在工商业的收益反不如金廷荪。

杜有政治野心，肯花钱，手面阔，手段辣，能笼络别人，利用别人。黄满足现状，只肯花些小钱，不愿冒一点风险。所以他办的所谓“事业”都是些不会亏本的买卖。黄以敲诈勒索所得，购置房产，坐收房租，认为较投资于工商业牢靠稳妥，比将现金存在银行里还要保险。有人劝他加入股份合资开店，他害怕亏本连累，一概谢绝不干，终其一生，没有和人合营过一项企业。

杜月笙早年跟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私运鸦片，帮会中辈份极低。后得黄金荣撑腰，渐露头角，所以才有后来这样烜赫的地位。黄金荣六十岁做寿那年，曾与杜月笙、金廷荪结为换帖弟兄。杜金两人尊黄为大哥，双方勾结甚密。但到了杜月笙势力达到登峰造极之后，黄杜两人渐有裂痕，只保持表面上的合作了。

先是，黄的门生陈培德当英美烟厂工会主席，时在九一八之前。杜的门生陆京士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为打击黄门，扩充自己势力计，指陈有共产党嫌疑，拘捕关押，不肯释放。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情，陆才将陈放出。陈培德获释后，对陆怀恨在心，在黄金荣前哭诉进谗，说陆心目中只知有杜月笙，不知有“老太爷”，矛盾误会，日益加深。我于一九二八年进入黄门后，因加入鱼市场筹建工作，被杜党排挤倾轧，心怀不满之后，

也在黄前点火。那时正当杜月笙的恒社气焰极盛之时。一九三六年的夏天，黄默许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生矛盾，搞垮恒社。

忠信社命名的由来，取之于漕河泾黄家花园走廊前面六角亭上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石碑，黄即以其中“忠信”两字为名，组成社团。忠信社的社员在黄门子弟中也不是公开的，其中主要分子有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松如、陈福康、鲁锦臣、潘瑞生、龚天健、胡憨珠、杭石君、吴玉荪和黄振世等，算是该社委员。社员则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黄金荣名为社长，但他只默许我等按其指示去搞，每次集会均不来参加。黄在组社之前，密召我们几个亲信门生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我等得此要领，即着手组织忠信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对策。后来感到杜党势大，乃联络杨虎的兴中社，结成联盟。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视为常例。当时所以择定半淞园聚餐，因黄杨两人对杜尚保持虚假情面，不愿被外人侦知内情，半淞园地处南市郊区，可以避人耳目。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状。这样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忠信社的秘密组织就在连天炮火声中趋于瘫痪，遂即销声匿迹，无形解体了。

（七）退休以后的剥削生活

黄金荣在做过了六十岁寿以后，就辞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职，退休闲居。沈德福继其后任，继沈后任的是任水扬。这两个人皆因不趋奉黄金荣，为潜存在法捕房里黄金荣的势力所排挤而去职。继任后任的是金九龄，以及法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两人均出黄门。担任法捕房总巡多年的乔辨士、法驻沪领事杜来，在黄退休后常到黄宅，商量有关法租界治安的事情。黄在幕后操纵法捕房警权，以维持其帮会集团中的霸权。因此，黄的退休是以退为进，将衣钵传之徒弟，自己以太上皇自居的一种做法。

这时，他的门生约有一千多人，每年都要向他送礼以示孝敬，加之他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受贿贪污之所得，经营了共舞台、大舞台和大世界，这是一项包赚钞票的生意，收入足够他挥霍一世。所以他到了晚年，就不问外事，在家纳福，过其剥削生活。

荣记共舞台是他最早经营的戏馆。当时京剧是男女分开的，女演员搭班演出的，称为髦儿戏。他在共舞台首倡男女合演，营业大盛。

一二八事变后，他将共舞台租给张善琨。其他如大舞台，最早租给沈长赓，后由范恒德长期租用经营。黄金大戏院则租给金廷荪。此外尚有大世界、荣金大戏院，则派其门生管理经营。

大世界初为黄楚九开设，黄金荣出资五十万盘下，改为荣记大世界。黄也有个打算，按照当时情况，将五十万元现钞存放银行，每年只得三千多元利息，大世界每天可出售门票五六千张，日得五六百元。除去各场开支，实际收入每天可得二三百元。星期例假及元旦、春节就有加倍的收益。一个月的收入约在七八千元以上。

他认为这项买卖不会亏本，况又可安插大批徒子徒孙在那里混饭吃，乐于承盘经营。

钧培里黄宅内部的家务由寡媳李志清当家。全宅有男女佣工三十余人。账房（俞永刚）、秘书（骆振忠）、当差、装烟、门房、保镖、司机等等，各司其职。此外，有厨司三人及房里打杂的女佣五、六人。黄息影家居，犹如下野官僚，每天交往访会的客人川流不息，门前车水马龙，迎来送往，户限为穿。这些客人中，有外省军政人员、当地富商缙绅、青洪帮流氓头子、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达官贵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全有。如有女宾，例由李志清出面接待。招待这些客人的方式，不是抽烟，就是赌博。黄公馆里的麻将，每天至少有四、五桌。抽头所得的钱，由李志清分给内外仆役，作为赏赐。

黄以势利眼光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他本人烟瘾很大。客人如有请托谋求之事，就在鸦片铺上商量解决。他经常用四、五支名贵烟枪，轮流调换。所吸烟土，均为多年储藏的大土，和以上等沉香珠粉之类。所以他虽为瘾君子，而脸上毫无烟容。

国民党政客中与黄金荣有过交往的，有宋子文、孔祥熙、王柏龄、杨虎、吴铁城、戴季陶、吴稚晖、于右任、蒋伯诚以及大汉奸褚民谊、陈群等人；上海工商界则有虞洽卿、王晓籁、俞佐庭、方椒伯、黄延芳、袁履登、林康侯、秦润卿、闻兰亭、盛老三、盛老七、李思浩、李

祖莱等。此外，如南市豪绅李平书、姚紫若，南市水电公司姚慕莲，救火会毛子坚，闸北王丙毅、顾馨一，与黄均互有勾搭，常到黄门作客，孝敬的帮会分子，三教九流，无不齐全。我所接触过的，有大字辈高士奎、曹幼珊、张锦湖，也有北京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

黄自退隐闲居，不时到漕河泾黄家祠堂游憩。他的门人对他阿谀奉承，便建议将祠堂扩建为家园，得黄默许。于是由唐嘉鹏、冯志铭两人经营其事，在黄门子弟及其他帮会分子中普遍捐募。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最少的三四十元，多的千余元。我那时捐助五百元，唐嘉鹏出一千元，杜月笙与金廷荪大约捐出四千多元。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捐募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有几万元余款。两位经手人由于手续不清，双方互相攻讦，闹出一场狗咬狗的丑剧。黄偏信唐嘉鹏，对冯志铭大为不满，竟加以驱逐，冯因此有一年多不到黄宅走动。

新建的黄家花园占地约六十亩，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题名为“四教厅”。四壁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的匾额，是黄家祠堂的旧物。厅右一块“文行忠信”大石碑，是蒋介石送的。四教厅的建筑，仿造丛林的大雄宝殿。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中供福禄寿三星，两旁摆着十二把红木大座，封建色彩十分浓厚。四教厅后面是一列钢骨水泥二层洋房，一共有十几间，充作黄歇夏的别墅。

花园内假山亭池，曲径通幽，颇多名贵花木，如玉兰、黑松、大牡丹等，桂花则尤为普遍。

黄家花园落成之后，每星期日，一般黄门子弟不邀而集，都到漕河泾花园内聚会，中午就在那里聚餐，游玩到下午三、四点才尽兴而散。黄本人每年过了立夏节，就迁至花园内歇夏，一直到八月秋凉后，再回钧培里本宅。手下一班游手好闲的门生，成天陪着他

抽鸦片烟或赌博，消磨岁月，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黄爱好挖花牌和碰铜旗两种赌博，龚天健、夜壶阿四、陈福康、鲁锦臣四个门生终日跟随为伴。偶然也到漕河泾附近小茶馆去摆测字摊（泡一壶茶闲聊），视作闲居一乐。

黄金荣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上海城隍庙每年一次的执香会，他是会长，他必率亲信子弟前往祭供叩拜，还叫些流氓装扮成判官、小鬼、阴皂隶，两个一对地搭成对子，面对面，在马路上表演。黄家花园内设有关帝庙，庙后土山上有观音堂，题名为“紫竹林”。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日举行关帝会，黄门子弟每人出资十元，到花园内关帝庙聚餐，菜肴由黄宅厨房供给，多余的钱就作为黄家花园的内部开支。这又是借名敛钱的一套手法。他又乐于交结僧道，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及上海龙华寺的当家和尚常到钧培里化缘募捐。黄出手不大，最多几百元。而各院主持均以得黄题名为荣，多少在所不计。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若有所求，惯以小恩小惠来扩大影响，拉拢关系。对于各项社会救济事业，不肯做发起人。在情面难却时，敷衍一下就算。他在法租界八仙桥办了一所金荣小学，由黄门子弟律师金立人任校长，算是他唯一赔钱的事业。

自从六十岁生辰后，他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和平素交往的人们敲一记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一百元礼金，多的往往送五百、一千。杜月笙、金廷荪等辈，每年都送二三千元，视作常规。因他性好阿堵物，接近他的人摸透他的个性，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家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寿诞酒席，例由黄徒仇万荣所开的桃花宫（后改大利春）包办，有时归鸿运楼定席。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赚

一两万元。

此外，黄门子弟一千余人，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如我这样，每节送门房二十元、茶包一百元、节礼一百元。一年之间要向钧培里黄公馆孝敬六百多元。黄金荣门生众多，加起来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向黄金荣按时孝敬这许多钱呢？在旧社会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我在没有拜黄金荣为师之前，只是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还不多。自从进入黄门之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抖起来了，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理事一类的职务，剥削的办法就更多。归根结蒂是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才能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也就乐意从我的剥削收入中抽出一些钱来供应自己的老头子。封建帮会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黄时常去吃小馆子，小东门德兴馆是他当年当法捕房探目时常去的。此馆后来盘给唐嘉鹏的徒弟吴全贵，吴开设泰新旅馆，制造红丸，是黄的徒孙。抗日战争时期，德兴馆因地处华界边缘，法租界当局在界边设置铁门，若遇紧急情况，就要宣布断绝交通，德兴馆的生意因而十分清淡，顾客寥寥可数。吴全贵特地邀请黄金荣去该馆会宴，把他当作活广告，以便招徕顾客。黄素来爱吃重油厚味，对当年德兴馆的红烧桂鱼和狮子头砂锅犹有回味，于是在一天中午，由钧培里开出汽车两辆，到德兴馆小宴，当即引起一班好奇的小市民聚而围观，要看一看这个流氓头子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为德兴馆大做一番宣传广告。抗战胜利后，苏州木渎石家饭店老板如法炮制，也邀了黄金荣到那里去小吃，把他当作活招牌，吸引顾客。石家饭店老板是黄门生，彼此利用，各得其所。

（八）黄门子弟内讧纪实

黄金荣在晚年退居的最初十年中，不断收纳门生，视为一条进财的途径，有时往往闹出笑话。

安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二十字定辈份，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二十个字。到了清朝末年，二十字辈用完了，又添上“大通悟觉”四字。民初辈份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青帮中称为空子。按照帮会组织规定，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所收的都是门生，门生是没有字辈的。只因他位高势大，不需要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他虽不是真正帮会中人，但在帮会组织中的地位，反比几个大字辈的要吃得开。因此有人问他，他就开玩笑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划。”后来他的老朋友高士奎、曹幼珊、王德邻等大字辈都劝他认一个曾任通海镇守使的张锦湖为老头子，他也不推不就，实际上仍未举行过仪式。

虽然如此，但在黄的门生中，为了培养自己手下一批小喽罗，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如我和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三十个黄门子弟，在八一三前，联合拜安清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堂收徒，继承封建帮会这份家业，收了许多徒弟徒孙。黄金荣晚年滥收门生，而这些门生中，有不少是我的徒弟徒孙，辗转浼人介绍，又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就和他的原来老头子成为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名为“爬香头”，是一件令人头痛犯忌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在外面混混的门生，曾经劝黄停收门徒，他当面也认为应当如此，但不多几时，却又开门纳徒。这是与他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分不开的。

黄在法捕房所收的门生，除金九龄、陈三霖、程子卿等少数几个人外，后来比较接近的门生，大都是他成为大流氓头子后所收。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等各色人员全有。其中比例最大的当然是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因为人数太多了，有的门生连黄本人也叫不出名字。我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下列这一些人。

一、属于英法租界捕房、公安局等任职人员：陈三林（法捕房探目）、金九龄（法捕房督察长）、程子卿（法捕房政治部主任）、丁永昌（法捕房探目）、鲁锦臣（法捕房探目）、曾九如（绰号花魁，法租界强盗班探目）、陆连奎（英捕房督察长）、尚武（英捕房探长）、冯志明（英捕房探长）、汤坚（英捕房探目）、韦钟秀（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马德荣（英捕房探目，抗战时充敌特高科探目）、乔松生（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抗战时投敌充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张荣（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副队长）、董明德（侦缉队分队长）、周相成（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秘书）、宋云涛（侦缉队指纹科）、曹安昌（苏州警察局侦缉队长）、顾葆羽（北京军阀政府上海税务局长）、许宝铭（浦东保卫团团总）、张志清（伪公安分局长）、易缵仁（南市邑庙分局）、陈亚夫（敌伪时期中华民族反英美协会常务委员）、胡寿琪（汪伪上海市社会局主任秘书）。

二、封建流氓、把头等职业白相人：顾竹轩（大流氓，天蟾舞台老板）、马鸿魁（法租界粪大王）、谢彬衡（大包作头）、朱顺林（六国饭店、好莱坞等赌场老板）、刘怡章（汉口大流氓，烟土贩子）、闵采臣（大世界总管）、许福宝和金立人（流氓律师）、龚兆熊（绰号哑喉咙阿六，天天饭店老板）、顾玉书（徐家汇大流氓）、姚松如（沧州饭店老板）、颜伯颖（恩派亚大戏院及大陆饭店老板）、唐嘉鹏（大世界经理）、水果荣生（大世界经理）、舒长泰（日新池老板）、王五权（杭

州大流氓)、孟禄久、娄炳章、谌则高(星相把头)、何国梁(招商局杨家渡码头包工头)。

三、属于工商界的所谓"生意白相人":郑仁业(新北京轮买办,正泰橡胶厂老板)、张子廉(三星棉铁厂老板)、谢克明(仁丰染织厂老板)、陈菊生(华欧制糖厂老板)、乐宝成、乐汝成(泰康饼干厂老板)、王云浦(中兴轮船公司总船主)、陈翊庭(舟山同乡会会长)、邬信泰(顺大鱼行老板)、李云生(招商局码头买办)、黄振世(渔业公司经理)、郑筱舟(国信银行行长)、吴小石(吴开照相馆老板)、朱文炜、郑慕周(以上二人为报关行老板)、周梦月(鱼行老板)、张善琨(新华影片公司经理)、邱子嘉(仁丰染织厂厂部经理)等。

四、属于报界及戏剧、医技等人员:吴玉荪(弹词)、王振川(西医内外科)、方慎奮(针灸医生)、方公博(推拿医生)、平襟亚(旧小说家,开设中央书店)、沈菊隐(新闻报编辑)、任矜苹、胡酣珠、杭石君(以上三人均为报馆编辑)及科天影(原名鲍琴轩,魔术师)、刘亮馥(牙科医生)等。

上列名单中,经常出入黄公馆与黄金荣关系甚密的人,是唐嘉鹏、顾竹轩、陆连奎、卢英、金九龄、张善琨、丁永昌、陈培德、张子廉、邱子嘉、董明德和我等二三十人。有些人虽拜黄金荣为师,除了逢年过节去走动,平时就很少来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正当商人要在当时社会上发展事业,对于象黄金荣这样具有恶势力的流氓头子,是不能不敷衍一下的。

周信芳最初在丹桂第一台演出,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请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

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允。常乃提出辍演要求。顾暗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知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浼人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召顾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

顾竹轩在黄门子弟中以杀人著名。他是苏北盐城人，小名顾四，绰号瘪嘴，帮会集团中都称他为"四老板"。原为人力车夫，后来考进英租界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开设车行，出租给贫苦的苏北同乡。他以巡捕身份，不怕车夫短欠租费。同时，又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凡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宽容放过。这样一来，他的车行生意大好。他见有利可图，干脆辞去巡捕之职，扩大车行业务，又开设天蟾舞台。后因永安公司串通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址，改建为永安公司南部。他心有不甘，聘请了穆安素和甘维露两个外国律师，向工部局大打官司，一直上诉到英伦法院。结果，由英伦法院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十万元。自此以后，顾在帮会中成为红角，苏北同乡等称他为"顾四太爷"。

顾与唐嘉鹏两人是黄门中两大台柱，各人都有一部分恶势力。后因大世界包场争利，相互仇怨，形成同室操戈。先是陈荣生，绰号水果荣生，当了大世界经理不久，就被人杀死。由唐嘉鹏继任为大世界经理后，各场包场，取决于唐一人。会有季云卿的徒弟许福宝，因为包不到大世界的场子，怀恨在心，蓄意将唐嘉鹏杀死雪恨。

许与顾竹轩在东方饭店开三〇一号长房间。那天许对顾说："唐嘉鹏这家伙不是东西，打死他怎样？"顾笑而不答。许乃乘机驱车至顾的徒弟苏北人王兴高家中，对王说："顾四爷要你打死唐嘉鹏。"王信以为真，即备手枪至大世界门口等候。唐偕同说《描金凤》的吴玉荪从大世界出来，正欲上自备包车之时，被王兴高枪杀致死。此案发生后，黄金荣立即打电话给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坚主严缉凶犯。法捕房缉获了凶犯王兴高后，招出顾竹轩为幕后主使人，顾因此被扣，判处五年徒刑，关了两年就交保释放。黄照旧视顾为心腹，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师生关系。在此案发生后，曾使金九龄非常为难，因为顾、金两人是儿女亲家，难以下手。

我在黄门中原为唐嘉鹏一党。唐被殂后，陈福康、邱子嘉、丁永昌和我各树一帜。其中邱子嘉以元老派自居，和我互有勾结。丁永昌只保持表面上的协作。陈福康一向管理黄宅房地产及大世界帐目。龚天健、夜壶阿四、鲁锦臣等与陈结成一党，包围老头子黄金荣，过其帮凶分赃的寄生生活。唐嘉鹏的徒弟王文奎也加入一伙。每逢黄公馆过年过节或喜庆大事，他们都来吹拍奉承，是黄宅内部的一批群小，我与他们互不协作。有次为了黄的养子源焘之妻在南市某烟馆吸食白面，我在黄金荣面前提起此事，认为若不加以禁止，不但与黄面子有关，即在我们子弟面上也失去光彩。黄闻言勃然大怒，竟将源焘之妻赶出黄宅。因此之故，内宅群小对我虽话不投机，但怕我在"老太爷"面前直言不讳，大都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与我相处。不过在背后却与我为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是常有的事。一二八后，杜月笙任上海市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主席，我为该会总干事，与杜常有接触。陈福康就在黄金荣面前说我背黄联杜，要投拜杜门等话。黄金荣将信将疑，经我解释分辩后，才不

置信。又在一九三七年初秋，我获得了一尾重达六千余斤的大沙鱼，想到大世界去展览，门票所入四六拆帐，并已向黄金荣谈妥。结果因未许陈党锡箔灰，即以有碍卫生，公董局卫生处不会许可为理由，阻止展出。我见此事不成，转向新世界尤阿根谈妥将大沙鱼放在新世界展览。当时新世界营业不盛，游客寥寥可数，门可罗雀，经在报上吹嘘招徕，突然观众剧增。尤阿根大为高兴，我也因此赚得了三千元暴利。

（九）抗战时期的苟安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守军后撤，两租界处在日寇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敌寇利用汉奸，成立维持会，帮会中的亡命之徒便乘机大肆活动，一时群魔乱舞，比往时更为猖獗。这时，杜月笙、金廷荪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务机关一度看中黄金荣，要他出任维持会长。有一天，敌酋（名已忘）前来要挟，黄事前伪装瘫痪，由两个家人扶着他出来接谈，声称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不配当维持会长等语，被他逃过了这一关。

其后，帮会分子徐铁珊、金鼎勋投敌，日寇利用他们组织“黄道会”。徐、金劝黄出面主持，他又用同样方法婉言推辞。但他对来访的敌酋与落水的汉奸，从来都是以礼相待，不敢得罪他们。抗战八年中，日本特务机关时常有人到钧培里访谈，黄礼待有加，其中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来往黄宅尤勤，关系更加密切。

黄门子弟中，媚敌附逆的颇不乏人，其中恶名昭著的，要算卢英了。卢在抗战前夕，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一九三八年冬，敌寇军部组织伪大道市政府，物色卢英出任伪警察局长，卢踌躇未决，与黄金荣商量。那时租界上日本人的势力还不能渗入，黄叫卢

英不要落水。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寇让步。卢英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由南市警察局长而跃升为伪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新贵”中的要角。卢再次到黄公馆探望他，黄把卢英当作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黄金荣不亲自下水当汉奸，并不是他有什么爱国之心，这从他对待汉奸徒弟态度和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所谓沪上三老下水后友好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他曾对人说，做维持会长，怕别人暗杀，为的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这一时期，社团的活动是较为消沉的。杜月笙的恒社与杨虎的兴中社均迁往内地，忠信社因为失去了攻击的对象，无形趋于停顿。我于一九三五年就组织起来的振社票房乘机大肆活动，黄金荣时常到振社来闲坐，看到振社内部进进出出的社员甚多，当面对我赞许一番，认为是黄门中一件得意的事件。

他对各项社会活动，一概以年老体弱为名，谢绝不去。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视为常课。一九四一年夏天，帮会分子高兰生在丽都花园摆宴做五十岁生日，黄金荣前往祝贺，同座者有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尚武、刘绍奎、汤坚等人。忽然从外面走进沪西七十六号魔窟绰号“杀人太保”的吴世宝（吴世宝为七十六号警卫大队长，吴妻余爱珍于一九四一年五月间乘车到公共租界烫发，西捕索阅派司，她的卫士不肯，被西捕开枪打死卫士及车夫），当着黄金荣面，手指尚武、刘绍奎等一批捕房探长，指桑骂槐地说：“这批瘪三，现在寿世已满，再与老子为难，穷爷一个个都要打死他们！”极尽威吓谩骂之能事。黄金荣在旁噤若寒蝉，不作一声，真是深得能屈能伸之道。

（十） 荣社成立后的一些活动

一九四五年九月，杜月笙从上饶乘火车回到上海。因为是从后方来的，身价顿增十倍。他所主持的恒社重又活跃起来。此时杨虎担任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的兴中社已改为“兴中学会”，吸收海员一万余人为社员。洪门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一万余人。黄金荣见而眼红，欲将停顿八年的忠信社恢复活动。后由我和邱子嘉建议，改名为荣社，采取公开形式办社，要与恒社互争千秋。黄同意我们的建议，即物色社址，拟定组织。会址设于嵩山路振声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荣社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杜月笙、杨虎、王晓籁等均以来宾的身份前往观礼。当场选出荣社组织人员如下：

社长：黄金荣。

常务理事：邱子嘉、黄振世、陈培德、杭石君、丁永昌。

理事：姚松如、吴玉荪、龚天健、陈福康、鲁锦臣等十五人。

监事：莫士爵、杨春华、张志清、陈菊生、张锦寿。

黄金荣拙于辞令，那天社长致词，他以家长身份说：“今天荣社成立，大家聚集一堂，欢欢喜喜，我很高兴，今后大家更要团结……”不知所云地说了几句。

荣社成立后，除了举行多次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说来，不如恒社活跃。我因为另有振社组织，对荣社活动不大热心。邱子嘉也不是一个有力的办社能手。兼之有些自称为社员而没有社员资格的人，如黄源焘徒弟陈雄、汤雄及邹政之等，对外以荣社社员自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遂使我们这班中坚分子也大为泄气，不愿以全副精力发展所谓社务了。

有一次，黄金荣向我提出，说是荣社房子很大，可以将我的振社和我的门生周一星的星社都搬到荣社，合并起来，人多势众，也就更热闹了。而我呢？振社是我称霸仗雄的一块基地，一旦合并过来，上有黄金荣，中有黄家班的群小插手，我自然不愿将自己辛苦培植起来的小团体轻易放弃，便推说振社分子复杂，反而不好，因此作罢。

一九四七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八十岁。若在往年，他要大办宴席，热闹一番的。这次忽然主张节约不铺张，只在玉佛寺办几席素菜。荣社子弟事前为他组织祝寿筹备的人员，聘请杜月笙为总理，杨虎为总招待，我担任总务。那天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各局局长均来拜寿，孔祥熙也来了，杜月笙、杨虎见孔驾到，即对我说："我们去陪陪孔院长，这里就请你代劳了！"他们只捧孔祥熙，反把寿翁冷落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身份在上海执行经管事务，口口声声要打几只大老虎，偶然还微服出行。我那时被聘为评价委员，风闻杜月笙暗中策动徒众抢购物资要搞垮蒋经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打击杜党的好机会，于是由我向黄金荣献计，请蒋经国到荣社赴宴，劝他以后行动要谨慎些，以防有人对他有所不利，顺便告诉他，杜月笙正在暗中煽动抢购物资的消息，叫他预作准备。黄金荣认为此举十分必要，当即由他备好一份请帖，叫我面邀蒋经国。我去见蒋时，他谦逊地说："请老太爷不必费心！"经我再三邀请，才允赴约。谁知到了第二天，酒席已经摆好，蒋却派了吴绍澍、蒋恒祥两人为代表。这样一来，当然不便跟吴绍澍谈起关于杜月笙的话，我们的计划便全部破产。事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扣押，杜已风闻荣社宴请蒋经国的事

件，认为是我暗中捣蛋。实际是有因无形，我们虽有倒杜的打算而没有成为事实。

（十一）向人民坦白交代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了黄宅所有金、钞、细软及钻石、珍宝，带领其养子成法及领女（忘其名）逃到香港，黄金荣一生搜括得来的人民脂膏，已十去其九。其时杜月笙、金廷荪等均已往香港。有人劝黄也去港安身，黄说："我的年纪已经八十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因此坚主不走。他本来思想顽固，晚年信赖潘七爷（子欣）和我，不时和我谈论大局，并和我说："有事多和潘七爷商量。"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受宁波旅沪同乡会指派，去港为宁波筹救济款。临行前去见黄，他叫我见到杜月笙时，商借美元五万元。那时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他无法再向人民进行剥削，而手头的现金又被他媳妇盗取一空，渐渐对这么一个开支浩大的黄公馆感到应付为难，所以叫我向杜借钱，可能是出于无奈。我到港后，即向杜月笙提起此事，杜当面表示十分抱歉，说此事且与黄家妹妹（即李志清）商量后再说。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去港前，得杨虎暗示，要我动员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返回大陆，政府一概不咎既往，希望他们回头是岸，向人民戴罪立功。王晓籁听了我的劝告后，当即表示愿回上海，杜、金及其他流亡的帮会分子不但坚决拒绝，反而劝我叫黄金荣速去香港，免得落入人民法网。我回沪后，对黄谈起杜、金诸人托我转达的话，黄沉思一会，问我道："振世，你看怎么办？"我说："还是不去的好。"黄默然无语。

一九五三年某月，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劝黄向军管会坦白交代。黄嘱龚天健草具自白书一份，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由首长粟裕、副市长盛丕华两位接见。据陈翊庭事后告诉我，黄于提呈自白书，交代历史罪恶后，与他一同步出首长办公室，两人方至楼下门口，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首长办公室，即叫黄在门口稍待，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事后知他恐生变故，急不及待地独自一人回到黄宅去了。此后不久，黄偶然发热病倒，不数日，就不治身死。

关于杜月笙

范绍增口述　沈　醉整理

我和杜月笙是从一九二五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青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一九二八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以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一九二九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庚帖，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

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一九三三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司令员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

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拜给了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这份资料，大部分是我和他接触中亲自看到或听他讲的；有些是长期和他一道的顾嘉棠、马世奇等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我从种种关于他的传说中，选出较为可靠的部分。

一、初期活动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诨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再叫它。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

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

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青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人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

门户而暗中作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仁社的头子，叫张镜湖，这人做过通海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军政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地位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份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们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当作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便是这个原因。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争斗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两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四亿元，我是该

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杜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象黄金荣只进不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总是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象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

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象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有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都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

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等之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要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他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一九四七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廎、李石曾等一千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他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襄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捐募。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我还记得，抗战前某年不知什么地方遭受天灾，他又在主持“救济”工作，当时他在上海已红极一时了，为了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黄天霸，张扮窦尔墩，票价最高十元。

那天我邀了大批人去替他捧场，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五元，‘莱阳梨’卖十元还这么开玩笑。”他的爪牙们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打开，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

杜能够成名，为很多人所称道，主要是他善于耍两面三刀的手段。这里就我所见到过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说明一下。

第一件是调解一九三〇年上海法租界水电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内幕。在这一事件中，被法帝国主义打死打伤的工人有二十多人，造成了上海的七二一惨案。他在这一惨案中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事件的起因是法国资本家凭借在上海的特权残酷压榨工人，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二百多两银子，华工月薪却平均只有十二元。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从不兑现。一九三〇年六月中旬，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

资的诺言。法方竟于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法商水电工会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八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帝方面完全不接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并宣布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杜月笙先是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支援他们，并答应他们的请求进行调解。这时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也去找他，请他设法制止工人坚持罢工，他也满口答应。

这次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帝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了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七月十四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七月二十一日，法国巡捕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廿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一致起来支持。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房警务总监费沃礼，请杜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杜为了讨好法帝，便指使他的门徒陆京士等组织“罢工后援会”，明为支援，实则进行分化瓦解。

这时上海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也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工厂支援罢工。警察局还派出大批警察，保护法帝派出的白俄到华界去修理通向法租界的自来水管，这更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因法帝拒绝国民党市党部调解的理由是，他们的公司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注册，所以国民党无权过问。可是国民党政府却自动派警察前往保护，还大肆逮捕阻止白俄修理水管的中

国工人。

蒋介石生怕工人坚持下去会影响中法邦交，赶忙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调解。李一向和法帝有勾结，到上海后，首先就找杜，杜满口答应，愿为蒋介石分劳分忧，加紧施展分化工人的狡计。

法帝方面态度仍极野蛮，他们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人跑到华界，警察局也同样逮捕他们。

工潮一直坚持到八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法国当局才允许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二元四角，但坚持要开除领导罢工的四十名工人。

杜月笙和李石曾一听到法方答应加了一点工资，以为是了不起的胜利，便一定要工人复工。对法方开除的四十名工人，他答应负责安置到工会工作，工资归他支付。罢工工人只好勉强同意复工。

在签字的时候，工人们要求在复工前释放先后被捕的几十名工人，法方坚持要复工后看情况再定，几乎又成僵局。后来由杜签字保释，才结束了这一工潮。法方要开除的四十人，杜垫了两个月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达到法方开除的目的。少数不愿复工的还被他的爪牙打了一顿。

这件事给李石曾添了面子，为蒋介石解除了忧虑，法帝更看重他，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也对他表示感激。杜是一举而四得了。

第二件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选举副总统的事。我那时和杜同在南京，我住在中央饭店，曾扩情成天陪着我，怕我出去活动，因我能控制不少四川国大代表的选票。曾要我支持孙科，我因李宗仁

过去对我不错，准备支持李。有天早上，陈立夫来找我，说蒋介石召见我。我不想去，下午他又送来蒋的手令，叫我一定要准时去。见了蒋，才知道也是为了要我支持孙科，我没有料到蒋会自己出马替孙科拉票，便老老实实告诉他，我答应了投李的票。蒋便指示我，我的一张可以投李，其余能控制到的选票都要投孙。我对此事有点犹豫不决，便去找杜月笙，他很坦率地告诉我说，无论谁叫他支持，他都答应下来，不象我这样。在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办法。他把他的这种秘诀传授给了我以后，我留心观察，果然每个参加竞选的人都对他抱着希望。本来他能控制的选票就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他自己却得了许多好处。

他早年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他又买一架飞机送给了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他这种举动大吹特吹，这正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在送这两架飞机时，都是用他的名字来给飞机命名的，如送飞行社的叫"月文号"，送孙桐岗的叫"月辉号"，其用意是不言可知。

其他象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反动头子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给汽车等物。许多中西探长、探目，每逢年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

早年给他和法帝拉关系的张翼枢，最称赞他这一手。张是留法学生，在法租界公董局当过华董，据说他和法国内阁方面有勾

结，法租界当局不答应他的事，他能直接写信给法国内阁有关人员。杜在法租界早年时吃得开，张翼枢对他有过不少帮助。他的门徒在法租界内犯案被捕，或别人托他向法捕房讲人情保释人等，只要他一个电话，或一张名片，便可解决问题。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或不便由他出面时，张翼枢便代他去奔走行贿，也是很生效的。

他结交朋友很广，无论南北军阀与官僚政客及外国名人到上海，他都得通过有关方面去联络应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园寺到上海时，对他表示非常好感。当他告诉我，他以后一直与西园寺保持联系时，我还将信将疑，后来我的儿子范之青去日本读书，他写了封信交我儿子带给西园寺，果然很得到照顾，我才相信他不是吹牛。象李顿调查团到上海，他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国海关与邮政的外国佬也同他经常保持往来。至于各省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军政官员到了上海，他也照例招待一番。

在不到十年中，他便超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黄金荣等大帮派头子了。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据他告诉我，在这方面他是下过一番功夫去模仿的，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他常常对我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

他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正楷字还能认识一些，略带行草便认不出来了。但他对写自己的名字，却下过一番功夫，看他的签名，倒也象读过几年书的样子。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

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的出身的人，是一下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不愿别人象对黄金荣一样称呼“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那一路的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有勾结，影响自己名誉。

他帮助别人发横财却非常之够朋友，我自己就有过几次这样的事。

一九四六年，我听人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我便和杜商量。他叫我请敌伪物资管理局长刘攻芸吃饭，由他出面说人情，我便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人合伙做这笔生意，我和刘攻芸本来熟识，但交情不深，我照杜的意见，在我家设宴招待刘，由杜作陪，酒醉饭饱之后，我便向刘提出要求顶仓库事，刘还没有回答，杜马上插嘴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刘只好答应顶一座仓库给我。当时还不必付给现款，只是由我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我们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有清点过，问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腐败的程度，实在使人吃惊。那一次我就赚了黄金三千多两。

杜兼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我和顾嘉棠想做投机生意时，便向杜请教，他指点我们一下，一转眼就可以得到几十、几百两黄金。后来我和顾向他要该所经纪人的号码，他说怕别人说闲话，因为要这东西的人太多，黑市已卖到几亿元一个。但结果他还是给了我和顾两人合共一个。以后我们懒得跑交易所，便把这个号码卖了几百两金子。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钱乱花，大都是靠了杜的帮忙。

他从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独立门户以后，便极力注意避免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有些是怕他爬起来对自己不利，处处打击他。据他告诉我，他刚出头时，遭到不少人的欺压，最使他怀恨的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中也是风头一时的人物。当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到租界，到处乱来，帝国主义也感到穷于应付。魏廷荣在法租界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帮同维持法租界治安，很得法帝的赏识。以后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初露头角，魏怕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杜在羽毛未丰时，只有尽量忍受，而内心则恨之入骨。以后杜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都有了勾结，势力一天天壮大，便向魏进行报复，曾派他的爪牙去绑架魏，没有成功，又准备去暗杀他。魏因自己力量日小，不再受法帝的重视，只好离开上海暂避。以后杜在上海的地位已巩固，才不采用那套凶狠报复手段。魏后来回到上海时，杜表面对他还是很客气。

杜身体一向不好，却好女色，还吸上鸦片烟，瘾很大，每天得抽二三两。不过他抽烟有定时，每日早午晚三次之后不另抽，所以不大耽误应酬和工作，他答应了去什么地方，一般都不会失约，以后甚至气喘病大发，也勉强带病去参加约会。他经常对我说，无论怎

样，要言而有信，否则不如不答应。我记得有次是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他和我及顾嘉棠三人一同去道贺，在汽车上喘病大发，几乎连气都回不过来，他稍许好转一点后，仍坚持前往。到了以后，我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刘航琛，刘没有让他下车便请他回去了。

他不爱穿西装，却爱吃西餐，喜爱吃点心零食。他有五个老婆。大老婆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只听说他的大儿子杜维藩不是他亲生，是大老婆抱了人家的孩子。他很迷信，自这个儿子抱进门后，事事顺利，因此把这个儿子看成了“兴家宝”，非常喜爱，胜过亲生。

他以后又从妓院中讨了老三、老五两个小老婆，还不满足，又由杨虎一手替他包办，硬把一个京戏名演员姚玉兰收为小老婆。抗战胜利后，又与京戏名演员孟小冬同居，上海解放后逃往香港，虽已六十开外，还与孟举行正式结婚。他虽有这些老婆，还爱经常到会乐里长三堂子去胡调，以抗战前银元来计算，我和他在长三妓院请一次“花酒”，总是花五百到一千元。以后他得了气喘病，连上一层楼都费力，却还是要去这些地方玩，上不得楼，便叫人用藤椅把他抬上抬下。

他自己尽管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对他的女人却管得很严。我听人说，他的大老婆本来和他还好，以后有人告诉他，说她与他的一个同门兄弟有暧昧关系，他一气之下，便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兄弟的脚砍去，以后弄清楚完全是误听谗言，他又怕别人议论，只好把这个终生残废的兄弟收养在家，不久这人就死去了。他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死了。

他不但对自己老婆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听到杨虎丢在上海的一个名叫“小老虎”的小老婆，与杨的徒弟汪盼有关系，他和

戴笠一定要杨虎设法把汪盼杀掉，说这是严重违犯了帮会规矩，非置于死地不可。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虎并没有杀汪，他对此事还表示很不满意。

他的孩子除维藩是抱来的外，以后老三、老五、姚玉兰等又生了维垣、维屏、维翰、维宁、维新、维善、维嵩等七个儿子，及美如、美霞两个女儿。

他几个老婆都存有不少私房钱，我有时钱不够花，还找他的老婆去借。有一次向姚玉兰借两万美元，她说只有一万九千，我拿到后，很奇怪怎么会恰好少一千？顾嘉棠便点醒我说："你归还时不就替她凑成了总数！"我才知道这是干亲家母先把利钱扣去了。

二、靠反共形成的特殊势力

杜月笙在旧中国能享所谓"盛名"达三十余年，长期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资本家的支持，关键是靠反共。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在孙传芳的直鲁联军溃逃时，工人们奋起收缴了溃兵的大量武器弹药，俘虏了大批反革命军队，维持了上海的治安，扑灭了溃兵逃走前放的大火，因此很受上海老百姓的热爱。

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两个口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急电本国请求增调军队到上海，同时与当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以后赶到上海的蒋介石进行勾结。

四月初，美、日、英、法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调集了五十多艘兵舰开到上海，英国把一艘载有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也开到吴淞

口外，法帝从巴黎和海防抽调几个营的法、越军开入法租界，两租界从三月间开始实行戒严，通向华界的铁门关闭，马路上架起大炮机枪，装甲车四处巡逻。

当时谣言很多，帝国主义更经常捏造事实，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因而向白崇禧提出抗议。据杜后来回忆说，当时租界的帝国主义气焰很凶，国民革命军军官士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都常被租界的巡捕捉了去。那时魏道明正在上海当律师，巡捕房每次把捕到的官兵送到租界的法院去审讯判刑时，都是由魏道明代为辩护，每次审判往往是被捕官兵被迫承认误入租界，具结悔过后才能保释。蒋介石便下手令严禁官兵进入租界，查出要以违令惩办。

杜当时在上海的势力虽不如黄金荣，但他却异常活跃。当时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等和他都有密切往来，陈群领他去见白崇禧和蒋介石后，蒋、白对他都非常称赞，还设宴招待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

帝国主义的头子中，先是法军司令巴而雪很赏识他，以后陈群又介绍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等与他往来，他们从杜口中可以了解到总工会和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他一下子便显得重要起来。

四月初，蒋介石在上海曾召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等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杜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有反共清党的准备。当时外面早也传言纷纷，有的人说共产党要组织政府，打倒国民党，并武装接收租界。据杜说，这种谣言是由陈群的政治部散布出来的。另一种是说国民党要驱逐共产党，解散总工会和纠察队，

这是蒋介石等反共的阴谋被泄漏出去了。

杜说最好笑的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听了这些话之后，还去找汪精卫查究，汪当然矢口否认，两人便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来为两种说法辟谣。蒋介石还赠送纠察队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上海市政委员会也褒扬纠察队是“民众的武装”。没想到几天之后，就发生了一场反共的大屠杀。

杜得到陈、杨两人的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后，他先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很多，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杜看看谁胜谁负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据说黄最后被杜说服，是杜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才决定参加。

杜的爪牙早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标帜，事前由杜与租界方面商量好，同意流氓和特务在租界内集中，配合反革命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便于四月七日离开上海去南京。

四月十二日早晨四点钟以前，杜和黄金荣、张啸林分别集合了他们的党徒，杜的爪牙高鑫宝、芮庆荣等由顾嘉棠率领；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率领；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率领。一律工人装束，佩带工字臂章，携带武器，分股从租界铁门冲向南市和闸北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申新纱厂等处。

这批冒充工人的特务、流氓，乘纠察队员尚在梦中时，缴了守卫的枪枝。有的地方被他们欺骗搜缴了一些武器，有的地方当时

发生冲突，工人们仓促应战。事前约定好了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由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四个团，分别将纠察队包围，向纠察队进攻。同时假称调解双方冲突，命令双方放下武器，趁机将纠察队武器全部骗走。在冲突时，纠察队当场被打死一百多人，打伤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流氓把纠察队的东西抢劫一空，循原路退入租界。杜月笙等当时没有离开租界，而是在铁门内守候，看到他们的人都安全回来，才离开铁门。

第二天（十三日），总工会把这一经过真相用特别紧急启事在《申报》刊出，戒严司令部立即派人将此项启事删去，并代之以该部特别紧急启事，否认租界方面有武装流氓冲出，并说这次事件纯系地方流氓莠民与纠察队发生纠纷，为了维持治安，才将双方枪械临时缴存。杜月笙等对戒严司令部说他们是流氓莠民，极不痛快。陈群又赶忙出来更正，声明这次事件是总工会内两派互相殴斗。

消息传出以后，上海工人们愤怒异常，所有工厂均罢工，工人分别在南市、闸北等处集合开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谋犯，立即发还缴去枪械，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顾嘉棠等第二天也大批出动，协助搜捕总工会和纠察队负责人。顾亲自在闸北宝山路口仁善女校、第二师司令部门口观看，游行的工人被该师全副武装的士兵打死一百多，陈尸遍地。反动派又对工人们进行新的诬蔑，说总工会内部隐藏有直鲁联军，已搜出了大量直鲁联军符号证件，“通敌有据”。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工人。

这一阴谋又是杜月笙的得意之作。因为流氓们抢劫了纠察队所有东西之后，回去一检查，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文件等便送给了杨虎。在清点这些东西时，杜发现工人们在收缴直鲁联军溃兵枪

械时，也缴了他们的符号证件等物，没有毁去，杜便建议拿这些东西作借口来捕杀工人，这便是所谓“通敌证据”的由来。

在两天的混乱局势中，反动派一会这么说，一会又那么说，许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群得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指示，由他拟好一个通电，叫杜和黄、张三人署名发出去，并印了几千张在上海散发。十四日上海和南京等有些地方的报上就刊出了这一通电。在这一通电中，对中国共产党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同时大肆攻击总工会和纠察队的负责人。但电文不打自招，说什么“同人等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凶蛮，以免遗害子孙，尤望全国父老，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共起而铲除之。同人等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出而奋斗。”恰恰证实了蒋介石勾结流氓进行反共的阴谋。当晚，白崇禧便去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行前又找杜等去勉励嘉奖了一番，因此杜的劲头更大了。

上海工人们并没有被这场大屠杀吓倒，除了继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外，他们印发了不少文件，揭发蒋介石为首的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大阴谋。杜又指使他的爪牙到处侦察共产党人，随时向杨虎递送黑名单，不断搜捕中共人员。

杜的通电还没有发出，他就找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团体，陈群也指使一些与国民党有关的团体，共凑集了六七十个，于十五日在各报刊出了致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把这几个流氓打手捧为“救国义士”，说他们十二日晨，亲自率领“敢死同志”收缴总工会枪枝，解散纠察队，使全市中外人士为之欢跃庆贺，希望全国各省市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办法，向他们看齐，以此作一次舆论试探。

十六日，陈群奉蒋介石的指示，要杜等公开出面招待新闻界，发表反共谈话。通过这一系列试探之后，蒋介石和白崇禧才不再

掩饰，公开提出了反共的言论。

杜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既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又为蒋介石等所器重，还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举而三得。

多年以后，在他做六十生日时，《中央日报》曾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他："十六年国军方奠定东南，上海伏莽遍地，一时人心未定，秩序纷然，先生以安定地方为重，与黄金荣、张啸林仗义执言，昭告国人，复默运机宜，不旬日而反侧以宁，此则有造于党国之始也。"对他这次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一直没有忘记。

蒋介石背叛革命成功以后，对上海青帮头子特别表示好感，不久他到上海，曾盛宴招待杜、黄等人，当面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他送过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我没有听他谈过，别人问到他时，也不正面答复，因他怕蒋知道不高兴。

多年来，蒋和他一直是保持着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在大庭广众中，对杜从不表现过分的亲热，当只有他两人或少数亲信在一起时，却对他非常要好。我在抗战前有一年去上海，正遇上他被蒋邀去南京，蒋约了他和钱新之与另外两个金融界的人一同吃饭，座上对他极为亲热。他们曾一同论起年龄，以杜最小，蒋特别鼓励他，说他前途无限，回来他非常高兴。据他自己说，蒋介石曾向他表示过，有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杜对此万分感激，常以此炫耀自己和蒋的关系。但他非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关系到他切身利害，从不肯轻易去使用这张王牌。他和蒋手下不少人有深交，一般问题不必通过蒋就能解决。我过去只听到他谈过两件事，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没有办法可想，他才直接找蒋而得到解决的。

一件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他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反动派内部也吵闹不休。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这件哄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还有一件是他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这时杜的徒弟王兆槐在戴笠控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任侦察大队长，王奉令后，便去密告杜。徐懋棠向杜求情，他看在钱的份上，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逮捕徐等，蒋接受了他的意见，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以后由于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要办也办不下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中，是杜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倚仗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甘心充当帮凶，又与反动头子有勾结，而两方面又都需要利用他充当工具，他的地位被抬高了。杨虎第二次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后，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杜为了直接控制警备司令部的主要部门，把他最得意的徒弟陆京士推荐去当该部的军法处处长。这个从来没有穿过军服的工贼，一下成了陆军上校。他的另一徒弟王兆槐是该部侦察大队长，在警备司令部里，许多人对杜比对司令还恭敬。

在租界方面，他的势力原来只限于法租界，这时也扩充到了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督察长金九林是完全听他安排的，公

共租界的流氓头子季云卿和他徒弟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对他也很尊敬。再加上商会会长王晓籁是他支持出来的，自己又兼了不少的董事长、理事长、总经理一类职务，故在工商、金融界也很有势力。

在他全盛时期，他是挥金如土。如果靠他所经营的企业、银行和兼职等正当的收入，他绝不可能一掷万金无吝色。他那么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不得不谈一谈他的生财之道了。他自己虽不直接做鸦片生意，但他大宗的收入是靠包庇贩运鸦片等毒品而得。当时在上海行销的各种毒品，都要由他保护，这笔“保险费”为数相当惊人。每年由各地运到上海行销和加工的毒品有几千担之多，他从中可以收到上百万的“保险费”。他不仅可以担保货物不出问题，连搞这项生意的人也由他保护。顾嘉棠便向我谈过，戴戟在上海当警备司令时，有次他手下的特务把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捕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看到了，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杜马上叫顾嘉棠带了八个携枪的打手，闯进房间，硬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他们平日护运毒品，也都佩带手枪，随时敢与检查人员对抗，死人流血在所不惧。

他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大的赌场，都是由他负责包下来。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一八一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苗根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

进赌场以后，便向账房换筹码，从一元到一百元不等，主要是

轮盘赌，还有单双、大小、回门摊、麻将、扑克等等，中西赌具一应俱全。我在那里赌过轮盘和大小，总是输的时候多。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赌场除了靠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办法来抽头，一千块钱只要输出赢进十次就等于没有了。

一些从外地来的大赌客，把钱输光以后，赌场还照例代购车船票送回去，好让回去再拿钱来赌，同时也免得在赌场寻短见或耍赖皮。赢得多的人，赌场也派人护送回去，但这种情况极少有。

赌场设备很齐全，可以免费供应上等鸦片烟、中西餐、冷热饮料等，休息时可以大吃大喝，以此来吸引赌客。杜月笙从这个赌场每月可以拿到三、四万元，顾嘉棠每月也可得五千元。

杜自己不到这种场合来赌博，平日总是在家里赌。客人赢了钱，得给他家里的人小费，为数也很可观，有些人想巴结他，给的比抽头还多。他一般小赌是“挖花”，陪他玩的有刘航琛、康心之、顾嘉棠和我等人，虽说是小赌，每次输赢也是上千块银元。大赌是推牌九，每场是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抗战胜利后由于法币贬值，便用美金计算。下场时再按当日美金黑市价格折算法币结帐。这种大赌，他是十次有九次要赢，而且赢得很多，他自己不耍花样，靠别人和他合作来做假。象以前一个大盐商的儿子朱如山、律师徐士浩等都有一套很高明的手艺。我曾和他合伙搞过大赌，他因身体不好，只赌到晚上十点左右便去休息，由我守通夜，往往到天明才散场。他在桌上时总是赢，做假的朱如山等人也和别人一样输钱，所以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当时输得最多的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在杜家里先后输掉九万多美金（当时外面传说吴输了九十多万，我记得是九万多）。还有四川帮的刘航琛、康心之、康心如，以及杜的小同乡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等，也输过不少。赢得的钱，

我和杜三七分，我有时一夜可以分到几千或上万美元。

杜玩假牌的手艺并不高明，有次戴笠和我们一起在我家里表演过，还是戴笠那一套比我们俩人都高明，他不论拿什么样的骰子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掷出自己所要的点子来。我和杜都称赞他这一手“绝技”。

杜在上海，不仅中国人开的赌场由他包庇，连当时外国人搞的“大翻戏”，他也分成。解放前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不知骗去中国人多少钱，我认识的许多女人中有不少爱去赌回力球，好多都弄得倾家荡产，甚而自杀。

当时这些公开赌场，是得到租界当局保护的，虽不象中国人开的赌场一样向他送包银，但也得和他拉上关系才能太平无事。我过去爱买马票，每年举行春秋两季香槟赛开彩时，也请杜去主持。那时头彩最高有过二十五万元，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过，得主都是不在上海的外国人。我最初还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后来杜告诉我，这些得头彩的外国人都是假的，要是真的付出那么大一笔奖金，那些外国人还吃什么？所以他从不去赌这些玩意儿，而只是从这几个外国大赌场中拿回一笔数目不小的车马费。

他兼差之多，真是惊人。他自己主办的商号倒不多，如象中汇银行，名义上是他办的，实际上是他的徒弟徐懋棠等占的股金比他多，还有通商银行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这通商银行据说开办在光绪年间，是家老银行，发行过钞票。他抢的办法很毒辣，先叫人去该行存款，等到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以后，便派人在同一天内去提取现款和兑换钞票，官僚资本的银行又不帮它调头寸。这样一来，弄得该银行措手不及，支付困难，风声一传出去，存户纷纷提款挤兑，眼看该行要垮台了，该行负责人只好去请他帮忙维持，他

先还故意推三推四，等他答应出任该行董事长后，他关照一声，提款和挤兑风潮马上就和缓下去。以后又由钱新之等在该行增加了官股，这样通商银行便被他抢过来了。当时的经过很复杂，我只记得这一简单情况。

另外他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还有其它一些银行的兼职。

在交通界，他是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兼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董事。

他懂得要成名还必须靠报纸为他吹捧，所以他也想方设法钻入了新闻界。他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他的徒弟办的许多小报，如陆京士办的上海《正报》都和他有关系。

他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中纺公司董事长、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等。杜兼的这类职务约一百个之多，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所兼的这些职务，一个月单是车马费就很可观，再加上干股分红，那就为数更大了。他的这许多兼差，大都是靠使用流氓手段和倚仗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勾结所取得，有些人则是利用他的“牌头”来应付意外的麻烦，有时他也利用这些兼职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如抗战开始时，蒋介石想要拿些轮船沉到长江当封锁线，许多私营轮船公司都不愿意把船拿出去，兼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杜月笙，便首先响应号召，拿出了几条船沉到江阴，别的公司也只好忍痛牺牲，长江封锁线便这样完成，杜因此而落得个“爱国”的名声。

一九三二年，他创办了恒社。这是以社会团体为名，实际上是个帮会集团，该社成员都是他的门徒。它标榜的宗旨除一般帮会的所谓道德信义之外，特别提出它是“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以此骗人和讨好反动统治者。他常常夸耀，他有“八千子弟，患难相从”。这完全是吹牛，实际上是两千不到。就连他的徒弟陆京士的清社、张克昌的畅社等徒子徒孙加在一起也不到八千。这些人和他的关系，他自己也很清楚，无非是借重他的势力来作挡箭牌，除了早年跟他打流的一伙人要靠他生活，常跟他在一起外，大部分工商界的人都是彼此利用而已。他的门徒中军官极少，因为他很懂得蒋介石的脾气，这个流氓出身的独裁者最忌讳他的学生和部下去拜别人当老头子。恒社中的将级军官如王兆槐，是奉戴笠指示才去拜他的门的。他平日和许多反动军官虽有往来，但大都是交朋友，并不拉来当自己的门徒。

他当时每月得支付一笔为数很大的钱，去养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每到月底，各方面的进账还没有转入他的户头，就有部分送出去了。我曾经看到过接受他的钱的名单，其中不少都是曾经有过一些名声的人，如章士钊等。

三、祠堂落成和六十大寿

我认识杜以来，先后参加过他一生中两次最热闹的场面。一次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参加他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一次是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他六十岁做生日。前一次是他大走红运的时候，后一次虽也热闹非常，却是在走下坡路了。

我于一九三一年五月间，便接到他的邀请，六月初才到上海，没有赶上参加他那大规模的筹备会的工作，只是去看了一场热闹。

当时替他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所谓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他在家乡修建祠堂，把在家里的祖宗牌位送进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当时的声势来光宗耀祖，所以典礼中最隆重的节目便是送这些牌位的盛大游行。为了筹备一支精采的仪仗队，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几乎用上了，一两个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等发出邀请函电，半个月前，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和礼品等已堆积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随仪仗队送去，其余都先挂进祠堂，大部分祠堂里挂不下。

六月十日，是经过几个风水家选定的送主日期。那天一早，我赶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他家的时候，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几万名仪仗队和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分为六个大队，这里我只把第一大队组成的情况谈谈。它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四人抬举，前后左右用一百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思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

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据他告诉我，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他说要找一个当过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鞭炮不停，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很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十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的人力车接送客人。

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一百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祠堂本身并不很大，只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房子，门前却立着一对很高大的石狮，气派很不小。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那里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作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和吃饭。

举行栗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二十一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十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会派代表去道贺？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一万多人。

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得到的。我还记得那次梅兰芳是从广东赶回来，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程砚秋是从哈尔滨来，尚小云是从天津赶来，还有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刚好一点也在头天赶到。其他如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来了。

从十日到十二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哄动。一万枚纪念徽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便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一千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是在开饭。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据说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事后杜告诉我，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有这么大的场面。他最感激的是法租界当局准许他那样大搞，因自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列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蒋介石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军队去给他守卫。

这次费用据说花了几百万银元，有许多项目是完全由别人凑钱代办的，还不计算在内，不过他收的礼金也不少。

杜为了想抬高自己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找不出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之后，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他非常高兴。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使他一下子成了晋朝名将杜预（杜预善用兵，当时人称为杜武库）的后裔了。许多为他捧场的文人，在为他起草特大的鸣谢启事中，便有这么几句：“宾朋联袂，车骑如云。草绿郊坰，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又俨然以杜甫自况了。

就在他祠堂落成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绋，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也没有杜祠落成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不久死去，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组成一个那样的仪仗队。多年以后，杜在津津有味地谈起那一件事的时候，还是得意非常，他看作是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日，是他六十岁生日。我从七月间便参加由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人所组织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的工作。开始是发动各方面送贺礼和通知在外地的熟人及门徒前来

参加祝贺，同时接洽邀请南北京剧界名演员前来演出，并利用所有的关系去进行宣传联络等活动。

在生日的前几天，我经常和他在一起，那几天各方面送来的贺礼、祝寿文等一天比一天多。杜的耳朵里每时都听到当时的所谓要人姓名和礼品名目，许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等，他都没有多大兴趣，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送他一点什么，好炫耀一下。因那时他已开始走下坡路了，生怕蒋会忘记了他。等了几天，一直没有看见蒋的东西，他有点着急了，便挂起长途电话去问蒋的亲信陈布雷，希望陈代蒋写几个字给他装装面子。陈当时也答应了，可是过了两天，蒋的东西还是没送到，他心里很不安。眼看只差一天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蒋已派了一架专机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接待这个专使，并立刻打开礼物，原来是蒋亲笔写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以后陈布雷告诉他，说蒋听到陈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叫人代写，陈也不便再催，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动笔。

在大批寿礼和寿文中，他只看了一些有名人物的东西。送礼最早的是钱大钧，第二是邵力子夫妇送的“仁者寿”三个大字，还有宋子文送的用乾隆年间竹根雕成的寿桃和佛手。他看到这一礼物时曾笑着说，想不到这位洋化朋友会送中国古董给他。

当时最忙碌的是从各地赶来祝寿的京剧界名演员，整天在安排演出精彩的节目。我起先不大了解，为什么这些名演员这么热情卖力，后来我经过这样两件事才明白。一是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时，老板沈兰庭两个月都不给他钱，还要他继续演下去。张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向杜说了一声，杜拿起电话问了沈几句，沈马上就付给张五根金条。还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后，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我经常接到南京许多反动头子的电话托我买戏票，老是

买不到好票，因票被朱文庸包下了，我很不满意，便去找杜商量，准备程在上海演出时捣一次乱，使他演不成。杜初不答应，并说把程每场送他的四张好票转送我招待朋友，我没有要。过了几天，情况还是这样。我再去找杜，他回答说程是有些不对。他一松口，我便找杨虎弄到一枚手榴弹，到我在上海的帮会组织益社找一个我养的打手，在程演出的戏院里丢了那枚手榴弹，后来程知道再在上海演下去要出大问题，便赶忙束装回北平了。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不去走他的门路，是没有办法在上海吃那碗饭的，祸人福人，只是在他一摇头又一点头之间。

他六十生日时，原来还准备举行堂会演出的，后来他的一些谋士向他建议，才决定改为赈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处水灾的义演，将全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另外把寿礼收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几个替他捧场的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写进去，他一向是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所以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他口头上虽大谈什么国内到处有灾荒，不忍心过事铺张，实际上那次生日，浪费还是相当惊人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等发起为他暖寿，在北京西路佳庐顾的家中，办了四十桌最丰盛的酒席，到的有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士钊、唐生明、潘公展等三百多人。那晚章士钊读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于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一百人联名签字送给他的。在宣读时，不少人当时都感到捧得实在太过份了。为了让这篇奇文不致全部失传，特抄下其中几句：“芦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

制，如是者相持至于八载。顾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掺之至坚，导之使然之二三君者，其谁乎？吾思之，吾再思之，此其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试执涂之人而问焉，吾敢曰，战时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其余的贺客中，也有不少极尽阿谀之能事者，有的把他捧成郭子仪，更有人说他的富贵寿考都超过了郭子仪。杜只简单地致了答谢。席间还由各地来道贺的曲艺名演员说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助兴。

第二天寿期，是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举行祝寿典礼的。寿堂正中悬挂一个比人高的寿字，由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签名于上。寿幛上面是蒋介石的题字。八个儿子都穿长袍马褂，几个老婆和儿媳女儿等都挂着精巧的寿字胸花。当天他自己不去寿堂，请陆京士、杨虎、徐寄廎、徐采丞、顾嘉棠和我六个人代他招待客人。凡去贺寿的人，都可以得到精印的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寿文和华福烟公司赠的寿烟一盒。汽车前面均贴上“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小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去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前指挥进出的汽车。

第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着才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钧、汤恩伯、郑介民、吴国桢等院长、部长、总司令、特务头子及金融、工商等界的所谓巨头和社会名流，穿长袍、西服与全副戎装的都有。当天去的汽车有一千多辆，宾客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

这次表面上说是为了提倡节约，实际上是分等级招待，一般

贺客只能吃到一碗素面，而有地位的都被请到里面去享受上等筵席。

蒋介石对他还是特别表示好感，除亲笔题字与派吴鼎昌代表祝寿外，又叫自己儿子蒋纬国领着儿媳到他家里去拜寿，向他行子侄礼，杜对此非常兴奋。

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原定从九月三日到七日为期五天，因很多有钱人认为这种南北名角的联合演出太不容易，又要求延长了五天。票价分五等，最高五十万元，起码二十万元。当时米价是三十多万一石。十天义演得到了二十多亿元。寿仪却有三十多亿元。这些钱都是随收随存于中汇银行，名义上他是一钱不要，但等到把这笔钱捐出去时，米价已涨到五十多万元一石。这些因法币贬值所得到的巨额利润，全上了他的腰包，只是苦了那些演员白帮他一场，而他却名利兼收了。

四、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七七事变刚一开始，杜月笙就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过着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那样醉生梦死，上海也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大肆征募医药用品。不久，八一三战事果然发生，过去说他是危言耸听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门徒和替他捧场的人，更利用这件事把他吹得比未出茅庐便预知天下大势的诸葛亮还要高明。后来我从孔祥熙口中听到，原来是孔先知道中共已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被迫不得不接受，孔为了勾结杜利用战争来发财，所以把这一消息及早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大卖气力，早在一二八时，他已尝过甜头，在那次战争中他是名利双收的。

上海开战以后，他又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现金，为数在千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中国军队西撤后，这笔巨款成了糊涂账，谁也没有向他清理过，大部分上了他的腰包，他成为抗战开始第一个大发国难财的人。

这段期间，他和戴笠勾结得更紧，戴借抗日为名，趁机组织起特务武装部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杜被邀去当了委员，并由他的徒弟陆京士等，把他们所控制的邮务工会员工组成了一个邮工支队，还拼凑了许多流氓帮会分子参加。以后这些部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一接触就垮了，剩下的逃到安徽改组成了“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他很不愿离开他的发祥地，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留在上海不走。当时主张他离开的人，大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关系的，主张他留下的人也不少，这些大都是他在工商界的门徒。后来由于钱新之和戴笠的劝说，他才动摇。戴临走之前，曾和他几次研究，如何利用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搞特务活动，他在这一点上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能留下一批人继续保持他在上海的地盘，而且是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将来无论哪方面取得胜利，对他都有好处。于是决定把他的秘书徐采丞和管家万墨林等留下。同他住在一个大门内的兄弟张啸林不想走，也作为有任务而留下，戴同意了。后来张投敌，发表为浙江省长，戴派特务把他打死了。这一内幕我知道一点，张不愿走的原因是对蒋介石早就不满，因张的儿子从法国留学回来，张想过去在四一二时他与杜月笙、黄金荣三人充当过反共的急先锋，希望蒋能够念及他的这一功劳，培植他儿子一下，便要儿子去南京见蒋，希望给他儿子一个银行经理或高级职员当当。蒋在接见时，一听到他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便不

敢用他。张对此异常怀恨，认为蒋太不讲交情。杜也了解这一情况，所以沦陷后除了家务方面和个人财务等请他帮忙照顾外，有关秘密工作都不愿意要他参加。后来张与陈公博、汪精卫及日本人有了关系，对杜的话根本不理，并且多方面想了解杜和戴在上海的活动。这样一来，杜、戴两人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在杜的布置下，由戴的特务收买了张的汽车司机，很容易地把这个与杜合作多年的老伙计打死了。

杜和钱新之一道带着姚玉兰和儿子逃到香港后很不得意，因为在上海横行多年，这一亲手打出的码头丢掉后，便有寄人篱下之感。当时他绝没有想到这个仗会打八年，总认为一两年便可见分晓。要是日本人打胜了，因他没有去重庆，回上海照样可以保持原来的地位，他与日本人还有不少关系；要是中国打胜了，更不会有问题，所以他呆在香港，静观变化。

他在香港期间，也是采用两面手法，既和敌伪有联系，又替戴笠做过不少工作。他和敌伪的关系，没有具体和我谈过。但从他无意中说出的汪伪组织的情况中，可以听出他在香港与这些人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他谈得最起劲的，是和戴笠搞的那一套。如唐绍仪和日本人有了勾结后，蒋介石很希望了解日本人向唐提出了什么条件，便叫戴笠设法弄清楚。戴去找杜，想把唐秘密请到香港商谈。杜怕唐不答应，除托人去向唐联系外，还找了一个与唐关系很深的朋友去邀唐，并说明如果唐自己不愿来港，可派一代表来。唐对这些完全不理，并加紧与日本人勾结，结果被特务打死了。

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据杜月笙说，还是他最先得到这一条约的全文，由他告诉戴笠转报蒋介石，重庆方面才公布出来的。不过这一密约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得来，在抗日战

争期间，他一直秘而不宣，抗战胜利后他虽说出，当时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接洽的高宗武，曾两次到过香港和他谈过许多情况，可是也没有说这密约是谁交给他的。

他在香港码头是吃不开的，收入便大成问题。这个离开名和利便感到痛苦的人，再也耐不住了，一九三八年夏天，他去武汉，见过孔祥熙。同年冬天，他又带着一批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金融界与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从香港到河内转往昆明、重庆，表面上是去西南旅行，准备投资开发西南工商业，实际上是去接洽做鸦片烟生意。

过去他在上海走红时，是包庇别人做鸦片烟生意，从中分红，自己不愿直接去做，到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不得不在这方面打主意了。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他如果肯出面做这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洋，向他购买。他去西南便是找戴笠商量，并弄清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顾嘉棠负责。当时西南许多地方负责人，还以为他真是想投资开发西南，对他大事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向他订货，在一九三九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三千多万元的定款，这些人都很相信他，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定金拿到后，他又活跃了起来，对他在香港的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九区的赈济工作，早已置之脑后，成天与戴笠研究如何把大批烟土运去交货的问题。

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他不得不去

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很凑巧，在他离开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陷敌，他没有当俘虏，这笔生意救了他。

为了以后还要在社会上混日子，他不能因香港沦陷而不讲信用，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到重庆后，有天他找我去，把这一经过告诉我之后，便拿出一张五百万元的支票给我，叫我去送给孔祥熙。他先叫我对孔说，他要我给孔买点东西，我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去，请孔自己去买。当时孔是住在范庄我的房子里，我每天都可去见他。我受了杜的委托，照着杜让我说的话向孔谈过以后，便把支票交给了孔。孔接过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关照过我，只要孔收下便不必再说什么，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我把这一经过回复杜以后，他立刻抓起电话通知戴笠。我当时在旁，只听他简单地说了句"货物马上准备起运"。接着就去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镇南关去交货。我经手一下，也分到了一百万元。我还记得，当时王晓籁在重庆周转不灵，顾嘉棠也送了他五万元，还送叶焯山五万元（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大宗是杜和戴两人平分。钱新之、顾嘉棠两人也分

到一些，我们便把这笔钱在宜昌合伙办了一个电力厂，买了一批新的机器。

他到重庆后，就更加感到不能为所欲为，内心很苦闷，经常向我说："一日无权，人人都嫌。"只有孔祥熙、戴笠、钱新之等少数人和他还拉得不错，比起过去在上海自然差得太多。钱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照顾他，除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楼上给他准备了住处外，还利用交通银行的钱在南岸汪山给他建了一座小洋房。

他原来还打算利用和戴笠的关系把他的恒社在重庆发展起来。因上海方面的徒弟们也有一部分到了重庆。他在临江路寨家巷转角处弄到了一幢楼房，作为恒社社址。而戴笠有他自己的打算，蒋介石曾指示他组织帮会流氓搞特务活动，于是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拉了不少从外地来的青洪帮头子和四川江湖大爷等做该会委员，杜也被邀请参加。所以戴不愿意他把恒社恢复到象在上海时一样，只望他协助自己搞这方面的工作。戴还去拉杜的人，杜看出了如果再发展自己的组织，便要和戴笠及四川地头蛇发生磨擦，所以决定只维持现状不求大的发展。后来有人提议把恒社改成政党组织，他感到问题很多，没作这一打算。由此，他对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自然不感兴趣，戴笠召集开会时，他常借口身体不好，重庆气候对他的气喘病很不适应等理由不参加会议。戴笠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常请他去军统局和中美合作所参加庆祝或节日等活动，他也不常去，去了也很少讲话。

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有一天孔祥熙邀我和他，以及杨虎三个人去孔家吃饭时告诉我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的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才没有再讲下

去。孔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都懂得他是想借此来拉拢我们，同时也是劝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蒋找到借口。所以我们对孔也更加尊敬。

杜听到这番话很受刺激，虽然他估计到蒋要杀也不会杀到他的头上，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出来后，他便和我与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孔谈出这件事不久，蒋介石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枪毙了。原因是被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其实兵役署已把兵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而在俞飞鹏，但因俞是蒋的亲信，蒋不追查，却把程杀掉。当时曾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极大反感，他们准备大闹一场。大家认为蒋介石不仅已开始杀袍哥，而且要杀四川人，不能不团结起来拿点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免得他再这样乱杀。杨虎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被蒋重用，早已万分不满，便到处挑拨，鼓动四川袍哥一定要借这事，名正言顺地大闹一场。

戴笠早已得到情报，正调集大批武装特务准备应付，一场大的流血案眼看就要发生了。杜得到这一消息，也了解到戴正在大肆布置，便出面极力劝阻。他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同时也对不起孔祥熙，因他很关照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瞎来。许多袍哥头子一向相信他，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好结果，这件事才慢慢平下去。

杜由于平日说话很小心，不易看出他对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原以为他对蒋介石非常忠实，和戴笠也象是无话不谈，实际上他曾暗中和人进行过反蒋的活动，如果不是我亲自参与其事，

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一九四一年前后，我从前方回到重庆。有一天，杨杰请了杜和我，还有黄琪翔、章伯钧、杨虎五个人到他南岸的家里去吃饭。饭后，杨杰提出请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党，念了一些东西，我看杜同意，我也同意了。出来时，杜便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并说连顾嘉棠都不能让他知道。我相信杜也绝对没有告诉戴笠，要不杨杰早就被杀掉了。

我当时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弄清楚是参加了什么组织。我只看杜同意了，便认为不会有错。他比我一向仔细，肯考虑问题，跟他一道吃不了亏。解放后，我问起黄琪翔，究竟那次杨杰搞的是什么？黄说他也不明白，只知道杨那时就在搞反蒋活动。

我当时认为杜忠于蒋，是因为他在重庆时向我谈过他替蒋介石做过许多事。如蒋为了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成立了一个“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戴笠和吴开先推荐杜为主任委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他作过的一些工作中，认为最得意的，是他利用过去在上海工商界的关系，为蒋介石推销了几千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蒋为此而设宴招待他，并当面嘉奖了一番。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上海投敌附逆的许多工商界分子，为了预留退路，才肯拿出极少钱认购了一些公债，作为将来的护身符。抗战胜利后，不少落过水的人，便拿出这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爱国”和忠于重庆蒋家王朝的证据。

他和戴笠除了搞过出口大量鸦片烟的生意外，一九四三年前后，又搞了一个通济公司，由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老板。当时蒋介石集团的要员们都是利用种种特权大做其生意，发国难横财，连他的美国主子也觉得太

不成话，向他提出过警告，蒋曾下令禁止官员经营商业。故戴笠自己不出面，却去向蒋备过案，由杜出面经营，让他分点红利。

通济公司倚仗戴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这种丧心病狂的作法，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一九四二年，杜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次恰好他的小老婆老三（杜维垣的母亲）和张嘉璈的妹妹一同由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地方豪绅为了讨好胡，也为他而举行了一次盛大欢迎会。据说还因为一九二八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在上海作救灾募捐时，杜帮过忙。他好久没有遇到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那次他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

一九四五年夏天，蒋介石正忙于准备接收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时，杜也异常活跃起来，他多次向戴笠谈到日本投降在即，应如何设法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等问题。尽管这方面工作重庆早在积极准备，但他的意见还是很受蒋介石的重视，蒋一听到他愿尽一臂之力，马上召见了他。当时他气喘病时时发作，蒋劝他先派几个得力的人去布置，等秋凉他再去。

他生怕错过机会，宁冒生命危险，也决心冒盛暑长途跋涉。蒋介石当面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叫他和戴笠一同前去。

六月二十五日，他带着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十多人，乘汽车由重庆出发。行前他身体还不舒服，可是一想到不久便可回到上海，他立刻变得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二十七日到贵阳，戴笠和中美合作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赶到与他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经芷江到达长汀。他稍事休息便到铅山去见顾祝同，顾当时满以为一定由杜负责主持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对他极表欢迎，杜曾和顾谈了两天关于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要顾多从中协助。没想到胜利后，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一发横财的任务交给他，这连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否则他就不会去白跑那一趟。

他在浙江淳安住了一个多月，随时和戴笠研究如何接收上海的问题，并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第一次主要是关于重庆政权到达前伪币的继续流通问题，具体内容我记不起。第二次是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赶到淳安，向他谈了上海方面许多落水投敌的工商界汉奸，希望杜在胜利后设法保护他们。杜便向蒋建议，对这类人将来给以宽大处理，不宜牵涉过多的人，以免有伤元气。他准备只要蒋对这一问题有回电，便马上通知上海，让这些人早点安心。但蒋对他这一电报没有给予答复。

他到淳安的消息很快在上海传开了，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去见过他。还有不少汉奸也纷纷派人和他联系，这时他又显得异常忙碌起来。

当时戴笠在淳安，专搞联络敌伪军，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等阴谋活动，杜

尽力予以协助，并向戴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这一对狼兄狼弟配合得很好，他自己也叫人放出消息，说他是由蒋介石派到东南去协助主持接收工作的。他留在上海的门徒更大造谣言，说他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他在淳安时，便有一些人从上海赶去和他接洽这样的事：上海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当然他都一一答应了。因此，在敌人还未正式投降，重庆所派的接收人员还没到达，杜已经在进行这种变相的“接收”，成为发“接收财”的第一个人了。

五、走下坡路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他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正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九月三日。随同他回上海的，除重庆带去的一批人外，又添了由上海去迎接他的另一批人，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的威风。事前上海方面早已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都赶到车站去迎接他，这使得他又踌躇满志了。

他很久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蒋自己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这使他非常失望。以后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不

料CC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弄去弄来，只弄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两次失败之后，他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夙愿”来为自己解嘲。

刚回上海，他还有点旧日余威，主要是和戴笠勾结得很紧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上海联合办事处刚一决定成立，他就把他在杜美路七十号一幢新洋房借与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要在上海找象他那样一幢房子，实在太容易了，但戴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利用一下。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人能去说人情，杜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一向是代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十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奔走他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他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我正和唐生明等在丽都打牌，得到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立刻去找杜，他一听大惊失色。他一向认为结识了戴这样一个兄弟，对他来说，真是如虎添翼，满以为胜利后可以相互勾结起来，在上海大干一场，没想到戴这么快就暴死了，他内心的沉痛，从他在上海主持戴笠的追悼会时落泪的情景，便不难看出。隔了好久，他一和我谈起戴来，还是无限怀念。戴笠死

后，情况就随之而起变化，许多特务自己直接找汉奸家属谈条件，不愿他从中插手了。

胜利后的上海，虽然租界没有了，却成为国民党各派各系大抢劫的重点地区。CC、军统、中统、宪兵、蒋介石的侍从系、汤恩伯的实力派，加上孔祥熙、宋子文四大家族和他们的爪牙一起拥来，彼此抢来夺去，把上海抢得一团糟。杜在这种局面下，不要说恢复过去的特权，连他自己抢到的东西也有人在打主意了。没有租界，他的恶势力再也敌不过这许多掌握特权、军权、政权的大小饿狼。他虽施展出全身本领进行联络拉拢，但这不是交情问题，而是关系到与反动派切身利益的冲突，哪里还能容许他再来插手！CC在上海的一些头目，表面上对他很客气，而暗中攻击他最凶。

首先使他感到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向他开火。吴公开向他要退门生帖，再也不承认他这个老师；并在自己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攻击他，一些影射他的文章，使他很伤心。顾嘉棠告诉我说，这是三十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这样骂他，他怎么会不难过？过去上海发行的报纸，哪一个不是捧他的场？这次着实刺痛了他，他无刻不在等机会报复。当吴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便连篇累牍地揭发和攻击吴，趁机大打落水狗。这样他仍感不足以泄恨，还指使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暗杀吴。这件事被毛人凤知道了，曾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坚决不允许王为杜去充当打手，使他一直没有泄出这口怨气。

接着使他丢脸的事又发生了。一向倚仗他的势力在上海横行惯了的万墨林被扣捕了。万是他家的总管，沦陷时留在上海为他照顾财产和与敌伪勾结做米的生意，赚过不少钱。抗战胜利后，由于杜证明万留下是替军统做地下工作，使万不但逍遥法外，还继续

当他的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的大老板。这次为了粮食贷款舞弊案被牵涉进去，法院传讯后予以扣押。他也看出这是他的反对派有意识在倒他的台，用杀鸡吓猴办法拿万来开刀。他知道敌不过，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出面袒护。但背地里却大发牢骚，说什么“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因为那次粮贷舞弊案万墨林不是主角，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来进行粮食投机倒把的活动，幕后贪污得更多的人却没有事，所以使他很感不平。我那时常和他在一起，一谈起当时上海一团糟的情况，他总是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还不止。”这时他处处小心，什么事都不敢过问，常常自称是“一品老百姓”。

他虽然希望平安无事地过下去，维持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局面，不要再让他过分地难堪便算了。可是反对他的人并不肯就此放过他，使他更加丢人的事终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九四八年秋天，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了，这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得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我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激动。他喘了好久，又叹了几声气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关于他儿子被捕的消息，当时不仅轰动了上海，连许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也为之大吃一惊。这件事的经过，我当时在上海，比较清楚，它的内幕谈起来是相当复杂的。

一九四八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更利害，物价的狂涨的确惊人。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

跟着涨落。蒋介石总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他当时很清楚，他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第一次接到这个电报时，曾对我和几个常接近他的人谈过，只有采取标本兼治才能有效。他复电蒋便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据说蒋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意见很不满意，又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他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他当时认为很得意，曾向孔祥熙谈过，孔也认为是一项好办法，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蒋介石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相同，最后才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顾主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大量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这不但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他告诉我，他最初的确认为抛物资是一项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料到南京方面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能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的头上。当时传说蒋认为杜不是诚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杜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曾大叫冤枉。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杜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杜便对我说，这是蒋介石在打招呼，希望大家帮他忙进一步搜刮。杜对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忙也帮不上。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便不客气开始上涨。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名义上俞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芸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恃有"上方宝剑"，决心借几颗人头来挽回这一局势。

我当时便听说蒋经国原来决定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对象便是他的表兄弟孔令侃。这个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势力横行不法搞惯了的扬子公司年轻董事长，搞不法的黑生意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的。蒋经国去南京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他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甥。我当时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常和孔令侃一起玩。这个消息传来，孔有点恐慌，便决定请蒋经国吃饭，当面拉拉言语，结果蒋经国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宋向蒋介石提出坚决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立刻通知蒋经国另行选择对象。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指蒋经国）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的身上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易在他身上找出大毛病。蒋经国的特务找去找

来才从他儿子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很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是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二千八百多股，在他看来，真是小事一件。没有料到蒋经国便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他和另外两个同样情况的人逮捕。

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虽气个半死，却表面上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口口声声说：“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杜维屏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得很，便只好送他到法院勉强判了八个月徒刑。一送法院，都知道不会成问题了，杜维屏也声明不服，延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到十一月间，法院只好改判六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吓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杜虽然害怕再坍台，不敢直接去和他作对，可是暗地里，却极力支持自己的手下去兴风作浪，从旁看热闹。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没有好久，上海市场物价便由硬性的“限价”改为“议价”，议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了。蒋经国在上海搞了不到三个月，毫无起色，只好灰溜溜地跑回南京。这时，杜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抗战胜利后，他做六十岁生日时，虽远不如杜家祠堂落成时那样的气派，但蒋介石等还是给了他不少面子，因此他还想再次检阅一下他在上海的力量。在竞选伪国大代表时，他想和CC较量一下，便决定参加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他明明是以CC为对手，却

偏偏要CC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当时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他这一着很高明。表面看他还是在靠拢CC，但等到他发动全部力量暗中活动，想在开票时抢个第一时，便被长于搞这一套的CC分子看出他想借此来抬高身价。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压制，坚决不让他抢到第一。开票那天，他还很有信心，认为可以得到压倒一切的多数票，结果又出他的意外，市参议长潘公展得到了第一；在上海向无基础的市党部主委方治得了第二；他被压到第三名当选。当时他非常后悔，不该去参加这次竞选，屈居于潘、方两人之下，在他看来，是件很不体面的大事。

伪国大第一次在南京开会，他又想选入主席团去露露脸。最初他以为南京方面的老朋友会支持他，等到要选主席团的头两天，他一摸情况，才知道可靠的票少得出他意外，他的确感到非常着急。要他坐在下面而登不上主席台，他又认为是件丢人到极点的事，他连夜找我商量，神情沮丧。我立刻答应尽力帮忙，他才转忧为喜。他告诉我还差四票，我为了怕别人临时拉他的后腿，便给了他六票。开票时，果然答应他的又少了两票，加上我多给他的两票刚好选上。他对此感激万分，回上海后，便要我把这两个投他票的黄色工会负责人请去吃饭，亲自殷勤招待了一番。

在这一段时期内，他知道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作风也变了，左手进钱放入腰包，右手进钱也放入腰包，很不容易向外掏出了。

解放前夕，我和他都决定出卖在杜美路的房子，那时只有美国人肯花钱买那些东西。我十一号的房子卖了一百七十根金条，他七十号房子卖了四十五万美元。他带着这笔款逃到香港去当寓公。一九五一年秋天他去世时，听说只剩下二十五万美元的遗产，

由孟小冬和几个老婆瓜分了。

他死后，顾嘉棠和他老婆把他的尸体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显赫一时的杜月笙终于弄得死无葬身之地。

（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四辑，
经整理人同意，在本辑转载，并稍加修改）

杜门话旧

黄国栋口述　罗醴泉整理

（一）

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到杜月笙家任总帐房，距今已有几十年。我所以能够进杜宅去，是由于我父亲的关系。

我父亲黄文祥，字文庠，是水果行出身，那时我祖父在上海南市里马路（从前叫大码头的北首，现名杨家渡码头）开设一家源裕水果行，托人将我父亲介绍到张恒大水果行学生意。当时张恒大的"当首"（即经理）是杜月笙的伯父，我父亲就拜此人为师。

当年从大码头起的水果行有张恒大、唐恒泰、张锦记、潘源盛、源裕等，近十六铺的里马路有宝大、梁东升、益大等，十六铺旧法租界地段有同茂、祥茂、合成、同祥茂、吴顺发等。我父亲在张恒大水果行由学生意升为小账房，这时杜月笙也进张恒大学生意，但做了不多时间，因杜月笙不安心学艺，时常上街去游荡，在饭店吃饭，付不出钱就记帐，饭店上门讨账，行里还得给他付钱。行门口马路上有女人乘坐的黄包车经过时，杜常用烂水果抛上去，侮辱调戏，有些女人就到张恒大来大吵大闹。这些事情使他的伯父非常不满，就介绍他到宝大水果行去学生意，拜宝大的经理为师。过了不久，杜老毛病不改，宝大经理就停了他的生意。

杜月笙失业以后流浪在十六铺。这时十六铺是上海重要的商

业区和水码头，市面繁荣，流氓众多，杜先拜套签子卖酒酿的陈世昌做老头子，后认识了在法租界巡捕房做包探的黄金荣，黄叫杜出面向停泊在十六铺码头上的民船要码头钱，向十六铺附近的“花烟间”（下等妓院）、“燕子窠”（吸鸦片的场所）、赌台等收月规钱。收来的钱全部交黄金荣，由黄分出一部分给杜，就这样，杜成为黄金荣的得力助手。

这时黄在法租界开设赌台，贩卖鸦片，都叫杜合伙，或由杜出面，杜自己也经营赌台、鸦片，逐渐发了财，而后又开设中汇银行。

杜月笙有了钱之后，第一件事是在浦东高桥造了杜氏家祠。一九三一年家祠落成，上海各界头面人物都去祝贺，我父亲也去了。杜月笙看到了我父亲，叫心腹茶房悄悄通知，要我父亲在一星期后去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他的公馆，有事商量。我父亲依约前去，杜就叫原来管帐的杨渔笙把钥匙全部交给我父亲，要我父亲立即任他的总帐房，我父亲就担任了下来。后我父亲中风逝世，杜要我继任父亲的工作，一直到上海解放。

（二）

当年杜月笙在上海有两个公馆，一在华格臬路，一在杜美路（今东湖路）。杜美路的房子是金廷荪用承包发行航空奖券的利润所得，造了送给杜的，杜自己没有去住过，抗日胜利后将这所房子以六十万美金卖给了美国领事馆。华格臬路房子是黄金荣送的，黄金荣靠贩卖鸦片等发了财，在华格臬路造了两座房子，都是三间两进，前一进是中式二层石库门楼房，后一进是西式三间三层楼洋房，东面一座二一二号送给张啸林，西面一座二一六号送给杜月笙。

杜月笙原住在民国路民国里，搬入华格臬路后，将前面中式住房楼下三间打通成为大厅，楼上三间住原配妻沈氏，又将后面西式楼房的楼下分为三间，西面厢房前部为秘书室，后部是古董间，是杜与人谈重要事情之处，中间是客堂，东厢房是大菜间，内设杜氏本人的写字台、烟铺和沙发等，在这里接见普通客人，总帐房办事、吃饭和电话间也在这里。二楼全部给第二个妻子陈帼英（老五）居住，三楼全部给第三个妻子孙佩豪（老七）居住。杜的原配沈氏，苏州人，是黄金荣给他娶的，生子维藩（小名林宝）。陈帼英，也是苏州人，共生三个儿子，即维垣（小名根发）、维翰（小名二囡）、维宁（小名三囡）。孙佩豪，是唱苏滩的筱桂荪的外甥女，也是苏州人，生了两个儿子，即维屏、维新。第四个妻子姚玉兰，北京人，她母亲是唱京戏老生的小兰英，父亲是唱京戏丑角的“七盏灯”。姚玉兰原来也是唱京戏的，嫁杜后，生了二子二女，即维善、维嵩和美如、美霞。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玉兰又介绍孟小冬到上海和杜月笙同居，因为姚玉兰看到杜氏的妻室中都是苏州人，唯她是一个北方人，势力孤单，所以拉孟小冬来做帮手，可是孟来上海后，得到杜氏的宠爱，反而把姚玉兰疏远了，使姚后悔莫及。

我看到有本写杜月笙传记的书中说，杜氏的四姨太与家乡来的表兄几度幽会，有人向杜告密，杜就派他的四大金刚之一，把表兄两脚砍掉，将姚氏关押起来等语，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姚玉兰作风正派，也无表兄在上海，也从未被禁闭过。评弹《筱丹桂之死》中有一段书说，杜月笙的三姨太在外搞腐化，杜月笙将关系人物斩去手脚，变了“活冬瓜”，并说张春帆拜戚再玉做老头子，戚再玉拜杜月笙做老头子，所以知道此事，也不正确。三姨太孙佩豪

一直是规规矩矩的，高年长寿，现在美国，两个儿子都在美国经商，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戚再玉也不是杜的门生，因为不论在抗日胜利前后，戚再玉还没有拜杜做先生的资格。

杜公馆里除了这些主人之外，尚有许多雇佣人员，帐房除我外，有杨筠心、邱曾受、赵琴波共四人。我负责银行取款，支付各项开支，管理来信和发信事务，接待重要来客等。杨筠心负责处理发来的各种婚丧喜庆帖子，逢时逢节各处送礼发信，写回单簿，管理电话、水、电的修理装置和各种报纸，分发零星开支、年赏、节赏，管理大厅清洁，招待来客的汽车司机和侍卫人员等。邱曾受管理伙食帐目，厨房炊事员的人事调动，并负责每月发放杜月笙救济贫苦孤老的“善折”金额（孤老经人介绍，取得“善折”后，每月可凭折领取救济金十元至五十元不等。这些孤老大部分为英、法两租界死亡的包探和巡捕家属），发信时写回单簿等。赵琴波负责带领“小开”们到外面玩耍，管理电话和水电费和所有大小挂钟等。此外，还有一个万墨林，负责管理茶房（服务员）、汽车驾驶员、厨司、门警、卫队等，外面打给杜的电话，都由万先接听，后交杜接，杜向外打电话，也都由万打通后再交杜接听。万墨林不识字，但记忆力特强，能记住杜的亲友、门生、机关、企业等一百几十个电话号码，只要杜氏令他打某处电话，他能随手拨出号码，用不到翻电话簿。

万墨林原名木林，进杜宅工作是顶替他哥哥万兆棠（度新）的。万兆棠是我父亲水果行里的门生，后来进杜宅工作，几年后积了些钱，吸上鸦片，日夜在杜宅工作，既怕麻烦又吃不消，所以要求杜介绍到烟土公司工作，杜宅里的事情，要他兄弟万木林代替。大家都认为“木林”这名字难听，后由杨度将“木”字改成“墨”字。

杜宅秘书室共有秘书四人，翁佐卿（左青），是张啸林的门生，

由张介绍给杜；邱访陌，由陈群介绍；王幼棠（曾任淞沪警察厅秘书）由刘春圃介绍；胡叙五，由黄炎培介绍（原在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

杜氏外出时的近身侍卫亦有四人。陆桂才，是张啸林的门生，做过旧军队的军官，在社会上，人家知道他是扬州白相人，叫陆大麻子，他广收徒弟，有一、二千人之多，家住南阳桥，开设维扬大舞台和荣贵祥香烟批发行等。陈秦鹤，是台州白相人，也收有不少徒弟，兼开西藏路恒茂里内的恒雅书场和恒雅剧场、八仙桥第一旅馆、东自来火街的恒雅茶馆、八仙桥第二旅馆、顺昌路同乐剧场、同乐旅社等。陈继藩，较有文化，能说法语，由法租界领事公馆华董张翼枢介绍来的，杜月笙认为此人比较老实，抗日战争发生，杜去香港后将他叫去。高怀礼，北方人，曾在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打听，在淞沪警察厅担任巡官等职。

杜家的汽车多，驾驶员更多。杜本人的汽车司机叫王宝钰（小名阿菊），无锡人，杜宅的所有司机都由他管理，有助手二人。四个太太的汽车司机有八人，子女的司机有四人，杂务用汽车司机二人，共有司机十余人。

厨房间炊事员有几种，苏州帮二人，扬州帮二人，本帮三人，北京帮二人，下手三人，一共也有十余人。

另外，有夜班卫队四人，门警六人，后弄巡路卫队二人。大菜间杜氏接待客人的茶房（称大茶房）四人，专装鸦片烟者一人。装鸦片烟的名郁泳馥（永福），原在十六铺摆水果摊出身，也是有名的白相人。他满身刺花，广收徒弟，曾任新城隍庙总稽查、上海纱布交易所总稽查等。此人在杜家时间最久，杜月笙认为能用这样的人给他装鸦片，是很体面的。此人平日作风随便，不拘礼节，即使黄

金荣、张啸林来，他也嬉皮笑脸，毫无规矩，见到杜宅女佣人，常开玩笑，杜不加约束。他有两个助手，帮他烧鸦片膏。另有杂务工，烧水汀二人，管冷气二人，打扫天井、大厅、送信等茶房八人，花园司务三人，女佣二十人以上，由杜氏的寡居表姐管理。每个太太处还有两个拖地板、揩门窗的男佣人。杜宅中的勤杂人员，确实是一个庞大的队伍。

经常到杜宅来的客人，有黄炎培、张翼枢、章士钊、陈群（此人在杨虎任淞沪警备司令时，曾任政治部部长，后在杜月笙办的正始中学任校长，杜是董事长，每月贴学校贰千元。陈在抗战时期，任汪伪江苏省省长，抗日胜利后自杀）等。另如刘春圃、杨度、洪帮大哥高士奎（按日乘汽车到杜宅，其生活开支全部由杜负担）、律师秦联奎、江一平、王荫泰、陆殿东、朱文德、王思默等，工商政界的闻兰亭、钱新之、王晓籁、虞洽卿、刘鸿生、潘公展、徐寄廎、吴开先、杨管北、金廷荪、杨志雄等，加上杜的门生朱学范、陆京士、唐世昌、章荣初、徐懋棠、骆清华、王先青、邵子英等，每天不下一、二百人。再加来客的侍卫、司机，真是热闹非常。

杜宅有如此庞大的雇用人员和来宾接待，所以开支非常惊人。如秘书翁佐卿、王幼棠、邱访陌，每人每月工资三百元；名誉秘书杨度、章士钊、黄炎培、陈群、刘春圃等，按月送五百元；汽车司机上手每月五十元，下手三十元；保镖陆桂才每月一百五十元，陈秦鹤每月一百元，其他陈继藩等每月八十元；门警、普通茶房、水暖工人每月六十元，大菜间茶房每月一百元，厨司领班八十元，其他一律五十元；女佣每月一律二十元；夜班卫队每月八十元。我每月亦给二百元，杨筠心一百元，邱曾受、赵琴波各八十元，月宝轮船每月工资五百余元。另有高桥杜祠、莫干山月宝别墅、杭州杜庄、苏州别墅

等处的管理服务人员，亦需大量开支。当抗日战争日趋紧张，杜氏准备离开上海时，要我结算银行帐目，总共负债五百七十余万元（其中向中国、交通银行借债二百四十万元，向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老板简照南之媳简陈季臣借三十万元，积欠中汇、通商、民孚等银行二百数十万元），他的股票、证券、房地产等估计不到二百万元。这些债务，直至抗日胜利杜氏返沪时，由于币制变动，才全部还清。杜氏在重庆时，因与上海的徐采丞联络，将纱布等物资由沦陷区辗转运往后方，发了大财，至此杜才真正成了有钱的大老板。

（三）

杜氏的起家与帮会有关。据我所知，洪帮在上海的势力不大，参加者大多是北方人，因为这一帮原来流行在北方，在上海，多数属于理发、菜馆、浴室、茶馆的老板和从业人员。青帮在上海的势力较大，上自达官巨商，下至贩夫走卒，都有青帮人物。其中有名的“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人。次要的有金廷荪（洽茂冷气公司、黄金大戏院、逍遥池浴室的老板）、马祥生（金门大戏院老板）、高鑫宝（丽都舞厅老板）、谢葆生（仙乐斯舞厅、大舞台、卡德浴室等老板）、芮庆荣（新光大戏院老板，他专收文艺界方面人士为门徒，如施春轩等）、杨顺铨（绰号卖鱼小顺，在十六铺开鱼行，为当时的鱼霸，还在老西门开西门浴室）、范开泰（绰号乌木开泰，开木行）、范回春（胜洋影片公司老板、远东运动场经理。以上二人为南市人，青帮中称为老前辈，城隍庙出身，黄金荣在城隍庙裱画店当学徒时，就与他们认识）、顾嘉棠（又名花园阿根，本是哈同花园的种花工人，后来靠杜月笙发了财，在赫德路造了很大的花园洋房，名叫“佳庐”，拥有弄堂房子百多幢，又在大西路造起顾家花园）、范

恒德(又名阿虎郎,开酒行,并同谢葆生合开大舞台)、徐德胜(扬州人,人称扬州杜月笙,在扬州广收门徒)、袁宝珊(曾开东南大戏院,现为南市影剧院)、叶焯山(是有钱的小开白相人,喜欢骑马,在跑马厅养了三匹马)、戴步祥(大中华饭店经理)、黄振世(开鱼行,是冰鲜鱼行中的大亨,在金陵东路开鸿运楼菜馆)等。

黄金荣手下出名的徒弟有丁永昌(小名野鸡阿大,大世界经理)、顾竹轩(天蟾舞台老板)、唐嘉鹏、陈荣生(二人在大世界门旁合开大利春菜馆,后因互争权利,陈荣生派人打死了唐嘉鹏)、樊良伯(专靠收门生过生活)、夏连良(新光大戏院经理)等。

杜月笙手下出名的门生有江肇铭(绰号宣统皇帝,主持福煦路一八一号赌台,专收各种白相人作门生,人数很多)、浦贤元(又名小阿本,专收文艺界人员作门生,特别是唱独脚戏的最多)、唐世昌(申报和新闻报的经理,专收各报记者为门生,控制上海新闻事业)。其他如金融业、海关、京剧名演员、交通部门等都有他的学生。

杜月笙能挤入青帮三大亨之一,甚至后来居上,超过黄金荣,有一段转折的过程。他原本是黄金荣的助手,在帮中地位比黄金荣差得很远。二十年代,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至共舞台看露兰春唱戏,不满意时,喝了一声倒彩,被黄金荣打了一记耳光。两天以后,淞沪护军使公署派军队从民国路进入法租界,包围共舞台,将黄金荣捉去,关押进护军使公署。这一行动出于法租界当局的意外,大家认为中国军队敢于违反规定,进入租界捉人,说明有很大的决心,要将黄金荣置之死地,于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黄金荣解围。这时杜月笙挺身而出,筹集巨款,亲自与护军使何丰林联系,费了许多周折,终于把黄金荣保释。这件事使杜在帮内的威

信大增，黄金荣出于感激，也极力把杜捧上去。同时杜与何丰林攀上了交情，通过何结交了一部分军阀，抬高了自己的身价，还打开了一条贩卖鸦片的新渠道，大大增加了收入。其时一年中仅与北方一个军阀成交的鸦片交易，金额即达几百万元之巨。

杜有了钱以后，开始结交政界人士，力求进入社会上层，开始经营银行、工厂等企业。一二八战事以后，法租界的新领事到任，法商买办朱葆三及其婿魏廷荣由于对杜不满，在新领事面前说了杜的坏话，并挑拨领事下令封闭法租界内所有赌台和烟土行。杜氏受此打击，非常不快，就吩咐门生邵子英（法商水电公司总翻译）组织法商公共汽车、电灯、自来水等厂的工人全部罢工。这时法租界内公共车辆停驶，自来水不流，电灯不亮，造成一片混乱。法国领事对此局面束手无策，就请华董李应生、张翼枢陪同到杜宅拜访杜月笙，当面要求杜帮忙解决。杜一口应允，第二天，法商水电、公交车辆全部复工；但杜对所封闭的赌台、烟土行等不准备再恢复，故主要收入来源中断，仅靠各处办公费、车马费等收入，不足维持开支，可是为了保持面子，排场还须照旧，不够的钱，只好向银行借贷。这时杜的社会地位和在帮会中的势力都已巩固庞大，不怕有人逼债。

（四）

八一三以后，江南各地先后为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尚保留一部分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予以消灭，运用威胁、利诱、绑票、暗杀等手段，企图迫使留在租界内所谓社会名流俯首就范。这时，杜月笙离开上海，移居香港。

杜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通知万墨林、朱文德、杨渔笙和我四

人说，明天到华格臬路吃夜饭，有话要同我们讲。当晚，杜告诉我们说，抗日战争已更紧张，估计日本人将对他有所举动，所以不得不离开，要我们胆大心细，仍按他的指示办事，并规定朱文德代万墨林写信和发电报，我除协助万墨林外，代张翼枢将在上海的报告、电报到电报局设法发出，杨渔笙专门发赈务委员会每月的救济费。所谓救济费，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发给社会名流的补助费，以免他们因经济上有困难，受日本人的利诱而去当汉奸。

杜对我们吩咐后，即去香港。同去的有钱永铭（新之），带去秘书翁佐青和王幼棠二人，茶房马镇兴（小阿五），汽车司机汤二宝等。到香港后，杜又来电报给我们四人，嘱咐所有事情应照他昨晚所谈的办理，如有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只要有他的介绍信，都要好好接待，他们托办的事，都要一一照办。

在上海同我们联系的，有国民党的人，如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王先青、汪曼云（此人后来做汉奸），有民主党派的人，如王艮仲（当时他用假名李大诚，是黄炎培派他在上海做通讯工作的）以及朱学范毅社的两个门生。另外也有一批人拿着杜的介绍信到我处来，要租房子，买汽车，捐车照，以及托带信件去香港，有的要求代买去香港的船票，有的有了船票，还要我另租上邮船的小火轮，因为从公和祥码头上船，码头上有日本兵的岗哨，要检查搜身。

这样过了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四人中第一个是杨渔笙忽然不见面了。他先避居别人不知地址的女婿家中，后逃往宁波，杜月笙在香港没有得到杨的信息，写信来问，我们如实告诉了他。杨渔笙原是无名小卒，自做了杜宅帐房后，逐渐有了钱，手里有三十多万现款，在宁波有二百多亩田地，五间二进房屋和一个花园。杜月笙平时很信任他，任为中汇银行襄理，他在杜面前说了经

理傅品圭的坏话，在中汇银行新大楼落成迁入时，杜改任傅为总稽核，另派由杨渔笙介绍的徐庆云之子徐懋棠为经理。由于这一原因，傅品圭对杨存有意见，上海沦陷后，傅品圭的父亲傅筱菴任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这时傅品圭在中汇银行一见杨渔笙，就恐吓他："日本人已经知道你的情况了，你要当心，被日本宪兵捉去了是没有办法活着回来的。"杨渔笙本来胆小，有了钱当然更怕死，开始躲在家里，不敢到中汇银行办公，且因他平日人缘极坏，中汇银行的职工和杜宅的人，包括杜月笙的儿子，都与他关系不好，他虽躲在家里，也常有人打电话恐吓他，所以连家里也不敢住。杜月笙知他逃往宁波，就电报通知他回上海照旧工作。杨渔笙接到电报后不仅没有回上海，反而去了香港，杜氏见到杨渔笙，大发脾气，要杨立即滚出香港，从此断绝来往。杨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杜不予理睬。后经钱新之、黄炎培向杜劝说，才准杨留在香港，但从此与杜家断绝关系。

杨渔笙脱离以后，杜月笙来信要把赈务委员会的工作交我负责，每月由徐采丞到交通银行领出款子，交我分发。杨渔笙原来只发十九个人，我接手后逐步扩大到二百余人，直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这一活动才告停止。

又过了三四个月，万墨林被吴开先手下的人出卖，由汪伪特工七十六号捕去。此人约万墨林到南京西路华安饭店（现在的华侨饭店）会面，万依约前往，一下汽车，就被埋伏在饭店门口的十多个人包围，绑架而去。万的司机邵翰度见此情况立即回来告诉我，我四处打探，知道是七十六号吴世宝干的事，并知万被捕后，受刑十分利害，同时吴又派人向万妻敲诈钱财，先后共达二十余万元。

万墨林被捕两个多月后，我也被七十六号捉去。我是在菜市街的路上，被停在路旁的汽车上跳下来的六、七个拿着手枪的汪伪特务绑上汽车的。出事后，顾文达（顾七）同张椿宝、潘三省、唐生明（唐生智之弟）都到吴世宝处为我说情，于是吴当晚就用汽车送我回家。

在这事情发生一个多月之后，有顾七和张椿宝二人来我家，对我说吴世宝在极司菲尔路新建住宅，在某日办进宅酒请客，要我也去参加。我对他们说，我要向人请示一下再说。我请示以后，都说要送一份厚礼才行。后由这些人给我钱，买了一些字画，先叫人送去，在别无办法之中，大着胆子去参加吴世宝新屋落成的酒筵。那晚到的人很多，大都是日本人，中国人中有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当时称上海三大闻人）、唐生明、张椿宝、纪增寿、耿嘉基、潘三省、顾文达、卢文英等，我心里害怕，吃完饭赶紧向吴世宝道谢而别。

过了几个月，吴世宝叫顾文达来通知我，日本人在注意我，要我离开上海，避避风头。我立即买了“日本皇后”邮船船票，动身去香港。船到香港，杜宅的茶房阿陶和杜的门生邵子英两人乘小轮上大船来接我，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来香港的，他们说杜老板到重庆去了，是杜打电报来通知我们来接你的，还通知杜维藩准备筵席为你洗尘。当天晚上，章士钊的姨太太殷德珍和杜的四太太姚玉兰也参加了宴会，饭后我住在邵子英的房间里。

过了三天，杜月笙从重庆回来，一见面就对我表示十分热情，我致谢他专电通知人来码头接我。杜说，你在上海辛苦了，这是应该的。随即问我有人拿了他的介绍信到上海找我托办的事情办得怎样？我说都照你信上的指示办了，来人很满意。杜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杜又找我谈话，给我港币零用钱五千元，接着，向我谈到杨

渔笙，他说，杨渔笙没有良心，发了财就怕死，他在上海当面答允我托办的事情，我一离开就避而不办，使各方面受到不利，他还有脸到香港来看我，我一见他就生气，我用了这样一个人，真是后悔极了。说到这里，他又把话题转到我身上，说："你这次来港，住上一个星期到十天就回去，现在上海万墨林已被捉去，出面办事的人没有了，上海各方面的人都不方便，对抗日工作是不利的，你听我的话，还是回去！"这时有客来了，我还没有表态，谈话就停止。当晚，他通知一些要好的朋友和门生，要他们分别请我吃饭，于是几乎每天晚上总有人陪我上馆子，给了我很大的面子。

我住了二十多天，见杜的脸色不太高兴，就决定再住几天回上海。过了五个星期，杜又召我谈话，我一见到他就先说，不管上海怎样危险，我决定回去，他就很高兴地说："那好呀，你早点回去，我就放心了！"过了几天，我向杜告辞，杜已叫阿陶买好了特等房间的船票。临行前一夜，杜备一桌酒席为我饯行，作陪的有张翼枢、章士钊、郭兰馨、陆京士、朱学范、杜维藩、顾嘉棠、邵子英等人，杜亲自给我倒了一杯酒说："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万事吉祥。"并嘱咐我要胆大心细，一切小心。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与往日一样办理一切事务，许多朋友都来看望我。有一天晚上，王先青、朱文德来看我，悄悄告诉我说万墨林改押在四马路巡捕房，他二人已通过刘绍奎、陆大公、刘俊卿等人，计划在今夜越狱出来，要我不要住在家里，以免受到牵累。可是第二天一早，王先青一个人来寻我，告诉我越狱的计划没有实现。因万墨林不能从大门出来，要从四层楼上吊出来，如果下面有人看到开了枪，危险性就很大，所以停止进行。王走时，也叫我处处小心。我到四马路总局，通过刘绍奎看了万墨林。过了几天，万墨林又被押到日

本宪兵队，这是徐采丞与金鼎勋以及日寇坂田大将谈判的结果，不久，万墨林就从日本宪兵总队释放出来。我看了这情况心里很高兴，紧张的情绪比较放松，可是不到三个月，我突然被日本宪兵总队捉去，说我是抗日分子，拷问了十几天，经徐采丞设法营救获释，住进南洋医院疗养。蒋伯诚在当夜就派代表来慰问，后来有几次半夜里有几个青年拿着鲜花来慰问，我既不认识，也不知他们是什么人，但他们知道我的姓名。过了几天，杜月笙从香港派他的门人老俞送来慰问信，对我说："老夫子非常感动，特地派我代表慰问，希望早日康复。老夫子还希望您对上海的事情仍要小心坚持下去。我默默点头。大约过了三个月，我又被贝当路(今衡山路)宪兵队捉去。这次是高桥开鱼行的丁如松领着日本人来捉我的。事情的原因是万墨林主持一个秘密电台，由朱文德出面装置在高桥丁如松家中，被日军破获，要丁领捉朱文德，但朱早已隐蔽，无法捉到，丁如松受刑不住，只好领着日本宪兵来捉我。我被送进了贝当路宪兵队，第一次审问时我就告诉日本人，第一，我不知道朱文德现在住在哪里；第二，我为人如何，你们可以到北四川路宪兵总队去查问，他们都知道我。这一下还有用，此后不审不问，也没有受刑，关押了四十多天，由我兄弟请了台湾人蔡庆其保释出来。

我向各有关方面说起这次被捕和保释的情况，有人指出，要好好请蔡吃顿饭，送点礼。我正准备进行，不料姓蔡的接二连三的请我在国际饭店、新雅饭店吃饭，宴席上的客人，全部是汉奸名人和日本驻在上海四区的宪兵队长等。我将此情况告诉各方面的人与徐采丞，询问今后是否再和他们碰头，参加他们的酒宴，大家的意见认为我既要出头露面做工作，不能不敷衍这些人，只要政治上不出偏差，不泄露机密，可以小心谨慎地同他们打交道。

蔡庆其请我吃了六、七次饭，最后向我开口，说他准备做五十寿诞，在金城大戏院义演一天京剧，要我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名角、名票参加，并邀请几个上海的闻人做庆寿活动的发起人。我只好按照他的意图，邀请名角马连良、汪吟秋，名票张中原、孙兰亭、裘剑飞、张哲生、孙钧卿等，在南国酒家吃饭，请他们帮忙演出，并介绍蔡给这些人见面。幸而个个都答应参加。我又给他找了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张慰如（敌伪期间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总经理）、马祥生、谢葆生、顾竹轩等作为发起人，并帮他推销戏票，发“秋风帖子”。

事后，蔡庆其要我担任皇后大戏院顾问，因为戏院经理张锦寿是蔡的干儿子。不久皇后戏院改组，蔡要我参加股份，我鉴于这个戏院的几个股份老板都是汉奸，必须慎重考虑，即和蒋伯诚、吴开先、徐采丞等商量。后来徐采丞通知我，允许我参加股份，钱由徐采丞交我，就这样我参加了皇后大戏院，出任总经理，直至解放为止。

（五）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杜月笙从重庆经浙西返回上海，我和万墨林等到车站去接他。他一看到我，就叫去问从前亏欠的债务怎样了？我告诉他，由于股票升值，币制改革等原因，五百多万债务已全部还清，他当即露出笑容，表示高兴，拖住我一起坐他的小汽车回杜宅。

杜月笙自重庆回来后，有很大的改变，过去随意挥霍，银钱一手来一手去，毫不吝惜，现在告诉我要紧缩开支，家里雇用的人员也减少了一些。如秘书邱访陌，因跟陈群做过汪伪上海市所得税

局局长，杜就不再聘用；秘书王幼棠年老病死；秘书翁佐青自己找了通商银行秘书的职务，辞去杜宅工作；另如万墨林、朱文德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不常到杜宅来；烧烟的郁泳馥到证券交易所当了总稽查，只留下我帮助料理家务。

这时杜的子女都已长大，陈帼英提出要举办三个儿子杜维垣、杜维翰、杜维宁的婚礼，杜一口答允，要陈帼英同我商量办理。后来孙佩豪又提出要给她的两个儿子杜维屏、杜维新举行婚礼，也由我办理。再后是姚玉兰第二个女儿出嫁。六件婚事之后，又有杜氏本人的六十寿庆。

六次婚事都在丽都花园举行，为了节约，只有茶点招待，但每次来宾都是五千余人，花费还很大。其中有几个人送的礼品价值昂贵，如中汇银行经理徐懋棠每次送金盾一只，重约二十余两；门生黄振东每次送金盾一只，重十余两；华商电气公司经理孙志飞、荣丰纱厂经理章荣初，每次送黄金十两。杜的女儿出嫁时，他们四人合送金“台面”一副，计有筷子、酒杯、杯垫、汤匙、酱碟等，全部用黄金铸成。后来杜本人六十寿辰时，这四人又合送黄金制成的福、禄、寿三星，重约十余斤。这些都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情况。

庆祝杜氏六十寿辰，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在丽都花园举行的，来宾六千余人。由于杜要求节约，每席仅用六个素冷盘和一大锅光面招待来宾，饮料可口可乐，由生产的工厂奉送，啤酒是中国啤酒厂和上海啤酒厂奉送。那天除了汽车多、客人多之外，来要饭的乞丐也有几千人。

几天以后，又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举行义演三天，全部收入捐赠慈善机关，开支由杜负责。所邀请的南北京剧名角全部尽义务，由杜赠送金笔和金表各一，作为纪念。

这时孟小冬已从北京来沪，住在杜家，也参加演出。演出前几天，孟小冬要我联系请人送花篮，我答允了。当时杜月笙在旁说，花篮折价，每只五十元，将来捐赠慈善机关，我提议每收到一只花篮的折价，就在中国大戏院门外墙上贴一张红纸喜报，写明是谁送的，送给谁的，杜和孟都同意。到演出那天，送花篮的，大都送十只（五百元），只有证券交易所和杜的门生黄振东各送花篮二百只（一万元）。墙上的红纸都写着孟令辉小姐登台志喜，×××敬贺，贴满了中国大戏院门外的墙头，共计花篮二千五百余只，折款十二万五千余元。

一九四八年，杜月笙遇到了一件痛心的事，就是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拘捕。当《中央日报》刊登着杜维屏戴着手铐的照片放到他面前时，他感到这个面子失得太严重，万分难受。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代客买卖证券，同时是上海大东书局的副总经理，蒋经国用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罪名把他扣押，这种罪名的处理可大可小，可以被枪毙，也可以押几天就释放。当时杜月笙立即打电话给钱新之、章士钊、徐寄廎、陆京士等，邀请他们来杜宅，杜与他们商谈很久。第二天杜又邀请黄炎培、盛丕华、刘鸿生、徐采丞前来商量，谈了整个上午。我在外面听到他们谈论蒋经国本来还要拘捕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因为孔令侃与杜月笙合办扬子公司，也算是投机倒把的罪行，后来是孔的母亲宋蔼龄与姨妈宋美龄一齐向蒋经国打招呼，才没有下手。但市面上已有谣言，说杜月笙也被扣押。

这几天杜月笙与这许多客人商量出什么办法来营救杜维屏，我不清楚。仅知几天以后，全市就发生了抢购风潮，凡属官价出售的东西，不论穿的用的吃的，从黄金到粮食都抢购一空，黑市物价

一日三变，仍然不受限价的约束，于是金圆券的价值直线下降，蒋家政权的威信扫地。不久，蒋经国悄悄离开上海，杜维屏就被释放。当时市面上传言，这抢购风潮就是杜月笙和与他有关的各方面合谋搞起来的，真相如何，我不清楚。

我虽在杜家几十年，有许多事情确实至今仍不明白。如杜回上海后，就卖去杜美路的住宅，此时杜在上海的五百多万债务都已了清，银行里还有存款，并不急于要钱用，为什么要卖掉房子？而且卖了以后又租借“十八层楼”（茂名公寓）七楼的几个房间，作为自己和孟小冬、姚玉兰的住处，租费高昂，这是使人很难理解的。

又如胜利后杜家的来客中，有一个我们不知其姓名的人，他常晚上来探望杜月笙，来时不报姓名，自称是龙寿寺的当家，但这位当家有时穿中装，花呢长袍，有时西装革履，看不出有一点出家人的样子。他每次来，杜都接见他，谈话时间也较长。后来我了解到这龙寿寺在南京电影院（现在的上海音乐厅）对面，是抗日战争后建立的，附近居民说这个庙的和尚不规矩，晚上常穿着西服外出，有时晚上还有妇女进出。解放后，这座庙宇立即被封闭，这庙与和尚是干什么的？与杜有什么关系？我一直未弄清楚。

又如杜在重庆新收一个姓周的门生（当时用的名字记不清了），到上海后由杜介绍给周祥生，在祥生汽车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来，杜常不接见，但这位姓周的来，立即接见，并通知我和茶房徐涛生，只要周来，就让他进去，不要阻挡。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奇怪，直到解放后才弄清楚。解放初，我在南京路中百一店门口，看到这位姓周的正坐着小汽车转弯由西藏路向北，他也看到了我，于是在西藏路边停住，下车来同我握手叙谈，感谢我过去对他的照顾，并说

他的原名叫周恩霆①，是周总理的堂弟。

自从限价事件以后，杜住在十八层楼，深居简出，接见客人减少。在上海解放前两个多月，蒋介石来电话，要他去复兴岛谈话。回来后，他就做了离开上海的布置，要我留在上海，秘书胡叙五跟他去香港。我不肯照办，向杜申说，我主持了他家六件婚事和他的六十寿辰，认识我的人很多，再加上我在国民党机构里担任过一些挂名差使，留下来有很大顾虑，而胡叙五恰相反，他因有大小老婆，家庭牵累很重，不愿去香港。杜见我们对他的安排有抵触，很不高兴，立即叫茶房徐涛生打电话把徐采丞叫来，要徐劝导我们。徐对我们说："你们的去留问题，杜先生早就有所决定，你们不要再纠缠，纠缠也没有用。"并当场拿出一笔安家费给胡叙五。这时我们二人不好再有异议。徐采丞向杜回报以后，杜就叫了我们去，笑容满面地说："你们能听我的话，这就很好，我很满意。"他拿出一根大条（黄金十两）交给胡叙五，并说："你拿去，把家里的事情好好安排一下。你走吧！"胡即告辞而去。杜又对我说："你听我的话，我心就定了。我现在对你直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谈了话，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所以你在上海不会有什么问题。徐先生也不去香港，仍在上海，你遇到困难的事情，可以和他商量。"

谈了一会，徐采丞也走了，只留下我和他二人，他又对我说："解放军进上海，队伍是正规的，不会出乱子，解放后你还可以见到不少熟人。"说着他给了我三封信，并说"出什么事情，可以找这三

---

① 周恩霆，曾用名翕园，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一九八三年去世。

个人。”我看信封上写的是廖承志、盛丕华和潘汉年。解放后，我看到报纸上上海正副市长名单中有潘汉年，就去市政府求见潘副市长，潘接见了我，我把信都交给了他。

在上海解放前一个多月的时候，一天晚上，杜在十八层楼召我谈话，吩咐说，明天晚上要宴请客人，为了清静一些，明天下午除了邀请的客人之外，其余来客一律不见，下午三时以后，家里的门卫、侍卫、茶房一律都回家去。要我在第二天早上亲自去十六铺德兴馆买几只冷盘，下午在新雅酒店买炒菜，家里的厨师在上午烧好一只鸡、鸭、火腿、蹄子的大沙锅，下午就叫他回去。客来后，由姚太太热好菜，要我送进去。

第二天，我都照杜的吩咐办理。下午五时前，徐采丞来了，杜要他在底层大门迎接客人，叫我在七〇五室门内等候。五时半，陆续来了钱新之、章士钊、黄炎培，还有一位长须白头老人，由徐采丞扶持着进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客人（解放后在报上看到照片，才知是中央人民政府张澜副主席），后又来了盛丕华、沙千里和史良。客到齐后，一共九人进餐室关门吃饭，热好的菜由我送到门前，徐采丞开门接进去。里面谈些什么，我一点也听不到。到九时才散席，杜亲自扶着长须老人至底层上汽车。这是杜宅最奇怪的一次宴会，隔了不久，杜就离开上海，又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我所知道的杜月笙

郁　咏　馥*

我原在上海城厢长生桥水果行当伙计，平时卖水果，秋天卖糖炒栗子。一九二二年前后，曾赴香港做水果生意，一九二五年赶上省港大罢工，在香港的生活很苦，就又回到上海。

我三十八岁那一年(一九二七年)，杜月笙的帐房先生来找我，说杜听说我烧鸦片、装鸦片很有功夫，想找我去杜家给杜装烟，我答应了。从此，我天天清晨去杜家，直到深夜才回家，因为杜睡得很迟，我一定要侍候到他吸了最后一口烟后，才能离开。

我进杜家时，杜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住宅造好还不到两年，听说这块地皮原是黄金荣的，黄送给杜和张啸林，杜、张就每人造了一宅住所。前面看来，两家各有大门，可是里面是打通的。

杜家这座住宅的二楼、三楼，住着杜的大小老婆和子女，底层有一大间“大菜间”，是他会客办公的地方，陈设很考究，冬天有水汀，夏天放冷气。在大菜间后面，有一间不大的房，名为帐房，实际是杜抽鸦片的地方，只有极熟的朋友和徒弟们才能进去，平常，只有杜月笙、万墨林和我三个人在里面，杜和我是对榻横陈，万则守

---

* 本文系“文革”前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同志，根据郁咏馥几次口述整理的。

坐在榻旁的一张小桌子前，专门为杜打电话、听电话。万干了这个工作多年，凡与杜有关的电话号码他多记熟了，只要杜一声吩咐，他就拿起电话来拨，所以大家叫他“活电话簿”。每天早晨，杜从楼上下来到这间房里抽烟，就有人预先把当天有几处开会，几处有应酬开了一张单子放在鸦片烟盘里，杜看了，一面吸烟，一面就吩咐万墨林，哪几处自己预备去，哪几处送什么礼去，哪几处打电话去招呼，万就立即遵办。

我这样在杜公馆当了十年多差。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不久，杜避居香港，我没有跟去，留在上海，一直与万墨林、黄国栋（杜的帐房）联系，从他们那里领取生活费。抗战胜利后，杜回到上海，先住在北京西路顾嘉棠的家里，后来又住在十八层楼七〇五号（杜的家属仍住在华格臬路，他自己和姚玉兰、孟小冬住十八层楼公寓），又把我找去烧烟装烟，直到一九四九年初，杜从上海去香港为止。他的走是匆促决定的，曾通知我跟他去，我接到通知，赶到码头，船的扶梯已抽去，没法上船，从此结束了和杜的关系。

（一）杜月笙的出身

关于杜月笙年轻时代的经历，我是在杜公馆听他的朋友和徒子徒孙们谈起的。

杜是浦东高桥人，一八八八年生，从小就死去父母，由他姐姐抚养长大。他小时就爱赌博，往往偷姐夫的钱去赌，姐夫发觉后，和他姐姐吵闹。后来，他姐姐看到他们郎舅俩实在不能相容，就托人给杜荐生意。他到上海进水果行当学徒时，他姐姐曾给他做了一些新的布衣服，哪知他在中途就和人赌博，到上海时，衣服已输给别人了。

有人说杜从小由他娘舅抚养，那是不确的。他的确有一个娘舅，姓朱，是做泥水匠的。杜曾向娘舅借钱，结果被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所以杜得意后，娘舅上门来总不加理睬，直到一九二五年修建华格臬路住宅时，听说还是他的大老婆“老四”对他说：“这回，你照顾照顾娘舅吧”，这才叫他的娘舅来做土木监工。后来，他还提携了他的表弟，在杜门中很有一点势力的朱文德，就是他娘舅的儿子。

杜到上海，在南市大码头张恒大水果地货行学生意；三年满师后，升做“当秤”，因为他经常赌钱，又和流氓混在一起，无所不为，被老板歇了生意。他回到家乡，无以为生，曾在高桥镇贩卖油条大饼，结果也糊不了口，又回到上海。张恒大水果行的帐房黄文祥看他可怜，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给他。同时，他又和里咸瓜街钱庄会馆一带（当时叫协兴街）的流氓白相人杭州阿发等结伙，时常在十六铺码头一带徘徊，看到有水果船开来，就潜登上去，半偷半抢拿了一些水果，一起在大街和茶楼、烟馆、赌场叫卖。因此在流氓群中，以“水果月生”出名（他早年叫月生，月笙是后来改的）。

因为他和黄文祥有这段关系，后来住进华格臬路住宅后，黄文祥变成他的座上客，一直到抗战时黄才死去。黄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黄国栋，杜把他派在华格臬路公馆里当帐房（原来的帐房是焦文彬，焦死后是一个宁波人姓杨的，杨是杜的老伙计，在杜开设中汇银行后，调充该行襄理，帐房由黄继任）。抗战时杜去香港、重庆，黄一直留在上海和万墨林一起经管杜的财产帐目，解放前杜去香港，黄也留下来没有走。黄文祥的第二个儿子叫黄国梁，由杜派在中汇银行工作。

在“水果月生”时代，杜不仅伙同杭州阿发等偷抢水果，还和他们一起摆赌摊、开花会，还时常到招商局金利源码头的煤炭栈房聚赌。据当时和杜一起的流氓后来告诉我，有一次，是杜的三十岁生日，他们同伙弟兄每人出了一块钱，准备晚上聚餐庆祝，不料一个下午，杜就把人家送的份子全部输光。杜的好赌，当时在同伙中是出名的。

在那段时间里，杜拜了青帮头子陈世昌为老头子。那时小东门一带，到处是烟馆、赌台和各种哄骗敲诈老百姓的地摊，陈世昌就是在那里发迹的。他初以套签子为生，手拿三根竹签，骗人把制钱套他的签子，套着了下面系有红线的一根，就可以得一只水果或一包香烟之类的东西，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后来陈成为小东门一带青帮的头子，他是通字辈，杜是悟字辈。杜在法租界当了大流氓后，陈就靠这个徒弟过活。他住在原八仙桥附近的福昌里，不时到杜公馆来串门，大家叫他老太爷。每逢过春节，他总在恒社开赌三天，招集杜门中的徒子徒孙赌钱，三天中可以抽几万元的头钱，大部分归陈世昌拿去。

在杜三十岁的那年，他从南市转到了旧法租界郑家木桥一带，替赌场“抱台脚”（保镖），充打手。不久结识了黄金荣，那时黄金荣依靠法租界巡捕房的力量，已成为法租界有名的流氓头子。杜先给黄做跟班，拎皮包，为人乖巧，深得黄的老婆阿桂姐的欢心。据说，那时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等私下集资开了一个公司，主要是包运和贩卖鸦片。杜月笙打听到这消息，告诉了阿桂姐，由黄出面，一定要参加一股，结果，不上两年，黄就分得了二百多万元。阿桂姐叫黄酬给杜五万元，这就成了杜起家的本钱，以这笔钱和人合开赌场和烟馆。后来，原在法租界包销鸦片的范回春改行不干了，黄推

举杜去接手，从此以后，杜的场面越来越大。到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到达上海，他更和国民党勾结，爬上了政治、经济的舞台，成为上海的“闻人”，声势超过了黄金荣。

（二）杜的生活和家庭

杜月笙在南市时，有个老婆，早死。后来跟黄金荣时，阿桂姐给他介绍了一个，一般称为“老四”的，算是他的大老婆。后来，杜听说老四与其表弟有暧昧行为，便让金廷荪找人打断了表弟的双腿，把老四的司机两眼搞瞎，把老四幽禁在一间小屋里，与外界隔离。直至几年后，老四的领子维藩娶亲，才把老四放出。以后，杜又娶了妓女出身的陈某为妾，一般称为“老五”，她们都住在华格臬路。另外，杜又娶了姚玉兰做第四房老婆。姚玉兰原是唱毛儿戏的。她的假母小兰英，是有名的坤伶须生，玉兰以外，她还有一个假女叫玉英，她们在共舞台登台被杜看中，杜原想娶玉英，玉英病死了，才娶了玉兰。小兰英在玉兰跟杜以后，就出家当了尼姑。姚玉兰不住在华格臬路，由杜在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租了两幢房子作为小公馆，以后杜两度去香港，姚都跟在一起。

杜月笙共有八子二女，解放后留在上海的是维藩、维仁。一个女儿嫁给了金阿三（即金廷荪）的第四个儿子。杜对妻妾“当夕”日子，先期做好安排，多年以来相安无事。他的儿女平时对老子带着三分畏惧，不常在一起。究竟老子在干些什么，他们也不明白。记得有一次，他们曾问过我关于杜月笙的某件事。我说：“这件事你们去问你们的妈就是了，怎么你们爸爸的事倒问起我来呢？”

孟小冬曾在大世界唱过戏，后来成了有名的须生。她在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投靠姚玉兰，呼姚为“阿姊”，同住在长乐路十八层

楼，和杜发生了关系，直至解放前夕，杜去香港，才宣布和孟结婚。

杜自从当了“海上闻人”以后，在家总穿着长衫或长袍，一副斯文样子。他的徒子徒孙中，一向穿惯短装、翘惯大拇指的，进了杜公馆，也要披上件长衫，否则被杜见了要挨骂的。

杜在开中汇银行以前，每天起身很迟，烟瘾也很大。他的烟榻旁，挂了十杆各式各样的烟枪，我总是很早赶到那里，打好烟泡，把十杆枪都装好了，杜一下楼，进了这间房就吞云吐雾起来。中汇银行开设后，他在社会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每天总在上午九时前起身，鸦片也不多抽了。起身后，吃一杯鸡汤，两片面包，吸上两三筒烟，就出门去。有一个时期，他说要戒烟，常在他那里的医生庞京周对他大事宣传蛋黄素可以戒烟，他听了庞的话，从此少吸烟而服用代用品。抗战胜利后重回上海，他的烟瘾又逐渐大起来，因为他的气喘病越来越厉害，越发离不开鸦片烟。

他酒喝得不多，赌是喜欢的，但他自以为有了身份，不再和徒子徒孙们一起赌，也不到公开的赌场里赌。在福煦路一八一号大赌场开设的时候，他在里面另辟一个秘密房间，供他自己和几个有身价的大亨们在里面赌。一八一号停闭后，他又在外面另辟秘密赌博的地方，具体地点我不清楚。至于在华格臬路公馆，他只偶尔在过年过节时找些朋友叉麻将。平时他是不在家赌的，也不许别人在他家里赌钱。

杜很少在家里请客，平时吃饭，他的老婆儿女在楼上吃，他和万墨林、我三个人在帐房里一桌吃。有时，他极熟的门客如张翼枢（骥先）等以及伙伴、门徒如顾嘉棠、叶焯山等恰在吃饭时刻到帐房里来和他谈什么事，也就临时添点酒菜在一起吃。

杜平时不喝酒，我是每顿要吃一大杯老酒的，总是他们先吃饭，

我慢慢自酌自饮。张翼枢等在座饮酒时，杜也陪饮一两杯葡萄酒。除我们这一桌外，楼下还要开六桌饭，是司机、保镖、当差、女仆们吃的。他自己有两辆汽车，每一个老婆各有一辆，另外，还有一辆是公馆里有事一般乘坐的，所以，司机就有六、七个人。他用了八个保镖，两个守大门，两个在屋里守卫，其余四个，分两班跟着他的汽车保护。我初到华格臬路时，杜尚没有保镖，只有一个长条子面孔的壮汉随侍左右。开了银行后，大家劝他弄几个保镖。杜起初认为不需要，经不起人家一再怂恿，并有一个当公事的营长，率先倡导，荐了一个保镖来，只得接受。从此他进进出出，有人簇拥，声势顿壮。

杜月笙在上海，除华格臬路的那幢住宅以外，在原杜美路（今东湖路）亨利路（今新乐路）口，还有一幢高大开阔的洋房，那是金廷荪给他造的。杜和国民党政府勾结，包销江浙等六省的“航空奖券”，设立了大运公司，派金廷荪任总经理，刮了很大一笔钱，金就在大运公司所赚的钱里，提出四十五万美金在杜美路造了这幢房子送给杜。可是，这房子造好不久，抗战爆发，杜旋即去了香港，这房子他一天也没有住过。抗战胜利后，他把这房子卖给了外国人，得到六十万美金（一说八十万美金）。

除此之外，杜在杭州和莫干山都有房子，抗战期间，这两处房子的家具等等都散失了。胜利后，他又从上海运去大批贵重家具，我亲眼看到运往杭州去的有好几张席梦思床，所有夏天用的沙发套子，都是用台湾席做的。这两处别墅，他主要是用来接待国民党要人和各省军阀政客的，经常要有中西厨司和侍役等多人看守伺候。

（三）杜月笙的穷奢极侈

杜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可以举两件事来说明：

一是他在高桥所造的“杜氏宗祠”举行“落成典礼”。这件事，在一九三一年曾轰动全国，上海各报在那几天都有详细记载。单就我亲自接触到的情况来讲，就够惊人的。“落成典礼”的前几天，杜就关照我多预备些鸦片烟，我就预先熬了五千两土，并从各赌场里调来了二十八人专门帮我熬烟打泡。到了杜祠以后，我调十个人专门侍候来参加堂会的名角们抽烟，另外十几个人，则侍候一般的所谓贵宾。至于杜的徒子徒孙中的“老枪”们，则给他们膏子、泡子自己去烧，不用我们侍候。就这样，我们十几个人还是忙得不可开交。这三天中，我忙得来不及吃一顿好饭，也没有去看一出戏。结果，五千两鸦片膏第二天就抽光了，又赶熬三千两，这才勉强应付过去。

那三天中，每天要开七、八百桌酒席，调去的厨子有几十人，杜还调了对此道有经验的徒子徒孙四十多人专司筵席安排等事。帐房用了十四个人，都是从中汇、通商等和杜有关的银行里临时调用的。

杜为了引诱高桥一带的农民来参加这个“典礼”，特地预备了大批的面盆、毛巾等等。凡来送礼的，不论送多少，一律发给一个纪念章，凭此在三天内可以随便吃酒席、看戏，要吸鸦片的也可以供应，另外，每人还发一个面盆，一条毛巾，几瓶痧药水和一个灯笼，上面都印有“杜祠落成典礼”字样。这样，招引了不少农民去送礼参加。

杜自己有两艘船艇，一名“月宝”，一名“波涛”，在那几天，除这两艘外，还自招商局和其他轮船公司调来了好多艘轮船，专门载运贺客来回于上海、高桥之间。南市有一个流氓绅士叫毛子坚，特地向城隍庙借来五顶专供城隍乘坐的金顶大轿，把杜的祖宗牌位抬

送高桥。

另一件事是杜在春节发压岁钱。据我所知，每年到夏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通商银行的帐房田洪元就给他预备“红包”两千个，每个两块钱，这是给一般司机、侍役和巡捕等等的，另外，还预备好两百个金“四开”（金币），是给朋友、徒弟们带同前来拜年的小孩们的；还打了五十个金洋钿，这是专给干儿子、干孙子们的。除夕之夜，杜洗好澡，一切准备齐全了，第二天早晨起，就门庭若市，一批批拜年的人纷至沓来，各色人等都有，徒子徒孙们向杜下跪磕头，其余有鞠躬的，有打恭作揖的。大概坐汽车来的，每一汽车连保镖要打发三四个“红包”。发得最多的是巡捕，有时来了四五十人一大队，到门口高喊：“向杜先生恭禧来了！”于是就有人请他们在大门外站好，每人给一个“红包”，发毕，他们喊一声“谢谢杜先生”，就走了。还有一些小流氓地痞，新年也成群来拜年，也是每人给一个“红包”，大概不到年初三，两千个“红包”就发完了，总还要叫田洪元补送八百个来，才能应付得了。

杜自己也要出去拜年，第一处总是先到钧培里黄金荣处，第二处是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处，其他地方只投一个拜年名片。

粗粗一算，他过年的压岁钱每年就要花几万元。一年总共要花多少，可能他的帐房黄国栋清楚一些，我和万墨林也约略计算过，大概除掉他大笔酬应，向各省军阀等送礼不算，单单他公馆的开支，每年就不会少于二百万元。

（四）他的钱从哪里来

杜月笙这样乱花钱，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据我所知，第一是做鸦片生意。他在追随黄金荣的时代，就做了包销包运鸦片的生意，

开了土行。后来，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合开了“三鑫公司”(上海垄断性的大土行)，包销包运从国外和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军阀贩运到上海来的鸦片和其他毒品。他省军阀运来上海销售的毒品，获利很大，三鑫公司分到很多的钱，他们有的是三七拆，有的是四六拆。比如热河的汤玉麟，每年就有价值好几百万元的烟土运来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为销售。总的说来，三鑫公司每年的收入，总有几千万元。这些钱，是按大三股、中六股、小八股朋分的。大三股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中六股是顾嘉棠、金廷荪、叶焯山、芮庆荣等，小八股是杜、黄的几个大徒弟。除此之外，当然还要分一大部分给法租界公董局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分一部分给上海的官员们。余下的，还要打发他们的“蟹脚”徒子徒孙以及在帮的新闻记者等等。

其次是从开赌场来的钱。上海法租界有一个时期到处是赌场，先是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申吉里，以后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八一号，这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赌场，由杜门的大将顾嘉棠“抱台脚”，江肇铭等充当管事。这个赌场，我去过好几次，到里面去，吃的是西餐、中菜、点心，应有尽有，都不用花钱，还免费供应香烟、鸦片、水果和中西名酒。坐汽车去的，还给司机五元钱，每辆汽车免费加五加仑汽油。这些都是“钓饵”，让你舒舒服服去送钱。这里面赌的花样主要是轮盘、摊番和牌九，输赢很大，里面有现成的当铺，现钱输光了，可以当场把金饰、手表等典押，接着是从里面的衣服起一层层脱下来拿去押。我在那里，看到不少人是输得精光走掉的。赢了钱要走，可不那么容易，不赌钱去白吃当然也不行，里面都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人在盯着你。我是例外，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杜公馆的人，是去揩揩油的。

再其次是包揽诉讼、绑票勒索，这方面，我所知甚少，但肯定杜从这方面捞到的钱是很多的。

后来，他又成为通商银行的董事长，又自己开了中汇银行，这家银行的资本，主要就是从烟土上捞进的钱。还逐步向轮船航运业、面粉业、纱厂等方面伸展他的势力，成为工商界、金融界的“巨头”之一，收入就更多了。据我所知，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企业、工厂、单位的董事长、理事长名义的，就有五十六个，其余常务董事、董事、理事等等，更不计其数，一个董事长，平均至少要得一千元薪津或车马费之类，还有其他干股的红利等等收入，算算这笔帐，他每月就要收进一、二十万元。

他有时也做做“好事”。比如，夏天免费施送些“施德之痧药水”，还通过慈善团体施舍棺木。另外，他还在家门口给一些向他求告的人一点施舍，凡来求告的，都要经万墨林和我调查盘问属实，然后发给一个卡，凭卡可以到他指定的钱庄去拿几块钱，或者到菜市街协仁祥衣店去领一件棉袄裤或一条棉被。

杜月笙的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快。每次他要出去应酬，田洪元先把一叠庄票塞在他袋里。譬如他到沙逊房子华懋饭店吃饭，临走时就掏出几张庄票来分给侍役、电梯司机、看门巡丁等。一班卸任的官员临走时，总要到杜处辞行。杜一听到“某某局长看你”，就从抽屉里捡出庄票，袖着去会客，多则万元，少则三、五千元，看来人的声望、地位与和他的情谊的厚薄而定，杜对来人婉转其辞，作为程仪致送。

杜月笙有几个据点，连同亲友徒弟，一个月的出账的确不少。每年出账，除了家用靠五十几个董事长的薪津、车马费收入抵销外，加上其他各方面用途，达四十多万元。杜在风头上时，徒弟月支

五十元到一百元的不计其数。各路绯私营与公事上人，都要沾他的光。他个人除了烟、赌两大支出外，别方面的冤枉钱是不花的。他虽以银行家身份与大工商家搞在一起，但从来不买古董文物。除了别人孝敬他的古董，由账房清客代为估价外，古董商人做不着他的生意。其实别人晓得他是外行，没有好货送他。

（五）他的朋友和门徒、门客

杜月笙和蒋介石的关系很密切，不必说了，他和国民党的其他所谓“党国要人”，也都有来往，其中孔祥熙和他的关系很深，我记得孔还亲自到华格臬路来过。他和宋子文也有来往，孙科等人因为在上海开银行、做买卖、玩女人，也非和杜来往得到杜的保护不可。国民党中和杜关系最深的是戴笠，其次是杨虎、陈群，他们都是结拜弟兄。上海的党官中，吴开先和他关系最深，听说先是他的徒弟，后来退还门生帖改成为朋友，其余为潘公展等等，都和杜关系密切。各省军阀，也都和杜有勾结，大都是为了合伙做鸦片生意。

上海地方协会时期，史量才差不多每天到杜家，两人很谈得来。史遭暗杀，杜闻讯悲恸，伤心了好几天。黄炎培此时也常去杜处。

杜对张学良、于凤至夫妇来上海，待以上宾之礼。张那时沉湎毒品，面容滞黯，精神不振，杜慨然为之策划治疗，去其沉疴。所以张抵沪不久，就迁居福煦路一八一号，由专门医生为他净毒祛瘾。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慢慢地脱离苦海。事后杜对人说：“汉卿有决心。”

杜月笙在他的公馆中聘有七个秘书，洪宪六君子的魁首杨度就是其中之一。[1] 他的鸦片瘾很大，来了总要躺在杜的烟铺上由我

---

① 据庞京周讲，杨度、顾鳌都非杜的秘书，但被杜延为上宾。

给他烧烟，每月由杜送给一千元，他不是每天来，杜有要事和他商量才请他来。其他历年充任过他秘书的人中，有一个是做过被暗杀的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的第三科长的无锡人，姓名我忘了。还有一个做过正始中学校长的姓陈的。郭兰馨也是他的秘书，是抗战前后进杜门的。

杜原来是个文盲，后来也在家学学写字，但写得很不象样。他和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国人来往很密，主要靠张翼枢从中拉拢，此人一直做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凡是杜和法租界当局的往来，都由他经手，所以，他在杜公馆很吃得开。至于杜和法国人见面，则由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开珠宝店的李应生（广东人）当翻译。

他的门客中，除以上这些人外，还有一个“洪宪功臣”顾鳌，公馆中人都叫他顾师爷，他也不常到公馆来，每来总是大吸一顿鸦片，杜每月送他几百元。另外，章士钊也是为杜所尊敬的朋友，经常有来往。

陈世昌是杜的老头子，极少到华格臬路，就是去，也一到就走。胜利后，到过十八层楼几次。他的一个儿子曾在中汇银行当过襄理，后盘下一爿小钱庄，全部蚀光。陈世昌带了儿子，夜里赶到杜处，陈诉说经过情况，指着他儿子道：“这个小鬼，在中汇做做本来很好，忽然心血来潮，做起那断命钱庄来，蚀得一搭精光。”接着向杜告贷二万五千元。杜毫不介意地说：“明天一定如数送上。”哪里知道，陈的儿子荒唐不堪，五天后又把这笔钱如数搞光。于是再到杜处借两万元。从此断了这条路，陈不再上门，活活地被他儿子气死。这是胜利之后的事。

杜的手下，大概可以分为两帮，一帮是老的，为顾嘉棠、叶焯

山、金廷荪等，都不是他的徒弟，但可以称为他的下手，凡是烟赌、绑票、打架、暗杀等等，都是他们干的。除这些人外，还有芮庆荣、高鑫宝等，也是他的打手。高的儿子过继给杜作干儿子，和杜比较亲密。上海沦陷期间，杜有不少徒子徒孙当了汉奸，到胜利后，大部分他都通过戴笠的关系，为他们开脱汉奸罪名，只有少数人如谢葆生等，大概在沦陷期间没有和万墨林等联系好，胜利后就没有帮他们开脱。有一天，我和杜都在那间吸鸦片烟的帐房间内，杜正低着头在桌边学写字，谢葆生悄悄地走了进来，叫了声："杜先生"，下面的话还没有接上口，杜抬头看他一眼，冷冷地说："你现在发财了，来看我啥事体！"谢见苗头不对，就溜走了。敌伪期间，谢做过伪苏州警察局局长，很刮了些钱，在上海新闸路有房子，还开了新闸旅馆和卡德浴室、仙乐斯舞厅等。杜的另一帮是门生，是他搞政治经济活动的爪牙，如陆京士等。抗战开始后，陆变成杜最得宠的徒弟，又是国民党的骨干和黄色工会头子。还有骆清华、唐缵之等，则是杜把力量伸向工商界的触角。

在上海的名流和闻人中，和杜来往最密的有钱新之和黄任之，史量才被暗杀前，也是杜的好友。虞洽卿有时也到华格臬路来，主要是向杜掉换庄票，就是把他的远期支票或空头支票向杜掉近期票以应急。王晓籁则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每月给他一千六百元。另外，王担任鱼市场总经理和江苏长途汽车公司经理，都是杜为了照顾这位老朋友老搭档而安排的。汉奸中的所谓"三老"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也都是杜的密友。

（六）杜的为人与嗜好

杜月笙自从开设银行后，出言吐语，温文尔雅，对人不亢不卑，

竭力做出"高等华人"的样子。有人给他开玩笑，说他是从"冷气间"里出来的。他已臻于炉火纯青，由此可见。

在我们讲起来，杜会做人不自发了财开始。在他浪荡于金利源码头阶段，逢到大家吃饭没钱，只要他身边有两角小洋，就会全数掏出来给你。说道："你拿了去吃饭罢，有了钱来'救'我！"他自己有时就这样挨一夜饿。黄金荣与杜月笙作风不同，黄眼光短，手面不大。任何一个徒弟，若能送他百把块钱用用，他心里就觉得很舒服，对他另眼看待。

杜月笙平日不发病时脾气还好，对待左右，不打不骂。他与墨林和我三人，在没有外客时，大家海阔天空，乱拉乱扯。杜市面做得大，交友广阔，一天到晚，应酬极忙。有人说他烟铺上挂有一块水牌，开列着一天中该去应酬的人家。其实水牌是不挂的，每天由账房间把接到的请柬帖子排一排队，按着主人的地位与情面大小，分别轻重先后，列成一表，给杜过目后，通知司机、保镖等人，照单行事。

我亲见杜会客时，先是侧耳倾听对方的话，等到人家讲完，才沉思一下，启口缓缓说上几句。妙在要言不繁，语中肯綮，叫听者动容。有人说他福至心灵，其实这是他做人的一种方法。杜本来胸无点墨，自从当了五十六家行厂董事长后，对自己的姓名"杜镛"两字，早夕勤练，居然写得笔笔着实。过了一时，签名签得多了，格外熟练，倒也有飞舞动人之势。

一般来说，杜的身体是结实的，平时很少打针吃药。每逢有病，请一位姓陈的医生按脉。抗战期间，杜在四川，有病总是请中医看。有一次他突患腹痛，大约是盲肠炎，请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中医诊治，这医生不用开刀，对症下药，一服而愈。从此他格外相

信中医。杜住十八层楼时，孔祥熙有时来，见杜身子不爽，表示非常关心，说："要什么药我处都有。"

杜月笙对跳舞兴趣不大，比不得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等人，乐此不疲。记得张啸林第一次进舞厅跳舞，池子里地板非常滑，他身穿长袍，一不留心，摔了一跤，杜等见状大笑。杜常去的丽都花园，在那里请人家吃饭，应酬为多，若说跳舞，不是常有的事。

杜是票友，欢喜唱戏，尤喜唱演《黄鹤楼》中的赵云，《落马湖》里的黄天霸等角色。郑家木桥律和票房彩排时，他总要搭一脚，露露脸。逢到救济义演，有人去请他登台，他高兴时，也不推却。有一次，闸北的王彬彦为慈善义演请杜去帮忙，每票售至五十元。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花五十元钱看杜月笙唱戏，其实不贵。他唱的戏在内行看来，固然不大象样，但他行头漂亮，在台上那一副做工与唱腔，看了管叫你笑痛肚皮，真不止值五十元钱哩！"

杜死在香港，当时情况我不甚清楚。杜将死时，孟小冬为争取与杜的夫妇名位，要杜的儿女们叫她"麦达姆"（英语"妈妈"）。杜一断气，谁都不肯把钱掏出来，终于去电美国，汇来三十万美元。这样，每个未亡人分到五万美金。杜患的是中风，发病那天下午一时还与家人们谈话，到两点钟，突觉手脚麻木，张口不能言语，急召医生抢救，说是不中用了，聊尽人事，下了些药，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十六日去世。

我出入杜家二十多年，长期和杜朝夕相对，我所了解的杜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有不少记得不周全，也可能有记错的，希望过去深知杜的先生们多加指正。

杜月笙打进大达轮船公司经过

黄 永 言

杜月笙在旧上海社会中，烜赫不可一世，政治上被蒋介石封为陆军少将，经济上当了许多大中型企业的董事长、董事、理事之类，号称为实业界巨子，还用巧取豪夺的手段打进轮船航运业。

旧社会里形容杜的发迹，称为“三阳开泰”，指杨度、杨志雄、杨管北三个姓杨的人做了他的谋臣策士，替他扩充地盘。早在一九三一年，杨管北首先开路，替杜打进大达轮船公司，从此作为一个轮船业的资本家，在航运业中势力日渐扩张。

在此之前，各轮船、码头的职工中，早已有了帮会人物，如招商局、三北、宁绍等轮船公司的业务主任（一称事务长，俗称买办）沈华亭、张延龄、沈荣三、谢葆三等，都拜了“老头子”，甚至招商局的船长黄慕宗竟成了帮会中的“山主”。各码头工头更须借帮会身份来压制和剥削工人，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招商局五码头职工会（统辖金利源、杨家渡、中栈、北栈、华栈等五个码头）主席俞仙亭便是杜月笙的学生。但其时杜毕竟未取得轮船业资本家的身份，他便和杨管北相互利用，千方百计地打进轮船业。

（一）杨管北与杜月笙结识的由来。杨管北镇江人，曾在之江大学肄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伐军第二路军白崇禧部队到了上海，陈群任该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杨虎担任淞沪警备

司令。政治部交际股股长李公朴和杨管北是同乡、同学，他把杨吸引至交际股充当政工人员。一九二七年五月，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上海也组织了“经济绝交大同盟”，办公地点设在河南路天后宫内，陈群、杨虎和杜月笙都参加了这一组织。杨管北是陈群派遣的代表，年少翩翩，长于辞令，为杜所赏识，渐成为杜门上宾。

（二）杨管北楔入大达。航运业是个大行业，各轮船公司大多为股份有限公司。当时杜月笙和杨管北手上都没有一张轮船公司股票，若凭赤手空拳打进轮船公司，并不是容易事。而且要打进轮船业，以当时杜的身份来说，还须选择适当对象，必须是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公司，能够保证有可靠的利润。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便选中了大达轮船公司为对象。

大达轮船公司是南通张謇、张謇两兄弟创办的企业。张謇是清末的状元，在政界和社会上具有特殊地位，在南通兴办了大生纱厂和盐垦公司等企业，在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八年间，又先后创办了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天生港通靖轮步（轮步是张謇特定的名称，即趸船码头），并宣布南通为不通商口岸，垄断了上海至扬州之间的苏北航线（俗称小长江线）。大达轮船公司在一九〇八年初开办时，资本额仅规银二万三千五百三十七两，一九二〇年增为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自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二十年间，盈亏相抵，总计获致纯利一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三十四两。南通和扬州是苏北的两大吐纳口岸，江南江北，交流物资荟萃于此，另外还有如皋、靖江等县的许多港口，客货运输频繁。垄断了这条苏北航线，前途大有可为。大达公司从仅有一百吨轮船开始，发展到“大吉”、“大德”、“大庆”、“大和”等四艘江轮，总吨位在四千吨

以上，还管有“储元”、“储亨”等拖轮和木驳。其时人们谈到大达公司，称为内河轮船业中的巨擘。

杨管北为杜月笙选中了这一对象，恰巧那时大达公司也给予可乘之机。大达实权操在董事长张詧之手，经理是鲍心斋。一九二五年张謇去世，张氏势力开始衰退。一九二七年张詧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反攻龙潭，国民党指为反动分子，同时南通人检举他是土豪劣绅，经国民党政府通缉。张詧逃往大连，张氏势力更一落千丈。大达公司在张詧当权时代，利润虽极丰厚，但各股东每年只能分得双股息，却得不到红利。张氏势衰之后，各股东啧有烦言。经理鲍心斋经营守旧，坚持存款生息，把企业利润二十万两存放在南通得记钱庄。一九三〇年前后，得记倒闭，大达吃了倒账，股东情绪格外激动。一九三一年，“大吉”、“大德”两艘轮船又在航行途中失事焚毁，死亡船员和旅客一千多人，公司遂成为股东舆论内外夹攻之的。在此情形下，鲍心斋被迫辞职，董事会推举蒋嘏堂以常务董事名义代理董事长，推举张詧之孙张慰慈以董事名义代理经理。这两人都有鸦片嗜好，又同属张詧系统，因而不为股东所满意。这些内外矛盾，杨管北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杨的姨丈徐陶菴是大达公司的董事，又是张氏兄弟办实业的得力助手，担任南通面粉厂经理。

杨管北趁此机会，便想法替杜月笙和自己收购大达股票。他在上海滋丰钱庄购得了三千元的大达股票（一说这股票是滋丰钱庄送给杜月笙的），过户到杜名下。他自己得到徐陶菴赠与的股票若干，又托徐挹和（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徐陶菴之子）的朋友在南通收购到一部分，过户到自己以及他的几个年轻朋友的名下。于是，杜、杨等几个人就成为大达公司的股东。一九三二年，杨管北等几个年轻股东要求董事会改组大达公司。董事会开会结果，改推张

謇之子张孝若为董事长，蒋嘏堂仍任常务董事，聘沈燕谋为总经理，并请徐挹和担任董事。沈燕谋是张家的至亲(祖父沈敬夫与张詧为儿女亲家)，一身兼任大生一厂、副厂、三厂等三个厂的总经理，这次再兼大达总经理，在南通遥领这个美缺，实际仍由张慰慈代理。

杜月笙、杨管北等此番一无所得，心实不甘，于是彼此呼应，再接再厉，部署了另一次进攻。遂由杨管北等几个年轻股东打头阵，向上海市社会局呈控大达公司非法改选。局长吴醒亚在杜月笙指使下，指令大达公司召集股东大会，改组董事会，重新推举董事长和总经理等。杜月笙和杨管北的股份在大达公司里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杜利用官厅势力，又有年轻股东冲锋陷阵，一些老股东和董事都感到头痛，这才不得不选举杜、杨担任董事。一九三三年新董事会开会，计议改推张孝若为董事长，杜为总经理，杨为经理，徐挹和为副理。这一办法不为张孝若所同意。后经和张、杜两家都有交情的史量才从中斡旋，把张孝若和杜月笙的职位对调，让杜担任董事长，张担任总经理，杨管北和徐挹和的职务仍照原议，张孝若才勉强同意。从此，杜月笙和杨管北在轮船业中就抢占了地位。

在大达公司新董事会酝酿董事长和总经理人选的时候，杜等深恐还打不进大达，又串演了一出武戏，指使帮会中人戴步祥率领徒众抢做大达码头的工头，把原工头张金奎的徒众赶出码头之外。双方发生械斗，警察局长蔡劲军亲自带了大批便衣警察和武装警察到现场弹压，把大达码头封锁起来，断绝交通，逼得大达的轮船无法装卸货物，只好抛锚在码头旁边。其实情况并不十分严重，若非有意借题发挥，正不必如此。戴步祥的徒众自己用尖刀戳破了一层表皮，流了一点血，讹称大受创伤，连日聚啸威胁，不肯干休，

故意搞得大达船只无法开航。结果，张孝若只好请许沅（曾任上海交涉员）出来疏通（戴步祥是大中华旅馆的老板，许任董事长），由大达公司支付三千元赔偿戴步祥的损失，先行解决了码头事件。公司受了这番严重威胁，管理部门人选问题便急转直下，适史量才的调解，也就水到渠成，杜月笙和杨管北等走马上任，打进了大达公司。张金奎虽是帮会中人，但不是杜月笙的徒弟，只得让步。戴步祥在纠纷解决以后，由杨管北带路，向杜月笙磕头拜师。

（三）杜月笙打进后的公司情况。张孝若任总经理后，并不管公司事务，杨管北所作所为，张孝若一切听之任之。杜初进大达时，声明不支薪金，只支汽油费和夫马费，真相如何，外人无从知道。从此之后，大达一直不开股东会，也很少举行董事会，而且年复一年，连股息都不发了，股东们谁都不敢说个不字。杜月笙最初也声明不更动旧人，不添请新人，但上马第一炮，就聘杨志雄为大达监理，以酬杨的运筹帷幄之功。过了不久，又引进了许多曾经效劳的人员，如业务主任宣纯叔、仓库主任臧瑞卿、总稽查陈润青等等，都是杜自己的人。在杜月笙进入大达以后，企业有了些发展，这是由于在“大吉”和“大德”两艘轮船焚毁后，杜运用了他的势力，向银行借款，定制了一艘“新大达”，计一千六百吨，抵补并超过了原来损失的吨位。又由银行放款，在十六铺码头新建了一座钢骨水泥结构的巨型货栈。

大达轮船公司在张謇主持时，垄断了苏北航线，其他各轮船公司垂涎三尺，但无法与之竞争。到了张氏势衰，大达改组，航业界以为机会到了，从此开始了剧烈竞争。

（一）与大通仁记航业公司的竞争。大通仁记航业公司的最前身是盐贩杨在留所办的永济航业公司，其后改组为大通协记公司。

杨绰号叫“闹海金龙”，在帮会中的辈份高于杜月笙。一九二四年，杨与陆伯鸿、朱志尧合作，创设大通仁记航业公司。陆与朱都是天主教徒，陆被罗马教皇封为“袍剑爵士”；朱系海门主教。他们集有“公教进行会”的股本，在天主教会中有相当地位，具有另一路社会势力。大通公司船只行驶苏北线，当时得到张謇的特许，但两家公司的明争暗斗，经常不息。杜月笙、杨管北进入大达以后，两公司吨位不相上下，明争货源，暗放折扣，斗争较前更烈。大达公司有天生港通靖轮步和仓库，大通船只不得停靠，显然居于劣势。杨在田因杜月笙同系帮会中人，亲往杜门要求联合，并将大通股票三千元赠杜，其时恰有平安、达兴、三北等公司觊觎苏北航线，就构成大达和大通两公司联合对外的条件。经双方协定，组织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按照议定百分比，公摊运费收入，两公司便从此合力抵制其他竞航船只。

（二）与平安轮船公司的竞争。平安轮船公司的老板郑锡棠是英商公茂洋行的买办，除自备轮船之外，还接收了英商老公茂造船厂，一身而兼水上两种企业。大达的“大德”轮焚毁后，公茂收购了“大德”残骸，修复后改名“大通”，设立益祥轮船局，以平安公司副经理李耀庭兼益祥经理，并借口“大德”轮原驶苏北线，要求参加苏北线航行。郑锡棠利用杜月笙、杨管北初进大达人事动荡之际，设法拉拢当时管大达报关业务的杨庆邦，准备给以益祥副经理的名义，引为己用，并企图通过杨庆邦的关系，再拉拢苏北各埠的人员为益祥轮船局揽货拉客。杨管北知道了这消息，马上提升杨庆邦为大达公司的总务主任，以安其心。一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暗中把李耀庭收买过来。李反劝郑锡棠出售“大通”轮。郑内外失据，只好同意以“大通”轮作价十二万元出售。杨管北并未

以大达出面购进，而用袁仲符的名义并仍以益祥轮船局的牌号向航政局登记，请李耀庭为益祥经理，把船转租与大达大通办事处。这益祥轮船局是个“袋袋公司”，有牌号而无办公场所，也没有职工，只有一颗图章藏在李耀庭的衣袋内。购船价款是通过杜月笙的关系向交通银行借贷得来的。这笔借款一直等到抗战胜利币值低落的时候才开始归还。

（三）与达兴商轮公司、三北轮埠公司的竞争。早在杜月笙打进以前，英商祥茂洋行的轮船业务被大达公司挤垮，它的沿江洋棚人员（各轮船公司在通航口岸不设分支机构者，由当地人士设置洋棚，代轮船公司办理货客业务，收取佣金），失业了好多年，经常蠢蠢思动。大达公司改组以后，他们又活跃起来，联络达兴商轮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派船行驶苏北航线。三北老板虞洽卿是个烜赫一时的人物，把上海航业公会当作他个人的工具，达兴公司老板徐忠信与虞洽卿为宁波同乡，关系很密，失业的洋棚人员找到这两座靠山，满以为可以一举成功，乃集资帮助徐忠信向怡和洋行购买“昌和号”轮，改名“大兴”，和虞洽卿的“永嘉”轮同时申请航行苏北线。洋棚人员摇旗呐喊为两公司助威，还联络各处绅商人士请愿呼吁，要求开放苏北航线，声势相当浩大。但上海航政局长吴颙拒发两轮通航苏北线的证书。虞洽卿恼了火，向交通部长俞飞鹏大兴问罪之师。可是交通部指示下来：“在全国航业合作方案未公布前，各航线暂维现状，不得变更。”虞洽卿碰了个硬钉子。但交通部的命令同当时实际事实并不相符，各轮船变更航线的不乏成例，只有苏北航线有这种限制，而且苏北航线也只限制别家公司，对大达公司却是例外。如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租用益祥轮船局的“大通”轮，以及大达公司租用汉冶萍煤铁公司的“汉平”等轮和其他拖轮铁

驳，航政局都发了通航证书，虞认为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他和杜月笙的矛盾格外尖锐，仍和洋棚喽罗们继续进攻，不肯罢休。航政局和交通部不能自圆其说，迫不得已，乃于一九三四年召开整理航线委员会，暗示航业界自己磋商解决。在航业界的调停下，规定达兴公司的“大兴”轮行驶北沙线（自上海至海门、启东），三北公司的“永嘉”轮由大达大通联合办事处租用，行驶苏北线。杜、虞之间在航行苏北线问题上的斗争才告结束。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杜月笙敲华新轮船公司老板黄振东一记大竹杠的事。前面谈过，杨管北为结好于杜月笙，在五三惨案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大显身手，杜的这记竹杠也是通过杨管北敲来的。

当时轮船业中有个华新公司是黄振东的独资企业，置有“华懋”、“华达”两轮，每艘各七八千吨，一向与日本的轮船公司山下株式会社有勾搭。黄振东的父亲黄静泉在上海开设元和糖行，以经营爪哇糖起家。由于这一家庭渊源，黄振东自办的华新公司也经营糖业。他们运糖，原是租用荷商渣华公司的轮船运输的，鉴于利权外溢，黄振东后来也就自备轮船运糖。华新公司经营的糖是爪哇糖，也有日本糖。这种情况，由于杨管北和黄振东之弟是结拜兄弟，所以杨管北知道得很清楚，也就给杨管北有了做圈套的机会。

当时的抵制日货，从表面上看来是雷厉风行的，广东路悦来南货号老板龚芳来因贩卖日货，被戴高帽子，牵着游街，一班没有靠山的商人都吓破了胆。可是越是雷厉风行，杜月笙、陈群、杨虎等勾结起来敲竹杠的机会就越多。陈群和杨虎扮黑面，杜月笙扮白面，只要碰到了对象，总由杜月笙出来说情了结，大事化小，小事化

无，使被敲诈的对象感激不尽。黄振东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杨管北给黄振东布下天罗地网。有一次，“经济绝交大同盟”(俗称“抵货会”)在河南路天后宫召集商人开会，黄振东也是被召人之一。被召去的都要在会上表明心迹，黄振东表明：“从来没有贩运过日本糖，今后也决不贩运日本糖。”话刚说完，便有华新公司的职工当场检出账册单据，检举黄贩运日本糖，指出有的糖在栈房里，有的在启运途中，数目有好几千吨。证据确凿，黄振东被当场扣押，第二天清晨被解送南市的上海县政府。

情势越是制造得紧张，黄振东的家属也就格外恐慌。由于黄振东之弟和杨管北是结拜兄弟，就势所必然地走上杨管北这条门路。杨管北做好做歹地请“杜先生”出来营救，结果由黄振东捐助四十万元，杜月笙保释了黄振东。有了这四十万元，陈群、杨虎自然也不作声了。

在黄振东的心目中，杜月笙是天大的恩人，救了他的命，保全了他的财产。由于华新公司与日本山下株式会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黄振东更迫切需要杜月笙保护。于是就向杜月笙磕头拜师。当杜月笙在浦东建造杜氏家祠落成的时候，黄振东还特别以十万元的代价，在江南造船厂定制了一艘华贵的游艇，定名“月宝”，专供杜月笙游览浦江之用。

“抵货会”以抵货为名，行敲诈之实，曾引起上海舆论的指责。杜月笙和陈群、杨虎不得不找个替罪羊，粉饰清白。恰巧“抵货会”的尹志衡向叶鸿英敲了一笔竹杠，杨虎便以警备司令的名义，把他枪决，掩人耳目。

杜月笙出任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经过

黄 炳 权

解放以前，杜月笙不仅是上海帮会中的头号大亨，而且駸駸乎居于工商界领袖的地位。据说，杜在抗战前后，一身所任的官商合办、私营工商企业和各行业同业公会的职务，包括董事长、理事长、董事、理事、主席、经理等名义，不下一百五十多个。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之职，也是其中之一。杜月笙与上海面粉交易所素无渊源，何以能够凭空一跃而出任该交易所的理事长呢？此中情况，知者极少，笔者当年身与其事，爰略述经过如下。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的一个晚上，我的寓所突然来了六、七位朋友，其中有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经纪人杨镜澄、王忠良、张松春、顾竹年等。他们说面粉交易所最近受到了纱布价格猛涨的影响，有势力的业外巨户朱如山、钟可澄等大量买进各月期面粉，进行投机囤积，造成猛烈的涨风，各经纪人开始不服贴，大都做了空头，倘再涨上去，他们都将破产。言下神色惨淡，愁急万分。他们为此特来找我，筹商对付之策。当时我除了在南汇、川沙两县经营电气事业之外，并兼任该交易所仓库主任。对此，事先我也有所风闻，听了他们的话，马上联想到如果面粉交易所发生轧空停业，不但许多做空头的经纪人将要遭遇到破产倒闭的危险，即交易所本身也必然会

因此而赔贴巨金，动摇根本，我的兼职厚禄的饭碗，也颇有打碎之可能。因此，我就答应他们设法应付。

翌日，我到交易所作了一番调查，大体上掌握了近日市场买卖、成交数额和结余筹码等等情况。就去看杨管北(当时担任大达轮船公司和扬州面粉厂经理)，告以此事。杨问："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朱如山、钟可澄等常常出入杜公馆(杜月笙的家时称杜公馆，在今宁海西路，旧名华格臬路)，你是杜公馆的红客，倘能借重一言，用杜名义在市场上抛出面粉数十万包，迫使当天跌到停板牌价，以后再看洋麦苗头。洋麦涨则强行结价不致亏本，洋麦跌则顺势补空，还可赚钱。这样，既可以压平涨风，解救许多经纪人的危急，还可以支持交易所，使不为巨浪所倾覆。此是以毒攻毒之策，所难者在于杜月笙是否愿被我们所利用耳。"杨管北踌躇了一下，即说："此事大可做得。"乃同去杜月笙家，杨对杜当面讲了一下，杜说："你们如果捏得住，我也愿意帮忙。"此时，杨即对我说："杜先生已经答应帮忙了，你就放手去办吧！"这个以毒攻毒之策，就在这样草草不恭的三言两语中酝酿成熟。

次日早晨，我邀集了以上几位经纪人，临时委托他们在市场抛售各月期面粉约五十万包，并暗中放出是杜月笙来做空头的空气。不料，这五十万包的筹码，大部分仍被朱如山等吃进。市场牌价跌而复涨，远不能达到我所布置的跌到停板的目的。于是我不得不在同日下午，继续委托他们大量狂抛，大约又抛出了八十万包，才在对手们猝不及防、措手不及的形势下，迫将牌价跌到停板的预期愿望。记得当天市场牌价，由上午开盘每包三点四元许，下午跌到每包三点二元许而强迫停板。按照该交易所营业章程的规定，凡买卖每千包面粉，必须于明天开盘前缴纳保证金二百元(即每包二角)，以

后市价涨跌达到一角时，又须对亏损的买方或卖方追收保证金每千包一百元，称为追证金。倘因市场牌价出现非常局面，在一天内的涨跌程度，突然达到二角时，必须立即停止拍板（即停板），待向买方或卖方追齐所有差价的保证金后，再行开拍。一天不追齐，一天不开拍。但停板也有一定期限，记得是以三天为限，倘到限仍未追齐保证金时，则除对未缴齐追证金的经纪人，予以必要的紧急处理外，市场必须恢复营业，照常开拍。我利用这一规定，一定要迫使跌到停板的牌价。当晚，我和杨管北又去杜公馆，把抛空一百三十万包面粉迫使市场停板等情，向杜作了说明，杜不加可否。当时该交易所行政当局常务理事诸广成、徐咏棠两人得知市场发生非常局面，惊悸万分，连夜在东亚旅馆开了一间房间，要我前去讲个明白。我就把此事发生原因，以及杜月笙为了帮助交易所打击投机，压平涨风，并解救许多经纪人的危险，出来大量抛空的经过，和盘托出。又把今后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可能发生的后果，对他们详为解释，诸、徐两人始化忧为喜而别。

一夜无话，第二天我一早到所，急看芝加哥美国小麦电报，每蒲式耳（蒲式耳是美国小麦的单位容器，每蒲重量是六十磅）又猛涨美金五分。面粉交易所的市场牌价，一般是跟踪洋麦之涨跌而涨跌的。今洋麦大涨，所方即借口没有追齐保证金而不开拍。讵料洋麦连涨三天，势不可遏。我再四筹维，这一抛空计划，除了强制结价，全部了结之外，别无良策。因而我于停板第三天又跑到杜公馆，对杜说明紧急情况，即拿了杜的一封介绍信，立即跑到江湾社会局求见局长吴醒亚。时吴不在，由该局某秘书接见。该秘书看了杜月笙的介绍信，不敢怠慢，问我怎样办理？我说请局给我一张布告。又问怎样措词？我即提出了措词的建议，大意是："查面粉

攸关民食，不许任何人投机操纵。今据密报，有业外人在上海面粉交易所内，大量买进各月期面粉，从事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应着该交易所立即彻查具报。”该秘书认为颇有理由，马上照办。我拿到这张布告，赶回交易所贴在市场。这样，借彻查为名的停板，就可以无限期的停下去而成为合法了。

过了二、三天，杨管北告诉我，朱如山、钟可澄等连日跑到杜公馆，要求杜先生调解这一纠纷，杜要我去谈一谈。我遂同杨管北又去杜家，适朱、钟两人亦来，杜对朱、钟说：“他们来了，你们去商量好了。”我就提出了按照停板时的牌价，全部结价了结的办法。朱、钟两人在语言之间似乎识破了并不是杜月笙真正抛空的秘密，因而态度强硬，拒不接受，并说：“你们交易所违法，我们要控诉。”我则报之一笑，不加理睬。又僵持了二、三天，又经过了数度争吵，最后朱、钟两人在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同意照停板牌价酌加若干，全部结价了结。因此，面粉交易所这一空前的轩然大波，终于在我们以毒攻毒的策划下，悄悄地得到满意的解决。该所许多做空头的经纪人，因此未受损失，咸以为杜月笙确能解救他们的危险而表示感激。

在此二、三年前，杨管北和卞筱卿（南京大同面粉厂经理）等所组织的内地面粉厂同业公会，请出了杜月笙担任该公会的主席，曾经几度向面粉交易所提出“准许内地面粉厂加入市场标准买卖，并以本厂栈单作为交割，与上海、无锡各面粉厂一视同仁”的要求。这因为该交易所市场买卖，历来以无锡茂新厂的绿兵船商标面粉，作为标准面粉。上海和无锡其他各厂的面粉，除上海阜丰厂的红蓝车粉与绿兵船粉相并之外，都要按照绿兵船标准予以贬值。贬值多少，由交易所理事会会同经纪人公会的代表，组成评议会，每隔一定时期，作一次评定，独内地面粉厂所产面粉，不准参加进去。所

以加入标准的各厂都可用本厂的栈单，不管空头与否，作为月底现货交割，而内地面粉厂必须事前把现货运沪，堆存于交易所所指定的仓库，再以仓库栈单交割。在交易方面前者确是占了许多便宜，后者常不服气。因此长期以来，两者之间在面粉交易所市场标准买卖和栈单交割方面，早已存在着排挤和反排挤的明争暗斗。终因上海和无锡各厂的势力，远比内地各厂为大，而且无锡茂新、上海福新两厂的荣宗敬、王禹卿与上海阜丰厂的宁钰亭（后为吕玉荪，最后为孙仲立）等，又都任该交易所的理事，一经他们反对，该所理事会就无法主持公道而接受内地面粉厂同业公会的要求。杜月笙、杨管北、卞筱卿等在这一方面自知力量不敌，只得无可如何而忍气吞声。但他们已经抱有等待时机，踏进交易所理事会和荣宗敬、王禹卿等争一日之短长的愿望。通过这一事件，杜、杨、卞等认为参加该交易所理事会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们更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岂肯错过这一难得的机会。

过了若干天，杨管北把此意图和我几度密商，并要我从中策划，以期达到目的。而我对此问题也有自己的打算。一则我对该所常务理事诸广成一向大权在握，独断独行，而且事事听命于荣宗敬、王禹卿两人的利己主张，常使交易所损失巨金，极为不满。因想乘此机会借杜的势力来制约他们，至少不让他们再掌实权，这对交易所是有利的。二则为自己着想，倘能因我斡旋而玉成其事，那末我与杜月笙的关系又可接近一步，这对我将来在工商界方面的发展也是大有帮助的。所以当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杨管北的要求。我知道同年八月，该交易所将要召开股东大会，改选理事和监察人。我也知道该交易所的股权，约有百分之八十直接或间接地操于各经纪人之手。此时许多经纪人正在感激杜月笙、杨管北帮了他

们的大忙而心怀拥戴。我就抓住这些有利因素，在暗地里做了一番周密的工作，总算如愿以偿。犹忆杨管北有一次和我密商时，对我说："你知道杜先生的脾气吗？"我问："什么脾气？"杨曰："杜先生要末不踏进来，如果踏了进来，他是不愿居于人下的。"我就意会到杨的暗示，即说："我有办法使王一亭落选，让杜先生当理事长。"杨听我言，即作会心的一笑，点了一下头。原来，在面粉交易所理事会内向有实力和绅士两派。实力派依靠面粉厂为后台，以荣宗敬、王禹卿为首，绅士派借助社会关系的声势，是王一亭、顾馨一等人。两派之间互为犄角，互相利用，因无巨大矛盾，尚能相安无事，因此王一亭能够联任该交易所理事长达十余年之久。杜月笙对实力派倒无所谓，但对绅士派不免多少有些忌嫉。因为他们出道和成名，都比杜月笙早，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杜对他们不得不貌为温厚，故执谦恭。而王一亭和顾馨一之间又有所区别，所以我料到杜之所忌者，在王而不在顾。我又知道王一亭在面粉交易所内不得人心，因为他多年来只拿钱、不管事，而且一贯地慷交易所之慨，以济其无穷"善举"之用。再则王的次子王叔贤曩年租借交易所的一所大仓库，开设竟成造纸厂，积欠大量房租，使王一亭左右为难，因而在历届股东会上总有不少人在反对他，历届当选理事的票数也是少得可怜的。我就针对了王的弱点，秘密地向一批较为熟悉的经纪人，做了一番捧杜抑王的宣传笼络工作，确切地掌握了过半数的股权。股东大会改选结果，王一亭果然落选。杜月笙、杨管北、胡筠庄（杜、杨介绍的）三人，当选为理事，卞筱卿当选为监察人。理事互选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时，杜又当选为理事长，杨亦当选为常务理事。不久该交易所内部机构改组，我也被理事会提升为总务科长。

杜月笙还有一种欲擒故纵、欲取姑予的虚伪态度。当他接到

当选理事长的公函后，故意推辞不就，并将原函退回。该交易所又推派了顾馨一、诸广成、徐咏棠三理事为代表，并嘱我陪同前往敦促就职。杜月笙初仍佯表推辞，经三代表恳切力劝，才允担任。我还记得当时杜曾讲过这样几句话："我原来是强盗扮的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是曲蟮（即蚯蚓）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些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杜当场还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不到所办公，二不拿薪水。"后来事实证明，一不到所办公确是做到的，至于二不拿薪水，只是沽名钓誉的一种骗人的巧妙手段而已。

杜月笙与恒社*

郭 兰 馨

杜月笙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金融、工商界等方面的人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恒社是杜门徒弟、学生的一个组织，杜月笙是理事长。

恒社创立于一九三二年①。它是一个帮会的组织，但披上民众社团的外衣。它的组织规程所标示的宗旨，用了很体面的二十个字，即“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其实际如何，自有定论，不烦剖析。社的组织，规定由社员大会选举理监事若干人，推选总干事一人，副总干事一至二人，处理日常社务；下设总务、组织、财务、京剧、交际、职业介绍等组。这仅是表面，实际恒社虽有理监事会，理监事的产生虽具有选举手续，但人选一向由杜月笙事前指定，只在社员大会宣读名单，大家照例举手通过而已。社的权力既不在社员大会，也不在理事会，而在杜月笙个人。一切社务总是先由他作出决定，然后通过理事会或社员大会，作为大家的决定。恒社是杜月笙御用的组织工具。当时的帮会组织披上社团外衣公开活动的，它是较早的一个。由于它树立了以收徒弟、学

* 此文曾于1964年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上发表。此次重刊，在少数文字上作了删改，并将庞京周所写《对〈杜月笙与恒社〉一文的订正与补充》中的有关内容，列入脚注。

① 据唐世昌回忆，恒社正式成立于一九三四年——。编者注

生，组织社团的榜样，其他帮会首要人物先后跟进，在上海便出现了黄金荣的荣社，杨虎的兴中学会，金廷荪的铭社，王晓籁的升社，郑子良的侠义社等等。荣社、兴中学会等的大头儿因与恒社的杜月笙原来就有密切关系，社员类型也相似，所以虽是各搞一套，依旧彼此气息相通。有时为了各自利害，也不免发生矛盾、冲突。

恒社的组成是与杜月笙个人当时的声势和地位相适应的。在一九三〇年前后，杜月笙已经从局限于法租界贩鸦片、开赌台、当白相人、讲斤头的流氓生活阶段，逐渐进一步露出头角，向更复杂的形式发展。他利用了租界里的紊乱局面，上海社会里的复杂的人事关系，国民党政治力量不能达到租界的矛盾和其它对他有利的条件，与社会各阶层多方面接触，从而沽名钓誉，培养力量，开始办理“慈善”事业。上海那时有许多慈善家，其中真正肯花钱的却以不愿露脸出名的居多。有了钱的总怕麻烦，正如老话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他们既怕绑票，又怕敲诈。租界时代的黑暗、罪恶人人知道，当时谁也不愿花了钱反找苦吃。正由于他们普遍存在着这样心理，就给另一类的所谓“慈善家”留下了投机发家的门径，名利兼收。杜月笙当时也是适合走这条门径的人物之一。他没肯放过机缘，参加了上海出头露面的慈善家行列，踏进了仁济善堂、中国红十字会等等机构。一九三一年国内的水灾严重，地区广，他便在各省水赈会、江苏水灾义赈会里活动了一番，因此博得了声誉上的转变。当年政界的许世英、王正廷、关炯之等，还有工商界的虞洽卿、闻兰亭、王晓籁、袁履登、王一亭、黄涵之等，都参加慈善事业，享有声望，杜月笙的姓名从此也就和这些人士联系起来了，鸣谢“大善士杜月笙”的广告不时在报纸上大幅地出现。这是当时杜月笙造成声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外，这时另有一种特殊环境出现，也给他的活动凑上机会。这就是劳资纠纷多，工潮不时汹涌，需要有人调解。在一九三一年大水灾之后不久，一九三二年又爆发一二八淞沪战役，上海工商业元气大伤，很多工厂不能维持生产，引起了劳资纠纷，斗争甚为尖锐。主管此事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的人员都感棘手，无法调停。于是其中一向走惯杜月笙门路的人们，便运用“奇峰旁出、曲径同归”的办法，邀请杜出来劝解。杜月笙凭着什么本领、什么办法来解决当时党政机关无从解决的纠纷呢？说穿了并不希奇，那就是把双方争执点所在的解散费的差额，由他暂时垫款付给劳方，使双方息争。例如某厂要关门，资方只肯出两个月的解散费，而劳方坚持非三个月不可，他从中调解，分别肯定双方的意见，一方面向资方表示，说是工厂既到了关门阶段，当然有不得已的困难，既肯出两个月的解散费，就出两个月好了，同时他向劳方表示，说是结合生活和失业情况而论，要求三个月也合理的，那相差的一个月，毋庸向资方磋商，由他来支付便了。如此，双方就立即结算出由他支付的解散费数字，他便通知自己的帐房间如数开出支票照付，了结纠纷。劳资双方看到他这样做法，无论如何，总不好意思不表感谢，于是报上大幅鸣谢杜月笙的启事广告也便刊出来了。杜月笙审时度势，认为这样做去决不至于赔钱贴本，而以后事实证明，的确也是如此。实在具有资力的工厂资方，想到自己的关厂纠纷由第三者拿钱出来了结，毕竟情理上讲不过去，同时目前这一个厂虽然关掉，自己却还得在上海滩工商界里混下去，杜月笙更不是可轻易得罪的人，倒不如趁此机会拉拢一番，于是他们就将杜支付的那一部分解散费全部归还，而且还附送一份礼物。诚然，也有真正归还不起垫款的个别事例，但这并不违反杜的心愿，而且也不是他的损

失。他的名气大了，社会关系更多了，财路也更宽阔了。

杜月笙所调解的劳资纠纷，浪潮最大也最突出的有两件，其一是一九三〇年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职工要求改善生活的工潮，另一件是邮务工人要求调整工资事件。关于前一件事，当时双方谈判出现僵局，势趋极端，全体职工准备总罢工，国民党政府选派要员调停无效。杜月笙适于前一年由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推选，担任了法公董局华董，他借此身份，出面调解。他一面口头劝导工人，同时垫了些款抑制了一部分工人情绪，一面又向法租界当局保证避免风潮扩大和造成事故，这样就把形势和缓下来。通过这件事，他抬高了自己在法租界当局眼中的地位，也博得社会上的好感。邮政工潮的双方和一般劳资纠纷不同，一方是政府的机构邮政局，一方是邮务机关的员工。政府交通部门的最高行政人员交通部长亲临上海谈判不成，而邮务工会邀请局外人杜月笙从中调解，却成立了协议，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突出的事件，对杜月笙造成更大的声势，起了不小的帮助作用。从此以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人把他抬得更高。虽然也有个别人因嫉妒杜的势力膨胀而生反感，但毕竟莫之奈何。杜月笙何以能在邮政局和邮务工会代表之间调解纠纷，取得成就呢？说明了渊源，并不奇特，因为那时邮务工会领导人陆京士等，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里外配合，问题当然较易解决。

在杜月笙声势日张的形势下，进门拜他做老头子的就增多起来，同时在流品方面也广泛和复杂起来，不局限于原来的某些阶层。这时他对吸收门人开始有所选择，不愿一味滥收。于是国民党分子、政府机关人员、工商界、新闻界、电影戏剧界都有人进门，希望以他为靠山，他也需要这些人替他摇旗呐喊和图谋策划，做培养势力的骨干。有了人，便需要有适应形势的组织，于是恒社便出现了。

从小就没读过书的杜月笙，在旧社会里体验了种种生活，受过许多考验，也积累了些见识，到了一九三二年光景，他显然注意到外貌上和作风上的改变，感到对人须谦虚有礼一些。于是打扮起来，短衫裤外面，加穿了长衫、马褂。过去一班同道弟兄，短裤、拖鞋、拷绸衫，粗声暴气，阔步乱闯的人们看到他变了样子，也同样长袍马褂，装做上流人物模样。但他们功夫不到，每逢得意忘形之际，仍会露出本相来，跟杜月笙多年的小阿荣（芮庆荣）有时谈到这点改变，禁不住会自己发笑。杜月笙自己表示，要不是他以身作则，这班朋友是不会接受约束的，所以即使是大热天，在会客室内他自己从不脱长衫。

杜月笙明白了过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交相利用的关系，因而巧于运用。他能按照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要求，适当应付，使有所求而来的，有所得而去。他还具有一特点，便是遇事能耐心深思熟虑，碰到重要性、关键性的事，必然审慎考虑到各方面，还不惜向人讨教。在同类的人物中，他在这方面得力独多。中年以后，可以阅读普通书报，但提笔只会签名。

一九三二年前后这一段时间里，杜月笙的智囊人物有陈群、刘春圃等，后来钱新之成为他关系最密切的决策者。同时经常和他接触的有黄金荣、张啸林、刘志陆、金廷荪、王晓籁和法租界捕房督察探目等，秘书有杨度、邱方柏①、王幼棠，随侍护卫有马祥生、叶

① 据庞京周（杜月笙的朋友，医生，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参议员）撰文订正："杨度（晳子）从来没有当过杜月笙的秘书，他和顾鳌（巨六）是洪宪六君子中的人物，被杜延为上宾。有一个时期顾鳌常到杜宅讲掌故，手中还托着水烟袋。杨度没有去几次就病倒了，杜接济过他医药家用，我亲见杨的女婿郭某为杨病事去过杜宅。杜月笙自命善于广交朋友，不管掌权红人、失意政客、知名文人、落魄军官，他一律招待，有的还特意资助而不提什么要求。例如一九三一年

焯山、高鑫宝、芮庆荣、顾嘉棠等。那时的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二六六号经常车水马龙,宾客云集,门徒雨注,俨然大亨门第。

恒社的名字是陈群取的,他那时正在替杜月笙办正始中学,引据"自强不息如日月之有恒"的典故,以"恒"字名社,还代笔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恒社月刊》创刊号。

恒社的目的和作用,是在加强杜门人士的联系,供给经常聚会的地方,以便于集中号召指挥。最初设在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宅的后面,采用俱乐部形式,活动偏重在京剧票房,也有赌博设备。至于社务中心和重要活动的协商决策,仍在前面杜月笙家里进行。恒社成员在社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在他们对社务活动的表现,而决定于杜月笙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因为有许多社员虽然同样拜他做老头子,实际和他没有经常接触,对他不发生密切利害关系,他也认识不了许多。只有核心人员,替他效力有过成绩,经他认为满意的、得力的,经常在他公馆进出的,才能获得他的信任和重视,而这些人并不就是在社里频频出面活动的。同时杜月笙对人的重视还有时间性,即使某些人和他具有较重的利害关系,不时接触,某一阶段他的心目中有重要性,但换一阶段,重要性便失掉了,于是亲疏与信任也就分档了。在杜门中有些人一度红得发紫,后来由紫变黑,甚至不许进门,结束了往日的关系。

恒社有社徽,圆形,周围十九颗星,绕成花边,中间一个大笙,

李济深、陈铭枢路过上海,杜曾在今延安中路卢湾区产科医院院址搭台唱戏,盛会欢迎。抗战时在香港,他供给吴佩孚的秘书杨云史人参、药品和家用,死后为其营葬。还招待过苏州耆宿张一麐等。类此之事很多。杜曾在闲谈中对我说:'人总是爱捧的,因而也同情捧人的人,我对于这些衰病失意老人何尝有什么报偿的希望,但是将来得到的将比我目前很方便地付出去的东西多得多。'邱方柏,实名邱访陌,福建人,是刘志陆、陈群荐给杜的。"

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颗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数，标志着众星拱月。恒社第一届理事为陆京士、朱学范、唐世昌、徐懋棠、洪雁宾、张颂椒、唐缵之、朱东山、许也夫、王刚、江肇铭等十九人。其中江肇铭系杜开山门第一个徒弟，人们俗呼“江小弟”，一个赌手。杜爱赌博，江是他在赌场中所吸收的。

在一九三二年恒社成立初期，其主要社员的分布情况约略如下：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方面，有陈君毅、汪曼云、林美衍、黄香谷、黄造雄等；在市政府社会局方面，有科长张秉辉、许也夫及主任王刚等；新闻界有唐世昌、赵君豪、严服周等；邮务工会有陆京士、朱学范、傅德卫、张克昌等；电影界有张石川、任矜苹等；鱼市场有唐缵之、朱东山等；法商电车公司有邵子英等；京剧界有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等；交通业有周祥生等。除上述之外，其他银行、企业、纳税华人会等机构中也都有人，巡捕房里还有若干包探、巡捕，有的公开，有的暗藏，各尽其通风联系、相互利用的能事。一般社员更属流品复杂，广布在上海社会各阶层。

这许多人参加恒社，并非在同一时期，而是或先或后的，早在杜月笙出道之后，迟至他死亡之前，不断陆续被吸收入社。凡属社员都投帖拜杜做老头子，但并不是所有投帖拜门的都参加恒社。也有秘密进入杜门，始终没有公开的，记得立法委员简贯三便是不公开者之一。孔祥熙公馆中有一批拜门的人，为了在本单位工作的便利，要求不暴露身份，也就没有公开过。如果要把恒社社员分档的话，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初期的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听、巡捕、赌徒之类，为数不多；(二)当地富户殷商的子弟，他们在租界里怕绑票，怕受欺侮，有时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门路，送重礼，进了杜门就有了保障，这类人人数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会上有

些活动能力，也有活动门路，但也有阻碍，未能畅所欲为，难以贯彻个人的志愿和企图，认定杜月笙的社会地位和势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这类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当时上海滩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损人利己，张牙舞爪，还有些人虽然不一定想吃别人，但也提心吊胆防着被人吃掉。这许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钻门路，杜月笙既经成为此时此地最响亮的吃得开的人物，当然也就成为具备靠山条件的对象了。

入杜门也得找关系、打交道。先要找和杜有关系、有交情的人向杜说妥，次一步还得托在杜公馆得杜信任的人物关照安排。那时杜宅事务管理万墨林，从高桥乡下的小铜匠、进杜公馆做小当差开始，渐渐通过小心伺候杜月笙而取得信任，熟悉进门拜老头子的手续。早期进杜门拜老头子，万是一关，人们虽然打通了上一层的关系，仍须铺好他这条路。当然，有钱可使鬼推磨，但对他总不免要摸摸清楚，适当安排。自八一三抗战时起，杜月笙离开上海，进门办法才简化了些，初步手续改归恒社办理，再转向杜公馆。因为这时万墨林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由吴开先经手要到一张蒋介石的照片，大为得意，后来还活动到了“国大代表”，对进杜门的事，不大愿意再插手过问，一心想走杜月笙的老路往上爬。

入门当徒弟的程序是：先用红帖子开明自己的祖先三代，并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的字句，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然后遵照约定日期备齐礼物，持往杜家行礼。最初要向杜跪拜，后来改为三鞠躬，如有多人同时拜门，可集体鞠躬。行礼后摄影，此外别无节目。由恒社理事会经办手续时期，凡申请入社，由社员二人介绍，填具入社申请书，经理事会通过后，报告理事长核准，定期办理手续，然后由常务理事、总干事等陪同到杜宅行礼。入门应呈送礼物，除自

愿另行致送者外，一般改作入社费缴纳。

社里的活动，在初期经常有春秋两季的社员大会，彩排，聚餐，每年七月十五日为杜月笙祝寿送礼。杜家生了小孩，同样须送礼祝贺。举行理事会自属应有文章。集会时期中日常有赌局；大的小的都有，各找对象凑局，由厨房供饭。也有社员叫局带了妓女一同前来，花天酒地，纵情享乐。每逢新年，万墨林利用恒社大赌几天，借此抽头，捞进一笔外快。不少嗜赌的人们来过瘾，取利市，保证不出其他赌场的毛病。后来，渐渐有人觉得这样地放肆，外面沸沸扬扬，口碑太坏，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就取消在社吃饭、叫局和赌博，只有票房活动和图书设备，只能饮茶、吃点心。

恒社有出版物《恒社月刊》，内容除一般社务报告外，有照片、杂文，有几次刊出旅行游记。它出到十五期以后未能按期出版，在抗战后，改为不定期刊物，有集会时临时编印特刊。恒社前期的活动在月刊中有一些一般记载，但凡秘密和有关重要的事，在刊物中却找不着眉目。这类材料只留藏在杜公馆的核心经办人物的脑海中。杜月笙派徒弟出外干事，并不由恒社理事会转手，而是直接并秘密地指派和发命令，只有当事的知道内容，而且要保密。能多这样惟命是从替杜奔走的徒弟和朋友，才是当时公馆里的红人。当然他们经办的事也不无半公开的例子，如一九三三年宋子文去美国接洽棉麦借款、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后回到上海之前，曾有电报给杜，请他在码头照料，防止别人暗杀，于是杜就半公开地动员了可以动员的力量，包括恒社的部分人员，前去码头戒备，还派了军乐队奏乐欢迎。杜月笙和宋建立交情，搞上关系，比孔祥熙早。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时，杜月笙担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对国民党军队抗敌御侮，大力支持。恒社中人，由于杜的关系，一部分

参加了运输、慰问、医药、征募、救济等工作，其中也有趁便找临时工作的关系。另有一部分人参加了戴笠的军统组织。杜、戴之间早就有关系，这时组成了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共有五个支队，各设指挥部，每部设指挥一人，其第二、三支队指挥陆京士等都是杜门恒社分子。每一支队下有三个大队，大队下再分中队。这些大队、中队长一部分是恒社分子，其他是接近他们的学生或工人。他们胡乱地搞了一阵，不但缺乏训练，枪支不全，而且也无军事经验，于是只有一个多月，到了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就一哄而散。

上海沦陷之日，租界成了“孤岛”，杜月笙于是月二十七日同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和钱新之、王晓籁等同乘法国兵舰秘密离沪赴港。

杜走以后，恒社在上海失去重心，社员开始星散，除一部分留在上海以外，一部分到内地，有的到别的码头去了。恒社的地址这时早由杜公馆后面搬到马浪路（今马当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以北的一幢楼房中去，社务无形停顿。到太平洋战争发生，这个机构也保不住，里面的东西星散，但留沪的社员们还保留个别的活动和接触。

杜月笙到香港以后，在告罗士打酒店七〇六号租了一个长房间，接待宾客访问，并派其秘书徐慕邢、翁左青先后担任留守工作，收发文件，对外联络。同时，在九龙柯士甸道租了一一〇号的一幢房子，安顿好他的家眷，开始做起寓公。杜月笙到香港不久，曾和钱新之、王晓籁坐飞机去过几次汉口，那时南京弃守不久，国民党政府的重心在武汉。蒋介石为了安抚杜月笙之类的流亡人物，特扩大中央赈济委员会，派杜为常务委员，并叫他负责第九救济区的事务。这个救济区，包括粤、桂、闽三省，总办事处设在香港，以便

利杜在港的活动。① 同时，杜月笙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那时，该会会长王正廷任驻美大使，所有关于海外侨胞的捐献款项物资，就由杜以副会长名义和常务理事王晓籁、林康侯等处理。这样，杜月笙在表面上就以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两个名义在香港活动，实际上则成为蒋介石和上海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转接枢纽，杜在其中担当了中介、策应工作。当时在上海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都利用杜月笙的关系作为掩护，有关文件也由杜处转给国民党政府，如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等，都以杜在上海的机关和在香港的寓所作为他们的联络站。当时在上海给他们做掩护联络工作的有万墨林、朱文德、张克昌、黄国栋及其他一部分恒社分子。后来，有一部分恒社分子如汪曼云、张克昌等投敌做了汉奸，而原由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仍由陆京士等从中策划操纵，不时秘密来往于港渝之间，在杜的指挥下活动。

一九三九年春天，吴开先从重庆到了香港，与杜月笙接洽，因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在上海已无法活动，决定改头换面，另成立一个机构来统一领导上海各方面的活动，这个机构取名为“上海统一委员会”。当时决定的负责人选是：主任委员杜月笙，常务委员俞鸿钧、蒋伯诚、戴笠、吴开先（兼书记长）。在这个委员会中，有杜月笙的门人陆京士、吴绍澍等，在上海参加工作的恒社分子有唐世昌、任矜苹等多人。原在上海商会活动的骆清华则在香港参加了恒社，由陆

① 据庞京周补充：“当许世英把赈济委员会常委的简任令转给杜时，杜表示辞不就职，曾说‘这样一来将会困在一个简任官上，而其他作用尽失’。其实他口头上虽然‘薄官’，心底里却是‘尊官’的。例如他住在茂名公寓七〇五室时，和陆京士通电话往往称陆为‘陆司长’，无非为了陆同军统勾得很紧，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蒋介石信任。这件事曾引起朋友们的讪笑，老弟兄的腹非，以及恒社分子中未能红得发紫的人的妒嫉。”

京士推引，拜杜为老头子，因此成为恒社的中坚分子之一。我也是恒社分子，那时在香港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担任主任秘书。①

从一九三八年起，恒社社员除留在上海的一部分以外，其他行踪不定，香港是杜月笙的所在地，到港的社员较多时，往往举行聚餐摄影，以保持联系。每年杜月笙的生日，更是恒社分子聚集的机会，很多人从重庆、桂林、韶关等地赶来为他祝寿。他们来港，当然还负有请示报告的任务。恒社那时在香港有分社的名义，却没有社址，也没有杜所指定的负责人，就以九龙的杜公馆作为联络和集合点。

香港英国当局对杜月笙的活动不是没有防范的。因此，杜不能象在上海那样张牙舞爪。他那时在港收过一批门徒，如邱唐、唐莱等，但没有公开张扬。同时，在香港的帮会如致公堂、三点会中人物，和杜月笙发生了联络关系，但也有一定的矛盾。

上海、武汉和广州沦陷后，恒社分子聚集到后方的日益增加，一九三九年前后，杜月笙为了赈济委员会事务和汉奸陶希圣、高宗武的事件，曾几次到过重庆。于是重庆成立了恒社的分社，地址在临江路十九号。四川是袍哥之乡，帮会力量很大，那时除杜月笙外，各地的帮会头子如汉口的杨庆山、上海的杨虎等都到了重庆，戴笠企图联络各方帮会中人，于是成立了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的前身“人民行动委员会”，派军统分子徐为彬、金玉坡担任联络工作，地址在戴家巷。杜月笙参加了上层分子的联络，并先后派恒社分子于松乔与此中人联络，开座谈会，举行聚餐，对重庆的黑社会进行控制。

---

① 据庞京周补充：“郭兰馨是在红十字会设立驻港总办事处之际，杜聘用的秘书。当时还有英文秘书谢曜、张为珂，会计员屠某(女)和吴一峰，以及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主任高红偶，都和郭兰馨相熟，深知当时情况。”

恒社分社成立后，杜月笙的旗子在重庆挂了出来，引起各方的注意。杜每到重庆一次，就吸收一批徒弟，人数相当多，机关成员、工商界、银行界、文化界都有。当时重庆杜门的核心分子，有上海去的陆京士、唐缵之等，有在南京吸收的孔祥熙手下的财政部公债司司长边定远等①，有汉口轮船业的沈楚宝等。那时，陆京士任社会部组训司司长。边定远是财政部的司长，是孔祥熙身边的红人，和孔二小姐经常打交道，杜月笙和孔祥熙相互勾结，对边当然更重视。因此，在重庆的恒社就形成了两股力量。论杜门历史，当然以陆京士为深，论和豪门的关系，则以边为优，各有诀窍，相互较量。社员中，有的归附陆京士，有的捧边定远。杜月笙对这情况是了解的，他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操纵控制。重庆恒社分子以东南各省人士为多，他们把在上海制的舞台圆幕，也辗转带到重庆，彩排了几次京剧演出，对社会上某些阶层起了一定的号召作用。当时去渝的名角名票如程派青衣赵荣琛、梅派青衣杨畹侬，都是参加过恒社的。

一九四三年，恒社为欢送青年军举行演出，场子被人打散，这是重庆黑社会突出的事件。为什么被打散，什么人策动的，当时始终未弄明白，恒社中人也没敢往下追究。照现场的情况推测，很可能是袍哥们搞的。恒社在重庆到处招摇，招兵买马，自然会引起地头蛇的嫉忌。那次寻衅，是给恒社一点颜色看看。当时恒社中人忍气吞声，不敢声张。杜月笙正在重庆南岸汪山寓所养病，门徒们也没有告诉他，但被戴笠知道了，曾亲自到现场查勘，不过后来也没见下文。

---

① 据庞京周订正："边定远实为孔祥熙长财政部时的总务司司长，非公债司司长。"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杜月笙早在那年十一月十六日和王晓籁、钱新之因事飞到重庆，因此未及于难。从此，杜就暂时定居于重庆，但杜患有严重气喘病，雾重庆的气候对他很不适宜，因此旧病时发。他的市区寓所在打铜街交通银行二楼，郊区寓所则在南岸汪山，市区常遭轰炸，郊区气候较爽朗，他住汪山时多。那座小洋楼是交通银行为杜特别建造的。杜是交通银行的董事，特别因为交行巨头钱新之和杜的交谊，所以交行才妥为安排。吴开先到重庆后，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

一九四二年十月，杜月笙在重庆越来越苦闷，有“蛟龙失水”之感。那年，闷极思动，就应西北国民党分子的邀请，到西安去“视察”。到了西北后，曾筹设通商银行西安分行，并插手于西北毛纺厂等企业。但在西安没有停留多久，又因健康关系，提前回到重庆。

他把中国通商银行总管理处迁到重庆，并设了重庆分行，由骆清华、陈国华等负责。企业方面，筹设了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由杨管北任总经理，骆清华、沈楚宝任协理，会计是陆增福，他们都是恒社分子。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的资本由恒社分子筹集一部分，其余由杜月笙筹拨，原来计划是为恒社建立一个经济基础。重庆是发国难财的主要场合，有了这个企业名义，加上杜的势力，自然可以白手成家，大展鸿图，恒社就不必靠社员会费和向各方敲诈作为经济主要来源了。但杜那时因为重庆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不敢过于放肆，主要只做了一笔昆明的走私买卖，发了一笔不小的财。中华公司的地址在望龙门林森路四十九号，房子是花钱买进的。

除此以外，通济公司也是一九四三年筹设的，这机构是由戴笠规划，利用杜月笙、钱新之的关系设立的。杜、钱分任正副筹备主任，常务委员有朱惠清、杨管北等，朱是以戴的关系参加的，筹备处就

设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楼上。在筹备时期，派钱新之介绍的徐子为为河南商丘界首分公司经理，① 配合重庆政府所设的战时货运管理局（该局局长即为戴笠，运输大队长是王兆槐），抢运进了一批上海的纱布。这批纱布是由上海的民华公司（通济公司的姊妹公司）通过敌伪关系运来的。上海民华公司的主持人徐采丞，是杜在上海的代理人，一直和敌伪勾搭，并设有电台，通过杜月笙，为敌伪和蒋介石之间通声气。这批纱布由徐采丞的女婿林仁麐押运，并由日文通译袁文彰一路陪同打通关节运到商丘，再由王兆槐接运到西安、重庆，交给戴笠的战时货运管理局转拨给花纱布公司，作为“平抑物价”的筹码。这是蒋介石集团中的官僚、政客、特务和日军、汉奸相互勾结的具体事例之一。第二批由上海运出的纱布从浙江淳安内运，仍由徐子为经手，他是撤销了河南商丘的机构赶到淳安去经办的。这批纱布，中途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扣下来另派了用场，没有运往重庆。为了这事，戴笠曾控告到蒋介石那里，后来不了了之了。

通济公司的徐子为在接运第二批纱布时，还在富春江附近被番号不明的杂牌部队绑架到山区，花了七万多元才赎出来，这也是国民党统治阶级内部黑吃黑的一个插曲。那时到淳安参加这一勾当的恒社分子有朱品三，在重庆的通济公司，军统曾派去总稽核林尧民。

一九四五年夏，杜月笙接到蒋介石的指示，要他到东南战区去协助“策反”工作，并配合所谓盟军登陆，听说这是戴笠从中策划的。杜于是年六月二十五日带了徒弟顾嘉棠、叶焯山、庞京周、胡

① 据庞京周补充：“徐子为，吴江人，黄任之主持川康建设期成会以及推销救国公债时，曾随黄及冷遹办理文书。杜之用徐，基本上还是黄所介绍，但在重庆时杜遇事往往请教于钱新之，徐被任通济公司分公司经理有可能得到钱的同意。”

叙五、杨志雄等① 坐汽车由重庆到了贵阳，会合戴笠与美国特务头子梅乐斯（中美合作所副所长）②，从那里坐飞机到芷江，再转福建到达淳安。在日本投降后，杜月笙就从那里经杭州回到上海。杜在淳安时期，上海有一批恒社分子赶到淳安去拜接老头子，其中包括徐采丞等。在此同时，恒社的核心分子陆京士也带了他的工运干部陆克明等到东南一带活动，为进入上海做好准备。后来在上海成立的"工人福利会"这个组织，就在那时培育了苗子。

抗战胜利后，反动官僚、政客、军阀、特务、流氓都把上海当作一块肥肉，从天上，从地下，涌到上海，展开了穷凶极恶的争先劫夺，五子登科，六畜飞腾，无法无天，一片漆黑。杜月笙于九月三日回到上海，在上海西站下车时，曾受到徒子徒孙几千人的热烈欢

---

① 据庞京周订正："顾嘉棠等五人都不是杜的徒弟。顾嘉棠和杜月笙是同道弟兄。叶焯山在帮会中是通字辈，比杜月笙大一辈。杨志雄原是西门子洋行职员，因在沪郊骑马认识了宋子文，后来常在宋、杜之间走动、传话，一二八抗战时，杨是地方协会会员，史量才死后与杜关系密切。胡叙五是杜的秘书，最初是黄任之介绍给杜的。一九三七年杜离沪赴港之前，已经在杜宅廊下小室内管电码本，起函电稿。他迟一步赴港，其后转渝，而在一九四五年一同到淳安的。此人极少交际，颇冷静，似乎只是为了薪水而机械地干杜门这个行当。他保管电码本之类当然不敢不小心，但是说他如何佩服杜月笙则未必。记得一九四五年将离淳安返沪时，他曾写过一段寓言式的滑稽文章暗地给我看过。文章假托淳安鸡鸭两族的族长对我们一行人的欢送文，讽刺杜被戴笠圈在招待所里无所事事，每天总是杀一鸡一鸭供应丰盛膳食云云。胡平日称杜为先生，背后则常称他老板，此非恒社弟子所应有。至于我，同样不是杜月笙的徒弟。约于一九二六年，我和杜在远东饭店、诚记公司等处赌博相识，其时宁海西路杜宅门口尚非车水马龙。以后常去杜宅走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间我任红十字会秘书长，杜是副会长代会长王正廷执行职务，这才发生了工作上的隶属关系。"

② 据庞京周订正："会见梅乐斯不是在贵阳，而是在芷江，并由芷江起飞至福建长汀降落。"

迎。但经过这个热闹场面后，他意识到离开八年重回的上海，已非复当年可以为所欲为之地。国民党各派势力错综复杂，深入上海，他难以如意地操纵，尤其是他的门生吴绍澍对他的态度，引起他很深的刺激。

从天上飞来、地下钻出的劫收大员中，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上海市副市长、三青团负责人兼社会局长的吴绍澍，原是杜的门人，红极一时，另一门人陆京士则是社会部的京沪特派员，上海市长钱大钧也是杜的老朋友，接收大员中最有势力的军统特务戴笠又是杜的老搭档，照常理说，杜那时贯通了党政军特各方面，应该可以称心如意了。他的苦闷，却发生在吴绍澍身上。吴在抗战以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干事，那时正式拜在杜的门下，和陆京士相结纳，并且曾由万墨林经手，受过杜月笙经济上的接济。抗战时期，吴还利用了杜的关系，在上海搞所谓地下工作。那时他在上海的联络站就设在原来的杜公馆里。后来他进一步依靠陈立夫，开始攻击杜月笙，公开否认他曾拜过杜门。抗战后期，陆京士想活动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吴绍澍商量，希望上海的单位推选他，不料被吴绍澍拒绝，这就造成了杜、吴之间的初步裂痕。胜利劫收初期，吴手握上海党、政、团、舆论（主办《正言报》）大权，不买杜月笙的帐，还处处和杜为难，但那时吴羽毛已丰，杜要对付他是困难的。杜在这段苦闷期间，曾一度由洪兰友、潘公展居间拉拢，在顾嘉棠家里与吴见面，一起吃饭谈话，拍照留念，吴绍澍还当面称杜为先生，并承认了过去与杜为难的错误。但以后，吴和他的部下依然和杜作对。后来，吴在汽车里被人打了一枪，但没有打穿保险玻璃，只吃了惊。大家都说这是戴笠干的，因为那时戴和杜是合作得很密切的。

杜回上海后，恢复了恒社总社，曾经由鄂森出面在浦东同乡会

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商量如何恢复总社的具体问题，第一是社址问题，第二是重新登记问题。这次座谈会是一九四五年秋天举行的，出席的有唐缵之、王润生、吴颖荪等二十余人。后来，又经过几次聚谈，社址问题首先解决，因为恒社社员徐大统在抗战时期经营纸业，大发其财，有“纸业大王”之称，他设有一个俱乐部叫伦社，在江西路九江路北首大楼的六楼上，原是他邀集赌友吃喝玩乐的地方，一共占了大楼的两层，相当宽大，他自愿献给恒社。社址解决后，就召集了一次社员大会，改选理监事，除了原在上海投敌有名的人以外，都通知参加。投敌的人，也不作开除的手续，说是帮会是重义气的，私人间还可以保持来往。

总社恢复后，活动并不活跃，经常到社的人并不多。经过研究，认为其原因在社址不合适，因为恒社离不开老头子，社址应该邻近老头子的住宅，使社员可以经常去杜公馆跑跑。于是，恒社就决定自建新屋，找到今淮海中路中南新村前面的一块地方，约有二亩大小，是以前一个白相人（姓名记不清了）送给杜月笙的。就由杜拿出土地证交给恒社做社基，着手筹建。恒社中是有建筑工程人才的，义务设计，计划造一幢三层大楼，内有大会场、舞台、餐厅、宾馆、图书室和办公室等等，规模相当大。基地上也已竖起了“恒社社基”的木牌，但到上海解放时，还没有动工，原因是恒社社员后来并不集中精力去搞。同时，杜月笙除初到上海时到宁海西路去住过几天以外，一直住在顾嘉棠家里，① 经常生病。那时在顾家的恒社

① 据庞京周补充：“杜月笙一九四五年返沪后，住顾嘉棠处仅三四个月，即移宁海西路过旧历年。一九四六年移居于茂名公寓的七〇五室。该寓仅四间半，原系杜徒徐懋棠所租。自杜迁入至濒解放时赴港为止，电梯旁的居民表上始终是徐懋棠的西译名。此时与杜同居的家眷是姚玉兰，姚还款留交好的姐妹孟小冬。屋既少而杜又多病，因此在这里接待的人确实不多，常去的恒社分子不

重心分子担任联络工作的是唐世昌，杜月笙因病与社员接触不多，为吴绍澍的事一直烦闷着。而社员们此时都主要为自己的利害打算，只有少数人关心恒社，所以恒社新建房子一直被搁起来了。

在此期间，建国西路（记得好象是三四四号）有一幢汉奸陶雪生的房子要出售（其实是早已被封的敌伪产业），由顾嘉棠介绍经手，怂恿恒社买下来作为社址，得到杜月笙的同意，于是恒社中人就发起募捐凑了六十条黄金，由杜的大儿子杜维藩（非正式内定为理事长的继承人）和唐世昌将此款送给顾嘉棠作为成交，并由顾将土地执业凭证交给恒社。后来知道陶雪生只拿到五十条，顾嘉棠吃了十条。房屋成交后，恒社就搬了进去，曾经热闹过一番，里面的家具装饰都是搜劫得来的，足够安排。但这房子原来是有问题的，敌伪产业清理处本要查封它，陶雪生、顾嘉棠早就知道，他们想及早脱手，而一般人不会也不敢买受。顾嘉棠出了主意，把它转给恒社，他们肯定借杜月笙的招牌就不怕查封。结果，中央信托局来查封，知道已是恒社的产业，于是将封条贴在墙壁上，作为已办过手续，恒社照旧使用，对封条视若无睹。直到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这房子才被人民政府接管，当时恒社的活动已停顿，还有少数社员住在里面，后来搬出来。

杜月笙于一九四九年三月离开上海去香港，从此恒社在上海无形解体。该社从一九三二年成立，直到一九四九年，共历十七年。上海解放前夕，除一部分社员留沪外，到香港、台湾去的不少。

过陆京士、朱学范等人。此外有黄任之、钱新之、徐士浩、朱如山等，以及因事特邀而去的人，皆不甚多。但证券、金业两交易所的理事会，为了迁就杜病，曾去那里开过会。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为了商量演出和剧场问题也去过。医生乐文照、粟宗华、董承烺和我都到那里为杜治过病，这些都是我亲见的。”

社员见于最后一部名册的约七百人，比较可靠的估计，包括死亡、前期和后期，也包括秘密参加而不公开的，恒社社员大约有一千五百人。有人说它有几万社员，那就未免夸张了。

杜月笙对徒弟的宠信和疏离，标志了恒社重心的变迁。在杜的心目中，凡是自己能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打得开局面，有能力、有地位的，也就是能对他有帮助的，才是他的好徒弟。在他对恒社社员的估价中，这类的人不多，一般都是和他相互利用，而大多数还是靠他的牌头活动的。

从恒社成立到一九五一年八月杜月笙死亡为止，杜月笙心目中认为最得力，可以重用，可以托以大事的徒弟是陆京士。早年，陈立夫曾对人说，陆京士的忠于杜月笙，超过忠于国民党，这也可见陆对杜的态度和关系。所以，杜对陆言听计从，所有恒社的主要社务活动，重大决定，都是由陆参加的。听说，杜临死以前，陆京士在台湾，曾电召其到港面诀。他临终电召的门人只此一人，至于他们是否见到最后一面，那就不得而知了。

恒社分子中，自己收徒弟成为杜的徒孙的，也有几人。朱学范收的学生最多，曾成立了一个毅社，都是工人，解放后解散了。边定远成立了靖社，学生也不少，大部是机关职员。唐世昌的学生也不少，大部是申报馆职工，唐做过申报馆的副经理，也是记者公会的活动分子。张克昌的徒弟以邮务工人为多。陆京士不收学生，毅社中一部分人受陆的指挥。

抗战胜利后，恒社在杜月笙的指挥下，与国民党官僚勾结干了以下一些主要活动：(一)替所谓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募款，这是宋美龄发起，由孔祥熙、杜月笙等负责的，杜指挥恒社分子活动，在天蟾舞台义演筹款，有梅兰芳、程砚秋及梅的弟子杨畹侬、程的弟子赵

荣琛合唱《四五花洞》，轰动一时。事后，孔祥熙在国际饭店十四楼请恒社办理演出人员吃了一次大菜。孔亲自出席，席间和马连良、金素雯等大谈其戏，兴致很高。（二）替所谓苏北难民协会筹款，由吴稚晖、谷正纲、王懋功（时为江苏省主席）发起。恒社主办了这次义演，杜月笙的老婆姚玉兰参加演出《吊金龟》，号召了不少捧场的人。除此以外，还有选举所谓上海小姐等等，以噱头欺骗群众，替反动官僚弄钱、牵线，搞到的那些钱到哪里去了，只有天晓得。

关于恒社和杜月笙的晚期活动，我初步记得起来的，大概就如上述。除此以外，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大搞伪国大的活动，曾由章士钊向杜月笙献策，把恒社改为政党组织，为此曾在社员张裕良的“良厦”中举行过一次座谈会，杜月笙和章士钊亲自参加。这次会谈的结果，除少数社员认为可以搞一下以外，大多数都认为条件不够成立政党，杜本人也认为恒社的人力、条件都不够，所以没有具体进行。这也是恒社历史中值得记上一笔的插曲。

以上所谈，是根据个人记忆，中间还加了一些主观的看法。因为可以帮助记忆的材料很少，而本人的水平又很低，错误和片面的地方，一定不少，希望了解这方面情况的先生们补充指正。

杜月笙与戴笠及军统的关系

郭　旭

一、杜戴结识的时间

杜月笙与戴笠结识的具体时间，我不清楚，只了解他们两人远在一九二四年前后，即在戴未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之前在上海过着流浪生活的时候，就结识了。

戴笠在二十多岁时，在其原籍浙江省江山县硖口镇，穷极无聊，摆赌摊骗人钱财，被人识破，逃避上海，寄居在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兄又为表姊丈的张冠夫（即张衮甫）家中，睡在地板上。他的表姊很讨厌他，常常闭门不纳，沈醉同志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辑《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曾述及。戴的表姊为什么讨厌他，主要是因为戴和杜月笙搅在一起的关系。戴当时和杜结识拜把，杜比戴大八岁，戴称杜为三哥，彼此时常来往。他的表姊很厌恶，常对她的丈夫说，戴不务正业，和黄金荣老婆的梳头阿姐（指杜的大老婆沈氏）的丈夫水果阿三（杜过去的绰号）结为把兄弟，太没出息了，并曾当面责备戴，戴仍不改，且常深夜才归，故她常闭门不纳。戴这才离开张家赴粤投考黄埔军校。这件事情是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任军统局会计室综计科长时，有一次和张冠夫、林尧民（张、林当时都任会计室副主任）同赴汪山杜月笙家时，张和我们谈起的。

戴笠去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混了一个时期，没有毕业，便离校去给蒋介石作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以后蒋在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成立一个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戴笠、许忠五、成希超和东方白等为该组组员。这时即初步建立了小型的特务机构，为蒋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和所属部队各部队长对他是否忠实及一般军风纪的情况。不久，蒋第一次下野，赴日本前夕，将这个密查组撤销，并发给该组三个月维持费。不料胡靖安领了这笔维持费后，把戴、许、成等留住在上海他的家里，只供给伙食，而将他们应得的三个月薪金全部克扣，自己带了家眷悄悄回了江西。戴、许等在伙食钱用光之后，便抬了胡家的衣箱到当铺里质当，但打开箱子，其中尽是小孩衣服，当铺不收。许忠五知道戴和杜月笙是拜把兄弟，怂恿戴向杜告贷。戴乃向杜借了五十元，公推许经办伙食，不料许拿了这笔款子，没有几天也逃之夭夭，溜到汉口原籍去了。戴只好再向杜借了五十元，才渡过困难。后来蒋介石复职，戴和周伟龙等组织十人团，继续替蒋进行特务活动。一九三二年四月一日，蒋将十人团扩大为特务处，即以戴为处长。此时许忠五找戴谋工作，戴虽然先后曾派他做过便衣队队长，汉口、西安等警察局的侦缉队队长，但对他约束很严，常被监禁。一九四二年秋，许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队队长时，被人密告在家聚赌抽头，戴亲自前往捉赌，可是并未碰上有人赌博，仅搜到麻将牌一副，筹码一盒，戴就将许扣押起来。按军统局惯例，该局成员被扣押时，照原薪发六成由家眷具领维持生活，我当时任军统局会计室副主任，主管发放这个费用，许妻每次前来领款，就向我哭诉，说许本人并未叉麻将，是她自己和人有时玩玩，她愿受处分，托我代向戴报告请将许开释。我将情况向毛人凤(当时军统局代主任秘书)反映，毛要我相

机报告戴笠。有一天，戴在军统局午餐，说得很高兴，毛示意我代许请求，我依照许妻所说的如实反映，请戴从宽早日将许开释，毛也从旁代许请求。戴当时对我们说许这个人坏极了，连他的钱都要骗，对别人更不要说了，接着他就把上述他们过去在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他最后说，如果那时候不是他过去在上海和杜月笙结识拜把的关系由杜一再借钱给他的话，那末除了他过去在上海过惯打流的生活不致挨饿外，他们那几个人在上海无亲无眷，身无长物，不去抢劫就非讨饭不可，许这个人须得把他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要闹出大乱子的。毛人凤和我听到戴这样说法，不便再多开口。结果许忠五这次被戴关了半年才释放出来。

以上两件事实，可以肯定杜月笙和戴笠建立关系的时间。

二、杜戴的相互勾结利用

杜月笙和戴笠相互勾结利用的事实很多，我知道的太少，除沈醉在上述一文中已经写过的我不重述和补充外，今就我过去所听到的及亲身经历的有关杜与戴在经济方面的往来，比较关系大一些的事实，写述如下：

（一）杜被戴利用指使其门徒充帮凶

戴笠自一九三二年任特务处处长后，以当时上海有各帝国主义者的租界和势力范围，有些反蒋的进步人士在这里寄居活动，因此除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作的“上海区”外，并控制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京沪沪杭甬铁路警察署、上海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但当时他的特务在两租界内活动，还有所顾虑，同时那时他的特务喽罗还不多，他以杜月笙的势力遍布于两租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故利用杜替他进行反动工作。戴来沪时，必与杜碰面。碰

头并不固定地点，有时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六十六号杜的家里，有时临时在旅馆中。戴不去上海时，经常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长和杜联系。侦察大队长由翁光辉、吴廷宪先后充任，自一九三五年春起，到日军占领上海时为止，一直是王兆槐。翁、吴在职时，和杜接触不多，王任大队长后，常去杜家，联系得很密切，并利用杜的门徒充作帮凶。一九四五年我在重庆军统局经理处听到原在上海任王兆槐部股长后来在经理处出纳科任副股长的林洁清说，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很多，各行各业都有，有的地位很高，有的很有钱，有的是无业流氓，各租界内都有他的门徒。杜当时主要是协助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因为王兆槐是杜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队里还有杜的许多别的门生，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并说，鲁迅先生出殡时，戴笠事先据报，宋庆龄和许多反蒋的人将参加执绋，即指示王兆槐派人对参加执绋的进步人士相机予以警告，并嘱王如人手不够请杜月笙派人协助。王接到戴的指示后，一面找他们商量布置进行，一面请杜帮助。杜指派了几十个打手交王指挥，王当时派他为小组长之一，出殡那天，他带了几个队员和几个杜的门徒，担任四川北路一段的活动，他们混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宋庆龄和许多大学教授在执绋，参加送葬的学生很多，都非常悲愤，高呼口号，有许多学生担任纠察维持秩序，他们看到四川北路那一段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又无隙可乘，没敢动手，几个小组都只好悄悄地收兵回去。

（二）杜被戴利用组织特务武装

戴笠自任特务处处长后，野心勃勃，逐步扩充他的力量，他认为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常对人说："搞政治必须有武力作后盾，否则是卖狗皮膏药，不为人所重视。"他看到复兴系的军人如陈

诚、胡宗南等都握有兵权，尤其看到另一特务系统复兴系的康泽，控制了别动总队及禁烟督察处缉私室所属的巡缉团。为了与陈、康等抗衡，他控制了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各省市的警察及在特务处成立一个特务队(后扩充为特务团)，但他认为警察是军队的附属品，随军事政治转移的，不以为满足。他知道搞正规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允许的，所以他想找机会搞一支实力雄厚的特务武装部队。一九三六年两广事件平息后，蒋攫得了广东地盘，派宋子良为财政部广东财政特派员兼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及禁烟特派员，并命戴协助宋接收陈济棠的缉私机关和缉私部队。戴利用这个机会，将陈的缉私队扩充为广东税警总团(等于一个师)，由他自己掌握。但他认为虽掌握了这个税警总团，力量还是不够的，何况还是地方性质的部队。因此他一心一意地想找机会再搞一支全国性的队伍。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发生，他就借抗日名义，向蒋介石建议，利用杜月笙把上海青红帮的力量组织起来，说是防止日军在上海登陆，万一日军登陆，就可在敌后行动。蒋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指定由戴掌握。戴随即由南京到上海和杜月笙商议，决定由杜出面召集上海青红帮的头目杨虎、向松坡、刘志陆、俞作柏等开会，传达了蒋的指示，并号召他们策动所领导的帮会力量共同组织起来。当经一致赞同成立一个“苏浙皖行动委员会”，推杜为主任委员，戴、杨、向、刘、俞均为委员，由戴兼书记长负实际责任。戴在委员会成立后，派周伟龙为书记，代他负责(以后由文强接替)。不久，戴即在该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别动军，保荐刘志陆为总指挥，下辖五个支队，第一支队长为何行健，第二支队长为陆京士，第三支队长为朱学范，第四支队长为张范①。每个支队(比一个普通团

① 据朱学范同志回忆应为张业。——编者注

大)辖四个到五个大队(等于营)，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等于连)，每个中队辖三个小队(等于排)。人数共约二万人，都是青洪帮分子。

日军登陆时，别动军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确曾奋勇作战，有过牺牲。如大队长廖树东率部和日军作战，伤亡较大，仅余一百多人，犹继续抵抗。在被包围时，日军劝降，他们坚持抗战，最后廖的两腿被炸断，当敌人来捉时，他仍将剩余的手榴弹向敌投掷，毙敌十余，自己滚入黄浦江溺毙。

上海沦陷时，别动军退到江浙的浦东、苏南、浙西及皖南等地区，因为本是乌合之众，没经过严格训练，在和日军作战时，除一部分牺牲外，其余多自行溃散，所剩无几，曾一度改编为“军事委员会教导团”。旋在皖南、苏南一带收容了由上海溃败下来的蒋军八千余人，混合一起，由戴笠报告蒋介石批准，改称“忠义救国军”，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归军统局领导，从此变成一支特务武装部队。

苏浙皖行动委员会在忠义救国军成立后，无形中停止活动，但戴以该军官兵许多是杜的门徒和上海其他青洪帮分子，仍利用杜对这些帮会分子的影响。上海被日军占领后，忠义救国军有一个支队在苏南，一个独立大队在浦东地区进行所谓游击工作，这两部分的成员中，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居多，戴认为必须加以训练，故电召这两个部分的干部由上海到香港面洽。那时杜住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七〇六号房，戴到香港后，在铜锣湾湾景楼七号陈质平(军统骨干分子，当时任军委会西南运输处香港分处监查科科长，担任戴和杜的联系工作)家中，召集他们开会和聚餐，邀杜到场对他们讲话。据当时任杜的秘书的郭兰馨讲，当时杜的讲演稿是由他代拟的，杜在会上替戴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五年六月间，戴邀杜陪同“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方特务头子梅乐斯前往东南各地视察，布置忠义救国军配合美军活动。忠义救国军所属各支队，先后由中美合作所所属雄村、东峰、玉壶等训练班分批抽调接受训练，全部换发美式装备。那时美军准备在我国东南沿海各地登陆，要忠义救国军呼应配合，一起行动。戴为了鼓励该军中的帮会分子配合美军抢先占领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免被新四军接收，特邀杜同行。杜以其个人的财产和黑暗势力都在上海，也愿同去。他们于六月二十五日由重庆出发，经贵阳到芷江，改乘飞机到福建建阳转往东峰及浙江、安徽等地。我听到当时随戴笠同行的军统局经理处科长叶世掞在回到重庆后说，戴、杜和梅乐斯等到东峰后，在中美所东峰训练班住了五天，乘汽车前往铅山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密商，由顾招待，在那里住了三天，再赴安徽雄村中美班，在该班住了十多天。戴到东峰等训练班时，都召集各班受训官兵和驻在附近的忠义救国军所属支队的官兵讲话。因为驻在雄村方面的支队较多，所以在雄村班时间较久。戴每次对官兵讲话后，总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都讲得很简单，大意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他随戴离开雄村班后，赴淳安等地视察军统局所属公开和秘密单位的工作，回来时杜仍留在淳安协助忠义救国军工作，戴留杜逵副处长（当时任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兼军令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随戴赴东南视察）暂代忠义救国军参谋长，担任和杜月笙的联系。

戴这次到以上各地，费时一个多月，到七月底才回重庆。杜月笙留在淳安，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离开，于九月三日回到上海。

这支特务武装部队，截至日本宣布投降时为止，从未和日军作战，在日本投降后，却首先进入杭州、上海、南京等城市，协助蒋军

抢夺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

（三）策动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内幕

汪精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间，离开重庆前往昆明，经河内、香港转到上海公开投敌，蒋介石以汪抢先投敌，同时还因汪过去和他合谋向日乞和求降，恐汪公开把秘密揭开，都与他不利，故在汪到河内后，便秘密指示戴笠派人前往河内杀汪。戴根据指示，派军统特务余乐醒率领行动人员王鲁翘等到了河内，逾墙入汪寓所，枪杀了曾仲鸣，没能找到汪。汪到港发表所谓"艳电"，不久在日方卵翼下，到南京组织了傀儡政权。蒋于是又指示戴一面派人继续伺机刺汪，一面派人设法策动随汪投敌的汉奸，分化汪伪组织。因此，戴曾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偕同军委会高参戴静园、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许天民等率领特务十人，由重庆经香港到上海刺汪，但因事机不密，被汪伪特工总部李士群破获，吴等被杀。关于策动汉奸脱离汪伪组织，则以军统局在沪组织于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沪一区区长陈恭澍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一九三九年，杜经徐寄廎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大致如下：

徐寄廎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

人私交甚笃。黄与汪伪政府外交部长高宗武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一九三八年到港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天（即一九三九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办理。因此杜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寇订的卖国密约，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又于第二天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和高宗武脱离汪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如愿出国考察就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十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十万元港币中发给陶、高各四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汪日卖国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汪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五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用他在身边工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

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二十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五千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谓声先生说，徐寄廎在抗战结束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

戴笠从一九三九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军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西借，才能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一九四一年春被调到军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五万元。我们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五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一次在来龙巷范绍增家，两次各挪借十万元，过了两年（一九四四年夏），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迅速膨胀，数字达五千万元。每次还款，杜都不肯计息。记得戴叫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杜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

他们五个人轮换地玩，范在“做梦”，我快到程起身“做梦”，特来意向他说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他就把准备好了的十万元支票交给我。

一九四四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在重庆向杜继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一九四一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一九四三年冬，我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九百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

一九四三年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

徐、万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锺锷（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诒（淞荪）、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任董事长，钱、戴、锺、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能代表杜）任常务董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彝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各投资一千万元，货运局二千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三千万元。后来货运局的二千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五千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二千万元，无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一亿二千万元，商定货运局的二千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地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一九四三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四十九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

资——棉纱和布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三千件于一九四三年冬由商丘分公司运到界首，交由界首货运处处长王兆槐运到西安、重庆等地。运到重庆的，由货运局送到花纱布管制局，作价八千万元，交给通济公司；运到西安的，作价多少，我不知道。第二批纱、布共五百件，由淳安分公司交由浙江货运处处长赵世瑞运到金华，被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扣留，顾打电报给戴笠，请其准予将这批物资留作该战区军用，戴复电说，这批物资，他只负运输之责，无权处理，须向蒋请示。与此同时，军需署长陈良根据第三战区军需局的报告，亦向戴提出了将这批物资留作该局军用的要求，戴对陈作了同样的答复。他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叫我面告陈良，要陈向蒋请求批准。后来，蒋批准交给第三战区作为军用。于一九四四年夏作价二千六百多万元(此时法币已比一九四三年贬值很多)，由财政部办了转账手续。

日本投降后，通济公司由重庆迁到上海中汇大楼(今延安东路上海博物馆)，那时货运局已经撤销，朱惠清和林尧民仍留在该公司工作。

戴笠死后，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一九四六年十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任局长。一九四七年夏间，通济公司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郑参加会议，回到南京，曾告诉我(我当时任伪国防部保密局经理处处长，主管该局的商业机构)说，通济的董事会，杜月笙找他出席，会议决定将公司资金折成美金五万元。公司虽然承认过货运局投资二千万元，但该局并未实交股款，只以车辆免费代运物资作为抵偿，今该局早已撤销，我们不占这个便宜，他已向杜表示，该公司的事随杜去搞，我们今后不过问了。

同年秋，蒋介石令保密局将所属商业机构移交给毛庆祥所主

持的"三有公司"接管，该局在办理移交时，没有把通济公司原来承认货运局的投资额作为该局的商业机构移交给毛接管，仅在移交清册中，叙明了和通济公司的关系。

（六）戴利用杜在帮会中作桥梁

戴笠除利用杜月笙组织特务武装部队外，还利用杜调解他和帮会中人的矛盾及拉拢四川袍哥。

1．戴曾利用杜调解和王亚樵的矛盾。王是上海安徽帮会头子，原是蒋介石拜把弟兄，蒋发迹后，对王疏远，王以后进行暗杀蒋的活动，遭戴毒手，这个事实，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述及，我在这里不复述了。我所补充的是戴在杀王之前，曾两度利用杜拉拢王的情况。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戴笠派原任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率领行动人员谷玉林等前往广州，转赴梧州暗杀王亚樵。我当时任广东税警总团军需处长兼广东缉私总处会计股长及军统广东区总稽核，戴来电命我协助吴工作。吴抵广州后，由我拨给用费毫洋券一千元，并代向广东缉私总处商借缉私小舰"广凯"一艘交吴使用。吴在梧州中央酒店将王暗杀后回到广州时，告诉我说，王亚樵于福建事变失败后，托人向蒋说情，蒋交给戴笠任用，叫王和戴接洽。当时王住在上海，戴以王是蒋过去的拜把兄弟，又是安徽帮中的首领，于是由南京到上海先去看王。但王以戴当时的地位不高，对戴非常傲慢，戴乃请杜月笙从中斡旋，由杜以上海帮会首领之一的身份，在新亚酒店请王吃饭，并请黄金荣、张啸林等作陪，替戴拉拢。王仍提出要做淞沪警备司令，作为条件，并表示不愿居戴之下，说戴是毛头小子，乳臭未干，谁愿受他的指挥。戴将王提出的条件报告蒋，蒋不答应，又趋破裂。后王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

组织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刺蒋未遂①，而将汪精卫击伤。这件事发生以后，蒋答应王以前提出的条件，叫戴找王接洽，戴得知王有一次由香港来沪，又请杜月笙找王接洽，但王恐蒋借机收拾他，没有答应，离沪去香港。以后戴侦知王与桂系接触，报告了蒋，经批准将王秘密杀死。起初拟在香港下手，已由陈质平勾引和收买了王的老婆金石心作内线，同月中侦知王由香港潜往梧州，住在中央酒店，故派吴来主持暗杀王的工作。吴率领谷玉林、李修凯等在王的卧室将王枪杀，即乘"广凯"舰返广州，工作尚称顺利。从吴赓恕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戴笠利用杜月笙调解帮会中人矛盾的一例。

2．戴利用杜拉拢四川袍哥。一九三八年冬，军统局随蒋政权各机关由武汉、长沙撤到重庆后不久，戴笠以蒋管区后方各省尤其是四川的袍哥势力很大，拟仿照以前设立"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成例，进行控制和运用。他得着蒋的批准在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之下，成立一个"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简称"人民动员委员会")，由军统局领导。该会的主任委员由戴兼任，拉杜为常务委员，当时，杜月笙在香港，由委员朱学范代表。会址设在重庆戴家巷一号。

该会在重庆的工作，主要是与青洪帮的各头目联系。杜月笙由香港到重庆后，戴利用他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杜家在重庆南岸汪山，杜进城时常在来龙巷十三号范绍增家，借赌博场和四川袍哥头目联系，替戴拉拢关系。他一进城，必打电话通知戴，有时还到曾家岩一五一号戴的寓所晤谈，有时戴去交通银行楼上访杜。戴知道杜在范家常和范绍增、康心如等赌博，时值重庆有赌博禁令，戴

① 一说该行动由华克之组织。——编者注

怕碰上他们赌局不方便，所以很少去来龙巷访杜，而且还授意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暗中保护他们。侦缉队队部同在来龙巷内，距范家不远。杜等每次在范家赌博，车辆盈门，深夜始散，侦缉队明知道屋内局面，决不进去，而且加派队员在外巡逻，装做维持交通，实为保护赌博。一九四四年秋，当时任侦缉队队长的军统分子谈荣章，邀我和军统局人事室主任龚仙舫到他家吃豆花，龚和谈开玩笑地说："荣章，你队天天在外面抓赌，为啥子隔壁范家的大赌不去抓？"谈答说，戴笠曾郑重交代过，杜月笙去范家玩牌消遣，结交四川朋友，嘱他好好地保护，这样他怎么敢派人去抓，而且还要派人去保护。

（七）日本投降后在上海的勾结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急于控制四大家族掠夺财富的目的地，但是他的嫡系部队大部分都在西南山区，他除令敌伪军在原地驻防，拒向人民武装投降外，并依靠美国的飞机、运输舰等为他赶运部队分赴华东、华北、东北各地。同时他着戴笠赶到上海与大汉奸周佛海勾结，指挥一切可利用的特务武装部队以及当地的各种敌伪力量阻止新四军进入城市。戴在上海首先成立一个军统局及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派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兼任办事处主任，他自己经常在沪指挥。此时，杜月笙也回到上海，和戴往来很密，他们勾结的事实很多，我因当时尚在重庆，所知道的较少，兹就我经手过的两件事实，记述如下：

1. 杜利用戴收回杜美路（今东湖路）七十号房屋借给戴用作军统局与中美合作所联合办事处。这所房屋，被汪伪财政部占为上海办事处，因房子被敌伪占过，而他过去尚欠的半数建筑费未付

清，恐作敌伪产业处理，故借给戴用，不收租金。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戴由上海回重庆时，曾对我说，上海办事处的办公房屋，原是杜月笙的，他借给我们用，不收租金，我们要替他维修，将来交还时，要修好交还给他。因此，军统办事处借用时，找陆根记营造厂修缮，并搭盖汽车房一大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间，该办事处结束后，又找陆根记将全部房屋修理，我还特地由南京到上海验收，会同结束处负责人廖华平交还给杜。听说杜以后将这所房屋卖与美国大使馆，得价款美金八十万元。

2．杜还利用戴的权力收回了法华路正始中学的校舍。此屋在一二八抗战后新建，杜月笙是该校董事会董事长，校长为陈群。上海沦陷后，陈群当了汉奸，仍兼校长，陈死后，该校停办，校舍由汪伪财政部税警总团占住，供税警训练班之用，一部分作为军需仓库。日本投降后，戴奉蒋命，接收了税警部队，改编为交警总队，房屋也由军统上海办事处接收。当时伪税警训练班的房屋应该移交给敌伪产业清理处处理，杜利用戴的接管，请戴发还给他，戴允其请，由军统局通知敌伪产业清理处，说此房屋原是杜任董事长的正始中学校舍，已发还给杜了，敌伪产业清理处接到军统局的公函后，就没过问。

杜收回了这所房屋，准备恢复正始中学，他的第二个儿子杜维垣由美国留学回国，担任了该校的教务长，但后面原充税警总团部仓库的一排房子，堆存着棉军服十多万套，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物资，仍由军统局所派交警部队看守着，杜维垣以大门有卫兵守卫，学生出入不便，曾请军统局将仓库移走。一九四六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所接收的军衣等军用物资移交给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我那时任该局经理处处长主管

经理业务，曾陪同联勤总司令部经理署派员来沪点交，但该署因为伪税警军衣全是黑色，不适合做军服用，延不接管。拖到一九四七年冬，杜月笙叫郭兰馨和林尧民到南京找毛人凤商量并和我接洽，经我几次催促经理署长陈良和傅仲芳从速接管运走，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将那些军用品搬出。以后该校因时局紧张便停办了。

三、戴笠死后杜与军统的关系

戴笠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坠机身死，杜月笙很悲恸，曾由通济公司赠送赙金法币二十亿元，由林尧民将支票送到军统局副局长毛人凤处，毛以这笔款子应送给戴的家属，命林带回上海交给了戴的儿子戴藏宜。

一九四八年一、二月间，杜月笙由上海到南京，住在洪兰友（当时任社会部次长）家里，有一次和洪一道赴灵谷寺戴笠坟前致吊。我以后听到守墓的人说，杜到墓前时，眼泪盈眶，行了三鞠躬礼，在坟墓的周围看了良久才离开。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和戴的关系之深。

戴笠死后，杜月笙与军统（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在内）仍然保持关系，不过杜与郑介民、毛人凤等关系，没有和戴那样亲密。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间杜离沪赴香港为止，王新衡始终担任着双方联系的工作。这个时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杜与军统局、保密局往来的事实，根据我所见所闻列举如下：

（一）一九四六年六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取消法西斯军事独裁的压力下，不得不将军事委员会撤销，但同时仍将原属该会的军令、军训、后勤等机构与军政部合并为“国防部”，实际上只卸除了军委会这块招牌。他又因人民提出取消特务机构，秘密指示戴笠将军统局化整为零。关于军统局化整为零的计划，我

已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八辑《美蒋特务合流及戴笠和杜诺迈、赫尔利、柯克等的勾结》一文中述及。这个计划在戴笠生前已经蒋批准，并已开始实行。惟特务首脑部——军统改组后的名称和隶属问题，迄未解决。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以“国防部”无军统局的编制预算，不能发放经费，只借支维持费几成，致特务经费感到困难。这时，军统局局长郑介民在北平任军调处国民党的执行委员，由唐纵代理局长，唐对经费不过问，内部事务归副局长毛人凤负责，我当时任该局经理处副处长，负该处实际责任，因将经费困难情形向毛反映，毛命我前来上海，找杜月笙商借法币贰亿元维持。我于六月里来沪，因不知杜的住址，找了王新衡（王当时任军统局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引我同往十八层楼（即茂名公寓）见杜，杜立即应允，嘱其秘书胡叙五开了贰亿元的支票给我。我问杜此款将来还到何处，杜说只要交给南京通商银行。到了下月初，我到该行归还借款，该行负责人童一平说，杜关照不收利息。以后七、八、九月，每月中我都来上海一次，向杜挪借贰亿元，也都于次月初在南京归还，迄未收过利息。到了十月间，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编制预算确定，经费有了着落，才停止向杜商借。

一九四九年杜月笙由上海往香港，寓居坚尼地城十八号，同年十月广州解放，我也到了香港。因毛人凤由台湾打电报给我，要我发给香港站组的经费，而经费尚未汇到，该站组急需款项，我又找杜暂借港币一万元，杜立嘱顾嘉棠取了港币现钞一万元给我。过了几天，我即归还，这是我最后和杜见面的一次。不久，我离开香港前往重庆，杜以后对保密局在经济上是否仍有支援，我不清楚了。

（二）一九四六年冬，军统头目徐亮（即徐为彬）以各地青洪帮

的势力很大，而军统局所领导的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已经结束，为了继续控制利用这股势力，使它成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外围，并作其个人的政治资本，曾向保密局正副局长郑介民、毛人凤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简称“新建协会”）作为团结各地帮会的中心机构，郑等采纳其建议，转报蒋介石批准。该会于一九四七年春，在上海成立总会，由徐亮任理事长，拉杜月笙为常务理事，在蒋管区各省市设有分支会，办法和目的同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一样。徐拉杜担任该会常务理事，仍在利用他来号召各地帮会，尤其是上海的青洪帮分子参加，但该会一切实权操于徐手。

（三）戴笠死后，郑介民和毛人凤分任军统局正副局长；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郑、毛分任正副局长，在郑未返局以前，由毛代行。唐纵和毛人凤都不在帮，他们两人和杜没有直接往来。郑介民参加过青帮，是通字辈，辈分比杜大。郑和杜虽有接触，但他们的关系远没有杜和戴笠那样深，郑对杜的态度和戴不同，要用杜时就去找杜，用不着时就不和杜接近。郑在任军统局和保密局局长时，只于一九四七年夏间，由北平到上海时，去看过杜，在杜找他参加通济公司董事会会议以后，就再没去看过杜。郑在通济公司会后，曾在南京对我说，杜月笙吸鸦片烟，生活腐化，白天当晚上，晚上当白天，晚上去看杜，杜的精神很好，但他却要休息了，杜拉他长谈，他精神吃不消，因此很不愿去看杜。这是郑自己说他不愿去看杜的原因。其实郑不常与杜接触的最大原因，还在郑怕老婆，郑妻柯淑芳对郑管得很严，怕郑被杜带坏。我于一九四七年夏间，有一次和保密局总务处副处长成希超去南京北平路郑家时，柯就对我们说过这样一番话：上海这个地方坏得很！烟、赌、娼、交际花，无所不有。杜月笙的门槛多，所以郑介民一去上海，她总跟着郑去，

怕郑跟杜搞在一起学坏了。郑去看杜，她也和郑一道去，杜请郑去开会，她就不好去，但她打电话催郑赶快回家。

（四）王新衡从一九四六年二月起，任军统局和保密局的上海站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一直继续担任戴笠、郑介民和毛人凤等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系工作，杜待之如上宾。王不仅和杜本人的关系密切，两家内眷也往来很密。我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每次由南京出差到上海，必去善钟路（今常熟路）一号访王，好几次碰到姚玉兰和杜的大媳妇等在王家打牌吃饭，有两次王还邀我和她们同叉麻将，有时王的岳母和王夫妇也入局，每次都在王家吃了晚饭才散。她们在王家玩牌时，都打电话回家去，杜月笙听到她们在王家玩，就放心了。

一九四八年春，蒋政权选举立法院立法委员，王在上海市竞选，杜出来支持，为王拉选票。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所谓选举，都是由 CC 系和蒋经国等操纵，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蒋介石圈定后竞选的。王因和蒋经国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私交极好，经蒋经国提出由蒋介石圈定为上海市应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之一。由于所提候选人名额比规定的多，候选人必须自己拉票竞选，王在上海虽已多年，但他一向搞军统特务工作，从搞选举的角度来说，对外关系不够。因此杜月笙不仅为他拉关系，而且破钞为王请客拉选票。王得杜支持，当选了立法委员。一九四八年秋，王到南京伪立法院开会时，曾和我说起："我竞选立法委员，自己花的钱不多，完全是靠杜月笙帮忙的，杜帮助很热心，亲自为我到各方面拉关系，而且掏腰包请人吃饭，他为我的事耗费精神和金钱不少。"这可以说是杜月笙因为王多年来担任他和戴笠及军统相互勾结利用的联系而对王付出的一笔报酬。

张啸林的一生

朱剑良　许维之

张啸林是上海帮会首领之一，与黄金荣、杜月笙同称“上海三大亨”。张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后更名“寅”，以啸林为号。生于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浙江省慈谿县人。父是木匠，早故，全家依靠母亲劳动度日，生活艰难。

一八九七年，张二十岁，由于在乡下难以度日，举家移居杭州府拱宸桥。到杭州后，与兄张大林一起进杭州机房学织纺绸。但他游手好闲，不认真劳动，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久，弃工考入杭州武备学校，在校与同学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这就是他后来同军阀方面有勾搭的由来。以后，他又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为“先生”，从此除充当李的跑腿外，就在拱宸桥一带以寻事打架、敲诈赌博为生。当时拱宸桥一带另有一个赌棍，诨名叫“西湖珍宝”，以张小林经常勾引他的赌徒为由，同张结下了仇恨。一次，“西湖珍宝”纠集手下的赌徒寻张小林打架，张因寡不敌众，在拱宸桥呆不下去，不得不与同伙躲到别处，靠制造、出卖点花牌九、灌铅骰子等赌具为生。

张小林不但在杭州城里赌博骗钱，还于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的时候，到杭嘉湖一带引诱农民赌博，骗取钱财。乡间的农民受张的骗，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因而民愤

极大。清末宣统年间，杭嘉湖一带人民曾写状上告，但张小林凭他在衙门里的熟人为他通风报信，得以逍遥法外。

一九一二年，上海英租界的著名流氓季云卿去杭州邀请名角到上海演出时，与张小林相识，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张即随季到上海，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俸禄，又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街一带设茶会，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等勾当。

张小林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发展流氓势力，拜了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随后，他广收门徒，发展势力。由于身材魁梧，臂粗力大，凶狠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也捧他为“张大帅”。

当时，上海滩上的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一次，张小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和广东帮流氓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后，终于被张夺得贩运特权。后来，张又和南市流氓范开泰（诨名叫“乌木开泰”）、范回春（诨名叫“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为抢夺鸦片贩运权同法租界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殴斗。金廷荪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得意门徒，而张小林和浙江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当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于是张啸林和何丰林搭上了关系。黄金荣、杜月笙为了利用张同军阀的关系，不想同张翻脸；张为了在法租界发展势力也不想同黄、杜弄僵，于是请出在上海的青帮“大”字辈出面调停，提出了所谓“黑心钱公平用”，各租界各帮共同合作，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有一次，黄金荣因触犯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而遭监禁，张运用和军阀的关系伙同杜月笙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对此十分感激。从此黄、杜、张三人就结为把兄弟。

一九二〇年，黄、张、杜三人正式合伙搞鸦片联运。张依靠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由黄金荣发“通行证”。这样，黄、杜、张三个流氓头子就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的首脑，大发贩毒财。三鑫公司就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给帮会头子、军阀和租界当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一九二四年，黄金荣把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两亩地基，分赠给张、杜两家，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两家共由一个大门进出，亲如一家。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公开叛变革命，指使上海的帮会头子盗用辛亥革命时的“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把上海的青红帮组织起来，充当反革命急先锋。张小林是这个组织的三大头目之一。四月十二日，黄、张、杜指使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事后，蒋介石为了酬谢他们，委任黄、张、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张小林又和新军阀搭上了关系。黄、张、杜还和国民党的王柏龄、陈群、杨虎等拜为把兄弟，以为结纳。

一九三〇年，张小林“荣归故乡”，一时轰动杭州城。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政客、乡镇长和地痞流氓为他摆酒接风，无耻文人每吾生为张献名为“寅”，号啸林（因张生肖属虎故名寅，啸林意即虎啸于深林之中，以显示威势）。此后，杭嘉湖一带的盗匪、歹徒、地痞、流氓纷纷投在张的门下。张在杭州西湖畔建造别墅，在湖滨路上开设天然饭店，并购买大量良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

一九三一年，张与杜月笙等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八一号合开一家赌台，借以搜刮钱财。他们还将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巨款

投资于银行及工商企业，由流氓一变而为“实业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也和他们有来往。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厂主、店东中有些人找他们作靠山，请他们挂名。一九三二年，经杜月笙推荐，张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张啸林的“五十大寿”、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和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竟成了轰动当时上海滩头的盛典。

三十年代后，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以及和政界的关系均超过了黄、张，使张十分忌妒。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宋子文事先对杜月笙透露消息，杜没有将消息告诉张，自己在交易所中兴风作浪，发了大财，张对此深为不满。又由于张为人吝啬，而杜善于慷他人之慨，因而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的门下，再加上一九二七年底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张托杜引见蒋介石，但一直没有得到蒋的重用，张怪杜不肯帮忙。由于上述种种，张杜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常是面和心不和，张和蒋的关系也渐有疏远。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要黄金荣、张啸林和杜同去香港。当时黄以年老多病不问外事，决定不去香港。张认为杜月笙去香港，黄金荣不问外事，正是他依仗日本势力，独霸上海的好机会，所以决定留在上海。八一三沪战开始，张正在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立刻派人潜往莫干山跟他密谈。上海沦陷后，张即返沪，指使其门徒充当汉奸。

一九三九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到四乡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物品的补给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张的生意越做越大，乘

机大发其财。

一九三九年底，张啸林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张充当伪省长。国民党特务探听到这一消息后，决定杀张。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张啸林的亲信、在“新亚和平促进会”中主持棉花资敌工作的俞叶封约张去更新舞台看戏，张因临时有事未去，结果俞在看戏时被人暗杀，张虽侥幸未遭暗算，但已吓得心惊肉跳。同年，有一次张乘车外出，汽车刚开到福煦路附近，突然红灯挡住了去路，只见一阵枪弹向张的座车射来，玻璃窗上连穿三洞，张的司机猛踩油门，闯过红灯，张啸林才免于死。

经过这两次事件，张从此闭门不出，并雇了二十多名身有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住宅周围还有日本宪兵日夜守卫。后来国民党特务用重金收买了张的随身保镖林怀部。一九四〇年八月十四日，林怀部乘张啸林和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三楼商量事情之际，故意在楼下与张的司机大声争吵，张从楼上窗口伸出头来责问，林拔出手枪击中他，结束了这个地痞流氓加汉奸的罪恶一生。

（原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经作者同意，略作修改。）

我所知道的张啸林

俞　云　九

张寅字啸林，浙江杭州人，出生在杭州钱塘门外偏僻农村的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父母早亡，因是独生子，父母生前宠爱，事事依顺，故而自幼骄横跋扈。长大后，终日在外闲荡，所交者俱是浪荡子弟、游手好闲之徒，经常聚赌滋事，侮辱妇女，因警局有人为他们撑腰，所以任意横行。他们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其实是诈骗钱财。杭州人替这班凶神恶煞起了个绰号叫“撩鬼儿”，这是杭州土语，意为没出息。

张啸林在杭州声名狼藉，便跟吴鸿到上海。吴鸿原是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旧部，当过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在上海青帮中熟人很多。两人到上海后，由吴鸿奔走，遍访青帮中的关系，联络了一批中等流氓，并托人先后把张介绍到市区宝裕里“燕子窠”（低级烟馆）及沪西大赌台“荣生公司”等处，充当稽查（俗称“抱台脚”）。不久，张积了一点不义之财，就租赁重庆路马乐里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屋，每天呼朋唤友，聚赌抽头，并将其妻子娄氏接来同住。

民国初年，张啸林在上海邂逅其父生前友人唐观经。此人是黄金荣的徒弟，曾任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经理。不久，经唐介绍，张啸林结识了投机药商黄楚九，由黄介绍，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

头子。从此，他利用帮会势力，与人合伙贩卖烟土，同时广收门徒，扩张势力。当时杜月笙已渐露头角，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后来在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各建住宅，楼上楼下辟暗室相通，专供张、杜两人密会时启用。张啸林发家后，野心勃勃，拉拢日本浪人土肥原，又由土肥原介绍，认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经常在华格臬路秘密出入。当时华格臬路张、杜住宅前，车马盈门，有捕房警探保护。

军阀混战时期，张啸林以“实业救国”为名，联络范回春、周邦俊、黄楚九等，共同组织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是个大赌场，地点在江湾，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嵩山路，聘请包兰文、洪纠咎等负责日常业务。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共舞台对面创设杭州饭庄菜馆。中苏恢复邦交后，张和杜月笙合作组织霖记木行，与苏联驻华商务代办机构订立在远东独家经销俄国木材的合约。此时他早与东北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苏联运来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由霖记木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与交接事务。霖记木行设在爱多亚路九十七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后又在木行内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捧场。郑别号“梅花馆主”，擅长书法及散文。

张啸林有一妻三妾，同居华格臬路。发妻娄氏。妾张秀英，本青楼名妓，接交过许多军政要员，张利用她的关系，扩充势力。几个妻妾都未生育，四子二女都是自幼领养的。长子法尧与两个女儿都住在华格臬路，次子忠尧另住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其他两子行踪不明。张啸林企图在上海自立山头，除广收门徒外，还想利用法租界公董局和法捕房势力，因而将其长子法尧送往法国留学。

数年后取得博士文凭，不料回国后默默无闻，挂牌开业也无人问津。杜月笙为照顾张的面子，将张法尧安插在中汇银行任襄理，本系挂名，不数月辞职。

张啸林为让其子出头，拉拢顾维钧、褚民谊等，携带法尧赴南京，晋见蒋介石，希望进入政界。事前经顾等通关节，蒋已默许，在上海安排法尧一个局级地位，不料法尧在晋见时与蒋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故而做官的希望落空。

后来张啸林与杜月笙反目。杜月笙组织了一个“恒社”，张不肯示弱，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及“忍庐”等集团与杜对抗。

抗战前，西藏班禅活佛到上海参观访问，张啸林心血来潮，以上海佛教会名义，请班禅一行到他的寓所随喜。招待的场面奢华至极，从大门口开始直到百忍堂正厅，全部铺设黄色地毯，从华格臬路口起，排满他的爪牙及捕房中西探捕，列队欢迎。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张啸林经黄楚九、周邦俊介绍，勾结汉奸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等，经常在自己寓所设宴招待。后又与土肥原密议，准备公开下水，不久即为林怀部刺杀。

上海三大亨的勾结和斗争

石　君

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号称旧上海帮会流氓中的“三大亨”。他们由于气味相投，互相勾结，又由于利害冲突，常有斗争。现就笔者所知，略述梗概。

一、开始合流

黄金荣幼年就在南市十六铺一带游荡，一批码头、烟花间的泼皮，以其勇于斗殴，多依附之。这些泼皮中，有杭州阿发、饭桶阿三、闹天宫徐福生、小工连生，以及虹镇的瞿龙龙，英租界的季云卿和马斯乾、杨顺铨等。黄曾经进城里一家裱画店学手艺，由于游荡惯了，不久就重回十六铺一带流浪。

十六铺和法租界毗连，法巡捕房感到这些泼皮经常在边界骚扰，影响租界秩序，便把黄金荣找去当巡捕。他进了捕房，穿起号衣，第一天回到十六铺，给一些泼皮瞥见，说他当了捕房的走狗，来管自家弟兄。他感到有些懊丧，次日，把号衣交还法捕房。捕头当场灵机一动，认为让他不穿号衣，同样也可以管束这班泼皮，于是就允许他不穿号衣，改充便衣探员（俗称“包打听”）。这样，黄金荣就开始在法租界巡捕房站稳脚跟，当上华籍探目。

黄金荣当了包打听，感到要有一个基地，作为泼皮弟兄聚会之

所，于是在法租界大自鸣钟(今金陵东路黄浦区公安分局西首)开设了一爿聚宝楼茶楼，后来又在隔壁弄内开起日新池浴室，并且在每天夜里把茶楼改为唱滩簧的书场。这时杜月笙经饭桶阿三介绍，当了黄的“蟹脚”(又称“三光”，即爪牙、跑腿之意)。这些都是清末的事。

张啸林在辛亥革命以后，才跟黄金荣做“三光”。民国初年，上海的帮会曾经发生过一次内讧，季云卿离开上海，避风杭州。那时张啸林在杭嘉湖一带赶集聚赌，季云卿到了杭州，和他混在一起。风头一过，季回到上海，与黄金荣谈起了张啸林，说他在杭嘉湖有点名气，黄就答应把张找来做“三光”。这就开始了黄、杜、张三人合流。

二、黄金荣做了两租界的闻人

黄、杜、张合流之后，在法捕房总头目费沃利和大头目萨维尼默许之下，策动一些泼皮，在法租界摆赌场，贩烟土，坐地分赃。这时英租界出了一件越狱杀人案，一个名叫广东桂林的，因犯案被关在西牢，和一个叫福生的一同越狱。广东桂林一逃出来，就到虹镇去看摆赌台的瞿龙龙。瞿送给他一百块钱。他拿了钱，去五龙池洗澡，先到德胜昌买衣服，裕兴隆买鞋子，宏茂昌买布袜，这几家都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字号，这样一来，英租界暗探(又称“暗差”)看在眼里，发觉这人有些不伦不类，加以注意。这时英租界开始使用暗探，其中有些人原在西牢里坐过，或当过禁卒。他们看到广东桂林的面孔有些相熟，要把他抓进捕房。广东桂林开口要他们“照应”，暗探不许，广东桂林就拔出刀子，把一个暗探杀伤。英租界捕房觉得刚办暗探就出了这个岔子，会影响以后雇用爪牙，因此要求法捕房协助破案。

这个差使落在黄金荣身上，黄当即出动了些“三光”找寻线索，终于访得了同广东桂林一同越狱的福生，就想法把他找来，每天给他三块钱，作为寻找广东桂林的代价。三元钱一天，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重赏。不久，福生找到广东桂林，这就为黄金荣立下了大功。此案凶手落网，使黄金荣不仅成为法捕房的宠儿，而且从此也受到英租界捕房重视，变成上海两租界的闻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法租界工作的一些法国人应征回国，鹰犬不足，法国领事把捕房人事作了调整，给了黄金荣一个督察长的头衔，黄的好友程子卿、金九林等也分任了政治、刑警两处的督察，有关与中国官绅的往来，有时也派黄出面接触。如南市绅董毛子坚、上海交涉员许沅、警察厅司法科长刘春圃等，都成了黄家的特客。欧战结束，法帝国主义者还给了黄一枚勋章。

三、拳头开路，贩毒摆赌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把贩卖烟土作为主要手段之一，黄金荣当然要尝尝这块肥肉。当时在租界包贩烟土的是郭海珊、沈杏山等人，于是他和杜月笙、张啸林坐上汽车，到英租界大东旅馆郭海珊、沈杏山、谢葆生所开的公司房间，和郭等“讲斤头”（谈判交涉之意）。刚出电梯，正碰上沈杏山，沈一见黄就打招呼，黄却不由分说，猛的一拳，当场把沈打翻在地。郭海珊闻声出来，看到黄等摆足阵势，就说：“好！金荣老大，你回去！明天下午二点钟到日新池来看你！”黄金荣回说：“好，闲话一句！”第二天下午，郭海珊单枪匹马到了日新池，双方相见之下，拱手就坐。郭开口就说：“从今以后，我们二八开。”接着补充一句说：“英法两界都是二八开。”临走，郭又说：“此来无物可赠，就把汽车奉送，司机也跟过来侍候。”黄金荣随即道谢

一声，就此作别。

从此，黄金荣有土有财，有财有势，便在龙门口购置住宅，并扩建了日新池（今大众戏院旧址），经营剧场共舞台。以后，郭海珊回苏北灌云原籍，烟土买卖归黄一人掌握。

接着，外国军舰运送烟土，越来越多。黄金荣得费沃利等庇护，正式组织公司，公开出售，并开设赌场。所得盈利，提出一部分给费沃利和法捕房其他头目，连驻沪法领事、法军舰官员，也成朋分对象。有时法国舰队司令来华，如招待麦兰将军等等费用，也从贩土进项中出账。当时法租界的东新桥、郑家木桥、八仙桥一带，顿成烟、赌、娼集中的闹市，和邻近英租界的烟赌场联成一片，数十年中，成为帝国主义在上海藏垢纳污的中心。这些烟赌场不断开设和扩大，其中最著名的赌场是西藏路升吉里及福煦路（今延安中路）一八一号。

四、争权夺利，内外交讧

这个贩卖烟土的“三鑫公司”负责人，名义上是杜月笙、张啸林两人，实际上是由杜作主，后台老板是黄金荣，但最大的实际老板还是费沃利。杜月笙由此飞黄腾达，门下得力助手有顾嘉棠、金廷荪、马祥生、叶焯三以及季云卿的徒弟小阿荣等。这时候，杜月笙已经常和费沃利及费的译员李应生接触，成为法租界“大亨”之一，有时黄金荣还得仰其鼻息，特别是在动用公司银钱方面。

在这方面，黄对杜十分不满，可是尾大不掉之局已形成，黄亦无可奈何。同时，由于杜在公司里掌握全权，张啸林同样不满，但他却怪黄不给他和杜一样的权力，对黄也不称心。另一方面，杜月笙对黄的不断要求取款颇感棘手，因而彼此之间，造成了三角矛

盾。加以法捕房大小中外头目，因为分赃不均，对黄和公司心中不平，关系更加复杂，于是众流汇合，形成反黄浪潮。杜、张还诋毁黄金荣只是“扒灰老大”（指黄金荣与其媳暧昧关系），闹得满城风雨。后台老板费沃利应付为难，考虑劝黄金荣退职，以缓和矛盾。黄那时感到四面楚歌，只得打电报给正在哈尔滨一带“打围”（帮会中对在外码头活动的暗语）的季云卿，促其回到上海，准备收拾残局。

正当这个时候，山东临城发生了孙美瑶劫车案，被绑架上山的旅客之中，有法国姚神父及意籍律师穆安素等，经黄通过山东响马出身的青帮大字辈高士奎（杨顺铨的老头子）的关系，抢救获释。这一下，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冒险家们又认为黄立了功劳。同时季云卿已经赶回上海，向杜、张等劝说，要以义气为重，并谓房帏中事，暧昧难明，不宜信口泄愤。这才稳住了黄在捕房的地位，他们三人之间的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五、继续斗法，广收门徒

上述风波一时平息，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虽然还是三位一体，其实暗斗激烈。杜在黄的左右走卒之间，不时离间分化，企图使黄孤立。黄则网罗一班在英租界六马路赌台收歇后眼羡法租界烟赌的流氓朱锦芳、蔡洪生，并联络原与法租界烟赌无关而在流氓群中稍有名气同时也眼红法租界烟赌的故旧门生唐嘉鹏、谌则高、许福宝等，在周围壮大声势。同时，黄、杜双方，都在工商界及新闻界吸收了一些门徒走卒。

我那时在《新闻报》当记者，就加入了黄门。在黄的授意下，唐嘉鹏、谌则高、邱子嘉、朱锦芳、袁三宝和我在苏州结盟。继而《新闻报》的方菊影、蒋剑侯、蒋宗义、徐耻痕，《申报》的许承绪，《民国日

报》的江红蕉，《时事新报》的胡憨珠及小型报《金刚钻》的施济群，《晶报》的余大雄，《福尔摩斯》的吴微雨，《小日报》的黄光益和冯梦云，也加入黄门。加入杜门的有《申报》的康通一、唐世昌、赵君豪及《新闻报》的陈达哉。加入张门的有《新闻报》的余哲文（后来加入杜门）及小型报人黄转陶。对比之下，黄门声势较大，特别是小型报，完全站在黄的一边。于是黄发动报界对杜攻击。杜月笙颇有心计，知道报纸的影响，当报上刚刚开始对他攻击，他便表示认输。当时我曾为黄在报上有计划地攻击杜月笙所经营的烟赌买卖，使黄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胜利，我也从中得到好处，黄从杜那里拿到钱，由我在有关人员中分摊。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方才置身事外。

当时我们形成一个集团，取名“黄九公”，作为我和黄光益、施济群、江红蕉、吴微雨、冯梦云、蒋剑侯、徐耻痕在新惠中旅社合开“公司房间”的代称。初开这房间是为了日常有个憩息之地，所以一般报人及非报人如吴天翁、谌则高、严荫武等都是这个房间的常客。历时久了，外界在刊登新闻方面不断有所请托，事后亦有所馈赠。

与此同时，杜月笙在新城隍庙附近开设大发公司，在法租界发行彩票，由朱锦芳、袁三宝、唐嘉鹏三人管领，经办职员是早年黄楚九、汪汉溪的利济彩票行的旧部，定期开奖，骗钱万千。这彩票的所以能够发行，都是杜月笙向法租界上下打点奔走的结果，黄金荣则坐享其成。这是黄获得的另一胜利。当时杜不这样做，黄门朱锦芳、唐嘉鹏等将在黄浦江中拦劫烟土。

当时杜月笙主持的公司经手的烟土，有高头货、北口货、外洋货之分。高头货从长江上游的宜昌运来，在隆茂码头提取，从汉口运来的在大阪码头提取；北口货在怡和及金利源码头提取；外洋货

在高桥东海滩提取。承运这些烟土的轮船，在煤舱间装有特制的暗室，凭证提货，武装保护。一九三一年的一个春天，和杜月笙同属陈世昌门下的邵文滨，竟干出一桩当初黄门大将唐嘉鹏等欲干而未干的事。他督领盐务缉私的炮艇在金利源码头江中拦劫杜公司的烟土。这批货是顾福康（即八股党小福江）托警备司令部武装保护的，与另一武装保护烟土的吴淞要塞司令部集团在江中火并一阵之后，警察局水巡队出面干预，在十六铺关桥先行将烟土卸舱，连夜通过警察局长陈希曾调解，决定以后烟土提取，七日一周，由盐务、警备司令部、吴淞要塞司令部三方面轮流协提，每挑（一百斤）提开销费四十八元。这场风波，表面看是邵、杜之争，事实上也是黄、杜暗斗的事例之一。邵在事前，曾到钧培里黄宅，说是“阿生（即杜）瞧不起人”，意在请黄调处，哪知黄的左右亲信及黄本人大骂杜月笙忘恩负义，机深阴险，不几天，上述之事便发生了。

以上是我所知的黄、杜、张勾结与暗斗的一斑。张于抗日时期以汉奸被杀，杜于一九五一年死于香港，黄于一九五三年死于上海，才先后结束了他们之间的纠葛。

顾竹轩在闸北发迹和开设天蟾舞台

王 德 林

解放前，顾竹轩任闸北保卫团团附时，我任第九队队长，有过一段共事关系，得知顾的生平点滴，兹就记忆所及，略作简介。

顾竹轩，苏北盐城人，名松茂，竹轩是别号。兄弟四人，他行四，由于他的鼻子特别大，上海人给他一个绰号叫“顾四鼻子”。

民元前，顾到上海谋生，住在闸北天宝里南首，适值旧英租界巡捕房招考华籍巡捕，主要条件是年轻力壮，身材高大，文化程度不计较。顾的身躯很魁梧，适合条件，应考之后，便被录用。过了一个时期，不知为了什么事，又被开除。后经人介绍，投入一家有钱人家拉包车。不久，又不知出了什么事，包车拉不成了，于是拉一般的黄包车过日子。这样一直到民国七、八年间，攒积了点钱，买了几辆黄包车租给别人拉，自己坐收租金（上海人称“放黄包车”），进行剥削。

旧上海是流氓恶霸的世界，善良的人民无时无刻不在恐怖中过活。象顾竹轩这样“放黄包车”而想要不遭意外事件，就非托庇于恶势力或官府不可，因此，顾以同乡关系拜法租界的曹幼珊为“老头子”。曹在当时的青帮中是所谓“大”字辈的人物，那时上海的青帮中“大”字辈已没有几人了。从此以后，顾便在闸北广收门徒，扩张势力。

顾竹轩虽然有钱有势，终究还是帮会流氓身份，如要明目张胆地行凶作恶，就得勾结官府。因此每逢闸北第四区警察署新署长到任，他就送给一辆新包车，平时请客送礼，吃喝嫖赌，更不在话下，其他各警长、警士也都有沾润。顾竹轩和他们同恶相济，如虎添翼，气焰愈张。

齐卢战争后，闸北豪绅王彦彬借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实际上是树立私人武装势力，成立了闸北保卫团，自任团总，请顾任团附，团部设在闸北大统路慈善团内。这个保卫团的编制是团总、团附、总教练各一人，团下是队，每队设队长一人，辖三排，排长三人；每排辖三班，班长九人；每班辖一棚，每棚团丁十名。此外，每队还设书记一人，教练一人。这就是说每队除有职称的人外，计团丁九十名。当时闸北区大统路、共和路、太阳庙、潭子湾、朱家湾等地，共组成九个队。我是第九队队长，负责保护苏州河上驳船货运。团的经费由地方筹集，武器弹药也由团自备，用人则由团部报请淞沪警备司令部立案加委，整个团也由司令部管辖指挥，可以说是官管民办的地方武装。团丁由招募而来，大都是散兵游勇、市井无赖，这些人来的目的并不是真的为了维持地方治安，而是为了穿上“老虎皮”，手拿武器，可以欺压善良，为非作歹。也有些纨袴子弟应募而来，借此向人炫耀，聚众滋事。这些人和顾竹轩都有一定的关系，王彦彬想要控制这些人为己用，所以请顾竹轩担任团附。从此顾竹轩成为亦官亦痞的头面人物，横行于闸北，顾竹轩三字从此叫开，再没有人提起顾松茂。这个保卫团直到八一三战事起才溃散。

也在这时，顾竹轩凭借双重身份，姘上了一个有钱的寡妇，想利用所得钱财，在英租界开设戏院。当时上海英租界有一爿丹桂戏园（后改名丹桂舞台），生意很好，赚了不少钱，顾竹轩看了眼红，

于是通过英租界流氓头子季云卿和巡捕房，在丹桂对面，开了一爿戏园，取名“天蟾舞台”。

开张以后，上演《开天辟地》的连台戏，连续几个月，生意好极，赚了不少钱。

丹桂由于天蟾舞台的异军突起以及上演《开天辟地》等戏，在营业上受到很大打击，于是以重金挖去在《开天辟地》中担任主要演员的常春恒，也上演《开天辟地》，以致不少观众又舍天蟾而就丹桂，这既丢了顾竹轩的面子，又减少了收入，顾便用威胁手段，要常回去，常置之不理。于是顾派党徒在一个晚上当常到丹桂演唱时，用驳壳枪将常击毙于丹桂门口。

我利用顾竹轩的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顾 叔 平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按照党的指示，我通过四叔顾竹轩的关系，利用青帮组织，较为顺利地完成了一些革命任务。

顾竹轩字如茂，因为排行第四，人称顾四，生于一八八五年农历三月十四日，江苏盐城人。他十六岁从家乡到上海，靠拉西藏路底协记公司的黄包车维持生活。二十岁拜青帮头子刘登阶为师，以后自己收有徒弟、学生数百人，其下徒子徒孙数千人。上海解放前，他先后在南京路、福州路开设天蟾舞台，曾任闸北保卫团团长、闸北商团会董、江淮旅沪同乡会主席、苏北旅沪同乡联合会副主任、苏北难民救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并数次赈济过家乡灾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曾营救过当时的上海工运大队长姜维新同志（系顾竹轩侄女婿姜维山的弟弟），受到周恩来同志的赞许。以后，现在本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周学文、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的杨进和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朱俊欣等同志都曾在顾竹轩的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我从抗战时期开始，也在他的掩护和资助下，开展了护送、营救党的领导同志等地下活动。

一

一九四〇年底家乡江苏省建阳县解放后，我先后任区参议会常务委员、县参议员，区、县武装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由于我与顾竹轩有亲属关系，组织上经常要我负责联系，护送一些领导同志途经上海，保证安全。

一九四三年春，中共盐阜区党委派建阳县县长唐君照同志找我商量，护送喻屏同志及其爱人李枫同志从苏北转途上海赴延安。当时喻屏同志是中共盐阜区党委敌工部长，李枫同志是淮安县委书记，接到组织通知，要调往延安工作。从苏北到延安，如果走陆路，沿途日伪封锁很严，危险性很大；走水路如果先乘船到大连，然后从东北去延安，沿途也很危险。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从水路取道上海，因为可以利用我四叔顾竹轩的关系，提供种种便利和应付紧急情况。唐君照同志向我交代，途中让喻屏同志以我的老师身份作掩护，先由一位同志协助我送到东台，以后则由我一人护送到上海，在上海设法从日伪机关里办好去山西岚县的通行证，以便转往延安。他还关照说，可以将此行的意图和喻屏夫妇的身份向顾竹轩如实讲明，瞒着他反为不利。

我们一行四人，带着前往泰州的通行证，从根据地乘船出发。不料船一靠东台码头，就出了问题。驻东台的伪军三十六师王建斋部，在码头上对行人盘查很严，我和李枫以及另一位护送同志虽都幸免检查，但由于喻屏同志坐过牢，被钉过脚镣，行走不够正常，因此伪军一见，就盯上了他，在他的大腿上拍了一下，就将他带走。

那时我想起东台有个开粮行的曹小洪，他的父亲曹润之是个大绅士，与顾竹轩是把兄弟。我和另一位护送同志对他家也都很

熟悉。我们立刻离开码头，来到曹小洪家。我对他说："我的老师夫妇要回山西老家，老师在码头上被抓走了。"曹小洪听了，马上去交涉，不出一个小时，喻屏同志就由伪军送到曹家。

根据原先的安排，另一位护送同志先回去了，我与喻屏夫妇从东台乘船去泰州。靠着在泰州开运输行的二哥顾月波的帮助，我们避免了途中的麻烦，并办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到了上海，我感到直接到我四叔家去不妥，就和喻屏夫妇先到我三叔家去，然后由三叔去找四叔商量，四叔一口答应给予支持和帮助。他们两人考虑到日本人信仰佛教，一般不到寺庙检查，牯岭路（今江阴路）地藏寺主持僧与三叔、四叔熟悉，且寺中做佛事的人多，便于掩护，遂让喻屏夫妇住在寺内。接着，我向四叔谈了喻屏夫妇此行的真实情况，说明喻屏夫妇是共产党的干部，想依靠他的掩护和帮助去延安，他表示没问题。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顾竹轩在家（湖北路迎春坊十五号）会晤并宴请喻屏夫妇，研究了去延安的路线和安全措施。顾竹轩花了相当于一、二十担米的钱，买通了在发放通行证的日军机关办事的中国人，并由他作保，为喻屏夫妇领到了去山西太原的通行证。为防途中不测，他还写了一封给京剧名艺人李桂春（艺名小达子）的信，托他帮助喻屏夫妇解决困难，交给喻屏夫妇路上备用。因为李桂春常在北方大中城市唱戏，很有名气，人头熟，可以帮忙，而顾竹轩与他关系很密切，其子李少春是顾的义子。一切准备就绪，由顾竹轩买好了车票，让喻屏夫妇起程了。在接到喻屏夫妇平安到达山西岚县的信后，我返回苏北，向唐君照同志作了汇报，唐对我说，组织上已接到电报，他们安全地到达了延安。

一九四五年三月，射阳县委书记马斌同志爱人林立同志患甲

状腺肿大症，必须作切除手术。黄克诚同志指示，一定要设法治疗。组织上又通过唐君照同志找我，要我护送林立同志到上海住院治疗。于是我与林立同志雇了一只民船，乘船到了上海。

当时上海仍处在日伪统治时期，敌人对共产党人搜索很严。为了安全起见，林立同志先住在顾竹轩家中（现劳动剧场前台三楼）。后顾竹轩通过关系，让林立同志住进了红十字医院（今华山医院）进行治疗，出院后，又在顾竹轩家中休养了十多天。

我完成了任务，与林立同志一起返回苏北，并应顾竹轩的要求，把他的小儿子顾乃瑾带到根据地参加革命（顾乃瑾当时十五岁，现任本市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中共党员）。

二

一九四五年八月，组织上决定派我与田云樵、方寺、邹凡扬、吴杰等五人，到上海搞地下工作，由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张执一和田云樵两位同志直接领导。一九四六年，为了利用帮会力量与敌人展开斗争，中共地下党成立了帮会工作委员会。其方针是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壮大革命力量，瓦解敌人，迎接上海解放。该委员会由田云樵同志任书记，金龙章同志和我为委员，金负责洪帮工作，我负责青帮工作。我把组织上派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事和顾竹轩谈了，他表示愿意帮助。于是我们的会议，最初都是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召开的，他的经理室成了我们最安全的碰头场所。我还依靠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青帮组织，获取合法身份，站稳脚跟，发展力量，开展对敌斗争。

当时组织上指示我，利用顾竹轩的关系，竞选榆林区副区长，以便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我把这个要求向顾竹轩谈了。他为我提

丁名，并分批邀请榆林区有影响的人士和保长、区民代表等吃饭。这些人实际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或苏北旅沪同乡会的成员。席间，顾竹轩授意他们为我竞选副区长出力。结果，竞选成功，我接到了国民党市政府的委任状。

为了更好地利用各种社会势力和帮会力量，经顾竹轩介绍，我拜了教过蒋介石的胡敬安为先生，并与吴仲达（当时任江宁区区长）、马树礼（当时任《前线日报》馆馆长，后曾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结拜为兄弟，还收了三百多个青年作学生。这些青年中有不少人团结在我周围，对地下工作起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底，国民党榆林区区公所成立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反孟新民的斗争”，旨在揭露国民党汪伪合流的真象，打击敌人，教育人民。

孟新民是国民党新任榆林区区长，是方治、潘公展、钱大钧等人安插在榆林区的爪牙。汪伪时期，他在江苏仪征县当过日本屯垦部队的军法官，杀害过抗日爱国人民。抗战胜利后，他潜来上海，摇身一变，当上了区长，重新鱼肉人民。对于他的汉奸罪行，必须彻底揭露，才能使人民觉醒。

当时区公所工作人员顾轩吾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与我很接近。他是孟新民的同乡，累受孟欺压，在我启发下，决心站出来揭露孟的底细。他利用苏北旅沪同乡会的关系，到江苏仪征县搜集到孟新民当汉奸的原始材料，其中有孟亲笔批准杀人的档案，又加上孟在榆林区两年中敲诈勒索、侮辱妇女等等不法行为，共列成十大罪状，向市检察院、地方法院控告，要求依法惩处。

开庭审讯时，孟新民在顾轩吾等列举的确凿证据面前，无法抵赖，昔日的威风扫地，狼狈不堪。最后，法院责令交保释放，在旁听

席上的区民代表无不称快。翌日,《中华时报》报道了这则新闻。从此孟新民不再敢明目张胆地鱼肉人民,起了保护人民的作用,而更大的收获,则是揭露了国民党与汪伪合流的真面目,使人民看得一清二楚。

我当了榆林区副区长后,经常出席国民党市政府的有关会议,不仅了解了上海市国民党的政治动态,及时向组织汇报,并且能直接获得国民党内部的有关资料,搜集了不少重要情报。如我出席上海市国民党代表会议时,会上发下一份有关市、区党部以及特别党部的代表名册,我将这份名册一直保存到上海解放后,交给了上海市公安总局,为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提供了一定的查证依据。又如在区内看到发给区公所的密件中说,中共地下党员潜伏在摊贩中做工作,要注意,我立即报告了组织。

当年团结在我周围的青年,对情报工作也起了不少作用。如江海荣同志(解放后由我介绍入党,现任大沪饭店负责人)在市警察局加油站工作,他利用给汽车加油的方便,摸清了市警察局车辆的数字和车号,还与汽车司机拉关系,每当汽车来加油,他就主动与司机搭讪,问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从而获得了国民党抓人的重要消息,甚至还探询到特务头子、市警察局长毛森的行踪。又如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妄图固守上海,在四郊构筑防御工事,拜我为师的学生中,有不少是三轮车工人,他们利用踏三轮车作掩护,到上海四郊察看敌人碉堡的位置、数量,将情况告诉我。我得到这些情报后,都及时向田云樵同志汇报,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颁布了发放市民身份证的通告,封锁户籍,企图限制我党活动,迫害革命人民。我估计这将给党的地下工作带来严重困难,决定搞到一枚发市民身份证用的公章,作好准

备，挫败敌人的阴谋。恰好区里第十二保的干事郑德林，为人正派，和我有亲戚关系，是我们帮助安插在这个保的，两年中已按我的要求办了不少事情，我即找他交代了任务。他利用发证完毕、当场销毁公章的机会，暗中留下一枚公章，将其余的都劈碎，交给发证监察人赵志清，赵问为什么劈得这么碎，无法清点，他推说上级指示，要当场劈碎销毁，杜绝流弊，旁边的区民代表等也帮着说话，赵不再追问，这枚公章就从敌人的眼皮底下落到了我的手中。同时，郑德林还带了些空白身份证给我，以后我又在其他地方搜集了些空白身份证，准备给地下同志使用。

当解放战争在上海外围展开时，党要派一批同志进入市区，为解放上海作内应，可是市内敌人严格检查市民身份证，对无证者不是逮捕就是拘留，同志们一时进不来。张执一和田云樵同志非常焦急，找我商量办法，结果这枚公章和一些空白身份证发挥了作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解放前，我在顾竹轩的帮助和青帮组织的掩护下进行了一些革命活动。党和政府对于每一个对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党外人士是不会忘记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上海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一九五六年七月，他因患膨胀病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附　　录

恒社社章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本社以联络感情互相扶助为宗旨。

第二条　本社定名恒社。

第三条　本社设总社于上海，如国内外地方有社员三十人以上，经呈由总社许可者，得设立分社。

第二章　社　　员

第四条　本社社员须经本社社员二人以上之介绍，填就志愿书，经理事会之通过，填发社证。

第五条　本社社员应负缴纳社费暨遵守社章之义务。

第六条　本社社员有左(下)列情况之一者，得由理事会宣告出社：

甲、不纳社费在二星期以上者；

乙、损坏本社全体名誉者。

第三章　组　　织

第七条　本社设理事会，以理事十九人候补理事十一人组织之，为本社最高执行机关，其人选由社员大会推定之，任

期二年，连选得连任，但不得过三次。

第八条　理事会下设常务理事会，以常务理事九人组成之，在理事会停开期间代表理事会行使权力，其人选由理事会推定之。

第九条　理事会的组织条例另订之。

第四章　会　　期

第十条　本社社员大会每半年举行一次，分春秋两季举行之，惟如有特别事故，或经社员三十人以上之请求，理事会得召集临时社员大会。

第五章　经　　费

第十一条　本社经费分特别、经常二种。

甲、特别费。特别费之征集分下列二种：

（一）经社员大会议决者；

（二）由社员及非社员自动捐助者。

乙、经常费。经常费分每月五元及二元二种，每半年征收一次，或按月付给，由社员自认，但均得享同等权利。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社章如有未尽善处，得由理事五人以上或社员三十人以上之提议，经社员大会通过修改之。

第十三条　本社章自社员大会通过日起发生效力。

恒社社员录(一九三四年)

姓名	籍贯	职业
丁如松	上海	丁茂德鱼行
丁如柏	上海	丁茂德鱼行
丁逍山	湖北	中兴公司
于松乔	江苏句容	邮政局邮务员
方文波	浙江鄞县	同安公司押款部
方兆棣	江苏常熟	商界
方致晋	安徽桐城	警察总队第五中队书记
方朝荣	浙江绍兴	永庆钱庄
方锡圭	上海	招商局新栈职员
方镇耀	浙江定海	利泰五金电器号
王　冰	江苏	上海市社会局科员
王　刚	江苏江宁	上海市社会局惠工股主任
王合友	浙江绍兴	宝和旅馆
王兆槐	浙江遂安	浙江保安处情报科长
王如松	上海	法捕房警务处
王叔和	江苏吴县	协丰营造厂
王咏梅	上海	王元道药号
王顺发	江苏无锡	商界
王端瑢	河南	学界
王端璞	河南	学界

王润生	江苏吴县	上海邮政局邮务员
王锦堂	安徽泾县	招商局新栈会计
王啸潮	浙江鄞县	祥丰金号
水祥云	浙江鄞县	上海邮政局邮务员
毛　云	浙江吴兴	律师
毛志讷	浙江鄞县	泰利证券号
毛志祥	上海	牙医师
毛东方	上海	商界
孔　充	江苏兴化	商界
孔文焕	江苏吴县	礼和洋栈骏泰公司
史香会	浙江鄞县	招商局江天轮船司机
石仁安	江苏吴县	商界
江肇铭	江苏吴县	牙医师
江声涛	安徽婺源	上海警察总队第五中队长
朱化农	安徽无为	中国通商银行行员
朱世模	浙江鄞县	四明银行
朱志扬	上海	太古洋行保险部
朱信科	江苏泗阳	江苏江都县警察大队长
朱承德	浙江杭县	政界
朱焕卿	江苏江阴	太古公司大通轮船主任
朱学范	浙江嘉善	上海市总工会主任委员
朱开观	上海	无锡县政府田赋主任
朱鹤皋	江苏南通	中国医学院总务主任
朱渊如	上海	律师
池廷显	江苏嘉定	警界

任家驹	浙江吴兴	政界
伍麟趾	广东台山	上海公安局北站分局长
后大椿	安徽天长	上海市保安处秘书、中华海员工会筹委会秘书
戎乾楚	浙江镇海	慎德肉庄
吴之芬	江苏启东	律师
吴少五	安徽合肥	立成兴星记机器制罐厂经理
吴文奎	上海	棉业
吴玉亭	河北枣强	汉口公安局第三分局长
吴巧福	江苏无锡	源泰翻砂厂
吴江枫	江苏吴县	大吉祥印刷厂经理
吴菊山	江苏江阴	华成丝号
吴雄谔	江苏奉贤	江苏水上公安队第一区第二队三分队长
吴绍澍	江苏松江	汉口市党部委员
吴蓉舫	安徽休宁	商业
吴钦德	江苏无锡	吴祥泰机器铁厂
吴颖荪	浙江海盐	茂隆洋行
吴麟趾	江苏吴县	和兴烟公司发行所
李山南	湖南湘阴	新闻记者
李家鼎	浙江杭县	陆军骑兵第一旅旅长兼江西第一管区司令
李炳星	江苏川沙	上海华商电气公司发电厂
李厚椿	浙江镇海	棉业
李斐叔	江苏如皋	政界

李鸿生	江苏	统税局苏浙皖上海查验所
李庆鑫	安徽合肥	上海市公安局第五区五所所员
李麟书	上海	法商电车公司
汪其俊	上海	地产业
汪桂祥	浙江绍兴	布业
汪振华	江苏吴县	商业
汪秦泽	安徽黟县	政界
汪启麟	江苏溧阳	上海市公安局第五区巡官
沈半梅	浙江德清	上海特别市五区党部常务委员
沈志青	上海	大来银行储蓄部出纳科主任
沈芸齐	浙江吴兴	沈源顺鱼行
沈振华	浙江余姚	上海老北门警察所长
沈咏青	上海	纱布交易所营业科
沈彭年	上海	笙昌水果行
沈维钧	浙江鄞县	中南烟公司
沈华庭	浙江慈谿	商界
沈宝槐	浙江鄞县	祥丰皮毛行
沈楚宝	浙江鄞县	航业
何长如	上海	大沪饭店总稽查
何绍芬	浙江萧山	财政部视察员
何铁华	浙江余姚	招商局北栈栈长
杜　武	河南封邱	学界
杜　刚	浙江德清	上海市教育局督学
杜文彬	江苏南汇	商界
余　畊	浙江昌化	浙江省公安局侦缉队长

余空我	安徽歙县	新江闻报馆编辑
车德芳	浙江镇海	招商局海宴轮船司机
蜀　鼎	北平	上海市公安局调查股主任
周　鼎	江苏吴县	江苏省水上公安队第四大队长
周文卿	浙江鄞县	医师
周孝伯	江苏南通	律师
周家祥	江苏阜宁	益丰庄
周梅庭	浙江鄞县	三兴渔轮局,周治兴渔栈经理
周剑云	安徽合肥	华威贸易公司
邱毓棻	江苏南汇	太古洋行武昌轮船
东云龙	江苏南通	逸园办事处经理
屈　伸	湖南宝庆	军政界
邵子英	浙江慈谿	商业
邵佐龙	江苏无锡	泰利铁行
邵湖生	浙江鄞县	海昌轮船公司经理
邵宝生	浙江	大昇月记金号
林芝梅	浙江鄞县	浙东第三区缉私营带
林昌植	浙江鄞县	太古码头巡丁房主任
林德华	四川威远	上海公安局督察员
林瑞福	上海	云州新记大旅社
金长根	上海	纱花业
金殿扬	江苏吴县	上海巡道街警察所长
俞士新	江苏宜兴	政界
俞天碧	广东中山	上海市社会局
俞仙亭	浙江	招商局

俞闻喜	浙江杭县	警界
姚本元	河南	上海市吴淞警察所所长
姚君喻	浙江吴兴	律师
姚盘卿	江苏宝山	意商义兴公司
姚肇基	上海	商界
施燮明	江苏吴县	神州旅社副经理
施体奋	浙江鄞县	华商公共汽车公司
胡炎民	上海	红手洋行
胡拜石	安徽休宁	胡开文墨庄
胡秉衡	上海	晋成钱庄
洪雁宾	浙江镇海	宁波实业银行
计鸿生	江苏	棉花业
后士杰	浙江鄞县	宁波市公安局第一分局长
胥仰南	江苏丹徒	鸿新染织厂
查铸亚	江苏宜兴	政界
浦贤元	江苏吴县	商界
唐世昌	浙江鄞县	申报馆编辑
唐经绶	江苏吴县	翔华电汽公司营业主任
唐缵之	上海	吴淞市政办事处
梁扶初	广东中山	上海市公安局北站分局长
孙桐岗	山东济南	航空委员会航空教导总队
孙祥簋	浙江慈谿	四明银行协理
孙理彬	江苏川沙	聚昌衣庄
孙贵清	江苏镇江	商界
孙经镶	浙江奉化	汉口农省两行公库主任

孙梦花	江苏金坛	新新通讯社社长
奚士尚	江苏	商界
袁炳元	江苏丹徒	协康橡皮总行
袁钰璋	江苏江阴	元记缫丝厂
倪瑞卿	浙江镇海	四明银行
桂葆泉	浙江镇海	法捕房警务处翻译
徐子权	浙江	商界
徐大统	浙江镇海	顺亨洋行
徐守怡	安徽南陵	商界
徐世福	浙江鄞县	法租界公董局职员
徐宗耀	上海	商界
徐忠甫	浙江镇海	航业
徐持志	江苏武进	警界
徐南丹	浙江慈谿	福源钱庄
徐茂先	浙江慈谿	国泰银行
徐怒涛	贵州毕节	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
徐纪雄	浙江上虞	棉花业
徐德良	浙江鄞县	招商局江新轮司机
徐荫谷	江苏吴县	华丰营业公司
徐鼎昌	江苏嘉定	公永和盐栈
徐懋棠	浙江镇海	大英银行华经理
徐福生	上海	泰昌祥洋货号
凌伯麟	浙江鄞县	宁波和丰纱厂经理
凌希超	浙江嘉兴	盐务
马君彦	辽宁	杭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马连良	北平	梨园界
马义寿	江苏嘉定	鸿泰钱庄经理
高荣堃	山东济南	庆记轮船局
高守武	天津	淞沪警备司令部
高庆奎	北平	梨园界
高联奎	北平	梨园界
殷信之	上海	达昌建筑公司经理
殷信甫	江苏吴江	东吴大学同学会干事兼校长室秘书
秦有德	上海	商业
张　桐	江苏无锡	律师
张一道	浙江绍兴	上海邮政局邮务员
张上珍	上海	太古洋行
张子廉	浙江杭县	三星棉铁厂经理
张元吉	上海	万昌米号
张少泉	江苏南汇	典当业
张石川	浙江镇海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
张旭人	浙江吴兴	浙江储丰银行经理
张克昌	江苏嘉定	上海邮政局邮务员
张克英	上海	太古公司吴淞轮船主任
张孝平	江苏吴县	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香全	浙江鄞县	招商局江新轮船司机
张南邨	江宁	警界
张松涛	上海	扬子饭店经理
张金魁	江苏江都	商界
张颂椒	浙江镇海	美国联邦保险公司华总经理、四明

银行地产部

张秉辉	福建闽侯	上海市社会局第四科科长
张菊生	上海	英租界工部局华总总办处
张惠卿	浙江鄞县	商界
张惠荪	浙江镇海	招商局南栈新永源帐房
张彩生	浙江镇海	新江天轮船
张德泉	浙江嘉善	新泉记营造厂
张种德	湖南常德	新闸警察分局巡官
张钰寬	江苏镇江	大利元奖券号
张锡麟	江苏青浦	大利元奖券号
张蓝田	河北静海	老北门警察所巡官
陆元虎	江苏昆山	淞沪警备司令部
陆京士	江苏太仓	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
陆金祥	上海	法捕房
陆金宝	江苏	商界
陆桂鑫	芜湖	上海市公安局侦缉员
陆机云	上海	华商电车公司
陆殿栋	浙江桐乡	学界
郭　莱	江苏六合	上海市公安局督察员
郭仲逸	上海	浏河水上公安局队长
郭兰馨	江苏南汇	上海市土地局科员
郭翛翛	浙江宁海	七星炼铜厂
陈　震	上海	律师
陈大器	浙江海盐	律师
陈之毅	云南江川	上海市保安处第一股长

陈元鼐	浙江镇海	全国经济委员会
陈有运	浙江鄞县	华东毛织厂
陈存仁	上海	国医
陈存甫	浙江鄞县	木业兼钱业
陈君毅	上海	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
陈亚夫	上海	乐华女子中学校长
陈抡魁	江苏无锡	中央党部派沪调查员
陈晴岚	广东	商界
陈智强	上海	商界
陈维贤	上海	商界
陈达哉	江苏嘉定	新闻报馆编辑
陈善章	浙江绍兴	中国营业公司
陈鹤年	江苏无锡	政界
陈德全	浙江镇海	金业
许也夫	浙江天台	上海市社会局科长
许祖年	上海	上海公安局水巡队二分队长
许惕君	上海	纱布交易所内均昶号
许海棠	江苏宝山	海丰汽车行
许梦麟	江苏昆山	永安公司皮革部
许姬传	浙江海宁	政界
许箴时	浙江吴兴	商界
曹万生	浙江鄞县	招商局江安轮司机
常福田	湖北	三北公司鸿升栈
毕振华	浙江吴兴	上海徐家汇警察分所所长
章一平	浙江诸暨	浙江保安处情报科指导股长

章荣初	浙江吴兴	上海纺织印染厂
庄瑞五	江宁	上海中宁轮船公司总经理、南京商业储蓄银行筹备员
傅振北	湖南长沙	警界
傅瑞钰	浙江镇海	招商局栈长
汤有为	浙江吴兴	律师
华士俊	江苏昆山	昆山县公安局长
贵郁华	浙江衢县	政界
鄂　森	江苏丹徒	律师
闵贯玉	江苏昆山	国医
冯一先	江苏吴江	沪北中学校长
冯保颐	浙江慈谿	静安法律事务所
冯宪成	江苏高邮	上海特别市党部第六区常务委员
黄子雄	江苏嘉定	律师
黄香谷	福建建瓯	商界
黄振东	江苏丹徒	华新进出口公司经理
黄颂声	江苏太仓	太仓浏河镇保卫团长、江苏第一区烟酒稽征分局太仓稽征所主任
黄椿生	上海	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翻译员
裘剑飞	浙江	商界
虞元荣	浙江绍兴	商界
万芹香	上海	萃盛砖灰行
杨　楞	江苏无锡	政界
杨克天	江苏江都	六合县长
杨祖钰	江苏无锡	永和米行

杨景存	安徽怀宁	商界
杨俊生	江苏淮安	大中华造船机器厂长
杨德林	上海	邮政局邮务员
杨钟甫	浙江诸暨	医师
杨润森	浙江嘉兴	商界
叶安香	江苏川沙	兴泰电灯号
叶荫三	上海	上海、大华造纸厂搪瓷厂总经理、骏大华行经理
叶夔麟	江苏吴县	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虹口捕房翻译
赵忠迪	江苏无锡	卜内门公司
赵君豪	江苏兴化	申报馆编辑
赵培鑫	江苏吴县	四明银行保管部
赵树声	浙江乐清	全国邮务总工会委员
刘心权	江苏无锡	上海邮政局邮务员
刘建郡	山东滕县	税警局第二区区长
刘俊卿	河北霸县	公共租界探长
刘海若	江苏武进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
刘云舫	天津	上海市邑庙警察所长
刘云舫	安徽庐江	外交部顾问
刘祺生	上海	华商电车公司
刘灏芳	江苏武进	英租界工部局工程师、大德工程设计社经理
潘守仁	上海	新鸿记建筑公司总理、洽盛地产公司经理
潘旭昇	上海	三新染织厂

潘家田	江苏吴县	江苏溧水县县长
潘振荣	安徽巢县	苏浙海洋护运缉私队长
郑正秋	广东潮阳	明星影片公司
郑君毅	江西安远	赣闽粤湘鄂北路司令部副官处
郑春和	江苏无锡	洪昌银号
乐秀樑	浙江镇海	商界
蒋长文	江苏丹徒	法捕房
蔡福棠	上海	长丰地产公司
谈松泉	江苏海虞	中法学堂法文教员
诸锦良	江苏武进	纱布交易所信诚昌号
楼邦达	浙江鄞县	华义银行
钱治平	上海	纱布交易所均昶号
钱南山	上海	纱布交易所泰昌号
钱培荣	江苏吴县	康茂无线电行
钱养然	江苏吴县	纱缎业
钱寿恒	浙江杭县	汉口市公安局第五分局长
卢　培	湖北江陵	上海市公安局四区二所所长
萧青山	湖北蔡甸	上海邮政局邮务员
谢　濬	江西南昌	军界
薛寿龄	江苏吴县	冠生园总公司经理
薛懋桐	江苏无锡	税警第二十五队
归松涛	上海	商界
韩士进	江苏铜山	商界
庞道宗	江苏吴县	金业
谭富英	北平	梨园界

谭楚书	浙江黄岩	商界
边定远	浙江慈谿	财政部科长
罗洪义	江苏无锡	洪昌银号
罗海涛	湖北大冶	上海市社会局调查员
罗道崑	江苏吴县	警界
严承德	江苏无锡	永丰染织厂
严桂福	江苏宝山	严新记营造厂
顾月波	江苏盐城	商界
顾嘉才	江苏兴化	商界
顾嗣曾	江苏宜兴	江宁要塞司令部
龚元彪	江苏吴县	律师
龚伯勤	江苏吴县	大昌轮船公司
龚绵钦	江西南昌	水上公安队十二大队队长

共三百二十四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５４辑　旧上海的帮会
作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页数=３８２
ＳＳ号=１００８３５５１
出版日期=１９８６年０８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　　旧上海的帮会
附录页